

前 言

在亚洲，菲律宾是工人斗争力量相对较强的一个国家。经过多方准备，2012年7月《工厂龙门阵》的编委会成功赴菲，对一批罢工积极分子、工人组织者和工人领袖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小册子，就是本次访谈的一点成果，本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综述篇，概要介绍菲律宾的社会历史，宗教历史，工人生活和工会情况。

第二部分运动篇，集中介绍、总结菲律宾工人斗争中的经验技巧。

第三部分访谈篇，在接待方的细致安排下，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组织者和各类工会、机构，但篇幅所限，只能摘选内容相对完整且较具代表性的数篇访谈，使读者可以了解到1980年代以来在菲律宾从事工人斗争的组织者们的个人经历和精神面貌，并一窥菲律宾基层工会的大致情况。

第四部分是我们同行几人的游记。

第五部分资料篇，我们选译了英国工会代表团于1985年访问菲律宾工会的报告的前18章。该报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菲律宾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实际情况，是帮助了解菲律宾的参考性材料。

我们为何要远赴菲律宾做采访？在中国，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已经激发了众多的自发工人维权事件。要在未来的斗争中少走弯路，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有所借鉴，而不能一味地在黑

暗中摸索。

远的不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和菲律宾就爆发过激烈的工人斗争，既有重大影响，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次菲律宾之行，我们有幸访谈到了某些健在的工人运动老战士，他们中的不少人依然活跃于劳资对抗的前沿。当地工人的反剥削传统，抗争者的丰富个人经验，都是有待挖掘的宝藏。虽然相对整个“宝藏”来说，我们的短暂访问只获得了一点皮毛，但对于尚未经历严酷阶级战争的中国工人来说，这点皮毛的价值并不小。这就是我们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基本动机。

菲律宾的同志和国内外很多朋友对这次访谈提供了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个访谈计划不可能实现。小册子各类材料的翻译、校对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无私帮助。在此，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真诚感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见谅。

2013年9月

我们的联系方式：

邮箱：worker72@163.com

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共和国，把社会革命的理想传播到全世界，也包括菲律宾。1931年，最具战斗性的一批菲律宾工人创建了以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党。

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给了依赖出口的菲律宾经济当头一棒。生产萎缩、裁员减薪日益严重，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工潮。1934年8月，首都马尼拉及毗邻地区的17个烟厂爆发万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烟草业老板和国家机器联手行动，使出各种招数企图打垮工人：警察大肆抓人、恐吓工人家属；老板的打手开枪袭击罢工集会；自称“同情弱势”的知名维权人士来到罢工现场，劝诱工人“先复工，再谈判”。但工人顶着压力坚持了七周，迫使资方有所让步。1937年底，某外省采石场五百工人发动静坐罢工，要求废除计件工资制。为了对抗老板，采石工人想了不少点子：卧轨拦路阻止资方运货；警察拘捕工人领袖时，罢工者全体陪同领袖前往监狱；当局解送工人领袖去外地关押，工人与同情罢工的附近居民一路跟着囚车游行，轰动了整个地区。罢工者的团结气势让老板一时束手无策，只好低头。1938年，外省某糖厂工人罢工，老板一度妄图招募周边农民进厂顶替罢工者，但在工人的积极沟通下，罢工赢得了村民的普遍理解，工厂继续瘫痪，资方只得坐下来谈判。

菲律宾的劳资双方相持不下之际，世界萧条进入了新阶段。1941年，为了确保能源、原料和市场，日本资产阶级出兵攻占了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最终于1945年战败投降。1945年夏，美国资本家跟着麦克阿瑟元帅的舰队，回到菲律宾。他们发现，与战前相比，局面已大不相同。

利用日本占领初期的基层混乱，菲律宾农村涌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简称“民抗军”），既打击日伪，也废除了地主的租税和高利贷债务。在城市，日军的铁腕管理让工人暂时沉默服从，却大大激化了固有的阶级矛盾。日本战败后，菲律宾工人的抗争热情空前迸发出来。1945年7月，在共产党指导下，全国的战斗性工人成立了“工人

组织代表大会”（简称“工组代会”），领导了几十次罢工，要求加薪和签订集体合同，多半以资方让步告终。十个月里，“工组代会”会员从一万增至八万，半数在工业中心大马尼拉地区。在农村，以“民抗军”

战士为骨干，普遍建立了主张土地改革的农民协会。

战后的菲律宾社会还出现了强烈的呼声，反对学校里的美式殖民教育，要求美军撤离和民族独立。一句话，劳苦大众希望改变现状的意志已势如烈火。

稍事犹豫后，美国统治者决定改变对菲律宾的控制方式，允许独立建国，但保留美资的全部经济利益（包括麦克阿瑟元帅控股的金矿）与压倒性政治影响。1946年7月，菲律宾宣告独立。

独立之后：资本家的政府是如何摧毁工农运动的

独立后的菲律宾，实行了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重要决定，照旧先在几百个权贵家族之间达成共识，并获得美方的认可，而后通过选票奠定大众眼中的合法性。这条上层小圈子政治的游戏规则，以及有名无实的“自由选举”对民众的良好麻醉效果，是菲律宾长期坚持普选制的两大主要原因。由于权贵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之间的交易往往需要反复讨价还价，客观上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分散低效。从1946年到今天，这个岛国每逢选举，谁的钱多（贿选买票、操纵媒体），谁的打手多，镇得住场面（篡改投票结果），谁就有把握当选。



当然，权贵们也经常就选区和候选名单达成默契。

建国之初，菲律宾剥削阶级的统治还算稳固，但一时也无力平定共产党影响下的罢工运动与农民协会。原“民抗军”总司令、种植园罢工运动组织者塔鲁克（菲共中央领导人）还当选国会议员，但旋即被国家扣上“危害社会”的政治帽子，终止了议员资格。在城市，“工组代会”会员突破了十万，就连美国驻菲海军雇佣的当地修船工人也罢工了，要求支付加班费，让美军高层大为光火。在广袤的乡村，农会要求降低地租和高利贷利息，水牛角的号声成了各村联合示威的著名信号。于是，美国大老板出马了。1946年前后，以广告商出身的兰斯代尔中校为首，中央情报局的一伙特种战专家来到菲律宾，手把手指导如何粉碎工农运动。这批高学历、举止斯文的“书呆子”专家向菲律宾的新生国家机器注入了“科学精神”，把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的最新成果与先进仪器相结合。

美国行家的指点下，当地政府在打击工农方面变得很有章法。在农村，政府用禁令和屠杀把农会赶入地下，迫使菲共进行武装自卫。随后，当局以一套组合拳打得共产党步步后退：推行“缴枪换土地证”，引诱游击队员投降；国防部的纪检部门深入乡村，当众处决严重扰民的下层官兵，改善军民关系；国家安全机构向地主筹募巨款用来奖赏告密，出卖一个农会干部可换得相当于农场工人十年工资的现钞；一些支持农会的村庄则整个被焚毁，以儆效尤。同时，军方不惜血本组建火力强大的特种部队，在空军配合下穷追猛打每个暴露的游击目标，直至歼灭。在城市，当局中止了《人身保护令》，无限期拘留罢工工人以及同情者，但又允许战斗性工会（比如“工组代会”）继续保持合法状态，让人觉得似乎还有集体维权的空间。工人犹疑不定之际，国家用武力破坏了绝大多数罢工（直至出动坦克），并诱使每个不驯服的工会陷入分裂。稍晚时候，菲律宾国会通过了《工业和平法》，这部法律既要求工会宣誓排除“危险分子”，在正式罢工前接受劳动部门的长时间调解，又禁止



老板任意解雇工会会员。也就是说，国家总是可以借口工会有“危险分子”而镇压工人，但纸面上工会能让工人有安全感，只要老板认为工人没有威胁……

在菲律宾军方成立的“心理作战处”，中情局专家讲解说：要收拾造反者，必须先杀得他们万分恐惧，再显示国家主导社会进步的一线希望；要阻止更多人造反，必须让他们无法在心理上

与统治者决裂，这同样需要给他们一点过好日子的指望。要想营造希望的氛围，有待一位够份量的“青天大老爷”做场好戏。1948年，兰斯代尔找到了合适的“青天”人选——律师出身能说会道、身强力壮鹤立鸡群的国会议员麦格赛赛，并安排他出任国防部长。这位部长的主要工作是扮演民众救星的角色，到处慰问贫困户、视察水渠建设、下田插秧、动辄穿着运动衫与农民一起载歌载舞。中情局请来戏剧学院的老师，教麦格赛赛如何在镜头前动情、落泪和豪放地大笑。他到处开空头支票，向农民承诺彻底土改，宣布工人享有最低工资，在大群围观者面前现场办公，惩治腐败的恶警小吏，他比周星驰更有资格拥有那句著名的台词：“其实我是一个演员”。铁拳与空话作秀并用下，1952年初，强大的共产党、城市罢工运动和农村游击队都化为灰烬了。

菲律宾的有组织工农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被打得发懵，不知如何还手。无论在菲律宾或其它国家，当剥削阶级感觉劳苦大众可能威胁自己的统治，它就主动“换个玩法”，把有节制的劳资冲突升级为阶级战争，利用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成果（从心理分析到凝固汽油弹）削弱、迷惑、腐蚀和灭绝最富战斗性的那部分工农。阶级战争并不自动等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如果单凭暴力能解决一切难题，独立后的菲律宾政权大可把浮上水面的工人运动一举荡平，不必筹划了好几年才迟迟出手。

问题在于，消灭肉体容易，绞杀工人的不屈精神却难得多。1948~1952年间的这场战争中，兰斯代尔及其同道总能比工人多走好几步棋，直至彻底打垮了工人。他们鼓励工人保持日常维权工作的惯性与幻想，然后在最意外的时刻打击工人。当工人开始警惕时，他们就在传媒上高调公告“菲律宾公民皆有依法维权之神圣权利”云云，让工人产生了新的麻痹幻觉。他们一面在乡下对农会斩尽杀绝，一面默许城市工人照旧搞罢工请愿、开群众大会、会见记者，似乎还很“理性包容”的样子。对那些力量已暴露的工人组织进行周密侦查后，国家一出手就盯着最勇敢、诚实和老练的工人往死里打。兰斯代尔之流的目标不是仅仅驱逐、杀死或囚禁若干惹麻烦的刺儿头，而是向工人发动一场“总体战”：涣散工人的队伍、唆使工人盲目行动、诱导工人怀疑自己的力量，挑动工人内讧，最终剥夺工人改变现状的勇气。兰斯代尔成功了，只有当被统治者陷于消极，麦格赛赛一类的“政治影帝”才有粉墨登场的可能。

从一开始，头脑最清醒的那部分工人就看破了麦格赛赛的猴戏纯属骗局，但多数民众还是对大人物的假面心存侥幸。这不是因为多数人太蠢，而是由于战斗性工人处处挨打，让广大穷人看不到追随工人反抗老板的现实意义。回过头来看，那一代菲律宾工人缺少合格的思想武器、组织形式和自卫手段。作为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机构，工会证明了自己无法帮助工人对抗统治者发动的“总体战”。作为最有效的集体维权工具，单一的罢工（即不生产）只要缺乏配套措施，而国家决心压服、乃至砸碎罢工集体，工人就难免牺牲惨重，更别说落实罢工的具体目标。菲律宾与其他地方的工人，必须尽早找出更符合斗争需求的组织形式，以便掌握如何进攻和退却才能把损失减到最小，必须懂得通盘审视作为一个整体的统治秩序，学会如何戳到有产阶级的痛处，迫使统治者有所顾忌，必须破解、缓冲老板与国家对工人骨干的“精确打击”。否则的话，难免周期性地重复灾难：工人维权有所进展，工商老板及其国家爪牙展开“总体战”，有组织工人土崩瓦解，维权成果付之东流。

自1952年起，十多年过去了……

心比天高的马科斯总统： 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强国之路

屠刀下的工农不再“闹事”之后，菲律宾统治者便集中精力捞钱。国家用全民税收补贴私人工商企业，提高海关税率阻止物美价廉的洋货冲击民族市场。五六十年代，由于本土制造业的起点太低，在确保商品销路和压低工人工资的前提下，菲律宾老板办工厂相对容易，利润一度也比较高。由于经济持续增长，一系列新工业部门建立起来，首次有了钢厂和炼油厂。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力雄厚的境外资本越来越眼馋菲律宾的市场，不甘心总被排斥在外。六十年代初，在国际财团的压力下，马尼拉的中央政府逐渐开放了国内市场，很快造成民族工业的凋敝，而且无力扭转局面。当时，除了萎靡的经济，看似稳定的菲律宾社会简直百病丛生。官商勾结的背景下，某些上层集团长期大规模走私境外纺织品对内倾销，扼杀着本土纺织业，还减少了国库税收。国家权力相对分散，权贵家族山头林立，造成各级政府与议会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从粮食自给到打击走私）常常议而不决。菲律宾政府一贯自称“亚洲民主的橱窗”，在这个“橱窗”里，普选制度、新闻自由以及独立司法似乎样样不缺，但选票、媒体和法院牢牢攥在权贵家族手中，完全是他们肆意瓜分权力与财富的工具。1950年，当时的议会多数党领袖阿韦利诺坦率表示：“如果我们不能有一点贪污受贿，作为多数党有什么用呢？我们掌权是为了什么呢？我们都不是天使”。上行下效，菲律宾各级官吏腐败盛行，除了几百个豪门大族碰不得，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都是官府中人借机勒索的对象。就连中小资本家也被事实上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很

难通过正式渠道影响政治决策，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庭、产业。一个没靠山的老板，随便哪个芝麻大的官儿都可能跑去敲竹杠。谁敢“民告官”，大多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

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失败后，菲律宾工人二十年没有加工资。新一代工人成长起来，工潮便重新抬头。1964年1~8月，三万多工人参与了86次罢工，反对裁员、要求加薪或赔偿关厂造成的损失。长久以来，进城找活干的赤贫农民川流不息，搞得首都的贫民窟里充斥着失业人口，治安也日益败坏。六十年代后期，欧洲爆发的巨大罢工运动与学潮冲击了全世界，菲律宾的校园也骚动起来。学生们充满斗志，敢想、敢说、敢做，他们憎恶老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社会黑暗，渴望颠覆这个灯红酒绿的吃人社会。

眼看局面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菲律宾的统治者日益强烈地希望涌现一位铁腕强人解决两大难题：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对这一意愿，美国也表态支持。很快，收拾烂摊子的人来了，他叫马科斯。

马科斯来自上层家庭，律师出身。他相貌好、口才好、善搞人际关系，曾任参议院议长。1965年，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上任不久，新总统向全国公众说了一堆大实话：“国家处于深深的经济和道德危机中：侵吞国库、国有公司负债累累、无效率的农业、走私、物价上涨、贸易下滑、政府濒临破产”，在讲话中，他还揭开了特别敏感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广袤的土地为少数家族集中拥有，另一方面，农民接近奴隶般的贫困和租佃状况”¹。

马科斯许诺改变这一切，为此要求更多的权力。不过，无论谁想变动利益格局，都要做好流血死人的准备。权贵大佬也好，贪官污吏也好，谁都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几年过去了，马科斯的政治革新迟迟没有起色。事情是明摆着的：哪怕推行有限的改良，马科斯也必须超越狭窄的权贵

¹ 1967年1月23日马科斯在国会的讲话。

小圈子，依靠更广泛的有产阶层，甚至得适当拉拢一番平民百姓。

1968年，一批年轻革命者重建了菲律宾共产党，主张“从外国的和封建的剥削压迫下解放菲律宾人民”²，并强化了号称“新人民军”的游击队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69年是菲律宾的议会与总统大选年，照例也是权贵们互相结盟、出卖、谋杀和分赃的年头。选举中，马科斯与竞争对手都干了不少龌龊勾当：花费巨资打点相关人等（从检察官到记者）、恐吓选民、把持投票站和暗杀对方候选人，诸如此类。最后，马科斯赢了。平心而论，这次选举的肮脏事不比以前多，但撞上了民众情绪发酵和意识觉醒的时刻。当被统治者的阶级心理趋向积极抗争，当青年学生对现存秩序充满怀疑，任何暴露在社会目光下的不公正现象都可能搅出天大的风波。

马科斯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是伴随着抗议选举舞弊的学潮开始的，而且一直很闹腾。马尼拉的工业区时不时罢工，大批农业工人进京请愿，抗议生活恶化。校园内的风潮从未停息：学生们反对驻菲美军，反对美资老板欺压工人，要求改善穷人的生活，要求土地改革。在几个主要产粮区，地主们扩充了打手队伍，想吓住农民，却刺激了更多人投奔“新人民军”。在马尼拉，有的学生开始暗中帮助工人改进罢工的组织工作。总统府里的人坐不住了。1972年9月21日，马科斯的几名亲信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针对国防部长恩里莱的假行刺闹剧³。当晚，与美国政府充分协调后，马科斯宣布全国军事管制，实施戒严法，管制期间保持新闻检查，禁止一切罢工游行和政党活动。军管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立即

² 1970年出版的《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第三章“人民民主革命”。本书作者是非共重建后的主要领导者何塞·塞松。在书中，塞松与他的战友们认为“菲律宾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菲律宾社会的基本矛盾”。

³ 1972年9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的车队遭到袭击。当时政府指控这是共产党所为。十多年后，恩里莱公开承认这是一次他参与炮制的假行刺，目的是为军事管制提供借口。

增加了对菲援助的力度，马尼拉的美国商会、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总部也陆续发电，支持戒严措施。截止 1972 年年底，至少六千人被捕，主要是工人和学生，也包括一些行政长官、议员、律师和记者。一时间，整个社会沉寂下来，都在看马科斯下一步如何动作。

在马科斯心中，军事管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革新，军人、资本、经济专家三位一体，构成这场革新的主导力量。他反复宣讲说，只要持之以恒地做大经济蛋糕，就能让所有人自动分享繁荣的好处，从而建设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中产社会”⁴，也就铲除了“工人接管国家”一类激进主张的社会土壤。

在美国顾问团的参谋下，马科斯首先改组了警察系统，几乎根除了扯经济后腿的走私现象，又在首都发起打黑除恶运动，治安明显好转。随后，各地军方收缴了五十万支民间黑枪，查禁了若干私家雇佣部队，盘踞乡间的土皇帝们顿时收敛了许多。从此，马科斯一直重用军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军队规模也扩大了三倍⁵。军管后，战战兢兢的国会不再扯皮，及时通过了政府送交的各种新政法案，许多劣迹斑斑的各级公务员也分别解职、下狱，一时人心大快。

集中了军政、立法大权之后，马科斯开始落实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蓝图。他听从国际垄断资本的建议，以出口加工区特殊立法、低廉劳力、解雇自由和禁止罢工为条件，吸引制造业投资。军管前，菲律宾只能出口原料，年销售额不过十亿美元，到 1979 年，出口额达 79 亿美元，半数为电子、成衣产品。同时，政府通过举借外债，迅速推动公路、港口与电站建设，为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与造船业服务。马科斯向外资担保不会搞国有化，但拒绝取消进口商品的高税率，继续扶持弱小的民族产业。此外，他还废除了美资在菲律宾零售业的长期优惠地位。军管的前几年，菲律宾国民经济达到 9% 的增长率，个别年份破天荒出现了

⁴ 见马科斯的著作《今日的革命和民主主义》。

⁵ 马科斯时期，菲律宾军队从军管前的 6 万人扩大到军管后期的 24 万人。

城市失业率大幅度下降的奇迹！1975 年，全国工厂工人总数首次突破了五十万。

在农村，马科斯高度重视解决粮食自给问题，投入了很大力气。通过改良稻种、加快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农业技术革新以及扩大稻米种植，1976 年菲律宾实现了大米自给，甚至还略有出口。同时，官方团体号召大量爱国青年志愿下乡扫盲、完善卫生防疫与婴幼儿保健系统，成效显著。军管十年，菲律宾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十岁。为了支持粮食种植，也为了削弱反对派权贵的经济实力，马科斯在主要粮食产区相继向四十万无地农户发放了土地证，分发的土地部分来自国家赎买的的地主田产，但也有部分来自没收的权贵乃至教会地产。

军管前期，马科斯创造了一个大企业拥有无限自由的投资环境，赢得国内外垄断资本的喝彩，被肉麻地誉为“民族之父”。中心城市的不少白领、小生意人也觉得治安好了，衙门办事不那么刁难了，颇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打算在这个戒严法主宰的清平世界里安心发点小财。在马尼拉，工业区贴出的招工广告明显频繁起来，工人似乎多了点盼头。粮食自给后，农民也在观望生活能否迎来转机。

但随后几年，菲律宾各主要阶级却迎来了新的社会风暴……

军事管制的另一面：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种种后果

在菲律宾，官商勾结不算什么新鲜事。上层人士通过长久的商业合作、轮流坐庄的执政方式与世代联姻，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典型的大有产者，通常住在城市，在乡下有土地和种植园，他昨天是企业经理，今天当选议员，明天谋个行政差事，后天或许跑去出任报社老板或大学校长……但占据了空前地位的马科斯及亲信帮派，攫取的资本也是空前的，让其他统治者不无微词。短短几年，总统的密友小圈子把持了一系列工业领域（从航运、银行、建筑到矿山），成为万众侧目的暴

发户。这伙暴发户垄断了境外贷款的发放，贪图抽头的好处，放任走私现象死灰复燃。他们与外资、军方合股兴办房地产、建设工业区和水平先进的大农场，为了得到所需的土地，随意强拆民宅、强占土地，不给分文赔偿。他们插手水电项目，却不肯安置库区移民。只要受害群众起来抗议，他们就派兵开枪弹压。马科斯曾肃清过私人武装，他的密友们为了商业利益又开了招募佣兵的政策口子。1976年上马的巴坦核电站本来是国家能源领域的突破之举，但总统指定的关系户承包商与官僚合伙来把工程变成了浪费资金的无底洞，建造预算翻了几番，还是未能交付使用。

军管初期，马科斯出手狠辣，整治了一些对中央决策不买账的世袭权贵，包括他的原搭档、副总统洛佩斯。除了没收产业、拘押判刑等措施，军管当局还秘密处决了个别大资本家以及走得近的高官。随着总统帮派的利欲膨胀，随着马科斯越来越公开割失势富人的肉、救“新政”周转开支的急，统治上层（从老牌权贵到天主教会）对他的不满渐渐浮上水面。天主教会在菲律宾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层教士自称“神的谦卑仆人”，但私下里全是拥有可观房地产与企业股份的大富翁，教会本身更是掌握着不计其数的大量产业，而且一向有权不纳个人所得税与土地税。在大米自给运动中，马科斯已经把教会的某些土地分给了种粮户，逐步取消教会经商的免税特权，着手侵夺教会的市区房地产生意。后来，他又瞄上了教会名下的一家大商业公司，试图插一手，气得主教们拍了桌子。

军事管制的维持，要靠军队。偏偏马科斯在军中重用本省同乡，视为嫡系，外省籍的军官统统成了后娘养的杂牌，敢怒而不敢言。军中，酝酿着倒戈的潜流……

在农村，粮食连年增产导致米价下跌，害苦了种粮的小农户。为了拉拢大地主，马科斯拒绝向种植经济作物的四百万农户分发土地。规模经营和改良技术的引进，提高了大农场的种植效率，却使许多农业工人

失业；日渐增多的大型工程建设往往伴随着强征农村土地，逼得许多农民家破人亡，惟有拿起武器除霸雪恨。马科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菲共“新人民军”不断壮大的过程。在全国主要产粮带——中吕宋地区，共产党游击队驱逐或消灭地主、高利贷者和地产商，减轻了农民的租税负担。农村的变乱让城市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他们（小厂主、小商人、基层军政官员、普通牧师）或是自己有一份乡下地产，或与地主群体有生意、姻亲或朋友关系。然而，军管当局既不肯过问新贵大资本家的强拆、强占行径，也不大理睬“新人民军”对中小地产者的威胁。

无论内部如何火并，统治阶级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共识：必须最大限度压榨工人。不管工业有多繁荣，受慢性通胀的影响，工人工资的购买力还是在下降。数年沉寂后，工业区里又有了不稳的苗头。马科斯的对策是迎头痛击，下令情报部门严查工人串联。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完成改革，某些人就要多牺牲一点。如果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镇压，那是错的”⁶。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快于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假如马科斯能无限摊大利润大饼满足工商界，假如美国靠山不计代价给他撑腰，或许他的独裁还能维持许多年。但资本主义市场的真理，就是不存在永恒的繁荣。1973年，中东石油价格暴涨，成为新一轮世界性萧条的导火索。菲律宾是个贫油国，进口能源的涨价直接影响经济和人民生活。持续的外部萧条，减缓了原料与制成品的出口换汇。政府曾给予厚望的海上油田开采，回报很小。政府越



⁶ 1977年5月30日马科斯答记者问。

是没钱，越依赖世界银行的贷款，越难以对抗代表境外资本的世行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1979年，马科斯取消了大部分贸易保护措施，让民族工业雪上加霜，私人老板的怨言更多了。马科斯执政的最后几年，经济增长徘徊在2%，工厂开工率难得超过50%。剥削者内部清算“民族之父”，用政治换马度过统治危机的时刻，已经来临。

七十年代末，马尼拉的大资本家圈子向马科斯递交了请愿信，要求他安排权力移交。总统选择了回避，答复时含糊其辞。1983年8月21日，流亡美国的菲律宾反对派政治家阿基诺闯关回国，打算领导国内反马科斯运动，结果刚下飞机就被总统亲信派人枪杀，震惊了世界。阿基诺死后，菲律宾进入山雨欲来的震荡期。

阿基诺何许人也？

与马科斯一样，阿基诺来自权贵家族。但与马科斯相比，阿基诺更富有，更英俊，更会处理人际关系，口才和文笔更好。他22岁当选市长，28岁当选省长，35岁当选参议员。他追求清白的名声，同时拒绝任何严肃的社会改良。阿基诺家族所在的省份，租佃率高达90%，阶级矛盾长期处于爆炸的边缘。在家族种植园里，阿基诺很早就关注农业工人的不满，挖空思想出了“劳资共处”的法子。他鼓励工人成立工会，并与工会签订了集体合同。这份合同并无多少待遇改善的内容，但从此阿基诺可以对诉苦的工人说：“有事问工会，这是工会签了字的”。他向工人家属提供免费的简单纺织技术培训，可惜当地并无纺织厂；他安排工人子女免费上小学，当然孩子早晚还得接父辈的班。1969年，阿基诺家族年收入5亿美元，他雇佣的制糖工人年收入200美元，而在多数工人的眼中，“阿基诺少爷”是个软心肠的大善人。

在1948~1952年间统治者对工农发动的“总体战”中，阿基诺为本阶级做出了独特贡献。那时，他以知名独立记者的身份来到山中，劝

告共产党游击队总司令塔鲁克体面缴枪⁷。他们谈了三个月，在空军轰炸的威压下，在阿基诺“缴枪后可以恢复国会议员身份”的保证下，塔鲁克签署了投降文件，但他与战友们下山后被当场收监，结结实实坐了十四年大牢。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阿基诺的表现。他听说塔鲁克下狱，立即去探监谢罪，许诺照顾塔鲁克的子女。塔鲁克原谅了他。

60年代末，某些“不识大体”的农业工人还是与阿基诺翻了脸。他们组织了秘密工会，要求降低地租。阿基诺的父兄们招募了成群的枪手恢复秩序。这种事，他是不过问的：阿基诺的手上不沾穷人的血！但秩序未见恢复，针对地主的游击活动反倒愈演愈烈。于是，阿基诺出面与“新人民军”首领、菲共中央委员丹特司令秘密会面，达成了技术性质的互不侵犯协定：阿基诺家族不协助当局围剿游击队，反过来，共产党也会克制当地工农的抗议行动。

马科斯上台后，阿基诺成为不妥协的反对派。他们两人都是剥削阶级的忠诚儿子，马科斯要动利益格局，以求变法图强，所以他想独裁；阿基诺维护旧秩序，反对承担变法的未知风险，所以他要民主。阿基诺有坚强的意志和明确的操守，不愿成为马科斯的附庸。他是军管后大搜捕的受害者，在秘密囚禁中瘦了20公斤。在狱中，他知道不少有权势的朋友在营救他，但也做了死的准备。坐牢八年后，在美方的斡旋下，当局批准他流亡北美。流亡期间，阿基诺忙于会见国内在野党派的代表。他没拿出什么新主意，还是坚持有产阶级统治下的普选制度，然而，在这个制度下，赤手空拳的穷人永远无法用选票战胜资本家的金钱和打手。阿基诺公开表示，赞成“新人民军”或工人代表参加选举，前提是“放弃暴力”。至于剥削者向工农施加的暴力，那是自古如此，天然合理的。在阿基诺看来，“法治社会”意味着穷人必须遵守富人制订的法律，而“理性维权”意味着就算有天大的冤屈，“行为过激”就活该受罚。

⁷ 即上文提过的原“人民抗日军”总司令、菲共中央要员，曾当选国会议员的塔鲁克。

1983年8月阿基诺遇害后，马科斯倒台已经是意料中的事，虽说他还想挣扎。这个阶段，后来被统治者称为“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进程”的台前幕后（一）：

军管时代的工人运动

1972年到1979年，菲律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0%，但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据菲律宾劳工部统计，1977年90%的工人工资仅够勉强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是贫民，他们比工厂工人更穷，依靠打零工挣一点饭钱。70年代中期外向型经济的暂时繁荣，为工人维权提供了新的动力：毕竟一次罢工可能毁掉老板的一叠订单。

公平起见，得立即说明：为了预防工人“闹事”，马科斯政权做了它能做的一切。军管初期逮捕的数千人中，最先获释的是反对派政客、律师和媒体人（除了阿基诺这样的少数硬骨头）。工人和学生则多半无限期羁押。在美国顾问的协助下，菲律宾警方引进了最新的侦缉和拷问技术（比如资料检索的计算机化），并与台湾、韩国同行交流镇压工人或政治犯的经验。但正如一位当年的罢工积极分子所说：“老板杀人也挡不住工人组织起来”。工业区出现了一个个工人小组，最初的聚会理由可能是游戏、看孩子或者学跳舞，那些对老板的压迫特别敏感而渴望行动的人，会彼此靠拢。个别主张社会革命的学生，这个时期也离校入厂，帮助最初的工人小组站稳脚跟。

1975年10月24日，一家私人酒厂发生罢工，要求改善待遇。这是军管以来的首例罢工，而且得到了周边社区贫民群众的支援。罢工44小时后，雇主被迫让步。同年11月，首都发生反政府学潮。同年12月，在菲共指导下，战斗性工人的地下组织“菲律宾工人协会”发动了第二

次罢工。这段时间，在不少工厂，工人自发地短暂停工，颇有出了一口恶气的感觉。马科斯的反应是重申罢工非法，但工人已经不大看总统的脸色了。1975年11月到1976年1月，光是在大马尼拉地区，4万工人发动了至少25场罢工。1976年春，官方宣布允许“某些罢工”合法化，这一让步只能说明政府在摇摆或者试探，不能影响罢工实践，因为自发的工潮照旧是不守什么官订程序的。同年六月，新的连锁工潮开始了，政府指示加紧镇压，但工厂里出现了更多的小组。情报机构的协调下，警方与工商界合作组建了许多秘密暗杀队，不断绑架暴露的工人小组领导者，形成一股“失踪”潮。

1977年是军管五周年，虽然经济起伏不定，但菲律宾有了一个新富阶层，市容也更繁华。与此同时，75%的工人工资依旧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每隔几个月，这里那里就发生一次自发罢工，让政府防不胜防。几年里，更多的工人被“失踪”，更多的学生匿名进厂，协助工人组织，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从贫民扩大到白领阶层。1980年，战斗性工人成立了全国组织“五一工联”（KMU），接受菲共的政治领导。1981年，马科斯形式上结束军管，却随即颁布了换汤不换药的《公共安全法》和《国家安全法》，引起更多人对他的憎恶，而憎恶又化为嘲骂。一位“五一工联”干部回忆说，当时的社会情绪“觉得一条狗都可以当总统，只要它不是马科斯”。取消军管后的四个月里，发生了上百次罢工。

狼狽不堪的马科斯第一次想讨好工人了。他下令提高最低工资，责成私人老板给工人加薪并支付加班费。工人不理他（菲律宾的劳动法规，凡是有利工人的条款，从来是废纸一张），老板更厌烦他了。1982年，马科斯想重振铁腕人物的雄风，大批逮捕“五一工联”的干部，但这一年还是发生了157次罢工。官方工会的基层组织也卷入了工潮，个别厂一级的官方工会被罢工工人改选，扩大了面对老板的周旋空间。

毋庸置疑，马科斯的革新努力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搅动了菲律宾社会。正如阿基诺生前担心的那样，失衡的快速发展，难免带

来失控的阶级斗争。在罢工运动中，身为社会生产的直接控制者，具备工业纪律的菲律宾无产阶级，初步显示了它的力量。部分学生、贫民、白领和文化界人士半自觉地跟随着它，希望一路走到没有剥削压迫的新天地。绑架、拷打和杀戮吓不倒他们，捐款和各种外围协助源源涌向了“五一工联”。有产阶级也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并希望主动地加以利用。早在 70 年代中期，某权贵家族的代表就秘密接触菲共的马尼拉地区领导人，试探在城市“搞搞震”的现实可能。1975 年年底，天主教会直接支持反政府示威，把它与总统的裂痕公开化了。菲律宾的前途，取决于到底哪个阶级将主导反独裁运动，工人还是资本家？

“民主化进程”的台前幕后（二）：

1986，愤怒与矛盾的一年

美国一直严密控制着菲律宾的政治生活，而且惯于同时扶持几个实力派互相牵制，自己扮演仲裁角色。就连马科斯，也一直没能挣脱来自大洋彼岸的狗链子。1985 年，上千名菲律宾中下层军官半秘密地成立“军队改革运动”，要求撤换歧视杂牌同僚的军队高层。马科斯本想把犯上的军人一锅端，美国却放话禁止他这么做。同年，美国国会披露了马科斯家族的海外资产清单，引起菲律宾舆论界的一片哗然。在此之后，《纽约时报》“奉旨泄密”，把马科斯当年为了争取选票，伪造抗日英雄履历的丢人黑账，一五一十翻了出来，让马科斯臊得无地自容，抓狂又没辙。一切，都指向了 1986 年初的总统选举。

既然马科斯赖着不走，美国决定与他拉开距离，并间接施加压力。与美方配合默契的上层反对派，开始整顿队伍。一小批实业家成立了“核心小组”，协调各路在野势力。阿基诺家族派出秘使，穿梭于工商界、媒体、军方与权贵家族之间，说服多数上层势力共同抛弃马科斯，以免

局势失控。当有的政客不愿让出参选机会时，天主教会出面摆平了选举利益的纷争，推举阿基诺夫人为反对派的统一候选人。1986 年 2 月 21 日，经过了投票、互相指责对方舞弊（马科斯和反对派照例分别搞了贿选和做票）、总统调兵进京与马尼拉的反对派百万人集会等等戏剧性场面之后，在美国政府的指示下，军方反水了。马科斯出逃夏威夷，他的 24 年新政正式告终。

菲律宾共产党也好，“五一工联”也好，都对貌似突变的变局感到十分意外。菲共影响下的工人对有产阶级核心部分的密室阴谋毫无知觉，错过了主动参与这次运动的机会。当马科斯企图在首都强行清场的危急一刻，倾巢而出、跑去鼓动首都工人上街的，是天主教会的牧师们！但上街流血又流汗的几十万工人，只是充当了阿基诺夫人“民主凯旋”的无名炮灰。

匆匆就职后，阿基诺夫人的内阁使出浑身解数，弥合权力更替造成的上层裂痕，尤其是防范下层群众趁乱夺权。他们再一次证明，剥削者可能在许多领域是纯粹的外行，但绝对精通怎样维护统治地位。矿业大亨翁格平充当了阿基诺夫人的高级顾问，他的建议归结为两句话：“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

选举期间，阿基诺夫人专门去工业区和码头向工人演说，许诺落实工会和罢工权。新政府上台后，一面释放了狱中的几位“新人民军”领袖以示开明，一面动员各地的权贵家族，恢复以往的私人佣兵团，因为内阁担心普通士兵受到群众运动的感染，或许靠不住了。马科斯完蛋以后，工人运动似乎解放了，涌现



了二百个新工会，从二月到十月，各地发生了至少五百次罢工，多数是无组织的自发行为。阿基诺政权没有急于跟工人撕破脸，它宣布同“新人民军”开启和平谈判，借机要求工人暂退一步，为谈判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在菲共的指示下，“五一工联”提出了“最大程度自我克制的（罢工）原则”，引起许多内部议论。从三月起，政府“只做不说”，重新收紧工人身上的枷锁，首先是授权军警压制自发罢工。

1986年五一集会上，阿基诺在三十万工人面前发表演说，一面发誓尊重国际通用的保障劳工团结权条款，一面要求工人提供六个月的缓冲期，静待政府的改良措施。她号召工人“忍耐、谅解和支持一些特殊的政策和计划，这种计划可能不会立刻对你们这个部门有利，但是从长远来说，它将使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富强，足以实现劳动者的梦想”。那一年，她接二连三讲了不少深得民心的漂亮话（从土改、扩大就业到调查军管时期的两千起“失踪”案），当然，政府在上述领域始终“只说不做”。

统治者懂得，在街头运动导致政权更迭的时期，“不能让工人太嚣张”。阿基诺夫人的内阁公开拒绝提高最低工资，以免刺激工人的胃口。同年八月，警方加剧打击自发罢工。从1986年3月到1987年4月，在罢工现场被枪杀的菲律宾工人，竟然比1972年戒严令公布到1984年底类似的遇害工人的总和还多。当巴坦出口加工区发生罢工，政府干脆派出军队，当街杀人。

整个夏天过去了，政府与菲共的和谈在继续，“五一工联”在等待谈判的结果。这段日子里，无数工人生平第一次投入自发罢工并关心政治生活，他们对斗争的步骤、手段、组织形式、敌友的划分以及工人运动的目标各持己见，而“五一工联”却被“静待和谈结果”的想法束缚了手脚，没能引导自发罢工运动找到前进的最佳途径。

1986年11月13日，“五一工联”主席奥拉利亚以及司机遭到资本家打手的伏击虐杀。这是一次典型的“斩首行动”，客观上是对工人战斗状态的深度测试。尽管奥拉利亚还算不上工人运动的“最高权威”，

但他领导的“五一工联”早已是工人斗争的著名旗帜，对他的谋杀，刺伤了整个无产阶级。1986年11月20日，至少50万工人、贫民为奥拉利亚送葬，队伍延续了22公里长。对许多工人来说，深深的悲愤过后，是茫然无力感，痛觉“天又翻回去了”，少数人变得急躁。至于菲共，它继续忙于和平谈判以及设法参与国会选举，直到1987年8月，站稳脚跟的统治者主动终止了和谈并重新围剿“新人民军”。缺少全局战略的自发罢工运动跌跌撞撞，又延续了两年（1987年436次罢工，1988年266次罢工），终于告一段落。菲律宾工人运动的历史性高潮过去了。

阿基诺政权完成了本阶级赋予它的使命，让上等人依旧是上等人，而下等人依旧是下等人。它削减了总统权力（比如独自中止人身保护令和宣布军管的权力），保障了不会轻易再出一个马科斯，以民族自强之名搞得其他有产者鸡飞狗跳。它贱价甩卖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借了更多外债，熬过了八十年代的经济低迷。

九十年代至今：勉力支撑、艰难度日的工人运动

1989~1991年间，在中国、东欧和苏联发生的变化，影响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包括菲律宾。工人夺取政权的社会革命理想，从此受到广泛的嘲笑、质疑和无视。作为社会思想的晴雨表，九十年代后的菲律宾学生很大程度上沉迷利己主义，专注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五一工联”逐渐分裂了：有些人成天嚷嚷“城市暴动”，最后一事无成；有些人依附于打着爱国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客（比如九十年代的拉莫斯总统）；有些人满足于当一个专职的工会官员，为会员、更为自己搞点福利，不再关心“阶级解放”一类大字眼。

近二十年的菲律宾经济，长期处于低谷，依靠八百万海外打工者的巨额侨汇勉强维持。粮食自给的政策被遗弃了，菲律宾再次依赖进口大米。西方推动的国际贸易自由化、1998年金融风暴和中国制造业崛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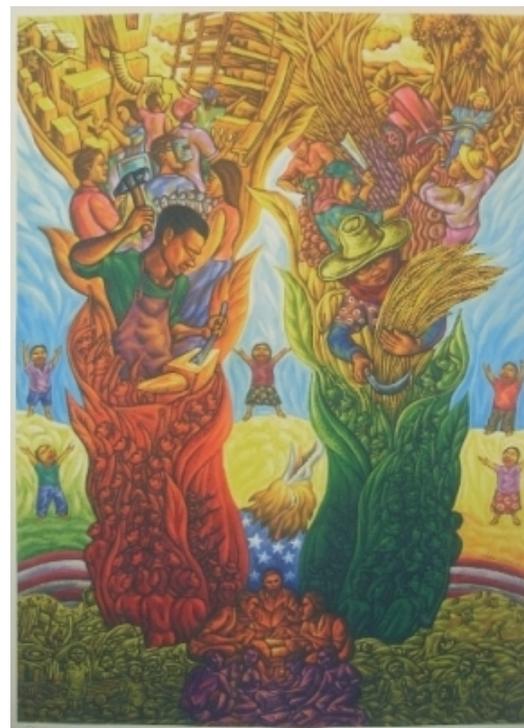
反复摧残下，这个岛国的工业资本相当颓败，工厂规模变小，工人更难组织。阿基诺夫人以来的历届政府，一贯厉行“出口加工区”政策，既是为了吸引外资，也分流了马尼拉地区的工人队伍。全国两百多个出口加工区的普遍特点，是偏僻封闭，就像远离城镇的一个个小王国，事实上采取了“无工会、零罢工”的原则。各加工区的 60 万工人不仅彼此分散，也失去了传统的周边贫民社区支援。早在阿基诺时代，政府就取消了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各地、各经济特区自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政府修改劳动法规，通过了许多反工人的条款。这些年，不仅“五一工联”备受打击，官方工会也在萎缩中：七十年代末，工会普及率达到 10%，2012 年仅有 2% 左右。

针对“五一工联”这类战斗性工人团体，政府、媒体、娱乐圈、基督教会、学术界和教育界开展了无孔不入的抹黑战，不是说“工人要知足，其实老板早想搬厂了”，就是说“哪里有‘五一工联’闹事，哪里工人就失业”，不是说“搞罢工的人都不信天主，没有灵魂”，就是说“非法罢工是恐怖主义，出了事没人同情”。在统治者的洗脑攻势下，尤其是在“个人顾个人、傻子为大家”的消沉社会氛围下，新一代工人多半不敢接触工会组织者，往往具有胆怯、蒙昧的精神特点。进入 21 世纪后，菲律宾工人的待遇很差（收入普遍只够吃饭穿衣、缺乏社保），不夸张地说，多数工人一旦失业立即有挨饿的危险，但他们十分恐惧正面的劳资抗争，对任何反剥削话题态度冷淡。工人维权的主要途径不再是罢工，而是没完没了的打官司扯皮或街头请愿。相当程度上说，菲律宾工人运动的战斗传统被切断了，过去几十年拼死抗争赢得的许多成果，已经荡然无存。

尽管工人的总体情绪相当萎靡，菲律宾政府还在继续灭绝有组织工人，显然有着“积累实验数据、改进操作工具”的长远打算。除了公开使用军警驱散、逮捕、殴打和枪杀罢工工人之外，国家机器还有条不紊地暗杀罢工积极分子、工会干部以及同情者（比如律师、学生、牧师），

造成工人运动进一步孤立无援。“五一工联”的一位前辈感慨说：“马科斯时代活下来的许多工人，死在阿基诺时代了”。最近十年，至少有上千名工人、农民维权分子或同情者被暗杀、被“失踪”，蒙难者的名单每天都在加长。

菲律宾工人阶级承受了无数的苦难，遭遇过严酷的战斗。它经历了荣耀的时刻，也曾陷入彷徨无计的心境。对中国工人来说，菲律宾工人的经验教训，是一座神奇的宝库。中菲工人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数量、收入、教育程度、文化兴趣或所属工业部门的水平，而是位于不同的斗争阶段。菲律宾工人的“过去”，很多方面可能是中国工人的“将来”。这本小册子的作用，就像是做一次阶级斗争史的“时光穿梭”，把中国工人的某些未来经历带回来，供现在的工人参考。



菲律宾天主教会简介及其与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关系

四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侵入菲律宾后，逐渐把天主教传入当地，目前全菲约 84%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几百年间，菲律宾虽江山屡次易主，天主教却始终屹立不倒。

征服人心，协助统治

刚到菲律宾的时候，西班牙殖民者只知道压榨和屠杀当地民众，激起了各种反抗和敌视情绪。为了改变这一僵局，西班牙天主教会派人赴菲传教，采取了“攻心为上、软硬兼施”的对策。传教士学习当地语言，督促殖民当局改善交通，把散居在山区、丛林中的当地人“移村并镇”，集中安置在以教堂为中心的一个个“教区”里，便于传教和控制。在教区中，教会掌握着行政、司法、教育和经济权力，向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生活方式，把宗教影响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的传教带有半强迫性质，推广速成班式的集体入教，然后从娃娃抓起，让初代教徒的子女后辈逐渐虔诚，即所谓“先入教，再信主”。

在教会的引导下，教区中的当地居民对入教前的习俗有所取舍，并围绕教堂活动重新编织了个人的人际关系网，即所谓“教亲”关系（有别于血缘关系）。这种教亲关系延续至今，成为教会支配民众的传统渠道。在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的几百年间，教会对维持政治稳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号称“每个传教士都是将军，背后都有一支（保卫殖民政府的教徒）军队”。

拿破仑曾经说过：没有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维持社会不平等。菲律宾天主教会也不例外，它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特殊工具，也是统治者的一部分。教会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为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也表现为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殖民地时期，它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从事广泛的工商投资，拥有数量众多的学校、传媒机构。上层神职人员大都是收入丰厚的有产者。19 世纪末，教会既维护地主对佃农的高地租，又陷入本土资本家与殖民者的利益冲突中，威信有所低落。1898 年独立战争期间，菲律宾爱国运动宣布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击毙和驱逐了许多西班牙传教士。

20 世纪初，美国成为菲律宾的新宗主国。美国政府一面在菲推动政教分离，剥夺了教会的行政权，一面给予它巨额补贴，让天主教继续充当剥削秩序的支柱。在三十年代，教会成立了多个群众组织，对抗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主要的手法是用小恩小惠挑动工人及其家属陷入内斗。

1946 年菲律宾宣告独立，天主教会进一步以中立、“慈悲”形象出现，对统治者“小骂大帮忙”，孤立斗争意志最强烈的那部分工农群众。1945 年，教会成立“天主教福利组织”。1962 年，教会高层指示基层神职人员踊跃下乡，“从发动大众，变为组织大众，从社会福利到社会公平，从发展到解放”。在教会外围组织“全国社会活动秘书处”的督导下，教士们成立农民团体，参与社会与经济改良（兴办信用社、农业建设、合作协会、村办企业）。所有这一切的大背景，是菲律宾农村阶级矛盾激化与难以根除的共产党游击战争，让养尊处优的主教们担心失去群众基础。

由于地主资本家的重重阻挠，由于菲律宾的普遍贫困，教会的改良措施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持久的实效。农业合作社受到地主的压制、恐吓，而施舍粥饭这类传统慈善，终归是喂不饱不计其数的半饥饿贫民的。

军管、教会的分化与工人运动

七十年代初，菲律宾政府宣布军管，左手镇压群众，右手发展经济。军管后，天主教会成了唯一合法的全国性民间组织。军管的头几年，教会一直支持政府的高压政策，但是很滑头地拒绝公开表态。

另一方面，由于教会世代把持教育领域，并培养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教士、修女群体，使得教会基层吸纳了不少平民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投身改良项目，但是往往一事无成，面对各种社会惨象，他们无所适从。六十年代末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爆发，1968~1969年欧洲工人运动的强劲冲击，促使菲律宾天主教会发生分化。家资巨万的主教们坚持替军政府说话，而若干基层神父、修女暗中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者提供帮助，甚至直接到工业区去做组织工作。面对内部的激进分子，天主教会恐慌了。当时，某高级教士这样总结了教会上层的担心：“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激进的左翼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引发了暴力和流血事件，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握机会加强对教民的影响，提出一些吸引人的方案，去真正地实现公正与公平的话”，菲律宾就可能爆发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内部也乱作一团，为了加强财政，军政府损害了教会的经济特权（比如教会下属学校、医院的免税优惠），让后者逐步得出结论：“你敢挡我财路，莫怪我断你生路”。1978年，教会电台首次播发未经官方审查的政治评论。1979年10月，菲律宾红衣主教要求马科斯下台或不再参选总统，以免“爆发内战”。1983年2月，教会要求下属的三千名修士统一思想，站在马科斯的反对派一边。1986年2月，天主教会积极参与、主导了推翻军政府的街头运动，为资产阶级和平“换马”成立新政权、巩固统治秩序赢得了时间。

从90年代至今，菲律宾天主教会经历了一个不断保守化的过程。在利用工人推翻军政府之后，教会收起了“温和改良”的假面具，积极配合政府抹黑工人斗争。少数坚持工运理想的神父，受到教会的排斥，时刻面临政府特务部门的暗杀威胁，继续着或明或暗的工人组织工作。一位长期从事工运的神父这样解释为何多数教士拒绝从事社会改良：“一是因为和工人接触就要（同情）共产主义信仰，他们不愿意；二是一部分教士本来就是靠压迫工人为生的，三是怕被（政府特务）暗杀。”换句话说，当工人可能威胁到老板的时候，教会就愿意接近工人，免得工人“闹得太过分”。当工人陷入消极，教会也就放心回家过安逸日子了。

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历史，是一部协助有钱人欺骗工人、农民的历史。它擅长装好人，也不乏当机立断的铁血意志。在教会的顶端，坐着一群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嘴上满口仁义，心里全是生意。工人要想识破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菲律宾工人生活、工作状况

本篇通过受访者的个人回忆，结合一些文献，来描绘 1980 年代菲律宾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大致状况，以便更好地了解当时工人运动兴起的背景。

前文介绍过，菲律宾工业基础薄弱，工厂和工人的规模、数量远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直到现在，90%的公司雇员不超过十人。雇员超过 20 人的就算大工厂，很少有工厂会超过两千人。全菲律宾的非农业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占人口总数 15%），相当于深圳市人口的数量。非农人口中，将近一半的人靠做散工谋生。一方面，无地的农民们不断进城，另一方面，工作机会始终有限。对于菲律宾的贫民来说，能够进厂打工就算很幸运了。这样的情形下，资本家极易把工资压得很低——你不做，大把的人等着做呢。

和中国一样，菲律宾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但很多工人的工资达不到最低标准。1984 年 2 月关于北马尼拉的一份报告指出：在 100 个工厂里，67 个厂的集体谈判合同规定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工人的加班费甚至不比正常上班工资高。工资总是赶不上物价。菲律宾的天主教会鼓励生育，一个家庭生养六七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养家糊口的巨大压力，也使得很多工人不敢轻易和资方对抗。据统计，1980 年代，菲律宾人口有 8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营养不良。

因为工作不好找，工资收入低，家庭压力大，菲律宾工人不像国内的年轻工人那样可以频繁地跳槽。他们往往是找到一份工作，就尽量做下去，因为工作一停，吃饭马上成问题。老板根本不愁招不到工人。他们可以规定苛刻的录用条件，比如招个普工也要求高中学历。1980 年代，甚至到现在，很多工厂都只招 18~24 岁的年轻工人，只有服装厂会录

用 25 岁以上的工人。在有些工厂，工人过了 30 岁就被辞退。而解雇工人是很少给赔偿的。在菲律宾打劳资官司很困难，动不动就要耗个几年，有些案子打了十年才有结果，普通工人根本拖不起。

尽管工人工资已经被压得很低，工厂还是普遍地使用临时工（短期合同工）。他们的合同只有几个月，社保、退休金一律没有，订单一赶完就要走人。临时工在受到工伤以后，就会马上被解雇，而拿不到任何赔偿。他们是不许参加工会的——哪怕是资方控制的工会。他们的基本工资只有正式工的 75%，许多人在厂里干了三年以上，每天工作 12~15 小时，到头来仍是临时工。这在菲律宾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中很普遍，女工更是深受其害。当然，千方百计从工人身上榨油水，这不是菲律宾老板的专利，而是“老板”这个角色的本性。

一个工人说：“我们如同破布一样被丢弃，用完后就和垃圾一起被扔掉。厂里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牲口。工厂主们对待宠物狗要比对待工人好得多。他们让狗住大屋子，喂它们吃肉，还备着兽医。”

菲律宾的法律强制要求工厂买社保，工人交一半钱，公司交一半。不过，据一些工人讲，他们退休后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大约只及平时工资的七分之一。打个比方，现在一个月挣到 3000 元，退休后每个月只有 400 元左右的退休金。现在菲律宾政府又增加了新的社保品种，但和其他国家一样，养老保险的基金总是不够用。

菲律宾的医疗设施条件很差，药品昂贵。在农村，很多必需药品都奇缺。政府口头上一再允诺要改善国民的医疗条件，实际行动却是另外一码事。1982 年 12 月，马科斯总统签署命令，拆除马尼拉一家有 1300 张病床的医院，地皮用于建造形象工程。结果引发了长达一年的抗议运动，最后医院才勉强保住了。菲律宾没有职业病防治法，没有职业病医院一类的机构。法律上只是要求雇主主要给工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没

有细节上的规定，更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工厂的正式工是有医保的，但正式工比例低，因此享受到医保的工人有限。最可气的是，工人通过公司交了医保的费用，有的公司却不知把这笔钱用到了哪里。到了工人生病的时候，政府部门说公司没有给工人缴纳医保。工人就这么失掉了保障，面对昂贵的医疗费，有人只好去借高利贷，以致负债累累。也有工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免费的医疗小组，举办义诊活动，但对庞大而贫困的工人群体来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讽刺的是，菲律宾医护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往往因为国内医院的工作繁重、报酬太低而通过中介出国找工作。

至于广大农民和农场工人，处境更是糟糕得多：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一概没有，在大地主和大资本的压榨下，三十年来他们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观。

城市贫民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无力租住房屋。一家人屈身的窝棚，有的建在随时可能塌陷的城郊土山上，有的在蚊虫肆虐、肮脏无比的垃圾山上。年幼的孩子们就在垃圾堆中玩耍。条件如此恶劣，贫民们还要面临被驱逐出窝棚、无处可住的危险。在老板和工人的斗争中，他们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发生罢工的时候，老板会用稳定的工作来诱使贫民顶替罢工者，或是充当袭击工人的暴徒。工人则要想办法团结贫民，不让他们被老板利用。

菲律宾也在推广普及高等教育，但是能够供得起孩子上大学的工人家庭很少，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的工人后代更少。政府应付就业压力的一招，就是延长教育时间。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除了4年的学习，还要加上2年的军训。教育费用也跟着提高，引起很大的社会不满。由于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比工作岗位多，每年大约新增50万的失业人口。国内就业难，迫使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出国找工作。更多的没上过大学的人被输出到国外做佣人、建筑工等等，由此也发展出一批外劳组织，帮助海外的务工者组织起来维权。

像国内很多普通工人一样，菲律宾的工人也希望能够摆脱给人打工的命运，自己开个小店。只是，在我国国内，即便是普工，如果平时节约一点，几年下来也有机会攒一点小本钱开店，做点小买卖。也常听到人们在说谁谁靠做生意发财了的传闻，虽然不一定轮到自己，但总能让人抱着希望。哪怕做生意赔了钱，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回到工厂，继续挣工资。但对于菲律宾工人来说，省吃俭用也很难有足够的钱去经营一份小买卖。再加上普遍的贫穷，购买力低下，即便开了店，能维持多久是个未知数。极少听说有人做这种小生意发财的。有些人只是在顺利拿到退休金后，才能换来一个刚够过活的小店主或者吉普尼司机的营生。对于年轻的平民女孩来说，嫁给一个外国人，比上学受教育更容易得到体面的生活。生活的持续贫穷，工作机会的难得，促使想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们必须想办法留在厂内向资方争取，而不是一走了之，寻找挣钱更多、受气更少的工作。

1980年代，面对国内工人的罢工潮，政府颁布了很多禁止罢工的法令，有的针对工业区，有的针对行业。工人一旦罢工，会受到严厉打击。国家甚至会出动部队，使用坦克、机枪来威慑他们。由于建厂成本低，又有大量失业、半失业人口作为劳动后备军，工厂主会使出关厂、解雇全体员工的杀手锏。这使得菲律宾工人的斗争比起国内工人要艰难很多。他们的每次斗争都可能会付出失业而沦为贫民的代价。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和组织者被捕，甚至倒在政府和资方的枪口下。环境是这样严峻，工人们要想代价尽量小些，收获尽量大些，靠单打独斗固然是不行的，集体行动前不进行计划、组织，也难以成功。为此，首先需要建立工人自己掌控的组织，充分团结和动员最大多数的工人积极参与斗争，同时要有策略地、利用社会各种资源条件来对抗资方和政府。



菲律宾的工会

在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工会是重要的组织形式。

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菲律宾政府允许工人或其他团体自主成立工会，但程序非常繁杂。工会成立后，还要再符合一系列条件，才能代表会员跟老板进行集体谈判。比如法律规定，在一个公司里，只有争取到50%员工支持的工会，才有权和资方就工人工资、福利、假期等方面，进行集体谈判，最后达成书面协议（类似国内的“集体合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正是通过各类程序、规则制约工人的组织，让战斗性工会组织者不得不在争取工会合法性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另一方面，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对付那些打算成立工会的工人。如果老板发现有工人策划搞工会，就会开除领头者，甚至把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炒掉。公司管理层会找工人家访，劝阻他们入会。有的公司建立情报网，专门监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不仅在工作中监视他们，连工人的私人生活也不放过。所以，绝大部分情况下，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秘密活动。如果工人组建工会的势头挡不住了，有的老板也会来软的。比如在工会选举时，宣布工厂放假，让工人们投不成票；或者邀请工人吃饭，在饭桌上劝服工人不成立工会。如果工会还是在工人的努力下组建起来，资方就把工人选出的工会代表调到条件恶劣的工作岗位上去，给代表穿小鞋，找茬把代表逼走。有些大公司甚至未雨绸缪，在雇佣合同上写明不准任何工人加入工会。新员工将受到严格的筛选，厂方设计专门的测试，查找那些有支持工会倾向的工人。过不了关，就别想上岗。

在老板们的百般防范和“严打”之下，即便在工会势力最兴盛的1980年代，也只有不到10%的工人加入各种工会之中。

社会各类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工人的集体斗争——控制工会，渗透、参与乃至操纵工人的斗争进程。菲律宾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工会组织，有很多不同立场和背景的全国家性工会联合会。在争取工人经济和政治权益方面，它们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作用。下文介绍的菲律宾工会大会（TUCP，以下简称“菲工大”）、自由工人联盟（FFW，以下简称“自由工联”）和五一工联（KMU）都是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由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会到各企业中动员工人，或者劝说资方成立附属于它们的工会。各企业的工会可以选择是否加入某个联合会，加入后要缴纳会费，同时可获得该联合会提供的服务和支持。

亲政府工会：菲工大

菲工大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工会，它在马科斯政府的支持下，于军管法颁布后的1975年成立。仗着政府撑腰，它成为菲律宾会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工会。1985年10月12日的《马尼拉时报》写道：“菲工大一贯支持马科斯政府。他们总是根据政府头面人物的指令来制订有关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菲工大的领导人也在政府公司和新社会运动党（KBL）机构中担任要职……”

在发生工人斗争的时候，这样一个亲政府的工会都做些什么？且看如下一个案例。

公平购物中心是马尼拉最大的商场之一，有223名雇员。商场有很多违反劳动法的地方。

一个附属于菲工大的工会联盟，最早和该商场联系建立工会，使商场工会成为这个联盟的分支。工会会员每月的会费中，5个比索交给工会联盟，3个比索交给商场工会。

后来会员们发现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商场签署了一项集体谈判协议。会员们质疑这个协议的作用，因为他们拿到的工资还是全国最低水平，有些甚至还达不到。其中 7 名积极分子（包括工会主席）被商场栽赃，以盗窃的罪名遭到解雇。工会联盟却声称羞于为他们提供帮助。

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并举行了罢工，要求让这 7 名被解雇者复职，还要求执行第 1、2、3 号工资令，实行假日津贴，并停止破坏工人工会的行动。商场的营业额从每日 70 万比索下降到仅 1500 比索。六个月后，管理层承认了工人的这个工会，并同意在劳动就业部的仲裁下给被解雇的 7 名雇员支付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最初的集体谈判协议过期后，菲工大的工会联盟也已退出。工人工会认为，菲工大的工会联盟卖身投靠资方，控制工会会费并从中牟利，不为会员提供福利或服务，问题发生时他们就消失不见。



讽刺黄色工会的漫画

与菲工大敌对的工会，批评他们软弱无力，站在雇主、政府一边。一些和工人联系密切的教会人员，也对菲工大评价很坏。一位主教说，在某省，菲工大为了在五一节集会时招揽工人凑数，给每个参加的工人 50 比索的报酬，外加一件免费的 T 恤衫。菲工大自己的会员也因为其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无能，表示出极大

的不满。1985 年 5 月，一个菲工大的干部劝说银行罢工者不要参加其他工会组织的游行，而要参加支持菲工大头目的游行。想不到就在这次五一节，政府在劳动法中又加上一个新条款：如果工人不遵守资方发出的复工命令，资方就有权解雇工人，另找人取代他们。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一个主流工会系统的头目能说会道。他来到一个家具厂，劝说工人们成立工会，加入到他们的系统中。当然，他们能够劝说越多的工人入会，就可以通过收会费挣到越多的钱。工会组织者和厂方的人交情甚好。厂方原本答应成立工会之后，会给签约加入工会的工人发奖励。结果工人没有得到，全都被工会拿走了。工会成立后，合同里的条款都没有落实，他们也不肯费心给工人争取利益。后来厂里不景气，裁员，34 个员工被解雇。工会听之任之。工人们得知工会头子收了厂里的贿赂，不可能再依靠工会了……”

“一家一百多人的箱包厂，厂方要雇佣新员工替代很多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工人找到厂里的工会寻求帮助，但那个工会坚持‘依法维权’，先去上诉，结果被法院驳回不予立案。工会只好搞罢工，但准备得很仓促。罢工的时候，并没有把工厂的厂门堵住，大家只是在厂门口傻站着，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没有迫使工厂的生产瘫痪，工人的行动也就毫无结果……”

政府为什么要主动成立工会，组织工人？另外，即便是成立不给厂里“找麻烦”的亲政府工会，老板也要给工会出点血，支付会费和工会职员工资。那么，为什么会有老板允许在厂内建立工会，甚至鼓励工

人加入？

首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既然资方总要压迫工人，那么，自发的劳资纠纷就始终有可能浮上水面。这是不论政府、资方如何限制、打压，都根除不了的。所以，建立一个政府或老板能够控制的工会，就可以尽量约束工人，把纠纷引导到“安全”的渠道。按照程序，受侵害的工人要先去找工会。而这类工会总是例行公事，跟资方没完没了地协商，或者走法律途径。这类工会领导人都乐得跟资方搞好关系，也容易被资方收买。除非工人施加了较大压力，工会才不得不考虑“行动升级”，比如罢工。但工会缺乏斗争性，也就意味着它们缺乏组织工人行动的经验，也不会投入很大精力，效果自然很差。总之，工会把工人的抗争力量消磨掉一大部分，资方的潜在损失也降到最小了。

其次，这类工会有助于政府和老板随时了解普通工人的思想动向，以防“不测”；还可以经常用“劳资一家人，有话好好说”来麻痹工人。它们最常灌输给工人的是：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一致，老板是工人的恩人，是下金蛋的鹅；劳资问题通过集体谈判就能解决，不鼓励工人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利益。前面说过，菲律宾的就业形势严峻，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并不容易，工人们难免担心工厂亏损倒闭会殃及自己，也就更容易被这类宣传所欺骗。

此外，有这类工会的存在，有斗争性的工人自己要想组织工会，就会更困难。通过削弱其他战斗性工会对本厂工人的影响力，可以避免造成对资方不利的局面。

改良主义工会：自由工联

比起菲工大，自由工联是另一种类型的工会。它由教会人士发起，据说是在美国劳联支持下成立的，成员之中美资、跨国公司的职员较多。这类工会宣称自己能够有力地保护会员利益，不遗余力地在工人中发展

成员，同时极力表白自己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独立于政府。它强调做人的尊严、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等等，但不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最初的口号是“不要共产主义者，不要非法人员，不要政治斗争和政客，不要政府控制”。

这个号称能够保护工人经济利益的工会，实际做法上，却往往让工人十分失望。

厂里只有一个属于自由工联的工会，这个工会不作为，每次集体谈判的工资上涨很少，没争取到什么福利，工作环境糟糕。虽然这个厂比其他厂工资都高，但和不断飞升的物价相比，还是很少。有工人被厂方不合理地停职或者开除，工会却无所作为。一个月会费 5 比索，直接从工资里扣，想不交都不行。工人不知道会费都用在哪儿了，很生气。有时会有会员和工会干部冲突，质问他们钱花到哪儿去了：“又拿我们的钱去喝酒赌博了吧！”

在马科斯统治时期，力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给自由工联的基层组织造成了一定压力，迫使工会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行动，向资方施压，保护工会会员和工会本身。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对这类工会的压制，也迫使工会领导们必须依靠工人时不时给老板一点颜色，否则自身难保。

147 名罢工工人在联合国大街上这家加拿大有线与无线通讯公司的办公室拉起了纠察线。这个工会隶属于菲律宾自由工联 (FFW)。纠察人员在门前的草坪上搭起了帐篷，边上立着工人用纸糊的美国资本家 Fred White 的像，满手美钞，意思是：公司的利润这么丰厚，对工人却如此苛刻。

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工会发出了三次罢工通知，反对裁员及资方破坏工会的行为。工会主席 Eda 介绍说，在 1976

年，工会有 200 多名成员，但是后来公司方面利用了劳动法，把 178 名工人划入“机密员工”或“管理雇员”类别。按照法律，这类工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这样一来，可以合法加入工会的工人数大幅减少。她担心，工会成员数在未来会减少到 50 人；而且一旦有工人离开，接替他的新员工就会被归为“机密员工”。

工会会员每人每个月向自由工联支付 5 比索的费用，后者则为他们提供法律方面和谈判方面的援助。当地的五一工联和全国劳工联盟曾经伸出过援手，但是她觉得他们的政治性过强，容易被资方顺利打压。她认为五一工联的人在和政府对着干，而她自己不想跟政府“闹僵”……

自由工联自称独立于政府，对政府持“批评而不反对”的态度，并劝说工人“别跟老板闹得太僵，那不现实；别跟政府对着干，那是找死”。这类工会的特点是不拒绝集体维权，但经常在斗争中拖工人的后腿。这类工会的头头喜欢讲“劳资双赢”，但对老板来说，工人多拿一块利益，自己就少了一块。当老板跟工人翻脸的时候，工会却让工人忍耐；当政府偏袒老板的时候，工会却让工人坐等“调停”。这类工会最重视的，是不要让工人在维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利益与老板是根本对立的。

战斗性工会：五一工联

在工人集体沉默的年代，那些本来就限制、控制、消灭工人斗争为已任的工会，不仅在改善工人处境方面几乎无所作为，有时候还赤裸裸地充当企业和老板压榨工人的工具。它和“罢工权立法”一起构成遏制工人斗争的工具。罢工是工人维权的最重要武器之一。菲律宾工人在法律上是有“罢工权”的。但是，就像许多经历了复杂劳资斗争的资本

主义国家一样，罢工成了少数“有资格”的工会的特权，并且在立法上受到严格限制，必须经过繁杂的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请，对于绕开工会的“非法”罢工，政府有权严厉镇压。马科斯在实施军管戒严的时期，则干脆禁止罢工。

这就是 1970 年代末菲律宾工人斗争兴起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往往为争取一些法定的、最低限度的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而斗争，主要手段就是罢工，大多是不顾禁令的自发罢工。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共产党积极发展工人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在工厂中组织起“战斗性”工会。

1980 年代初期，菲律宾工人斗争走向高潮。严酷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引发工人一波波罢工。政府的回应是镇压，并出台禁止罢工的法律，工人则以更大规模、更持久的罢工潮来回应。马科斯政府派出军队，在纠察线上直接枪杀罢工者，残害、暗杀战斗性工会干部或工人活动者，企图吓退斗争工人和组织者们。在这种环境下，各地的战斗性工会从地方到全国逐步建立起工会联盟。我们从一段材料可以大致了解这种联盟建立的过程。

1976 年，某出口加工区的第一家工会在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尽管为军管法所禁止）。1979 年 3 月 5 日，出现了军管法期间的第一次罢工⁸。罢工者遭到逮捕和拘留。政府认为罢工者应被隔离。在当地社区以及一些神父和修女的帮助下，三天后工人被释放。斗争持续了 53 周，工人赢得胜利并复工。更多的工会以此为榜样发起了罢工。政府的反应就是颁布 BP 130 法令，即“重要工业部门禁止罢工”。

加工区工人与各工会和联合会的领导人组建了一个联合论坛（领导者论坛），试图在与出口加工区当局进行请愿对话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当局负责人承诺在一家纺织公司

⁸ 军管时的第一次公开罢工发生于 1976 年。

的纠察线上谈判，不会动用武力。但是军队袭击了纠察线。结果，二万名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工人，解决工人罢工提出的问题，即资方命令每个工人同时操作 6 架织布机。在与政府进行了四天的磋商后，工人被释放，引发罢工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启发下，建立了 AMBA-BALA 联盟，联合团结全省工人。“AMBA-BALA”还有“瞄准开火”的意思。它来自于 10 个地方工会领导的倡议，并成为菲律宾地方性工人联盟的先驱。

1980 年，类似 AMBA-BALA 的这样的战斗性工会联盟，组成了全国性工会联合会“五一工联”。他们主张工人阶级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倡导工人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利益，同时揭露政府出卖工人利益的行为。

五一工联领导的工会和工人积极分子，主要利用法律规定的相关权利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他们的主要目标，首先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和各种大中型的外资企业。在这些部门中组织工人，首先威胁到马科斯家族及亲友的利益，以及马科斯承诺保护的外国资本的利益，所以一直被资方和政府联手打压。资方如果发现有工人在工厂里自己组建工会，尤其是和五一工联有联系，会设法解雇。政府则在主流媒体上大肆抹黑，甚至专门拍摄电影，宣传五一工联是反政府组织，让一般工人产生畏惧，不敢接近。

尽管压力很大，但因为五一工联聚拢了一批真诚的、富有战斗力的工运活动家，能够更有力地帮助工人斗



争，所以，一些缺少组织经验的工人，或者没法靠原有工会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人，还是会通过各种途径结识、并最终信任这些组织者。

前面两节的案例讲到，由于厂里的工会不能解决工人的问题，工人们最后都通过五一工联进行了更有效的斗争。斗争中也锻炼出一批组织者，活动者。

“（家具厂）工人很愤怒，就跑到旁边的全国工会联盟（NAFLU，战斗性工会联盟，现属五一工联）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就给工人进行培训，帮助工人把之前的官方工会‘转变’成战斗性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罢工的时候，前任工会主席就在家待着，什么都不管……”

“（箱包厂）罢工工人觉得厂里的工会帮不了什么忙，就到附近教堂寻求帮助，这个教堂和五一工联关系不错，建议工人们去找五一工联。有一个干部接待了他们，最后安排我去做工作。我第一次去工厂的纠察线找工人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打扑克，下棋，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有人说五一工联是颠覆性组织。很多人非常担心、警惕，怀疑我。但我没有放弃，每天都去，跟不同的人谈。每天去给他们讲国家形势，怎么去搞工会进行斗争，后来慢慢就得到了工人的认同和信任。工人对我熟悉了。后来原先的工会头目得到厂里的贿赂，离开了。我就给大家讲如何去搞纠察线。我建议他们把要求写在纸板上，在厂里转着圈游行。工人说这不是非法的吗？我说不是非法的。一开始，工人们行动时，看到警察来了、地方官员来了就害怕，躲得远远的。我说这是你们的斗争，你们得自己去和他们讲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就开始自己去讲要求……”

工人斗争热情普遍高涨的时期，五一工联这样的战斗性工会虽然要

顶着很大的政治、经济压力（缺少会费），但颇有发展。因为工人的斗争愿望比较强烈，倾向于抛弃那些无力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转而投向战斗性工会。1983年5月，巴坦出口加工区中的46家企业，有37家组织了工会。12家属于自由工联，7家属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9家属于五一工联。到1984年底，变为自由工联8家，TUPAS 4家，五一工联13家。

马科斯独裁统治期间，五一工联带头冲破罢工禁令。据一位学者统计，当时全国约有10%的罢工是五一工联组织的，其余大多是工人自发行动。90%的罢工要求是提高工资一类的经济诉求。1983~86年是工人运动高峰期，也是五一工联最兴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工人力量较强，有些工人的工资还是挺高的，一两天的罢工不至于使他们吃不上饭。他们也不害怕资方炒鱿鱼，因为如果工会领导被解雇，会导致其他工人发动罢工，所以管理层不敢随便解雇工会的干部。1986年，五一工联曾经宣称要举行全国性大罢工，逼迫马科斯下台。全国性罢工当然比自发罢工威力大得多。它事先经过充分准备，组织性强，目标统一明确，能够给当局者相当大的震慑。而且，这种罢工，因为参与的人数多，也能比一般的罢工更有力地应付军警的骚扰。

.....工厂分布在高速公路的两边，我们拉着一个长长的条幅在高速公路上游行，把路堵了。两边的工厂工人不断加入游行队伍。警察会来骚扰纠察线。警察追着工会领导跑来跑去。警察追，我们就跑，他们追到这，我们就跑到另一边，警察累得跑不动了就不追了。有时候，他们试着把罢工工人统统抓到警察局，但又没有足够的房间。有的被抓的工人，就睡在警局办公室的桌子上。而且还要给他们吃的。警察们受不了了，只好说，好好，你们都回家吧。被抓到警察局的工人还会试图组织牢房里的犯人。工人到处都在组织，不停地组织.....

当时，面对资方的压迫和政府的腐败，社会其他阶层也有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动力，工人运动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也使他们找到一个可以贡献自己力量的途径。学生，学者，律师，教会人士，媒体，甚至小店主等等，都有人会站在工人一边支持他们的斗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会在后面的章节具体讲到。

菲律宾工人和工会的斗争也得到了其他国家一些工会的关注和帮助。1982年，澳大利亚的港口工人把一艘菲律宾船只列入黑名单，拒绝搬运它们的货物，以此向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五一工联干部。

进入1990年代，菲律宾工人运动走向低潮。统治集团及其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制订了更多压制工人的法律条款，新建工业区采取“无工会，无罢工”的原则，并系统地使用暗杀手段，有计划地对罢工积极分子、工会干部、工人组织者、帮助工人的律师、教士等实施肉体消灭。

在一些资方势力强大的跨国企业，罢工工人在遭到集体解雇、武装镇压一类的严重打击之后，已无法像斗争高潮时期那样再进行有效的组织，给资方施加压力。战斗性工会在走法律程序或者以厂外抗议的形式继续抗争的时候，也显得力不从心。在这些行动中，工人本身就处于被动地位。且不说由政府制定的种种程序、法律本身就对工人不利，光是这些程序本身，就足以耗尽工人们的斗志和精力了。即便工人最后胜诉，资方仍有一套办法对付。我们访谈到的一个日系汽车企业战斗性工会的负责人这样说：

“.....2001年公司同劳动部串通，阻止我们成立工会，当时开了一个听证会。工会在听证会上获胜。公司报复，以非法罢工为由把参加听证会的250名工人解雇了。2001年3月16号300人被解雇，3月28开始罢工，持续10天。我们企业在马尼拉有两个厂，一共700多人参加罢工。当时日本国内总部来人，给总统阿罗约施压，威胁说不解决

自发罢工与有组织的罢工

珠三角地区的自发罢工数量之大，行业之广，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但从目前来看，在多数自发抗争中，由于常常可以依靠一两次临时行动达到目的，工人难以将资方看作真正的“对手”。往往在受到资方几次打击的情况下，工人才意识到自己在与资方“战斗”。只有在受到资方几次打击的情况下，工人才可能进入严肃些的“战斗状态”。即便是在反关厂抗争中，工人的团结和行动，也常常是被资方逼出来的。而一般来说，资方或管理层遇到劳资纠纷，会比工人清醒得多。他们明白工人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对资方经济利益和统治权威的侵犯、挑战。他们会搜集各方面信息，分析工人的行动方向、精神状态，制订对策。尽管资方也有内部矛盾，但他们比工人能够更快地拧成一股绳。

这种情形，源于工人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从一盘散沙的消极状态，转到团结一致争取利益的觉醒状态，必须有一个过程。在中国，工人“无意识”地参加抗争的状态十分显著，还有一个原因：近十年的大繁荣让老板更容易让步。既然不用付出太多代价便能“胜利”，即便失败也可以再换份工作，工人自然不愿与老板轻易对抗，缺乏将行动进一步深化（比如更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动力。

前文介绍过，菲律宾工运的现状是：工人生存艰难，官方往往野蛮镇压，资方很强势。因此，菲律宾工人要想争取一点成果，必须认真准备与资方的每次对抗，通过更组织化、更有针对性的手段搞行动。一旦出现自发罢工，厂内外的觉悟工人（比如五一工联）也会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更多利益。

在七八十年代的军事管制时期，菲律宾有很多自发罢工，反映了当时工人的反抗情绪。自发罢工，与五一工联策划的罢工，时常是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的。工人的潜在不满，通过自发反抗爆发出来；工人普遍的反抗状态，是五一工联的活动基础。五一工联背后有菲律宾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以及庞大社会关系网的支持。他们帮助工人组织起来，传授经验，让工人与厂外的社会支持结合起来，以便赢得抗争。另一方面，五一工联帮助工人学会从阶级的高度看问题，把斗争矛头更明确地指向资产阶级的整体统治。

影响生产，是工人维权最方便也最有效的武器，军管时期，政府严厉禁止罢工，等于把这个武器从工人手里夺走了。于是，一些工人用罢工的实际行动来冲破禁令。当时，某厂的自发罢工既提出了经济要求，也提出反对戒严令对罢工、纠察线的限制。这次罢工发生后，一些工会领导被迫害，但是工人意志坚定，坚持了一周。后来在五一工联的发动下，工业区内其他厂进行了声援性的联合罢工，同时提出各厂自己的经济要求。声援罢工中，工人们轮班去游行，支持那个最先罢工的厂。外厂工人的声援罢工，可以给资方、当局表明工人的团结态度，也分散了那个厂工人的压力。因为事先有所组织，这种联合罢工坚持的时间会久些，行动目标直奔主题。

总罢工

总罢工是工人对抗老板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必须精心组织。当觉悟工人建立了较强的组织网络后，便有能力选择时机，发动影响下的工人进行总罢工，除了提出关系到当地多数工人的经济诉求以外，也能产生政治压力。组织发动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总罢工，组织者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复杂，事先要充分准备。

1988年，南他加禄省的工会联盟 OLALIA（属于五一工联）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地区总罢工，反对石油价格上涨。随后五一工联组织了一天的全国性总罢工，作为响应。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运输费就

上涨，很多基本商品的价格就上涨，工人的通勤车费同样也涨了，所以这次罢工得到了工人的积极响应。在南他加禄省，五一工联影响下的工厂都加入了罢工。工人离开工厂，居民离开社区，走上公路，造成交通运输全部瘫痪。罢工之后，政府决定让步，但并没有立刻降低油价，而是拖了一段时间，再下调油价。无论在中国还是菲律宾，统治者都很注意心理战，避免给工人造成印象，好像工人一罢工，政府就屈服了。但这场总罢工的胜利还是触发了全国工人的连锁反应。一个月后，五一工联影响下的各地工厂都提出了涨工资的要求。

组织这类大罢工，一般会首先召集各厂的工会干部开会讨论，研究当时的形势，考虑最大和最小的可行性，比如最少可以罢工半天，好点的话，可以罢工一到两天，最少有十个工厂会加入罢工，最好的情况下，全省工厂都会加入罢工，诸如此类。

其次，因为各厂、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必须做好协调。罢工的积极分子必须清楚各地区、各厂的具体情况，要细致了解自己能够坚持几天，各厂能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罢工。罢工后如何游行，厂门口如何设立纠察线，等等。在一些组织薄弱的工厂，工人可以在小休或吃饭时间出来声援一下，再回去上班。罢工的物资供应也很重要。工人必须知道工会有没有钱支撑罢工，因为菲律宾工人家里往往没太多余钱，而饭是每天要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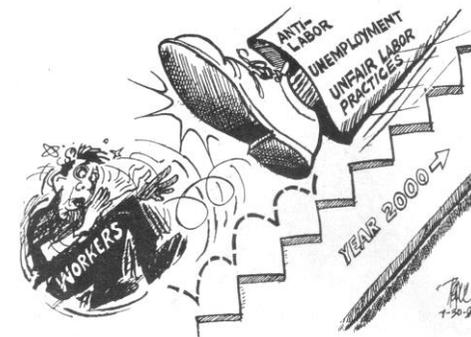
罢工前，五一工联在已有的工会组织基础上，建立各种临时委员会：食品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联络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等。这些临时机构向工人提供了自我组织的空间，让工人有机会参与对罢工的组织管理，学会如何介入厂内与社会的日常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罢工，是工人接管社会的第一步。

总罢工的威力是巨大的，产生的效果甚至令组织者本人也大为惊讶。

... 当时搞的这个反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地区性总罢工，影响很大。因为当时很多军人（看到我们组织的总罢工后）发现来自赤色分子的危险太大了。他们没想到，我们已经能搞出这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认为阿基诺政府太软弱无力，搞了几次政变要把她赶下去。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事情，我们只知道工人的工资太低了，因为物价太高，我们必须罢工抗议。我们没想到这次罢工对全国都产生了政治影响。

前面提到过，菲律宾的工人总数并不多，即便是在工人斗争最激烈的八十年代，五一工联这种战斗性工会能够影响到的工厂数量，也很有限。战斗性工会领导的全国性罢工，如果只数人头的話，是不能与目前见诸报端的某些国外“总罢工”相比的，比如法国的百万人罢工游行，或者希腊的全国大罢工。但这些“总罢工”貌似声势浩大，过后往往并无效果，没帮到工人什么忙。原因有几个，其一，是这些国家有一整套方法来限制工会活动，尤其是罢工，而工会也十分配合国家的限制措施。这些国家的工会要组织罢工，不管什么范围的，都需要各部门层层审批，就算审批下来了，政府也好，公司也好，早已做好应对的准备，罢工的威力减少大半。二是，它们的罢工较少涉及工厂工人，参加罢工、游行的人多为服务业或政府文教机关雇员（比如教师），要组织一场合法的工厂罢工难如上青天。这样一来，表面热闹的“总罢工”也就打不到老板的痛处，影响力有限。

菲律宾工运漫画。图左文字为“工人”。图右（裤管上）文字分别是：反劳工；失业；不公平的劳动规章。▶



罢工中的工人组织问题

- 引子 -

菲律宾的工人斗争从三十年代至今，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们问到一些极其“简单”和“幼稚”的问题，比如如何设置纠察线、如何防止工贼时，好些工会干部都有点奇怪，不知从何谈起。原因在于，大半个世纪以来，五一工联领导下的工会运动，从工人的动员、教育、成立工会、与资方谈判、示威游行、罢工、设立纠察线、社区动员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前面提到那些，对于他们来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的只是根据工厂、工人情况的不同而调整。但中国工人阶级整体来讲还处于比较“幼稚”的状态，对斗争中的很多常识，还需要一步一步去探索。中国的工人运动，由于劳资双方都还没有充分放开手脚，至今缺乏一个深化的过程。因为所处时代不同，斗争环境不同，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菲律宾工人的方法，但对于愿意坚决维权的工人而言，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并在实践中举一反三。

诚然，近二十几年，中国有过非常多的罢工。这些罢工中，除了一部分反改制行动比较持久，其他的抗争——尤其在私企——往往时间很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让老板赚得了巨大利润，只要作一点小让步，就能换来良好的生产秩序；而相对充分的就业，也使得工人不怕失业。所以，罢工发生后，劳资双方一般速战速决，罢工结束后，工人往往还是一盘散沙。中国的官方工会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工厂则是一个摆设。在工人日常斗争中，它往往是缺席的。

不过，随着斗争次数的增多，中国工人也出现了分工协作的倾向。一旦罢工，有些工人堵住厂门和仓库，阻止资方偷运机器、进出原料和货物，有些工人阻止其他工人上班，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罢工纠察”。不过，工人还没有有意识地用好它。罢工纠察线预示着工人的组织性相对成熟，开始严肃地考虑如何对抗老板。相对于只是待在车间里不干活，或者一窝蜂跑到外面堵路的罢工，这是更具组织性的罢工。

在相对持久的罢工中，中国工人有时会自发筹集资金。例如 2007 年沿海 S 市某工厂罢工时，工人在厂内斗争多日无果，决定选派代表集体上访。上访所需的交通、食宿费，不可能完全由代表自己承担，所以工人们各出 5 元，集体承担。在一些更持久的罢工中，这类资金还用于给代表发“误工补贴”。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罢工基金。

本文主要谈谈罢工纠察线、罢工基金、老板破坏罢工的手段以及如何打击工贼这四个方面。

- 斗争前的组织工作 -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罢工前的组织问题。菲律宾的法律规定，只有得到政府认可的工会才有权利跟资方谈判，要求加薪、加福利等。如果不是工会在领导罢工，而自发罢工的组织性也不够好，工厂完全可能根本不睬罢工者，直接招新人上班，罢工者的工资要求也要打水漂了。而单个人去跟资方叫板，通常只能落得失业滚蛋的下场。

五一工联宣布说，它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战斗性的、爱国主义的工会”。多年实践中，五一工联摸索出了一整套工人组织的方法。在发动工人集体维权之前，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成立工会。他们要么主动选择某些 200 人左右的中等工厂，组织厂内工人；要么有些厂的工人积怨已久，想反抗老板或已经开始反抗，通过种种途经找到五一工联，五一工联便指导工人继续斗争。

对于前一种情况，他们通常先设法接触工人，办法很灵活。例如在对工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曾有女性组织者，通过在厂外主动搭讪，帮女工拎东西，去她们洗衣服的地方聊天等方式，取得工人的信任。也有男性组织者以“老乡”的名义，请朋友介绍认识某矿山的工人。对于直接上门求助的工人，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邀请工人。通过邀请工人参加一些厂外活动，例如看电影、文艺活动、社区服务，甚至去某一个工人家闲聊、拉家常，以增进对工人、工厂情况的了解。当组织者对工厂情况基本了解，并取得一部分工人信任之后，就可以尝试组成一些小组，开始学习更多的内容，比如菲律宾社会、经济状况、什么是真正的工会，等等。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调查，了解工厂、老板的背景（与官方、军方的联系、与外资的联系、资产规模等），通过调查来确定怎样组织工人。这些首先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会成立工会委员会（工厂工会筹备会），由他们确定成立工会的时机是否成熟。一般来讲，工人组织者需要接触厂内多数工人，而且对其中大部分人进行培训。只有做足了准备，才有机会成立能获得官方认可的工会。这个过程往往很长，有的时候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十年之久。

五一工联为何如此依赖“官方认可”呢？因为工会成立了，就可以有所行动，把平常工人不满的问题提出来，跟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如果资方拒绝谈判，或者拒绝执行谈判协议，工人有权罢工。当然程序是很繁琐的：罢工前工会要进行不记名投票，超过一半（之前是三分之二）的会员同意才可以罢工。按照法律，罢工必须通知劳工部，而且罢工之前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如果罢工合法，还有一条对工人或许是有利的法律：警察必须距离纠察线 50 米以上。减少直接的肢体冲突，至少会增加一部分工人的信心，避免工人因为害怕受迫害而缩手缩脚。

菲律宾的罢工时常拖得很久，因为失业率高，工人罢工不容易，一旦罢工就会尽量坚持以达到要求。在五一工联的一份工人教育小册子上，总结了工人斗争的九种方法。搞斗争的时候，工人会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相应的方法。但近年来，由于失业率继续增加，工会被削弱，工人斗争往往采取很温和的方式，例如签名运动、噪音活动（工作的时候敲桌子制造噪音、吃午饭的时候敲碗 5~10 分钟）、挂牌子、戴袖章（在上面写上工人的不满或要求）、集体请假等。即便是温和抗议，厂方也会报复，所以工人要做好应变准备。更高一层的行动，可以是下班后在厂区外面游



行，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不影响工厂的生产、生活，而罢工往往是最后的选择。这一点跟中国恰好相反，中国工人要么不吭声，一旦动起来往往直接冲击生产：堵路、堵厂门、堵仓库、集体上访等。

- 罢工纠察线如何设置？ -

2005 年，某矿山的 1000 多名工人罢工，工人在交通要道、矿区的主要进出口设置了五条纠察线，每条纠察线有 160 个工人，两班倒，轮流值班。政府部署 200 名军人和 15 名警察去镇压罢工。警察东一下西一下袭击纠察线，工人只好跑来跑去加强被袭地带的防守，晚上也睡不好觉。矿工的家属也上了纠察线呐喊助威。罢工者每天要消耗 3 吨的大米，但很多人给罢工工人捐款，还获得了约 15000 公斤的大米捐赠。

按照五一工联的经验，罢工开始之前，必须做好周密计划，包括成立各种委员会，有负责纠察线的、食品的、财务的，等等。首先，而且

最重要的，就是设立纠察线。罢工期间设置纠察线，有这样几个作用：

1、瘫痪（至少是影响）生产，包括阻止原料和货物的进出，阻止工厂组织工贼进厂恢复生产；2、把工人组织起来，让所有人有事做，每个人的充分参与，是鼓舞士气和斗争成功的重要条件。3、制造舆论，在工业区和社区进行宣传，以争取周围工厂的声援罢工，以及社区居民（主要是工人家属）更多的同情；扩大斗争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逐点说明纠察线的各项作用。

1. 瘫痪生产

五一工联总结说：老板有自己的律师团，心理分析师、智囊团，还有政府和军队撑腰。工人除了自己劳动的双手，几乎一无所有。所以在劳资对峙的情况下，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影响老板的生产和收入。如何影响老板的生产？停止工作，尤其在老板急着出货的时候。如果老板有库存，则要阻止运出货物。在菲律宾的很多罢工中，老板为了避免停工的损失，经常不惜代价动用直升机，运送原材料、货物、工贼进出工厂，以及给厂内继续生产的工贼送饭。由此可见，工人停止生产对老板造成多大的损失！工人常用的另一个手段，是去卖场抗议，这对那些生产成品的企业比较管用。曾经有一家奢侈品工厂罢工，工人们就到销售该厂产品的大商场门口，挂着牌子抗议，这可能对品牌的形象造成一定损害，也会增加老板的压力。当然，这个办法只是罢工斗争的辅助手段，效果未必明显。总之，只有老板肉痛了，才会让步。

这里有个例子：某矿井每一层的底部都有一座水泵，因为井下的水平面低于海平面，必须不断排水，否则矿井设备会被淹。2003年当地矿工罢工，保证水泵运转的工人也罢工了，设备被淹，给资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工人事先计算出，假如一个月不排水，最上面贵重机器都会淹掉，工厂的损失更大。结果，一个月后，老板就答应工人的条件了。

但只是停工也不行，因为资方会马上雇佣新人顶替罢工者。所以纠察线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阻止工贼进入工厂恢复生产。这一点后面会

有详细说明。

2. 组织与分工

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性组织者告诉我们，曾有一个生产名牌包的工厂，有员工100多名。后来工厂要关闭，并拒绝给工人安置费，工人无奈罢工。那次罢工持续了四年，工人们以纠察线为家，一个又一个孩子接连出生，他们都亲切地叫这位组织者奶奶。刚开始的时候，罢工效果并不明显，有工人请她去帮忙。她到了罢工现场，发现多数人甚至不知道“纠察线”是什么，只是在厂门口搭了帐篷，没事做就打扑克，下棋。她去了之后，就教他们如何分工。分工的一个好处，是让大家都有事做：有的做饭，有的出去募款，有的去社区搞宣传，有的去抗议喊口号，带领大家唱歌、安排休息等。有的罢工发生后，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有的回家睡觉，有的出去玩，总之各干各事。这样力量就分散了，也容易被管理找到个别员工进行“谈话”，各个击破。因此，把人聚拢，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可以让整个罢工变得有组织，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3. 制造舆论

罢工尽量不要孤立在一厂之内，外界哪怕只是围观，也能增加罢工者的信心和老板的压力。五一工联有一辆宣传车，顶部有一个大喇叭，发生罢工、游行、示威的时候，会开着到处转。宣传车的好处是，可以不断到周围工业区、社区宣传，也无需太多人力物力。同时、制作条幅、宣传单，也是必要的。

一位五一工联干部这样介绍某次罢工中纠察线的作用：

大家轮流去纠察线，三天一轮。我们还成立了医疗小组，谁家孩子有病了就去照顾一下。……除了给家庭困难的支持以外，还有人专门负责监督各地区工人家庭的情况，谁有问题了就想办法解决。家人一般都很支持（罢工），也有不支持的。如果家人不支持，我们也去工人的家里做工作。厂里男工比较

多，结婚的比较多，家里经常会因为没钱吃饭吵架，所以不光开大会，更常开的是各地区的小会，帮助罢工工人解决各种问题。有些吃不起饭的家里，就让他们去纠察线上吃饭，让他们知道纠察线是为大家服务的。

社区里的青年人经常来拜访我们。有的农民每隔两天就来送吃的，我们的纠察线就像个聚会场所，各种人都来。我们有一段时间被警察赶走了，就去城里待了两周，厂里只找到少量工人复工，没找到足够人手替代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有一定技术含量，有一些工位很热，而且本地区的其他工人也不愿意破坏罢工。纠察线一共有两百来人参与，其余一千多人，会参加会员大会。有些待在家里的工人被警察骚扰威胁去复工，但是只有很少人去，所以矿上开不了工。



罢工者在纠察线上做饭

争取人心的社会宣传很重要，不光是工人家庭的支持，还要争取社区，我们写了很多通讯稿，报道罢工进展，因为厂里抹黑我们，一开始，社区很多人觉得我们罢工是非法的。经过我们宣传，就好了。

- 罢工基金 -

罢工要坚持并获胜，一个必要条件是设立罢工基金。工人不可能饿着肚皮罢工，食物委员会也不能做无米之炊。我们了解到的罢工中，罢工基金有几个主要来源：

1. 罢工前工会的会费收入。
2. 罢工期间的募款。通常罢工纠察线上会有捐款箱，也有人专门向其他工会、社区居民、教堂筹款；有条件的会员也可自由捐款。
3. 其他收入。如果罢工持续时间太长，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一部分工人会尝试重新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工人拿一部分工资捐给罢工基金。也有的纠察线会开小卖店，赚得的钱也归罢工基金。

由于菲律宾工人收入低，罢工时间长，罢工基金通常不富裕，顶多维持生存。罢工中通常会组织“食物委员会”，除了利用罢工基金买粮之外，也募集食物。教堂、农村都是他们经常求助的地方。2005年某矿山的罢工中，就有社区居民给工人送胡萝卜、大豆。当地很多蔬菜种植园，也允许工人家属去收菜。因为那一年菜价下降，农民/农场主认为运出去卖会亏本，还不如捐给工人。最后纠察线上堆满了蔬菜。但大米是稀缺的，只能限量供应。妇女们组织起厨房，安排打饭的秩序。

这几年，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也有过“罢工基金”的雏形。在罢工之前或罢工过程中，有人发起筹款，一般就是五元十元，如果是持续久的斗争就多一点，总之根据具体需要，大致定一个数额，花完了还可以再筹。这个钱的花销，主要用于资料的影印，代表的交通、话费、餐费、住宿费等。2005年前后S市有一次罢工，工人甚至想到代表可能被开除，筹款时把被开除代表的“离职赔偿”也算进去了。

- 如何应对资方的各种花招 -

工人发起罢工，老板最恼火的莫过于延误生产造成损失。所以在大部分罢工中，老板首先考虑如何延续生产，或者如何发货。菲律宾的老板发明了无数的手段，应对类似的情况。限于篇幅，只能暂且列举几种。

1. 用直升机破坏罢工

某可口可乐制瓶厂的罢工中，公司招人顶替罢工者。工人们拉起纠察线，不让顶班的新人进出，也不许运料和出货。老板就用直升机给顶班者送饭，工人放烟花干扰直升机，导致直升机被迫着陆。事后，这起“坠机事件”不了了之，没有工人受罚。

2. 最常用的手段：开除工会干部，打压罢工积极分子

2003年某服装厂成立了工会，并赢得了代表工会选举权。工会提出跟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但资方不同意。工会便向劳工局提出了申诉，但申诉石沉大海。2006年，工会主席被资方非法解雇，工会发动了罢工。一开始，资方解雇了15名工会干部，之后挨家挨户跟工会会员说：“只解雇15名干部，其他人可以回厂工作”。厂里还写信警告工人，要求他们退出工会，警告信超过三次没回音就直接解雇。最后，老板解雇了60名工会成员。这些手段让工会人数大减，罢工难以维持。最后打垮罢工的，是一次绑架事件：某天凌晨，四名不明男子闯入罢工线，绑架了工会主席及一名会员，带到高速公路上，恐吓一番后扔下了她们。结果，守了11个月的罢工线被迫撤离，罢工失败。一部分工人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在当地的加工出口区里找工作。

据工会组织者总结，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是工会干部“不够积极”。自从开始罢工后，工会每周都开例行会议，但是来的干部越来越少，还推说工作忙不能守着纠察线，即使只要她们周六或周日住一个晚上，也不愿意。反而是一些普通会员比较积极，还帮忙打电话找人来开会、帮忙守纠察线。而主席自己（女性），则在纠察线住了11个月之久。不过，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工人（包括工会干部）担心失业，对罢工没有信心，而且也没有组织好，才导致失败。

2001年雀巢工厂的罢工，资方也聘用了近500名临时工代替被解雇的工会会员，并与解雇的员工一个个分开谈，后来有200名工会成员分别与资方签订协议，并且拿了一笔遣散费，罢工也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老板跟他们的菲律宾同行一样，很注意及时清洗斗争积极分

子。不管罢工成功与否，最后那些“出头鸟”总是要被清算的。不过，对于中国工人来讲，问题相对简单。虽然有些工人，尤其是年纪大，家庭负担重的人，比较担心失业，但还没到“恐惧”的程度——即便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不至于没饭吃。而年青工人更不用说了，本来就不喜欢被拴在同一个地方，被开除也没什么大不了。不怕失业，是现阶段中国工人敢于斗争的重要原因。

3. 关厂

如果罢工工人很难对付，老板又不愿意让步，资方往往会使出杀手锏：关厂。对于资方来讲，关厂只是一个法律游戏，在法律上注销一下，再搬到别处去，菲律宾的空厂房很多，政府也愿意为资方搬厂提供便利。有时一个工厂赚了钱，又不愿给工人合理的待遇，发生纠纷后就搬去别的工业区，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对于这种情况，工人没什么好办法。有一批遭遇关厂的工人，想出的办法是：去工厂的新地址抗议，甚至去老板家外面抗议。有一场持续了四年的罢工，工人们买了话筒到老板家附近设立纠察线，保安出来说他们把孩子吓哭了，他们就喊：“孩子们听着，只要你们的父母办事公平，我们就不来了。”这场罢工坚持了多年，最后得到了部分赔偿和安置费。

在关厂这个问题上，中国工人的处境也比菲律宾稍好一点。一方面是工作好找，另一方面，老板要是跑了，如果工人愿意行动，也总是能争取到一些经济补偿金。在深圳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欠薪保障条例”之类的文件，要求所有企业交一笔钱，以便部分企业倒闭或搬迁后，工人得不到赔偿时，可以用来支付赔偿金。对于没有这类文件的地区，只要工人愿意去争取，大多能拿到一点补偿。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政府能够在经济繁荣期集聚巨大的税收，也就有了暂时安抚工人的财力。

- 如何应对工贼 -

这里说的“工贼”，是指在工人罢工的时候，不顾集体利益，主动或被动配合资方进行生产，从而破坏罢工的工人。“工贼”一词带有贬义，通过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称呼，建立了一种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它意味着不道义、背叛、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工贼也分好几种：一种是资方从外面雇来复工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失业者、城市贫民，甚至是监狱里的犯人；第二种是本公司员工，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受资方威逼利诱而拒绝罢工或在罢工途中复工。除了资方或政府走“特殊渠道”（比如通过监狱或黑社会）雇来的犯人或匪徒，大部分都是跟罢工工人一样穷苦的劳动阶级。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老板有时候会给工贼高出平均水平 2~3 倍的工资。这对一些失业很久，家庭困难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要阻止工贼，一般来讲有两种办法，一是采取强硬手段，用威胁、断水断电断粮等方法让进入厂内的工贼无法干活；二是用说服的办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如果没有强硬手段，攻心的效果也不会很大。毕竟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你跟他讲任何道理都是没用的。

一位年老的组织者，经历过非常多的罢工，她举了两个例子，某内衣厂发生罢工，工人建立了纠察线，资方叫来了警察“维护秩序”，还招募了一批工贼去复工。罢工者决定第二天早上向厂里的管理层、工贼发起进攻。他们用塑料袋装满了小便，当工贼、管理、警察们进厂的时候就扔到他们身上，每天都这样干，弄得他们臭哄哄的，受不了。后来厂方起诉工人，法官听到工人的做法都笑了。但因为是厂方违约（拒绝进行集体谈判）在先，罢工最后还是胜利了。

在另一次罢工中，厂方雇工贼进厂，正门有纠察线，进不去，他们就跳墙或以其他方式进厂。工会很难说服他们，就把他们围困起来，切断水电，过了一两周，他们就受不了了，要工人放他们走。有些新招的

人做的都是废品，其他人不熟练、不达标，也是招募工贼有时效果差的原因。

一位矿山组织者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某矿业公司的两次罢工。罢工开始之前，工会进行了详细分工，成立了若干委员会，其中包括：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后勤委员会（搭帐篷，准备炊具等），食物委员会，罢工护卫队（在军队、警察、工贼破坏罢工时，进行自卫还击），有力地保护了罢工。对待工贼，他们采取了如下几种办法：

——给充当工贼的工人打电话：“如果你这样做，就开除你的工会会员资格”。工人的福利跟会员资格有很大关系，工会会员比非会员的福利待遇要好。这样，一部分工贼就会屈服于工会的压力。

——让工贼做卧底，提供资方内部信息，通过这种事来证明自己对手工会是真诚的，否则还是会开除他们的会员资格。

——2005 年那次罢工，所有的矿工都没有跟老板合作。公司就在外面招人。罢工者在进入矿区的必经之路检查车辆，把经过的中巴（当地人叫 Wing，类似公交车）拦下来，工人上车去问：“我们这儿在罢工，有没有人可以支持我们？”很多人慷慨地给他们捐钱。收完钱，工人又问“有没有新来的”，这时可能有人说是来上班的。工人就把这些来“上班”的人请下车，说你们受骗了，我们这儿正在罢工，你进去工作没啥好处。据统计，有 36 个工贼被这种方式堵在大门外。后来公司又让工贼走路进去，罢工护卫队就用弹弓打工贼（一般只打脚，不打头），有 12 个工贼通过这种方式被赶走了。罢工者买了好多钉子，有警察的车过来，就把钉子连成一排，放在路上；如果是普通过路者，就撤掉。

顺便讲一下，“罢工护卫队”是一个秘密小组，只有少数人知道谁是队员（以保证安全），罢工结束后，小组就解散了。

——罢工纠察线把路拦了，没人给厂里的工贼送饭。工人知道矿井的要害位置，例如电源供应线，可以轻易把全矿搞瘫痪，有人手也干不了活。

——另外，还有个不太“光明正大”的损招。某次罢工中，6名工会会员在管理的威逼利诱下复工了。工人们天天在厂门口“闲聊”：“你知道吗？有没有看见，好几个男的进了××（某工贼的名字）他家，不知道跟他老婆在屋里干嘛呢！”。说这话声音很大，工贼们听了心里也不好受，三天后，他们就跑回家了。罢工结束后，劳资签定了新的集体合同，加了工资，当过工贼的6名工人也被算进集体合同的名单里，享受到了罢工的红利。这几个人心怀愧疚，在全体工会代表大会上捐献了一头猪，让大家吃了一顿。

- 遭遇不利，如何妥善结束罢工？ -

罢工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工人可能遭受的牺牲：例如被抓、被打、罚款、暂时或长期失业，并准备好对策。一位工会干部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时，说道：

“我们会有ABC三个计划，分别针对不同的人。计划A是靠外援养活一部分人；B是一些工人出去打工，把收入的一半拿出来支持罢工者；C是去游击队或者做城市贫民。C不算是真正的计划，只是最坏的打算。结果，有一半的人坚持下来了。”

罢工是一场复杂的斗争，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果选择对了时机，拿捏好了轻重，给了资方有力的一击，罢工大获全胜，当然是好的。罢工的胜利，不仅会激励本厂工人，也会激励整个工业区的工人，让他们更有信心。中国的罢工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工业区里一个厂罢工成功，其他厂的工人也开始“闹事”争取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工人刚开始闹，老板就主动提出加薪，息事宁人。

但菲律宾的情况，大有不同。失业太严重，老板太强势，政府太野蛮。面对资方的压迫，抗争是必要的。如果不能成功，如何有尊严地结束战斗，如何尽量减少损失，就是最紧要的问题，因为撤退比进攻更考



验工人的组织性和觉悟。

某矿山的一次罢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资方要求开除19名工会干部，否则不答应工人的任何要求。后来，工会经过考虑，同意开除19名工人干部，换取工人加薪。

一名当时被开除的工人（后来成为工会全职工作者）说，他失业的那一年，是人生的低谷。作为家庭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失业等于砸了全家人的饭碗，要找到工作也不再可能，那么他今后的路如何走？

从罢工的开始，工人就必须了解到斗争的复杂、艰苦和可能的风险（积极分子被开除，罢工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罢工面临困难时，必须作出取舍。例如资方往往会给工人出一个单选题：牺牲工会干部还是保全工人？是一味“宁死不屈”，还是部分放弃以保持实力？如果必须要妥协，作出抉择后，要有组织地复工，清楚、公开地告诉工人罢工有哪些结果及其原因，让失败的工人继续拧成一股绳。

工人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设法让“牺牲”本身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工人，让工人变得更清醒而不是陷入迷糊，让工人更了解自己的力量和弱点，最终让工人凝聚为更自觉的战斗集体。

小结

本次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的罢工基本是由工会主导的。不过，在七八十年代的工运高潮期，菲律宾也有过很多自发罢工。无论自发或预先有工会机关的策划，只要坚持斗争，工人就不得不学会分工协作。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工人受劳动分工的支配，但那只是被动的服从，为了老板的利润而工作，工人什么都决定不了，也没人会听工人说什么。在罢工中，工人暂时脱离了生产，但可以建立、学习和掌握另一种分工：集

体斗争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工人是主动的，说话有人听，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工厂。

罢工是一所学校，工人在这里学会如何团结，如何进攻，如何防守，如何谈判，如何蒙蔽敌人和争取盟友，如何主动地开始和结束战斗，直至如何管理工厂和社会。也就是说，学习如何从事阶级斗争。



外界支持

在菲律宾，罢工不仅仅指工人在厂内停止工作。一些被解雇的工人在公司门口设立纠察线，进行持续抗议，也称作罢工。这种罢工有时会坚持数月甚至数年。我们知道，菲律宾工人的反抗有太多障碍，比如：工人罢工一天就少一天的工资，对家庭影响很大；纠察线上的工人被资方、警察骚扰；官方会给罢工扣上“非法”的帽子，从而孤立工人。要在种种不利的形势下坚持下去，除了充分发动工人之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寻求各类人士支持。

在这类力量中，教会是一个重要角色。教会和工人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照顾老人、子女入学、发放救济、组织卫生防疫之类的工作，在中国是由官方机构来完成的，在菲律宾则是由教会扮演主要角色。因此，工人组织者们寻求社会支持时，教会是他们的主要联系对象。

前文介绍过，天主教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工具，但在军管时期，社会气氛普遍对现状不满，部分平民出身的神职人员，同情劳动人民的境遇，被工农反抗所感染，而投身到工农运动中去。通过这些神职人员，战斗性工会的组织者同各厂工人建立联系，利用教会的一些外围机构进行工人调研，出版劳资问题的敏感书籍，利用教会资源发展工人运动。教士修女能够给工人和工会组织者提供的具体帮助，还包括：工人可以通过他们接触战斗性工会；工人们需要在厂外秘密活动的时候，可以通过神职人员找到场地；有些工会干部或工人在受到政府、资方迫害后，可以通过神职人员找到庇护场所。一些认同或同情战斗性工会主张的神职人员，甚至参与建立工会。在罢工工人遭到镇压的时候，一些神职人员会奋不顾身地站到工人前方，抵挡那些袭击纠察线的军警。

在菲律宾，同情、支持甚至参与工人斗争绝非易事。我们在菲访谈期间，就有一位外国牧师因支持菲工人斗争而被暗杀，曾经还有位主教在家中遇害。律师、记者、学者这一类社会人士，只要同情工人，也就有可能被暗害。在菲律宾，真正做到为工人说话，需要冒很大风险。

除了教会之外，社区居民的支持，也是罢工能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早期建设的一些工业区和居民区比较接近，或混杂在一起。组织罢工前，战斗性工会往往培训工人如何在社区内做宣传，驳斥资方、政府对工人行动的污蔑——工人们不是贪得无厌、懒惰、受到“赤色分子”的唆使才罢工，而是为了争取合理的基本权益才罢工。通过让居民们了解工人的处境，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这些同情者有的会捐钱，有的提供临时住所，当工人们被警察骚扰时，还会想办法掩护工人。

某厂工人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没有加班费和夜班补助，劳动条件也很差。工人们在工会组织者的带动下准备成立工会，一起向老板提出要求。老板不同意，还用关厂来威胁。工人们一边打官司，一边在厂门口设立纠察线，进行了一年的罢工。罢工能持续这么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人之前和社区的人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罢工时社区的人送水送饭，工业区其他工会也会赞助，教堂还给一些帮助，罢工者的孩子们都去本地学校读书。罢工组织者还请了一些媒体（广播、电视）来报导他们罢工的原因和状况。一有外国友人来访问，就会带他们去参观这个工厂，声援工人。罢工一年期间，500个工人中，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当了小贩。纠察线上还开了一个小商店，但大多数支援还是来自于其他机构和教会。500人有一半坚持到最后。在罢工期间资源有限，支持不了那么多人。留下的人对其他人的离开表示理解。最后工厂欠工人的钱都还了。

矿区工人的斗争，也很说明问题。菲律宾的矿区通常位置偏僻，距离其他工业区也远。矿工可以得到最直接支持的地方，就是所居住的社区，因为这类社区居民大都是工人家属。充分调动所属社区的力量，对矿工极为重要。

1987年，隶属于五一工联的一个矿工工会请了一位干部协助他们组织矿工家属，因为来自家庭的支持能直接帮助矿工的斗争。他们家属有一部分在社区做点小买卖，其他的都是家庭主妇。干部到当地了解情况后，工人社区的主要问题，一是饮用水被化学品污染。二是卫生问题——那里的公厕是长长的一条坑，公司每三天才给清理一次，对孩子们的健康很有害。当时五一工联干部组织了几个妇女积极分子，让她们自己去找工会谈，要求工会把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加入到与公司的谈判里面，因为生活环境也会影响工作。当时把意见提交给公司，公司不肯让步，搁置，他们就罢工，要求公司处理这个事情。一般工会给公司的要求会有很多项目，包括涨工资，这次不同的是提出了保障水源，提供医生等等关于健康的项目。所以，这些家属非常活跃、关心。家属里有一个发言人。每次谈判，这个代表都会去。谈判时，家属们就在外面拉警戒线。时刻都准备好罢工。罢工的时候，工会干部在发言，一个妇女就走上前去，拿过麦克风说出自己要求。谈判了一个月后，终于取得胜利。

当然，统治者不是吃干饭的。针对罢工工人与社区居民打成一片的情况，菲律宾政府出台了不少整治措施，首先是把工厂从首都马尼拉迁到外地。九十年代以来，菲律宾在外省建立了上百个工业区，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工业区、居民区靠得太近，或者工厂距离高速公路太近，使得

罢工容易扩大影响。许多新建的工业园远离居民区和高速路，园区内保安很多，门卫森严，不许“闲人”进出，随时准备修理“闹事”工人。工人坐班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和住处，每天两点一线，除了工友和亲戚，很少与其他人有联系。本次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少在厂里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甚至不知道相邻工厂的工资是多少。这样一来，工人组织者的活动就多了很多障碍。不过，有句老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些神职人员已尝试在这类工业区内开办工人活动中心，作为工人交流的场所。工人和老板的拉锯战，还在延续。

在我国，各种宗教势力虽然日益壮大，但通常和工人运动没什么关系。珠三角工人的斗争中，很少有社区居民介入和支持的现象。但工人寻求媒体、律师等社会资源协助自己维权，则相当常见，缺点是过分迷信传媒、律师的影响力。如何合理动员社会力量，又不吃亏上当，对中国工人来说越来越重要。



斗争工人面临的迫害

在菲律宾访谈期间，一位工运组织者说道：“对付罢工工人，资产阶级有两个办法：首先识别谁是积极分子、谁是先进的（工人）。对待这些人有两手：来硬的——骚扰、开除、暗杀；来软的——收买。”

众所周知，在劳资纠纷中，各国政府通常是偏袒老板的，但操作起来各有不同。在中国，工商业大繁荣暂时避免了劳资的流血对抗，国家机器的强大，也让统治者很自信，不必动辄对工人施展雷霆手段。一般来说，中国的罢工者不怕开除，很少坐牢，黑名单制度尚未广泛建立，基本不存在针对维权工人的绑架暗杀。

菲律宾的情况大为不同：经济长期不振，工人顾虑多，老板很嚣张，军警在罢工现场枪杀工人的事，屡见不鲜。菲律宾当局打击、瓦解战斗性工人及其组织的手段十分露骨，包括收买、恐吓、黑名单、造谣抹黑、抓去坐牢直至肉体消灭。

本文主要介绍抹黑、暗杀这两种手段，以及菲律宾工人的反应。

抹黑

自成立以来，五一工联一直是老板们的眼中钉。为了抹黑五一工联，政府甚至拍了一部电影，污蔑五一工联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江湖骗子，恐吓观众“五一工联到哪儿，哪儿的厂就关门大吉”。菲律宾的失业很严重，政府就利用许多工人对失业的恐惧，成功地使他们疏远了五一工联。

当局还利用民众的宗教偏见，不断妖魔化群众斗争的基层领袖。在采访中，一位农运干部谈到，1980年代他帮助种植可可的农民成立农会，反抗当局乱收税。当地政府就到处贴传单骂他是“恐怖份子”。传单上，

这位外表矮胖、憨厚的大叔，被画上牛角、狼耳朵，像一只狰狞怪兽。这是因为菲律宾盛行基督教，而基督教义中的魔鬼是头上长角的。



应该说，官方的抹黑行动是奏效的，这些年来，在大量工人、农民和贫民中炮制了对五一工联的恐惧和提防心理。对那些继续忠于工人事业的群众积极分子，统治者亮出了刀子。

暗杀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数字：仅仅 2003~2010 年间，菲律宾被暗杀的工运、农运干部及其同情者（包括学生、律师、牧师或基层官员）就达 1800 人，失踪 200 多人。尽管政府总是装模作样地宣称“正在缉拿凶手”，但许多迹象表明，针对维权工农的暗杀一向是军方与情报机关所为，并得到了美国特务机构的技术指导。

我们访问的一位工运干部，曾多次遭遇暗杀：“当我乘坐的吉普尼经过（街上的）路障并减速时，有几个人上了车，让乘客都下去。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抢劫，是冲着我来的，当机立断跳下去就跑。附近有一个警察局，我跑到警局旁边，那四个人持刀追上来。我就跟警察抽烟、聊天，他们便不敢过来了。”这类刺杀罪行举不胜举。

总之，菲律宾的“多党民选政府”把暗杀维权积极分子当作家常便饭。面对残酷的形势，五一工联的相关对策主要是发动舆论，给政府施加压力。例如，有工会领袖被暗杀，五一工联就组织群众性送葬，发起诉讼，直至“上告联合国”。应该指出，这些做法的总体效果不大，没有遏制住暗杀风。越来越多的老干部死于非命，是目前五一工联逐渐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访谈篇



街头宣传画

为了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好地了解菲律宾工人运动的历史背景，接待方特意安排了这次问答式的讲座。据讲课者柯先生自己介绍，他 1976 年参加了学生运动，之后加入新爱国联盟（BAYAN），再后来从 1990 年代开始从事工运工作，现在在写一本关于菲律宾工人斗争史的书。柯先生短发，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表情凝重，眉头微锁，不苟言笑。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一边讲，一边也不忘观察我们这些听讲者的反应。我们也不“安分”，时时提出问题，打断他的讲课，这时站在黑板旁的他就会微微低下头，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他一定不只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简单。他的脸，他的精神气质，都与我们遇到的那些浴血战斗的工人组织者有着本质的相同。漫长残酷的斗争岁月，工人和同伴的血，都刻在他们脸上的皱纹里。

问：1983 年农民有提要求吗？

答：要求真正的土地改革。

问：为什么八十年代很多农民都跑到城市里了？

答：因为（官方推行）土改，如果是种粮食的土地，就属于（官方宣布的）土改范围，于是地主就把粮食改为经济作物，向外出租土地就少了，所以菲律宾的半工人阶级的人数（因失地农民进城而）增长。这是在 1980 年代初。有很多土地开始种出口的经济作物，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比如以前种植玉米的地方，养一种像虾的东西，只要有一个人看管就行了。

Mula sa Pyudal na Pagkaalipin sa Nayon Tungo sa Buhay Busabos sa Lunsod



上图标题文字：在农村受封建奴役，进了城还是当奴隶。

问：农民运动是不是像中国农民一样打土豪分田地？

答：很多地主住在城里不住在农村。要是农民占领土地，政府会派军队镇压。农民先是要求减租减息，这是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以下简称“菲农运”）的最低要求。

“菲农运”是地下的，没有合法身份。（它的目标）是领导、启发农民，（帮助农民）提出要求，而不是当农民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农运分子）去劝农民要缓和些。就是说，“菲农运”是一股使农民更激进的力量。

问：菲律宾农民是不是不像中国农民那样，没有出路才造反的？

答：1960年以前，人口集中在吕宋岛上，后来政府鼓励人们去棉兰老岛开垦种植。在1980年代以后国内才普遍出现人口压力，以前可以去棉兰老岛讨生活。一直以来，菲律宾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反抗宗教迫害，反对税收，反对强迫劳役。菲律宾历史上有很多群众反抗，不光是农民，还有很多市民阶层、工人的反抗。一个农民朋友跟我说，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教人顺从，宣扬来世得报。

问：神职人员是怎么劝导农民不要反抗的？

答：1970~1980年代有一个解放神学运动，但是教会本身是很保守的组织，300年的奴化宗教教育，不光是看今世还要看来世，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上。如果教会发现有哪个神父参与工运，会把他调到其他教区。

问：马科斯倒台的时候，军方是什么态度？

答：有几种情况。有些将领和（反对马科斯的）国防部长拉莫斯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将领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不想站错队。另外大家都不想造成全面内战。

问：红衣主教辛海绵的真实立场是怎样的？

答：一般来讲选举是一个减压阀。群众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把不喜欢的人赶走。但是1986年的选举让人更加绝望了。当人民群众的所有反抗手段都达不到目的的话，红衣主教就起来做一些（反总统）号召，怕人民叛乱，内战爆发。长期以来红衣主教都不搭理马科斯的，他一直比较反对马科斯。

当时军队内部有秘密的改革小组，由中上层军官组成。当时马科斯要抓两个（参与改革小组的）将军，他们就要求人民保护他们。红衣主教这个时候发出号召，是个很及时的措施，不然（对统治者来说）就麻烦了，他们最害怕的是革命。

问：1985年，五一工联、菲律宾农民运动、新爱国联盟为什么抵制大选？

答：菲律宾农民运动和五一工联不一样。五一工联最高纲领就是推翻马科斯政权。（马科斯下台前夕）那会儿我在新爱国联盟，当时五一工联和菲律宾农民运动的正式方针是不投票，抵制竞选。当时有老百姓强烈要求投反对票，但（五一工联、菲农运、新爱国联盟）上面的人只

是反对参加竞选，没有听到群众的声音。菲律宾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抵制大选。

五一工联、菲律宾农民运动、新爱国联盟当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参加选举的话可以把专制政权选下去，或者通过选举教育人民，并不认为当时推翻马科斯的运动能进到一个新的高潮，只是认为换个总统还是一样，没有根本改变。他们随后意识到选举的作用，1987年以后开始参加选举，选举这个舞台不能放弃。当然在所有组织里，这三个组织是最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大部分人民还是受反对派分裂主义的影响，影响范围还是有限的。当时（这三个组织）没有意识到反法西斯运动是一个进步运动，他们提出抵制竞选的时候，把自己从人民群众的运动（反马运动）中隔离出来了，被孤立了，变成消极的了。

在这三个组织内部，1986年选举前后都存在着关于是否参加大选的激烈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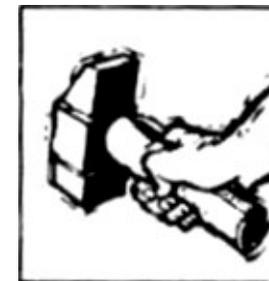
问：红衣主教号召的那些人是什么身份？

答：当时每个街区的基层教士都出动了，（当时）马尼拉大部分人都是工人，所以还是以工人为主。那些鼓动工人上街的神职人员，大部分都没有支持过工人运动。

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许诺进行土改，但是他们家族有很多土地至今也没有改革。（阿基诺）政府里的官员很多都是开明派人士，但是两届政府都是动荡式的。地方警察、整个官僚体系没有改变。阿基诺也召开了立宪大会，有关工资就业教育等等都写进去了。经济领域，也继承和落实了从马科斯时代就已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也改变了，马科斯时期的劳工政策全套保留下来，并且搞得更自由化了。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实施贸易自由化。阿基诺夫人下台，当时的国防部长接任总统，继续推行自由化政策。

问：工运高潮时，五一工联的情况是怎样的？

1984~1986年，五一工联下属有11个联盟，每个联盟的要求各有不同，最主要的要求就是罢工权。五一工联是1980年成立的，工运高潮是1986年和1987年，多数罢工还是工人自发搞的，五一工联领导的罢工只是少数。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期间，五一工联领导的罢工起到了带头作用，冲破罢工禁令，其他工厂跟进。



工运高潮时期，大概只有10%的罢工是五一工联组织的，其余90%差不多都是自发的，也有其他工会组织的罢工。有的自发罢工也有提出成立工会的要求。自发罢工的缺点是时间短，容易被收买。这是二月革命前后，全国范围罢工的情况。革命高潮也触发了罢工高潮。90%的罢工主要是经济诉求，要求提高工资。

问：当时的联合罢工多吗？

答：在出口加工区有。耐克的服装加工厂，管理层对工人很粗暴，工人走出工厂抗议，整个加工区发动了同情罢工，持续了几天。

问：我们采访到的一些工会干部认为1972年的戒严令是针对工运的，但刚才您说是针对学生的？

答：我认为戒严令主要是针对学生运动。因为当时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诉求，对制度威胁不大，但是学生还提出一些政治性口号，对制度有威胁。斗争的目标很重要，1900年前后，工人斗争高涨了，那时是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但是后来（工人搞的斗争）只提经济要求了。1972年的戒严令，是因为学生提出政治口号。欧洲有一些大的罢工，煤矿汽车运输等行业，可以瘫痪国民经济，但是目标只是经济目标，没有政治目标，所以政府可以容忍，妥协。

1986年是罢工的高潮，经济诉求比较多，后来的罢工就比不上那个阶段。现在的工人斗争陷入低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向工人解释政治诉求的重要性。

问：1986年之后，罢工逐渐减少，是不是和工人的期望落空有关？

答：有工人说什么变化都没有。我不这样认为。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当时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群众要求提高工资，1989年出台了一个工资合理化法令。当时工人要求工资从25比索提高到50比索。结果工资真的提高了25比索，但是（政府）取消了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度，改为各省自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条款，因为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1987年（五一工联）出现了冒险主义，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通过城市暴动去争取工资增长，没有注意到政府取消了全国最低工资。我们没有注意到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很多地盘。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波及所有领域，原来有很多中产阶级、中等资本家，因为新自由主义而没落了。工人中失业率大增，很难组织斗争。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像被罩住眼睛的马，没有看到大环境改变，宏观环境的恶化。现在罢工的次数和规模小多了，（斗争的）代价更高了，需要更高的觉悟。这是为什么斗争减少的一个原因。

问：五一工联里的其他人也认同这种想法吗？

答：恐怕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问：城市的罢工有没有影响到农村的罢工？农场工人的罢工能否得到城市工人的支持？

答：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工人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会有互相支持，但做得还远远不好。我们发现，要搞一个成功的罢工运动，必须有好几个条件，要有农场员工、其他工厂和社区的支持，不然很容易被

破坏。我们能够获得其他阶层的支持，有时多有时少，很不稳定。

问：五一工联有没有组织过跨厂罢工？大规模的跨厂斗争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答：多数是有组织的，但是1980年代罢工高潮的时候，还是有不少自发的联合罢工。联合罢工需要更高的阶级意识，不光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有其他人的处境。

问：1980年代的时候，除了五一工联等已有的工人组织，工人有没有自发的成立组织？

答：有的出口加工区里面，各厂的工资差别很大，服装厂工资很低，电子厂工资高一些，虽然都要求搞工会，但是目标不同，不容易联合，要把大家联合在一起需要沟通交流。

工人自发斗争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甚至反对政府（的有关）条款，但是占领工厂等更高形式的斗争基本上不可能。菲律宾这边没有阿根廷那种接管工厂的斗争形式。

问：在联合罢工中有没有具体分工？

答：在出口加工区里要搞活动都很危险。五一工联的一个策略，就是至少在十个工厂里同时活动，这样资方和政府就不知道组织者到底在哪里。要选择（搞组织的）时机。如果有几个工厂的工人比较进步，就同时在其他工厂进一步提高组织水平。假如两三家工厂里有足够多的工人支持工会，其他工厂也有工人的支持，才可以开始。

第一步是在关键部门的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第二是成立小组。第三是组织委员会。我们尝试寻找联系工人的方法。不同的工厂会有不同的工作小组。以工作小组为基础成立委员会。不同工厂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第一个工厂的问题主要是经常炒人，第二个是工资低，第三个是经常罚款。初步的组织工作大约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成功后组织一

次公开的集会。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搞集会游行，要求和厂主对话。这里有一个问题，工人经常换厂，但他们居住的社区是不变的，所以就在社区里组织工人。同一个工业区内，不少工厂属于相似的行业。工会成立之后，就向工厂要求转为正式工。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如果被解雇，那么他就会作为组织者进入一家新的工厂，这会增强不同工厂中组织者的联系。只要不是特别有名的、突出的积极分子，厂主还不会特别关注。因为在这个工业区里资方非常强势，所以组织工会要有策略。几家工厂同时成立工会，要比一家工厂成立工会好得多。工厂的合同只签六个月，工人也有办法对付，就换名字，再干六个月。工作满六个月的工人会享有一定的福利，但是资本家既想要熟练工，又想不给工人福利，所以也默许工人换个名字继续留在工厂工作。

问：政府会不会像抓工人领袖一样，抓一般的积极分子？

答：积极分子被抓的话，我们会提供帮助，打官司。一般是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列入黑名单。

问：工人自发罢工有没有时间较长的，有多长？

答：统计数据不好找，只有罢工人数和发生时间。

自发斗争为什么坚持不长？因为准备都不充分，没有罢工基金，没有社区的支持，容易妥协，自发罢工的领袖很容易被厂方威胁或者收买。

问：自发罢工中的工人领袖有什么特点，普工，技工还是基层管理？

答：如果自发性罢工的话，领袖人物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男性为多。可能是基层管理多些。

问：80年代工人组织内部的冒进思想是怎么回事？

答：工运中有两派，一派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一部分，农业还占很大的比重，另一派认为是菲律宾是半工业化的，多数人都是工人

阶级，农民在工人化。所以第一派认为工农联盟是很重要的，革命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第二派认为工人阶级是主体，应该提出工人阶级的要求了。第二派要复制列宁的革命方式，认为应该走苏联的道路。他们认为1986年的人民力量标志着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下一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他们当时在各种工人团体组织中寻找群众暴动的合适时机。但是（他们搞）城市起义的目的，不是像列宁那样夺取政权，而是通过起义的方法获得工资上涨。当时，我们正在争论起义时机是否到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对菲律宾的影响，没有注意到政府通过了工资合理化法案，其中含有一个取消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的条款。

当时组织了一个十天的大游行，围攻总统府，希望游行被政府镇压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参加游行的人很少，政府没有理睬。

还有一些人给工人发武器，在一些工厂挑起与资方的武装冲突。他们以为制造事端会引起人们的公愤，吸引支持。当时发生枪战的工厂，几个中层管理打死了，工人领袖也被打死了，最后老板关闭了工厂。工人连纠察线都没有搞，因为怕自己被枪杀了。另外一个矿区也是工人和管理人员互相枪战，工会办公室就从矿区搬到城里，工人就不敢去纠察线。这些（搞冒险的）人的头目最后被别人枪杀了，有可能是内讧。1994年从五一工联中还分裂出一个黄色工会⁹，是奉行经济主义的。

五一工联有一套“分阶段工人教育”的理论：1）工作条件，2）工资，3）政府问题，4）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先组织工人，提出经济要求，在争取经济利益的行动中，遭遇政府镇压，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提出政治要求，最后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

问：除了五一工联，其他工会和工人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菲律宾工会大会（TUCP, Trade Union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是最右翼的工会联盟。其主要成员是菲律宾海员工人工会，

⁹ 一般指与资方妥协或被收买，或是被工贼所控制的工会——译者注。

菲工大的一些头目就出身于海员工会。海员工会是按照国际公约由上而下建立的,不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菲工大是 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的,是戒严时期马科斯政府操控的唯一合法工会。自由工联 (FFW)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产联帮助下建立的,主要是受天主教的一个分支“耶稣会”支持。耶稣会在天主教中比较开明,这个教派在菲律宾有很多学校。自由工联宣称不受政府操纵,也不受任何政党的操纵。全国工会联盟 (NAFLU,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r Unions) 是 1957 年成立的,后来他们都拒绝加入马科斯控制的菲工大。后来,马科斯就想把菲工大按行业组织起来,自由工联和全国工会联盟不是按照行业组织的。

菲律宾的工会其实是很强政治性的,和各党派有联系。

菲工大很少组织工人罢工,但是因为它是官方认可的工会联盟,工人加入比较容易,而且有时候工人也没有选择。当时马科斯只允许菲工大公开活动。自由工联在马科斯上台前就存在,但是马科斯上台后,只允许工人加入菲工大。菲工大还有一个国会议员,自由工联没有国会议员。

1970 年代末之前,菲律宾只有 10% 的工人是工会会员。现在只有 3 ~ 5% 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只有 1.5% 的工人同资方签订了集体协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都有集体协议。菲律宾劳动力人口 4500 万,很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是在服务业,其次是农场工人,然后才是产业工人。2010 年工会入会率降到 2%。最多的时候,五一工联有 30 万会员,后来都下降了,菲工大的会员数也下降了。

虽然菲律宾拥有的船只不多,但是在船上工作的菲律宾人不少。一个船上的海员一般都是一个国籍的,以便船长控制。海员工会是菲工大的核心工会,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果是巴西的船,巴西的旗,船员是菲律宾人的话,那么工会就是菲律宾工会。

很多集体协议都是假的,没有实际内容,就像情人的口头协议。另外,集体协议是秘密的,工人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政府名册里有很多

工会,但是很多皮包工会的存在目的,就是骗工人交会费,工会没有实体存在,就算找得到地址,也找不到人。

在交通电力等垄断行业里,有一些独立工会,它们不加入任何工会联盟。这些工会的政治倾向取决于工会头目的倾向。这些工会能存在,主要是会员比较多,会费比较充足。菲律宾航空公司,菲律宾电话电讯公司,马尼拉电力公司等等,都属于这类企业。这些工会与资方订立的集体合同也各有不同,有的有加薪条款,有的没有。比如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工会与资方订立的集体合同就是十年以内不增加工资。菲律宾航空公司在 2008 年集体合同到期的时候拒绝与工会谈判,拖了三年,到 2011 年工人罢工,资方把工人都解雇了,然后又返聘。解雇的主要是地勤人员。

1998 年,有个富人收购了菲律宾航空公司,强迫所有 45 岁以上的飞行员退休,然后按照新员工待遇重新聘用。当时菲航共有三个工会:飞行员工会,乘务员工会和地勤人员工会。地勤和乘务员要求与公司谈判,公司拒绝后,工人开始罢工,新老板立刻宣布航空公司破产,当时菲律宾政府成立了一个机构挽救航空公司,迫使地勤人员和乘务员复工,并且同意十年不涨工资。到了 2008 年,十年协议到期,公司始终拒绝谈判。到 2011 年,工人再次罢工,公司态度强硬,将罢工工人全数解雇,然后按照临时工待遇重新聘用。

菲航被收购后,公司内原有的很多部门,饮食、地勤等业务,全部外包给新老板另外成立的公司,按新员工待遇返聘这些员工。这个老板同时收购了两家航空公司,飞行员要在两家公司工作,但是只挣一份工资。后来还把三百多个飞行员解雇,按照新员工返聘。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组织工会仅仅是为了经济原因,所以我们面对的就是工会腐败问题。如果只讨论经济,往往就是一些工会头目得利,腐败问题严重。腐败都是从小事情开始发展的。在谈判中,工会头目会知道最低和最高要求,会私下跟厂方订个协议,公司给工会头目一

个红包。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保证工会运动的正常进行。不断地做工会干部的思想工作，要有战斗性，不能只注意钱的问题。雇主也会千方百计瓦解和腐化工人领袖。

另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新形势下，劳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的一个工会干部说，当我们找到答案的时候，他们把问题改变了。

要问正式工怎么看待合同制，其实合同制早就有，但人们不知道事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现在大多数工人基本上都是派遣工。以前认为临时工、派遣工是正式工的补充，现在变成主体了。

资产阶级非常聪明，当你学会应付他的时候，他的方法就改变了，他们的眼光是非常长远的。不是他们聪明，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干。所以我们对工人的教育不能光放在经济上，要不然总是跟不上斗争形势，老是落后。我们不光要看本地区本行业，还要看到全局，现在这个形势就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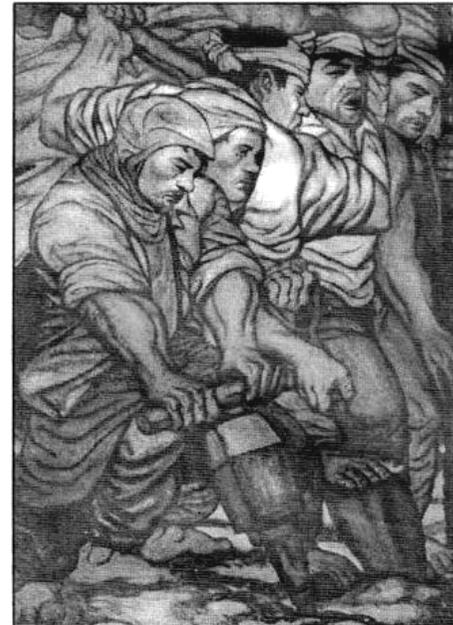
关于临时工、派遣工与正式工的问题。这个与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高度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行业，对工人技术水平要求低，就用临时工和派遣工，对技术要求高的地方就用正式工。有一家服装厂，工人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式工，其实工人的劳动关系属于一家外包公司。这家外包公司是台湾的，是1949年国民党投资建立的。这家公司有巨大的（生产）网络，母公司决定关闭菲律宾的工厂，搬迁到中国大陆，这时工人才知道自己的劳动关系属于台湾的外包公司。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把最低工资下调，使正式工的收入逐渐变得跟派遣工的一样。现在是根据订单招临时工，连短期合同工都不是，有货做就雇人，做完了就解雇。公司里清扫维护等工作一般由专门的公司来做。有直接招聘，也有通过中介招聘。以马尼拉工厂为例，有三种工人：正式工，派遣工和临时工。现在一些中层管理都是派遣工。通信公司工资高，之前主要业务是正式工来做，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后来装电话、修电话等主要业务外包，工人的工资就降低了。现在只有监工才能拿到最低工资。

问：在失业的情况下如何斗争？

答：工人失业后很难组织，而且政府和资方对出口加工区的控制十分严密。这种情况下，要到社区里做组织工作，把失业的和没失业的人组织在一起。有一个地方做得不错。先在社区组织工人成立互助会，给工人讲一些尊严之类的课，然后加强对工人权利这方面的教育。这是经济区里最成功的组织经验。不只是针对工厂采取行动，还有对整个经济区的管理采取行动。第一次行动成功了，第二次阻止了破坏工会的活动。

问：怎么安置失业矿工？

答：采矿在菲律宾是非常重要的行业，中产阶级和教会也在关注。采矿业关联到很多方面。我相信，告诉矿工需要保护环境（所以要关闭一些矿山），矿工一定可以理解。采矿对菲律宾（的自然环境）危害太大了。工人阶级不能光把眼光停留在经济上，很多工人（组织）的领导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应该明白。很多（失业）矿工去做季节工。



妇女运动组织者奥菲

刚开始遇到奥菲时，没有想到她就是我们要访谈的对象，还以为只是一位接待人员。她安静地站在楼梯边，神情平和，身体发福，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甚至有些不起眼。和她聊过之后，我们才发现她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我们随后遇到的很多经历过残酷斗争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头衔是“主席”还是“秘书长”，看起来都是没有架子的普通人。他们谦和，热情，平易近人。他们和我们一聊便是几个小时。有的人年事已高，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精力还旺盛，太让人钦佩了。

我父亲是前任五一工联主席。他想让我当工会秘书。起先在五一工联下属部门做办公室工作，后来觉得基层工作更适合自己。1985年，我开始担任一线的工会组织者。

当时我去过工会下属的鞋厂、烟草厂，了解工厂的基本情况和工人的现状，感觉他们很需要帮助。我接触了一些女工，学习如何跟工人相处，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找工人做访谈，我说“我想要找工作”，拿这个当引子。工人说，你可别进厂，工厂的条件很不好。这样就聊开了。你不是本厂工人，保安是不让进的，只能在厂外面跟工人接触。

食品厂的斗争

在一家食品厂外我遇到四个女工，跟她们聊天，问为什么厂里面噪音那么大。她们说是做爆米花的，噪声很大，有的人耳朵都聋了，有很多职业危害（化学品什么的），有女工怀孕了还在做。工人的居住条件

很差，宿舍外面有围墙，外人进不去。

我跟工人接触，通常是趁着他们出来买东西、洗衣服的时候上前搭讪，帮他们拎东西什么的，借机聊聊天，取得了一些女工的信任。我了解到她们不光是工资低，劳动状况也很差。这个厂里有500个工人，没有工会。男工女工工作不一样，男工主要干搬运类的重活，女工做包装类工作，比较好组织。我告诉女工应该争取最低工资、加班费、夜班费，争取劳动保护和对女工的保护。我们平常去社区街道参加活动，比如扫地、照顾小孩之类，这样就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我们还参加了政府下面的医疗项目，从中得知大多数工人都有一些皮肤病、耳聋、呼吸道疾病。工人就有了想搞一个工会的念头。他们不知道我是五一工联的组织者，只是把我当作热心市民，有的甚至以为我是街道工作人员。工人们开始在工厂里建起一个20人左右的协会，并着手调查工厂的基本信息，了解老板是谁、产品卖到哪儿等。

食品厂老板是个菲律宾的大资本家，主要经营食品。管理层的事情也得了解，比如他们赚多少钱。这类调查的作用是能够教育工人们去争取应得的东西——作为一个工人应有的基本工资、福利待遇，作为一个人应当得到的基本待遇。工人通过学习法律，了解自己的诉求有哪些依据；此外还要了解社区的情况。接着，就讨论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刚开始组织的时候，工人很害怕，担心可能会被开除。我就向她们解释斗争可能达到的美好前景，大家又感到很开心、很兴奋。协会搜集、整理了一些工人的要求，打印出来给大家看，变成了集中和反映工人意见的工人委员会。我们把一切东西都想出来——体检发现的病、加班费、产假、奖金等要求——全写在一张纸上，最后向资方提出要求。

工厂察觉到工人在悄悄酝酿组织。一次吃饭时，经理威胁工人们说，你们要是搞了工会，我们就把这个厂关掉。同时贴出公告，换了一副软面孔：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人力资源部门反映……当时工人们很兴奋，小组成员开始有点高兴地说：厂方愿意跟我们对话了。他们跟资方谈了一

回。对于工人们提的要求，工厂回答说会研究研究。回来后大家更兴奋了——终于平等地跟经理谈了一回话啊。她们还幻想起来，以后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啦，等等。后来副经理把工人叫去问话：是谁教你们写这些东西的？工人们说是社区医疗的一个人告诉她们的。社区的人知道她们在工厂里太受罪了，就帮助她们（这时工人还以为我是社区的人）。

经理听了工人这番话，就很有顾虑，担心工厂的待遇要是被外人知道，尤其是他们的上司知道了，就很麻烦。他还怕挨当地政府部门的处罚。工人的要求书提交后，管理没找工人，而是找到社区的领导，讨好他们，还特意给社区捐款。社区领导说，你们有这些钱给我们，还不如给工人，还教训了厂里一番，说你们怎么做事的，这么对待工人。工人们知道后很高兴。

可是管理回来后什么都没做。工人等了一个月，发现没有任何动静。那些特别活跃的女工就选举了工会主席，向劳动部门申请成立工会。之前的二十人小组成了工厂工会的核心。厂方都气疯了。老板说你们干嘛成立工会，你们有要求我都答应啊。工人说你们什么都没做啊，工资也没涨，劳动条件也没改善……这是 1986 年的事情。那时是允许成立工会的，但不允许罢工。

刚开始，工人们都会很害怕，但作为一个集体团结起来了，很明确地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就会感到力量和信心。这些经验都是我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

工人都是本地人，住在厂里，集中营似的，跟外界隔绝起来。工人有了医疗项目后，厂区外的人才开始有所了解。社区老百姓原先对工厂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头一次了解到，都感到有点骇人听闻。

此后，工人开始向劳动法庭起诉工厂的劳动条件差、拖欠工资等问题，得到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工厂负责人在劳动法庭上称，实在是还不起欠工人的钱，只有关厂。工人于是设立了纠察线，把工厂封闭了。社区的人们很支持他们，给他们送去米饭、食物、水、牛奶。劳动部门

也批准他们在选举后成立工会。戒严时虽然不允许罢工，连三人以上的集会都不允许，但罢工照样发生。工人们用罢工行动冲破不许罢工的禁令。

斗争中，我的角色主要是出主意。因为父亲是五一工联主席，从小耳濡目染，见过很多斗争。我觉得社区在斗争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社区的人往往都会支持工人。一是工人自己的团结，二是社区内的支持，都是斗争胜利的保障。罢工时，社区居民给工人送水送饭，工业区里的其他工会也会赞助，教堂也给予一些帮助。孩子们都去本地学校读书，有人照顾。当时还请了一些媒体（广播、电视）来报导他们罢工的原因和状况。五一工联如果有接待外国的来访者，就会带他们去参观这个工厂。

罢工期间，资方通常会雇些人来顶替罢工工人工作。但正门有纠察线，工贼进不去，就跳墙或用别的办法进厂。工会当然会劝说他们不要进厂，但没什么用。接下来就把他们围困起来，切断水电，过不了一两周，他们就求饶说放他们出去。有些被招来的人做的产品不合格，要返工，重做。工厂招人顶替，有时是通过几个社区公用的一家招聘机构，有时是通过公司自己外设的机构，他们会去较远的其它地方招人。但这种情况不多。新招工人不熟练，是工贼少的一个原因。至于那些水电设施，是工厂所有的，如果罢工期间受到破坏，复工后工厂自己修，政府和警察是不会管的。

罢工持续了一年，工人住在纠察线上，同时在劳动法庭打官司。全厂 500 名工人，有的找到了新工作；有的当了小贩，上午摆摊，卖不出去就给大家。纠察线还开了一个小商店。但大多数的援助还是来自于其他机构和教会。有一半人坚持到最后。其他很多人（有 120 人）到别处找到工作，有的回老家，有的离开后又回来。最后回来工作的有 380 个人。由于罢工期间资源有限，支持不了那么多人的长期抗争，部分工人离开，留下的人表示理解。斗争胜利后，不管走了没走，欠的工资都还

了。这家工厂直到 1998 年才关门。

工厂有 60% 的女工，她们都是正式工人，但待遇是按临时工给的。工会主席是男的，工会委员会成员全是女工，副主席和其他干部也都是女工。那个工会主席从第一天起就呆在纠察线上，比较积极，上劳动法庭打官司也是由他出面。外来访客都是女主席接待。罢工中的积极分子都是些平常就积极关心工厂问题、远离管理层的人，愿意出头跟厂方谈判。工人和管理的区别：后者是薪水制，工人则是按工作时间算工资。基层管理属于工人。上层管理通常无法进入工会委员会，这些人只会是间谍。

组织矿工家属进行斗争

1987 年，我到过马尼拉周边的省份，帮矿工的妻子组织协会，支持矿工斗争。那里已经有一个五一工联的工会了（资方知道这个工会）。我们想把矿工的妻子都组织起来，因为矿工及家属居住的地方都在矿业公司划定的区域内，远离社区，因此矿工斗争能得到的最直接的支持，只能来自家庭。矿工家属有一部分在社区做一些小买卖，其余都是家庭主妇。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公共厕所脏，饮用水都是被矿区化学品污染过的。我受工会之邀，去做家属的工作。

当地有两座挨着的矿山，一座 600 人，另一座 1000 人。矿业公司的工人在加入五一工联之前很久就已经建立了工会，但只提一些经济要求。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指导，不清楚以前做过什么，但是一定为工人做过有好处的事。这个工会是当地的其他机构组织的。这是有方向地组织工人行动的开始。但他们之前没有任何谈判和罢工经验，所以才叫我过去。

我一个人从马尼拉前往矿区，公开接触矿工，但不用自己的真名，也没说自己来自马尼拉五一工联本部，只说是当地五一工联分部的组织

者。来之前，五一工联当地办公室的人已经给了我一份当地情况介绍，这样就知道大概应该去做什么。那里条件很苦，住得很挤，墙很薄，刚去时要适应一段时间。最大的问题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幸好矿工都懂英语，可以用英语交流。那个地方历史上被美国侵略，老老少少英语说得都很流利。矿工们说的英语比我还好呢。

我花了四个月时间慢慢适应他们的环境。组织斗争的主要切入点是水的问题，以及生育问题。第一个项目是清理卫生。那里的公厕是长长的一条坑，公司每三天才清理一次，对孩子们来说很有害，水也被化学品污染了。我让几个妇女积极分子自己去找工会谈，事情引起了工会的注意。工会就把健康环境问题纳入与矿方谈判的内容里面，把意见提交给矿方。矿方不肯让步，把意见搁置下来。矿工就罢工，要求矿方处理这个事情。谈判时，家属里有一个代表当发言人，每次谈判都会去。工会的议程上有很多常务项目，包括涨工资。这次不同的是，加进了妇女们提出的保障水源、提供医生等关于健康的项目。

谈判期间，家属们就在外面拉警戒线。工会罢工委员会要时刻准备好，第一天谈判就开始为罢工做准备，时刻关注厂方的动向。家属们也要时刻准备好，有罢工的动向就开始行动。罢工发起之后，就得到了家属的大力支持。这些家属非常活跃。有一次，一个五一工联工会干部在发言，有一位妇女走上前去，拿过麦克风来，讲述自己的要求。

积极的妇女开大会动员其他妇女。五一工联的工会也动员其他地区工会的人来支援。大部分妇女都很积极，这些要求对她们来说关系重大。起先在本地区活动，后来几次组织去城里做宣传。一些积极的妇女参加了演讲培训。她们很愿意参加罢工，也愿意接受教育，把自己从家庭妇女变为一个积极的妇女。但她们也没法全体参加罢工，因为要做家务，有些人还做小生意赚一些小钱。罢工中设立了很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一名妇女代表，不光有负责做饭的，还有教育呀什么的各种委员会。这次妇女参加得非常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露同志

矿方曾派保安、警察去骚扰罢工者，还朝天放枪，但没有人受伤。矿方惯于首先向警察求助，因此警察来得很早，大概十来人，几辆车，来了几个小时，厂里会给他们钱。法律规定警察必须离警戒线 50 米远。为了破坏警戒线，他们会出手打人。但是如果工人组织得好，一般不会被破坏。工人只是自卫，没有打斗。大家组成人墙，非常团结。工人一直是坚强的，难以瓦解。当然资方会找人谈话，要求他们复工。工人则答说：你答应我们条件，我们就回去工作。工人罢工越久，矿方损失越多。持续了一个月后，工人终于胜利。资方妥协了，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也不追究罢工积极分子的责任。

我们在罢工之前就做了调查，所以很清楚资方有能力支付多少工资和福利。通过了解每天能挖多少的矿原料、市场价是多少等信息，算出每天的营业额。矿场不像工厂那样可以搬迁，所以资方更容易妥协。罢工一定要选在生产的旺季。选择时机时要考虑时间、管理层，以及他们的底线，还有其他地区的运动是否高涨。注意要在生产的产品还没有卖掉之前就罢工。

罢工取得的成果是：劳资双方签订了一份有法律效用的协议书；资方安排每天用清洗矿场的废水来冲洗厕所；饮用水就专门用一根管子，从山的另一边拉过来。工资要求方面很难落实，需要继续施加压力，会有律师、劳动部的人来催促落实。



露已经是个老太太了。我们临走前的一个中午，在五一工联的厨房里遇到她。当时她正在那里安静地吃饭。感觉她应该经过不少风风雨雨，于是攀谈起来。原来她是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的干部。和这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露的外表看起来跟普通群众没什么分别，很温和，喜欢微笑，甚至讲述起自己在牢房里被虐待的经历时，也一再微笑着。她跟她的儿子都没有说得这么详细过。很多情节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记载革命先烈们英勇事迹的书籍、电影里女主人公的经历。她说她也读到过中国革命者的故事，并从中汲取到力量。而那些故事，竟在她身上重演了，她自己成了故事的主人公。那是几十年前的菲律宾，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投入到人民运动中去。露就是其中一个。

我今年 70 多岁。原来是菲律宾大学的学生，没毕业就加入新人民军，给农民讲课。后来去过拉丁美洲，到过利比亚，参加一些激进组织。在拉莫斯时期，我去过荷兰。跟政府和平谈判时，我也是代表。我参加了菲律宾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合作项目。现在慢慢接触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党，所以想学西班牙语。以前在学校里我有学过一点西班牙语。

从哪里开始呢？先讲一个大概经历吧。我在大学时学社会学，研究菲律宾的社会问题。在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我参与了塞松领导的学生组织。当时学校里还有一个教会领导的学生组织。两个组织针锋相对。反动的学生组织为政府所利用，污蔑其他人是共产党。当时的大学教材都是官方的，亲美派搞的。有一个进步的历史老师，教我们菲律宾真正的历史。我们自学辩证唯物主义等等。当时参考书不多。没有那本塞松

的书，没有系统的关于菲律宾革命历史的书。我们为了国家民主而斗争，学习阶级分析方法，了解民族矛盾。我们知道校园外的社会是什么样子。1970~1971年，全国各处群众运动高涨，学生运动高涨。人民运动变得强大以后，每年暑假，我们都参加工人罢工运动。1968、1969年左右石油价格上涨，学生们很激动。有一个支持马科斯的教授用枪把参加运动的学生打死了。全校学生非常气愤。他们占领了学校，宣告成立学生公社，把桌椅从教室里扔出来作为障碍物，把学校里的路都堵上。学校的各个大楼都按照革命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外面的军人想进来（镇压）。我们说学校自己有警察，校外的警察不应入内。从那以后，大学就有了一个新规矩，只能用自己的警察，外边的军警不得入内，到现在还是。自然科学的教授加入我们，用酒瓶子制作燃烧弹，把实验室里的化学品用于制作武器。不久，外边的工人就开始支持我们。我们大概围了一个月学校。刚开始是因为石油涨价，接着我们的要求就涉及到政治问题，教育自由等等。我们还占领了学校的电台。当时群众都同情学生。教授甚至把他们的汽车装满汽油，带进学校做燃烧弹。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知道不可能这么永久地占领下去。我们向校长提出要求，一是校外警察不得干预校内事务，二是学术自由，三是不能强迫学习西班牙语。当时西班牙语是强制学习的，现在是学生可自由选择的第二语言。那段时期成立了好多学生组织，并派出学生代表参加地区教育管理委员会，这个管委会可以决定各校校长的任免，6票可以决定，学生占其中1票。

离开菲大时，我没有办什么手续。后来戒严令解除后，菲大允许以前的积极分子回校继续学习，但是我没有回去。戒严令期间，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被取缔了。当然我们没有停步，而是继续搞地下组织和活动，只不过根据情况换了组织方法。我们做社会调查。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工人，他们不顾戒严令，发动罢工。戒严期间的艰苦生活，使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观点。

我们一直要进行斗争，没有别的选择，走不了回头路。我自己坐牢

一年多。我丈夫是菲大的学生领袖，坐过两次牢，每次三年多。我转入地下时，把儿子交给姐妹去带。我姐妹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从事那些运动，但还是给我经济上的帮助。

我在游击队时，经历了两次武装冲突。那是人生中很特别的经历，跟在城市里搞中产阶级运动完全不同。条件很艰难，它能考验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第一次冲突时，我在那个村子里才待了一周，上了五次课。刚给游击战士讲完课，敌人来突袭了。战斗中，身边的同志一个个中弹倒下。当时我都傻了，站着一动不动。后来反应过来，就往回撤，还听见队长在大喊大叫地跟敌人拼命，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头皮被一颗飞过的子弹擦破了，掉下一缕头发。这是很考验人的时刻。我问自己下一步要怎么做。敌人挨家挨户搜查。房东把我的枪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枪声还在响。我问房东能不能把伤员救回来。房东说现在太危险。当时在村里认识的人不多，情况不熟，我就离开村子。看见一大堆军人，村民告诉我要一直走，我就一直走。军人拦住我，问我听没听见昨夜的枪声。我说有听见。问我离交战的地方多远。我说挺远的。军人没看到我头上受伤。当时我二十几岁，看起来年龄很小，他们就没怀疑我。后来我发现自己吓得尿裤子了。

老乡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上了公交车。在车上我想，我需要休息一下。我想要换车，要么到马尼拉，那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要么去别处，有地下工作的地方。路上，警察拦下了我们的车，说是前边打仗，有一个人逃了出来，要搜查，任何人都不能下车。我就想怎么办，我必须下车。我说我要去方便，就把所有的东西留在车上了，包括我丈夫写的家信，那是用卷烟的纸写，一小片一小片的信。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想到家庭，想到儿子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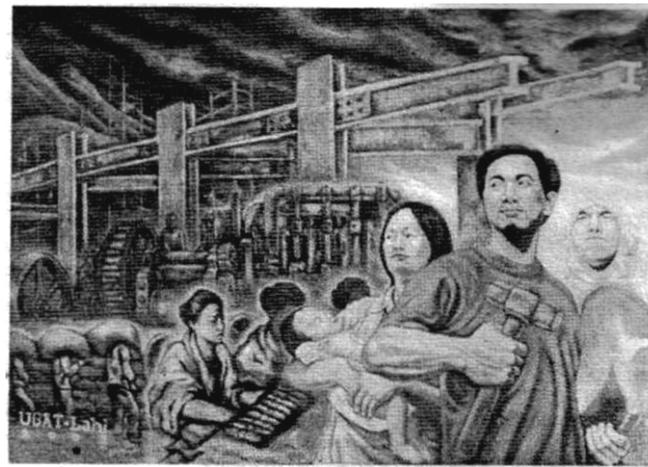
后来上了一辆吉普尼。到了之前来过的一个村子，我找认识的村民问情况。村民说这里有战斗。我想起自己坐的吉普尼后面就跟着辆大卡

车，心想哎呀，我怎么又跑到打仗的地方来了！我想回到原来打仗的那个地方去。老乡说，你就在这等着吧。午饭时间，老乡带我到甘蔗地里干活，遇到以前的战友。这支游击队跟我原来所在的那个游击队不一样，我原来那个都是新手，装备也不好。这支游击队都是有经验的队员，装备也好。我白天给他们讲自己游击队的遭遇，但是队员更留神的是周围的情况，好像并不关心我讲的，只说他们会报仇的。我从没有受过军训，打起仗来就发愣。他们告诉我，遇到枪击时应该躺下，滚着移动。当晚，又发生了冲突。夜里行军的时候，我走在队伍中间，突然听见枪声。原来我们的队伍发现前方有亮光（有人抽烟），就开枪了。早上发现打死了四个军人。（他们判断抽烟的是军人）因为丘陵地带没有住户，他们断定抽烟的人不会是村民，也不是我们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同志在哪里。后来，大家称赞这个游击队干得好，还说我是里头唯一一个女兵。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因奸细出卖，我被军方抓获了，是一个当地村民告密。于是敌人知道了我是第一次战斗中漏网的。一年以后，军方审判时，把这个村民叫来跟我对质。叛徒说：“你投降吧，我来帮你。”我说：“你连一个军衔都没有，怎么帮我？”

我被带到军营里去，手脚绑起来，严刑拷打。每次审讯前，他们都虐待我身体的敏感部位，胸部和下体。他们想让我哭，让我变得脆弱，但这更激起我的愤怒。我骂道：“你们是什么人？真是禽兽！除了把我捆起来，折磨我，你们还有什么本事？”他们搜到我身上带有药品，治心脏病的药，就问我那些医生的情况，因为知道我是菲大的。受审时，我用英文答复他们，造成一种高高在上的气势，就像心理战。第一阶段是技术性问题，问我一些情况，想让我出卖同志。这个时候最危险，因为你不在监狱里，没人知道你在哪儿。很多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折磨死了。当时我很弱小，体力上没法反抗，但是我采取心理战。我说“你们这些没本事的胆小鬼”。他们每次虐待我的时候，我就质问他们：“难道你们没有母亲吗，没有女儿吗？”最后问得他们不好意思了。第二天有

高级军官来视察，他们就给我取下锁链，穿上衣服。当时我绝食抗议他们的虐待。医生来看过之后，说要去治疗。后来我被送到医院，有几个人监视我。最后我总算活了下来。住院时我在纸条上写我是谁谁，被捕了，赶快告诉我父母我在这里，写完把纸条扔到窗外，但是没起作用。

革命者经受这些考验的时候，面临生死的时候，要考虑为什么斗争，还要不要斗争。我遭到拷打的时候，回答他们的问题，都是瞎编的。就是用心理战，经常藐视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只是看起来强，但你们辩论不过我。你们使用暴力，只是说明你们软弱。”敌人的折磨反倒让我更加坚定：这个政权太反动。我对他们说：“你看，你们在这个社会起什么作用，你们就是为虎作伥！”他们说：“我们还修路呢。”我说：“路是工程师和工人修的，根本不是你们修的，你们不干好事。”战胜了那些折磨之后，我就是个胜利者。有了那样的经验，就再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了。



琳达经历的工人斗争

琳达 (Linda) 是一妇女组织的副主席，已经 70 多岁了。她从 60 年代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至今已 50 来年，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了。老太太非常瘦小，一头白发，但是依然手脚麻利，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几天之后，我们参加联盟组织的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游行集会。老太太在集会上拿着麦克风喊话的劲头，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我们是很贪心的，希望能把她 50 年的经历全部打包带走，但是时间有限，而且她依然忙于各种具体的事务，所以我们只得到两次访谈的机会，每次也不过两个多钟。她人毕竟上了年纪，有些事情回忆起来的确很不容易。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明明就在脑袋里的某个地方，但就是抓不住，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发现这里的老活动家大多没有写过传记或回忆录，而各种文字记录的材料，也大都不能像他们讲出来的故事一样精彩生动，当年的峥嵘岁月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之中了。

阴差阳错进工会

我 1960 年上大学，进的是一所穷人家孩子上的大学，三年级开始参加工会工作。当时全国工会联盟 (NAFLU) 来学校招聘，学校把我推荐过去做秘书了。我本来希望进一家政府办的保险公司去实习，所以学校的安排让我很生气。

那时，在校大学生从事各种活动，但并不关注工人。曾有一次学生抗议，因为学校原本说是安排上三个学期的西班牙语。这以后就只要学

一个学期了。在全国工会联盟实习时，工会开会时经常听他们谈到怎么组织农民、组织工会之类，我非常感兴趣。工会主席说：你非常好，对工人好，希望你留下来，至于工资，要看我们工会的钱有多少。

当时我是勤工俭学，到一间律师事务所打工，以此支付我的书本费、学费。我成绩好，律师也特别喜欢我。后来律师发现我在工会，就问我怎么不到他那儿工作，而要去工会做。我觉得律师尽坑穷人，工会主席待我则像慈父似的。父母对我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因此不反对我做工会的事。我也会用挣到的钱给父母买东西，牙膏什么的。那时是单身，没什么负担。有时我也教育父母，在办公室学习和领悟到什么，都会跟他们讲。

那个主席开会时，就像讲演似的。听众说这些不用讲了，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他就说不是给你们讲，是给琳达讲。他说农民生产是供给粮食，工人生产是提供各种生活用品，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这话留给

我的印象特别深。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一次我向工会主席请假，因为那是四月初，耶稣受难的日子，天主教有活动。工会主席说，你走了，工人怎么办？

我说我的工作有那么重要吗？他说，是啊，工人的事是最重要的，你要是不在了工人怎么办？

工会主席有时带我去游行。我害怕。他说只要跟人民在一起就不要怕。有一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来菲律宾访问，他是大高个儿，宾馆特意为他做了一张大床。各种机构、组织到宾馆前游行，大喊“美国佬滚回去”。警察拿棍子打我们。我们唱国歌，他们就不敢打了。但是后来再唱，



警察可不管了，抡起棍子就打。我也差点挨了打。工会主席就说，你看他们拿我们的税钱，却用棍子打我们。有一次，我去一个被枪杀的积极分子家，他家居然住在臭水沟旁边。我心里更加气愤。我觉得自己够穷了，但是没想到还有更穷的。我很受触动。总之，那个工会主席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教育我。

在工会的工作中我慢慢得到培养，但我不满意。我还想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组织者，我要去前线组织工人。工会主席就说：“你还在接受教育，我们就是在培养你，将来可以做组织者。”

有一次，我去看一家味精厂的罢工。那天下着大雨，地势低的地方，水淹到膝盖那么深。工人还坚守在纠察线上。一辆卡车拉着货往外开，罢工的工人就躺在地上，不让卡车开过去。我很担心卡车会开过去压死他们，但是卡车司机不敢。我觉得那些妇女非常勇敢。还有一家给可口可乐生产瓶子的公司发生了罢工。公司雇新人去顶替罢工者。工人拉起纠察线，不让新人进出，也不让货物进出。老板就用直升飞机给困在厂里面的人运吃的。工人用烟花射飞机，结果把司机吓坏，飞机也坠落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捕，因为责任在老板那一边，跟工人没有关系。就这样我慢慢接触到一些工人斗争。

戒严令之初被捕入狱

马科斯是在1972年9月21日颁布的戒严令。我那时患有肺结核，9月23日去医院检查。警察在上班的路上等我，结果没抓到我，就直接上我家，要我去警察局。我慢慢收拾衣服。警察说一会就放出来了，不用拿那么多东西。但我知道这一去肯定没那么快回来。我很幸运没有被强奸，那时经常会发生被捕者遭到强奸的事。戒严令发出时，我们都有思想准备，知道可能被抓。但我那时只是一个工会的办公室秘书，还算不上活动积极分子。我本来想，等别人被捕之后，我自己会坚持留在办

公室处理事务，谁知第一个就轮到。警察之所以想抓我，因为我掌握了好多工会的资料，或许可以从我身上搞到点什么信息。

在戒严令之前，工会主席已经开始培训我了，经常突然大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所以到了警察局，我一点都不怕。警察说你在这待一段时间，需要什么东西就写下来，结果我写了很多。警察说怎么写这么多，很快就出去了。我说，你们想让我当叛徒，我不当，肯定会被拘留很长时间的。跟我同住一个牢房的，还有两个学生。当时有些学生特别崇拜工人运动，知道我是做工人工作被捕的，很崇拜我。晚上我也哭，想孩子，但不敢出声，也不想影响学生，就捏着鼻子哭。我被关押的这个劳教所，监狱主管有三个孩子，都跑到游击队去了。他老婆经常哭，问他孩子跑哪里去了。监狱主管比较同情我们，就写信给马科斯说我们这个监狱不上刑，如果上刑就去别的监狱。很幸运，到12月底我就被放出来了。正是在监狱里，我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大家都在传阅很多革命刊物，比如毛主席语录。后来狱友知道我要出去了，在毛选上签名送给我，让我出去为工人服务，结果被发现了。于是我被关进一间单独的牢房里，关了一个礼拜。每当我感到难受，就把拳头伸出窗去，以示自己的坚决。

皮包厂的罢工

一家一百多人的皮包厂要关闭，工人要求赔偿。这个公司从小做到大，里面有干了十年的老工人，听说厂方要雇新工人来取代他们，都想：“我们是正式工人，怎么会被取代呢？”工人便一起去找工会，但那个工会是黄色工会，除了上诉、打官司，其他什么都没做。上诉被驳回，不予立案。黄色工会就主持罢工。但它没有带领工人把厂门堵上，而是让他们呆站在门口。工人们觉得“这怎么也能算罢工啊”。他们看出这么搞对工厂毫无影响，工人的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挺心酸的。总之，她

们对黄色工会很失望。有人提到五一工联，她们就决定试试去找。工人问到附近一个教堂，教堂跟五一工联关系不错，把地址给了工人。四名女工代表就这样找到五一工联。接待她们的干部对我说，这个厂都是妇女，你去做工作吧。我就去了。

刚到纠察线时，我看到工人都在打扑克、下棋。很多人听说是五一工联派来的人，就很担心、警惕、怀疑，说五一工联是颠覆性组织。我没有放弃，每天都去，跟不同的人交谈。我给他们讲国家形势，讲怎么去搞工会，后来慢慢就得到了工人的信任。黄色工会头目收了厂里的贿赂，离开了。我给大家讲如何搞纠察线，把要求写在纸板上，在厂里巡回游行。工人说这不是非法的吗？我说不是非法的。工人们看到警察、地方官员来了，躲得远远的。我说这是你们的斗争，你们得自己上，把自己要求什么都讲出来。她们就开始自己去讲要求。

起初我去斗争现场，看到满地都是红色。老板是中国人，红色代表吉祥。我说把它换成黑色，倒霉、晦气的意思，老板看到就很不高兴。我经常去纠察线，孩子都把我当祖母看。纠察线上怎么睡都是我安排的——单身的男工睡一边，夫妻俩的带孩子睡中间，另外一边睡女工。我像一个母亲一样细心把他们安顿好。罢工期间工人要有分工，有人照相，有人举牌子。我教育他们，举牌子不要举得软绵绵的，要有战斗力。我给他们做培训，讲斗争的意义，邀请一些妇女组织、学生们来看望女工，声援她们的罢工，周末还请教堂来做弥撒。我说，罢工的工人应该去争取团结社区的人。他们说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说你们自己站出来说嘛，说上几次就会了，我们要学会通过公开演讲说出真相，让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说，我讲不来呀，因为我会哭。我说，哭没关系，要愤怒地哭。工人不敢说话时，就跟他们讲：哭不是罪过，你们不出来说话，谁替你说？！我们都说家乡话，又不是说英语，有什么不敢说的。我们在纠察线培训演讲。经过训练，很多人就开始公开发言了。

面向社会的宣传鼓动工作很重要。工厂在河边，有一次刮台风，河

水都涨到肚皮了。工人没法再在厂外睡觉，那几天就到教堂里过夜。工人写了份公开求援书，社会上很多人送来食物、菜、鱼等。台风过后，他们继续得到很多资助。跟教会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教会人士同情罢工者，周末去纠察线做弥撒。大学医疗人员前来为工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是通过教会联系的。街区的人也得到医疗服务的帮助。有一个孩子出生在纠察线上，工人搞了洗礼仪式，通知了电台，前来现场直播。后来老板花钱雇了政府工作人员，清理罢工场所的“垃圾”。他们开了大卡车过来清场，把罢工者的背包往卡车上扔。街区的老太太就让小伙子爬上车把包通通扔下来，结果只丢掉很少几个包，其它全部“获救”。罢工者得到这样的支持，很是兴奋。

工厂管理层想把机器拉出来，搬到另一个厂子去生产。工人堵着厂门。老板也反对搬过去，怕把那边的秩序也搞乱了。最后搬了两回才搬过去，那里是反动力量最嚣张的地方，有很多进步分子被杀害。一个工会成员眼见货车走了，就打车跟着去查看新厂的位置。后来工人们每周都去那家新厂抗议一回。

另外两场罢工

一家台资服装厂，有300多名工人，大部分都是女工。几年前，工会和公司进行集体谈判，要求增加工资、福利待遇。谈判期间刚好碰到圣周假期¹⁰。谈判之初，公司寸步不让，圣周开始时公司松了口，同意了要求。大家都很开心地过了一周假期。但圣周结束回到厂里，工人们发现所有的机器都不见了，老板和管理人员都跑了。后来社区居民告诉工人：你们工厂的机器都被老板搬走了。工人设置了纠察线，要求跟厂

¹⁰ 圣周（Holy week），天主教和东正教名词，共七天，纪念耶稣受难前一周的事迹。圣周之后就是复活节。

七十年代老组织者访谈

方谈判。老板没出面。工人利用剩下的几台机器，和剩下的材料，自己生产衣服，自己卖，这样就有钱吃饭了。厂方上诉，说工人侵占了工厂的材料和机器。工人说，这是你们造成的问题，我们有集体谈判的协议在这儿，你们不执行，自己跑了。工厂的地是租来的，这时，地主也去告厂方没有支付租金。这对工人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地主有钱有势，厂方最后给工人付了钱。圣周前签的集体协议，也被要求履行。

还有一家生产内裤的工厂，之前有两个工会，一个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一个是五一工联的工会。为了打击五一工联的工会，资方管理人员承诺：如果不参加五一工联的工会，我们可以跟你进行集体谈判。黄色工会的主席就一直追问厂方：我们什么时候谈判，什么时候进行集体协商？厂方却食言了，不愿进行集体谈判。黄色工会的领导很生气，也加入了五一工联的工会，参加了罢工纠察线。厂方给警察送钱，让警察维持秩序。工贼每天早上来上班。罢工者决定第二天早上向厂里的管理层、工贼发起进攻。他们用塑料袋装了小便，每天等工贼们一进厂，就朝他们（工贼、管理、警察）丢去，把他们熏得受不了。黄色工会的领导说：厂方不守信，说了要谈判却不肯谈。厂方起诉工人，法官听到工人的做法也笑了。斗争到最后，老板还是赔给工人钱了。那个黄色工会的主席也成了教师工会的主席。



这里是“工人教育研究所”下属的多媒体工作室，老人就在这里工作。

他已经 60 多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活跃在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一线。他很风趣，交流的时候，提到他的老伴，总是用“女朋友”这个词。

“女朋友”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战友。他们一起制作广播节目和一些音频宣传材料。

他的身体不太好，刚刚病愈没多久，但却急着回来“补课”。我们没有见到他的“女朋友”——她的身体也不好，近期就发生了两次中风。

老人很爽朗，有时会大笑。他说要感谢我们的提问，让他得以重温那些难忘的往事。

现在的工作

我主要负责准备广播用的材料。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下午 2 点到 3 点，都有不同的广播节目。周一是医疗卫生问题，周二是农民和其他群体的问题，周三是工人问题，周四是妇女问题，周五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形势问题。周三的节目就是我负责的。

有时我们会参加一些讨论会，有价值的就录音，作为宣传资料，上传到网上。我女朋友的声音非常好听。

有时候我们会制作一些系列性的专栏节目，主题包括工厂环境、家庭冲突等。节目最后往往会提出一个口号，宣传组织工会的权利，因为

组织工会是工人的权利，工人的权利是人权。

我们不是五一工联的组织，但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经常支持五一工联的活动。我们会配合五一工联的活动计划，把我们的广播计划与他们的组织工作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节目内容与工人联系较紧密。

工人在菲律宾人口中占少数，大概只有 15%，而农民的人数是最多的。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形成更大的抗议力量，我们也会到农村去，搜集农民的情况，制作与农民情况有关的节目。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工人。

要融入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如果不熟悉工人的情况，节目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学生时代

我上学的时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学生会的干部，上过黑名单。作为积极分子，要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的选举，争取到领导权，就能组织学生做很多事情。不仅要参与全校性的社团，还要参与各个学院的社团。组织工人也是一样，争取工会的领导权。积极分子就有了双重身份。

我们引导学生讨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学费高涨，校服问题，教学设备短缺，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被学校贪污，等等。

还要把学校的问题同政府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政府的腐败问题与国家的地位联系起来——因为腐败的政府背后是美国政府在撑腰，再联系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这些方面对学生进行鼓动，可以把一部分人很好地组织起来。

我们还让学生注意警察对群众运动的镇压。有时警察中还会有军官出现。

我们做宣传鼓动，组织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如签名运动，即向校长或地区的教育部门提交联名信。如果他们不理睬，我们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总的来说，当时我们认为学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学生的数量只占人口总数的 2%~3%，但是学生运动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制造很大的声势。

对学生的组织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后，就会动员他们去工厂与工人结合。初期主要采取假期进厂实践的方式。有些学生进厂后，就再也没有回学校了。号召进厂不是强制性的，全靠学生的自愿。

当时有很多是政府设立的学生组织，以及教会设立的学生组织。激进学生组织比较少。但是激进思想的影响很大，甚至成为潮流，好像不参加组织，就落伍了。那时新人民军的领袖在学生中就很有名，受到推崇。

组织工人

我也进工厂做过工人。记得是一家叫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生产灯具。夜班的时候，我们用扩音器播放他加禄语的国际歌。管理来了，看工人听着歌，干得挺起劲，就说不错，继续放。

那时我们的组织力量很小，所以工作重点放在跨国公司和一些有组织潜力的大工厂。选择工厂时，要考虑工厂的人数和工厂内部的情况。当时大工厂的待遇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有时候可以利用工厂内原有的工会的干部去做组织工作。

有一家厂工人上万，老板是个犹太人。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工厂。工厂里那么多工人，总有人过生日，就可以开生日宴会。这些活动都可以掩护组织者。

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就不能回学校了。

“讲师”琐记

戒严法颁布后，所有激进组织都被取缔了。但是还有很多合法的组织存在，包括政府的工会。所以经过研究讨论，很多学生积极分子就想办法进入合法组织中进行活动。有的学生进厂做工，通过工厂里的合法工会开展活动。这个时期的活动都是地下的秘密活动。在某些合法的组织里，还是有些活动空间的。

一家工厂表面看上去很“正常”，厂里有个官方工会，但是谁都想不到，就在工会里，有人正在做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教育和组织工作的中心，是反对戒严令，反对马科斯。那时，我们把马科斯政权、美帝国主义和工人的情况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工人只占人口的少数，所以还要把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联系起来。

组织者要隐藏自己，需要合法的身份，需要一个工厂工人的身份。如果一个组织者能在工厂中找到工作，就比较容易做组织工作了。

表面上看，不同工厂中的工会没有联系，但实际上，积极分子们建立了地下的联系网络。1975年，我们在马尼拉一家酒厂发动了戒严后的第一次罢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罢工后，紧跟着就是南部地区出现罢工，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可以在戒严令时期反抗了。城市工厂中的组织者，在这些罢工中暴露后，就转入农村。

当时，我的一个同志在农村被杀，另一个朋友在城市中被抓。十年后，我和那个朋友见面了，我问他是怎么被抓的。他说他去一个朋友家，不知道那里已有警察监视，就被抓了。警察以为他是个普通工人，他的身份没有暴露。

如果工厂有工会，组织者的任务就是把工会转变过来；没有的话，就是组建工会。我们的方法是：启发，组织，鼓动。工人觉悟程度不一样，有的工人很快就能被我们吸收进来。

1980年代初，到处都是罢工，工人提出的大都是经济要求，只有少量的罢工提出了政治要求。在出口加工区，很多工厂工人会发动同情罢工，支援其他厂的罢工工人。

1972年到1980年，我一直都在做工人的组织工作。1980年开始，我接受了培训，之后开始从事工人教育工作，就像讲师一样。

我们讲的东西是从工人的生活中来的。同工人的密切联系，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法，使警察和政府很难找到你。

当时有宵禁，晚12点到早4点，严禁外出。被抓到就要受拷打。最好是能在工人区里住下来。刚开始，同工人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时候，就需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当然，在自己的住处，也可以组织小组学习，可以和同志讨论问题，互相帮助。

有一天在工人区活动，回去晚了，没有吉普尼，只能步行。后来碰到巡警，于是灵机一动，敲门进了一家殡仪馆，那里正办葬礼，双方都以为是对方的家属，到4点就离开了。

有的时候会躲到墓地里。

有个工厂是生产棺材的，有一次躲在棺材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有一次，我们还在一个军营里搞了一次学习。有一个女工认识军营里的一个军官，于是就去军官的别墅区搞培训。那个女工说，你们小心点，这儿有士兵。

还有一次在外省，也是到一个军官家里去学习，他被派到其他地方打仗去了。

上课的时候，有人放哨。警察一来，我们就转移。有时我们在工人家里讲课，有的工人家属对我们很反感，所以我们经常要换地方。



药品和食品联盟主席访谈

我是药品和食品联盟（Drug and Food Alliance）的主席。五一工联成立时，这个联盟就是最大的几个成员之一。

现在联盟的附属工会，不仅来自药品和食品行业，还有银行业和通讯业。联盟附属工会中战斗性最强的是雀巢公司的工会。

2006年，雀巢菲律宾公司发生了严重的劳资冲突。工会组织工人罢工，建立纠察线。罢工工人在纠察线上遭到军警的暴力镇压。此后，工会先后有两名工会主席遭暗杀。现在与马科斯时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各种武装力量都用来破坏工会。社会到处都在讲民主，但对工会和工人来说，什么变化都没有。

我的工厂经历

1980年，我进入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工厂工作。该厂老板同时还拥有一家钢铁厂、一家炼油厂和一家卷烟厂。进厂后我先做学徒工，两年后转正，成为正式工。

1982年，我成为了这家工厂的工会主席。当时的工会还不是五一工联的成员。

1985年的时候，工会大概有270名会员。虽然戒严令已经取消了，但是组织工人还是很困难，要在秘密的地方开办工人培训班。记得有一次，工人正在学习的时候，警察闯了进来，命令工人停止活动。工人说他们在祷告，才蒙混过关。1986年，马科斯倒台，但是他制定的法律都留了下来，组织工会依然困难重重。相关法律中对罢工的限制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罢工中不能阻止其他工人工作；工会不得阻止非工会会员工作。这些规定使得罢工往往没有效果，因为不能使工厂停产。

1986年我们厂没有罢工。后来我们的工会开始接近五一工联，并且开始联合行动。1989年，我们厂第一次罢工，持续两个月。这次罢工前我们做了准备，到社区中宣传。我们还把工厂生产的食用油拿出来分给社区里的居民，争取支持。结果罢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社区的支持，使警察对我们的镇压没有得逞。

1991年，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破裂。工人罢工7个月后，资方让步，达成了协议，但是我却被开除了。从1992年开始，我就成了全职的组织者。

现在，那家工厂的工会只剩下20多个会员了。

在银行业开展组织工作

菲律宾中央银行一般不干涉其他银行的劳资关系，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央行出台规定，允许使用合同工和临时工。正式职工和临时工、派遣工的工资差别不是很大。银行招聘的都是年轻的职员，免费提供工作服，新员工日工资500~600比索，入职两到三年后，月薪可达到一万六千比索左右。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没有加班费，职员也不敢要加班费。

现在的金融区，有五六千名银行职员是银行业工会的成员。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在银行业做组织工作了。

举个例子。某家银行有3000名员工，其中正式工有1600多人，派遣工有1000多人，派遣工只得到最低工资。派遣工同正式工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银行业的工会联盟反对使用派遣工，反对合同化。

菲律宾的银行业有16个工会，属于不同的联盟，跟我们观点相同的只有4个。但是我们都反对派遣和合同化。我们想了各种办法来做，包括举行研讨会，在国会里提出议案，在银行职员中搞教育，还有在银行门口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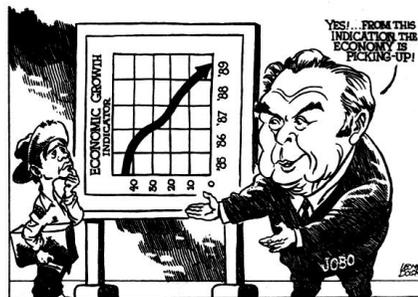
2009 年有过一次联合示威。当时共有来自 8 家银行工会的 100 多名会员参与示威，大部分都是工会的干部，都是正式工。因为合同工不能加入工会。派遣工、合同工到底是不是银行的职工，他们自己都很模糊。示威的目的，是为了让派遣工转为正式工。但是银行新雇佣的职员都是派遣工。比如一家美国银行，原来有 400 个正式工，现在只剩下 8 个，于是工会也就只有这 8 个人，而且全都是工会干部。现在新法律规定，派遣工和临时工可以加入工会了。但是，非正式工的流动性很大，很难组织。

银行职员与工厂工人有很大的不同，组织工作也很不一样。银行职员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服务。银行职员彼此之间的交往不多，下班后经常出去玩，尤其是在周五。他们租住公寓，月租金大约五六千比索。工厂工人在生产中则经常要协作，下班后回贫民窟。

我们在银行职员中间进行组织工作的时候，不会提五一工联，因为人们一听就害怕，很多工会一听说五一工联，就不理不睬。所以我们就说是工人教育研究所（Eller）的。我们就利用 NGO 举办一些讨论会，邀请一些工会里的领导参加。参加活动的人还是有，但是不多。之后我们再通过这些工会领导了解职员的情况，与职员建立联系，为他们提供咨询。慢慢地，会逐渐与他们交流我们的理念和观点，推广“真正工会”的课程，给他们一些学习资料。

银行职员，主要是出纳，如果在工作中出错，要负责赔偿损失，这是他们通常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另一个就是临时工的问题。

有工会和没有工会，情况就不一样，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做组织工作。



图文：“这样来看，经济还在增长！”

前酒店工会干部老杜

老杜黑黑的，高高胖胖，很结实，别看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脸长得却很孩子气。他受父亲影响，从学生时代就参与工人运动，有着丰富的工人组织、斗争经验。他是政府暗杀的对象，每天都有生命危险。这并没有吓倒他，却使他更坚定自己的步伐。他有一套应付办法，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听他描述的过程，简直比电影还惊险，但无论从他的表情上，还是从言语中都看不出任何的恐惧，他仿佛在用自己的经历向我们说明：为了工人的正义事业，做任何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个人经历

我父亲原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工会活动分子，后来被暗杀了。他是车间代表，1972 年戒严令期间在美军军事基地做焊工。父亲在美军中途岛一艘核潜艇上工作，是甲级焊工。工作的时候，为了不让工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会把他们的眼睛罩起来，回来也是如此。他把这事告诉同事，猜测他们工作的地方是一艘核潜艇。最后工头知道了，把消息透露出去，管理层开始对他有了敌意。父亲就因为这事，被暗杀了。那年父亲 32 岁，我七岁。像我父亲这样的技术人员不多，可能是美国人嫌这种工作不安全，才让菲律宾人去干。据工人们说，他在（中途岛到海底）一个大管道里面工作，人家打开引擎，把他卷进去了。官方说是事故。工人说是他们故意的，美军知道他在里面工作，还开动机器。美国军方经常这么干：你要多说几句话，就给你制造一些事故。这是工会得出的结论，

因为他说得太多了。后美军赔了 4.5 万比索，给父亲订制了一口很高级的铁和铝制的棺材，还安排了一辆很好的葬礼车。

我在高中时已经是一个积极分子。15 岁就被菲大的共产党组织“赤化”了，参与学生运动，主要搞游行、示威，讨论学校、国家、人民武装、美帝国主义的事情。当时想去游击队，人家说我太年轻了，不让去。他们组织我很容易，因为我特别恨美帝国主义。后来我跟菲大失去了联系。工作后，我加入工会，每年都当选最优秀会员。所有的集体行动，比如学习、游行、示威、罢工等我都参加。我参加的会议、学习、游行都是最多的。

我只上了一个学期专科，没钱读书，十九岁就去俱乐部，工作了两年。当时最低工资 45 比索，我的工资 7 比索/天，包吃住，人家没喝完的酒可以喝，有小费。祖母让我继续上学，我又上了一年计算机技术，然后就去酒店上班了。不久在街上碰到老朋友，介绍我去工会。工会里的人知道我是积极分子，就推动我去参加活动，说“抓到一个好兵”。

工会改组

我 1986 年开始在酒店做清洁工。1990 年酒店关了，就开始做组织工作。酒店是贷款建的，后来还不起钱，被政府收回。老板又从政府那儿再租下来。阿基诺推行私有化，把酒店作为头一个私有化项目。1990~1993 年，我是五一工联在那个酒店的组织者。

1992 年，五一工联内部搞整风运动，把我安排在服装行业，做到 1996 年。之后去了 ANGLO 工会联盟，帮助他们改组，有五六个头目拒绝整风。当时不少工会跟他们脱离了关系，这样 ANGLO 从 106 个工会缩减到 40 几个工会。但很多基层工会、工人不知道上层分裂，会费还继续往上交，结果进了头目自己的腰包（贪污）。这些领导被罢免后，我们占据了领导层，才发现他们的贪污行为。基层工会很多人不满，说

上面拿了会费不干事，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选领导。大会前“清理”的时候，我们到各地一些基层工会去调查，问他们为什么离开联盟，可有的工会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 ANGLO 了。最后 8 个大工会恢复到 ANGLO 里面。把老一届领导罢免后，一些基层仍然是老领导的支持者，在劳动部注册的是 ANGLO 的新领导。分裂出去的注册不了，没什么人了。

还有五十多个工会都是小业主、小买卖者的工会，1987 年经济危机时破产了。

工会收集会费没有统一标准。通常是工厂直接从工资里扣。有的是交给基层工会，基层工会再上交给全国工会。有的直接交给全国工会。还有的一半交给基层，一半交给总部。有时全国工会的领导打电话给工厂老板，让他们把半年的会费都交给他们，这样基层工会就没钱了。

工会不光要搞经济斗争，还应当搞政治斗争。每年都要有计划：培训领导力、战斗力等。不仅是处理工人和厂方关系、工资福利问题；而且要培养工人的觉悟、战斗力。马科斯下台后，这类培训越来越敷衍了事，质量越来越差，只注重一些经济问题。工人开始认为工会越来越软弱，没有斗争性，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东西。

旷日持久的酒店罢工

酒店有过两次罢工。第一次发生在 1984~1986 年，将近 300 名员工，罢工了两年，最后工会得到承认。罢工结束后，还剩 160 名工人。

第二次罢工是因为酒店要私有化，卖给了新老板，我们就没有工作了。罢工持续了 3 年 10 个月。新老板通过警察驱散罢工者，破坏了纠察线。我们打官司，还赢了。最高法院判我们罢工合法，但不顶用。我们的罢工基金很快见了底。有的工人有孩子，压力比较大，越来越撑不下去。工会所属的联盟有个政策：任何工会罢工，其它工会要按人头每



月捐款1比索来支持罢工。其它宾馆的工人也有零散捐助。马尼拉大宾馆都是新老板的，还没有成立工会，我们那时正在帮助他们成立工会。

在马科斯时代，一个地方罢工，不仅有可能得到经济支援、道义支援、人力支援（前去纠察线上

支持），还有可能发起社会动员。到了90年代，工会运动滑向经济主义，不去通过组织纠察线制造影响，扩大声势，罢工者所能得到的道义上的支持就减少了，只是其他工会给点钱罢了。

罢工工人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是宾馆的停车场。我们不能把它卖掉，但是可以出租。有人来停车可以收费，一天能得到1000多比索。我们把宾馆里所有三百多个大型照明灯具、保险箱也卖了。宾馆值夜班的一名保安是某工会干部的丈夫。我们对他说，罢工没工资，明天就没饭吃了，想把灯具拿去卖掉。他说，等别的保安睡着的时候再干。这事儿老板不知道。

因为罢工旷日持久，原来的140多名工人最终剩下20多人。很多人另找了工作，有的出了国，但他们都支持罢工，经常寄钱给我们。20几个坚持下来的工人，有17个变成组织者，派到各地搞组织。

罢工结束后，宾馆开始装修了一段时间，就停工了，到现在还没开工。

工人接管客运公司小记

事情发生在1999年至2002年间。某客运公司的老板过去是军队里的将军。他们非常腐败，对经营管理一窍不通，公司出了问题也不想办法克服。他们积欠了工人很多钱：从工人工资里扣收的社会保险没有交给政府；拖欠很多假期、年终奖，和其它福利。终于有一天，工人把老板围起来，要他用这里所有的汽车零件来抵债，逼迫他签字。老板叫嚷说，工人简直就是抢劫。但最后工人还是把公司接管下来。当时，客运公司有60多辆车，但只有18辆能正常运行，其中1辆有空调。工会领导营运工作，每辆车配一个司机、一个售票员，共36人，另外20人负责维修。

公司有200多工人。因为车少人多，大家争着开。工会只好安排轮流上班，这样大家都有活干。先安排没有其它工作的，没有出路的。有的工人，家庭比较大，孩子很多，优先考虑。有的工人在其它公交公司有工作，靠后。工会小组成员则最后安排。

刚开始赚钱比较多，全花了，跑到外省旅游啦，给员工开生日party啦，等等，没有省下来，结果经费越来越少。公司的这些车都比较老旧，每一两个月就有车子坏了，得修，慢慢地没有经费修车了。两年后只有三辆车能开。想找公交车生产商买新车，拿破旧车当抵押，生产商不干。工会只好把所有的公交车都卖了，钱分给大家。很多人不得不另找工作。

奸细与暗杀

当前，组织者都可能面临被暗杀威胁。我们应对的办法很随机，比如不常在家，出入没有规律性。我们把街区的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了，大家都会保护组织者。如果有奸细来打听组织者住在什么地方，就都说

不知道；或者给个莫名其妙的答案：“他十年没回来了。”有一次，一个奸细凑巧问到我女儿，女儿说：“你问的那人是谁啊，不知道啊！”我经常不回家，或者去亲友家，每天都得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有两个孩子，大男孩读大学，小女儿读中学。他们都有手机。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不联系也不发信息。有很多次我碰上有人企图暗杀我。有一次晚上 11 点回家的路上，有人“打劫”。那四个人躲在一条街的四个角落。当我乘坐的吉普尼经过路障并减速时，这几个人上了车，让乘客都下去。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抢劫，是冲着我来，于是当机立断跳下车就跑。附近有一个警察局。我跑到警察站，那四个人持刀追上来。我就跟警察抽烟、聊天。他们便不敢过来。过了一会，我绕过警察局，跑到某机构办公室去，一边跑一边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每个部队都有一个专搞恐怖、暗杀的小组，不同部队负责不同地区。枪杀的对象都是头目、领导人。雀巢的工会主席肯定是资方出钱让人暗杀的。国家安全部跟军方合作。政府知道我们是谁，知道谁是积极分子、工会干部。像五一工联、菲律宾农民运动（KMP）的主要干部，例如主席、秘书长，都被盯得很紧。他们都有专人保护，每天的谈话等都有做记录。对那些从事地下活动并受到威胁的干部，也有保护措施，带保镖等。

资产阶级就两个办法：首先识别谁是积极分子、谁是先进的，对待这些人有两手：来硬的——骚扰、开除、枪杀；来软的——收买。虽然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但我们都要通过地下组织秘密地进行，不暴露积极分子。七八十年代，斗争性工会运动高涨时，美国中情局（CIA）专门拨款支持菲律宾黄色工会。当时高涨的工运威胁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它们拨款 2000 万美元，成立了菲工大（TUCP）。

工贼问题

我们的敌人太多太强大。资方有保安、打手，国家有警察、军队。因此，罢工要想成功，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保证我们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首先要考虑使工会会员完全站在我们这边，其次是能够得到社区、教会的支持。

罢工时，要安排好纠察线，阻止工贼进厂。工厂管理层知道我们罢工，就会另外雇一些人准备对付罢工。他们会在报纸上登出招工广告，或者去贫民区招人。这就要靠纠察线来对付，阻止厂方把人员送进去，阻止货物进出，让生产彻底瘫痪。有一次罢工中，我们用特别结实的大铁链把厂门锁了，钥匙弄断在里面，打不开。有时候警察会护送工贼进厂，我们就手挽手躺在地上，不让车子开进去。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坚强的工会，还要争取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真正的民族主义工人联盟（ANGLO）毕主席

访谈的时候，老毕话不多，无论什么问题都回答得很简单，甚至有点刻板的感觉。可能如他所说，他从来都是自己有意，但服从大多数。他很低调，不张扬，但还是被选为了工会副主席。贫困是很多组织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他也不例外：工资少得可怜，老婆也经常抱怨。不过，当有人坚持不下去、退出组织工作时，他仍坚持着。

真正的民族主义工人联盟有 19 个工会，共 2500 名会员。前两届主席都去世了，我现在是副主席。2011 年我们成功组织了一个工会，今年正在组织另外一个工会，八月份表决。但今年有两家工厂关闭。其中一家罢工两年了。这期间一场台风把厂给淹了，损失不小，厂方说没钱开工了。我们不信。当时我们判断，厂方是以此为借口关厂。十八个月之后，我们才确信关厂已成事实，没有生产了。最后我们跟厂方达成协议，把赔偿增加了五天，由合同里规定的每一年工龄给 17 天赔偿增加到 22 天，就结束了。

另一家工厂是突然关闭的。公司做了很多赔钱买卖，说没钱赔给工人。工人说你们参加赔钱的买卖跟我们没有关系，继续要求赔偿，正在打官司。

自我介绍

我只上了两年大学，后来没钱就辍学。工作是电工机械类，搞维修

的。

1981 年，我 27 岁，开始在美国通用电子公司工作。工厂在马尼拉南面一个中等城市，生产空调等电器，60% 股权属于通用，其余是菲律宾人的。全厂 2400 人，绝大多数是男工，只有 5%~7% 的女工（工会里女普工积极分子只有一个，负责财务工作）。

这家厂工资高，人事部招人需要介绍，一般都接受反工会的人推荐的人。我本来在工地上修理机械，一个偶然的进了这个厂。那天我坐吉普尼去一个地方，过桥时遇上堵车，吉普尼不去了，让我下车，就在那家厂门口。厂里刚好缺一个机械工。我有经验，要求工资是最低工资的两倍。厂方答应了。

工厂有首席管理，底下是副职，一个管雇人，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库房，一个管物流，一个管财务等等。管生产的下面有很多车间、生产线，一层层下来，下面还有管维修的。管理人员有从工人提拔的，也有从外面雇来的。厂里有相关培训，结业后就升为管理人员。

厂里有三个工会，一个是生产工人产业工会，一个是白领工会，一个基层管理的工会，其中基层管理 100 人，白领 300 人。工厂条文规定，基层管理不制定政策，只负责执行政策，拿月薪。

如果罢工，那两个工会都会支持我们。他们一直支持罢工。

厂方会组织很多活动——体育活动，比赛，劳动竞赛（有奖励），团队精神的培训等——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人会高兴，尤其是得到奖励的那些人。所以我们教育会员要警惕厂方的宣传。他们只是想拉拢人心，好为自己赚钱罢了，而不是为工人好。

工厂后来倒闭了，原因是 1997 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老板在 1990 年代初期借了很多美元来扩张，要建立一个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厂。贷款时是 26 比索兑一美元。亚洲危机时，50 比索一美元，连本带利一下子欠了很多钱，老板受不了。新厂 1995 年开张，1998 年就关闭了。

早在 1993 年，厂里就搞过裁员，提前离职的工人会得到安置费。

1997年经济危机时，又以同样的方式裁掉了一批人。到现在还有将近400个工人在打官司，要求经济赔偿。他们靠捡垃圾过日子，很辛苦。其实很多人不相信工厂会关闭，觉得裁员是暂时的，福利这么好，舍不得离开。有些人拿了安置费，买了吉普尼，但还是很贫穷。

参加工会

学生时期我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我弟弟倒是在高中时受一个学生组织者朋友的影响，开始参加学生运动。那时候我弟弟非常激进，去工厂纠察线，还老是跟我争论，想说服我。但我一来因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和他不一样，二来因为比他大，不服他，便没有这种意识。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学了神学，当了神父，现在已经是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不一样了。他热衷政治活动，选举的时候，甚至帮助议员搞策划。

在通用电子公司工作时，生产车间管理员总是把别人干不了的活让我干，我特别烦恼，就说“你怎么不让别人去做”。管理人员很生气，说不服从调动的話，就要开除我。我也很生气，跑到工会去问怎么对付他们。工会让我参加了三天的“真正的工会”（GTU）课程培训¹¹，我成了车间的一个积极分子。1985年我成为工会领导人之一。后来工会主席被调到上面搞全职工作，工人就选我加入理事会。过去的副主席当了主席，后来又成为全职组织者，我则变为副主席。

工会主席、书记、财务是全职



¹¹ GTU，全名 Genuine Trade Union，意思是“真正的工会”。GTU 课程是由五一工联组织的，旨在培养劳工意识，分辨战斗性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区别以及培训工会运作实务等——译者注。

的。我是副主席，不是全职，但是只要工会有事，给主管打声招呼就可以离岗。有时需要组织旁边工厂的工人时，我就告诉管理说工会有事。工会主席知道我去组织工人，但给厂方的借口是去总部开会。

1993年，我辞了工，成为五一工联的全职组织者。

我们厂没有罢过工。1987—1989年这三年里，五一工联曾想要组织总罢工。但是在罢工之前，厂方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没罢成。我们厂待遇最好，其他厂工人想跟我们待遇一样，我们去组织时，工人会听我们的。我们工厂附近有一个电子厂，生产电视。我们去帮助那里的工人建立工会。当时厂方不承认他们的工会有权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我们便组织工人罢工，迫使厂方认可了工会。

马科斯倒台对工厂的影响

1986年，马科斯倒台，工厂没有受影响，照常运行。我们没想到马科斯会逃跑。当时五一工联，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的上级新爱国联盟（BAYAN）估计会发生全国大暴动。他们以为马科斯会全力抵抗到底，从而造成一个全民暴动。我们工会准备占领市政府，任命工会主席为市长，我为副市长。但马科斯逃跑了，矛盾化解，暴动没有发生。我们也没有占领工厂，虽然工人说没有管理层照样可以正常运转，但是长期来说还是需要专业管理人员。工人仅仅占领工厂，不改变社会结构还是不行的。其实我自己对占领市政府这种想法不认同，有自己的怀疑。在我看来，条件其实是不成熟的，工人意识都不够。回想起来是个别人头脑发热。

当时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但认同这个目标的力量还是少数派，毕竟五一工联人数还只占工人的少数，战斗力不够。

不过在马科斯逃走之前，我们厂2月22、23号罢工两天，不是响应红衣主教，是政治罢工。因为当时领导人的说法是，统治阶级内部出

现了矛盾，我们要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24号，红衣主教邀请人民上街游行，支持反马科斯的势力。人民都听信他，因为红衣主教一直是反对马科斯的。当时人民没有看透政权的性质，光顾着反马科斯了。“二月革命”完了之后，我们哭了，特别伤心。菲律宾人民怎么能相信阿基诺政权。阿基诺是大地主，他们上台，政权还是会一样。工人有很多期望，但事实上都没有实现，因为阿基诺继承了马科斯的法律、政策、制度，工人从这场斗争中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很悲伤。马科斯下台，我们没有觉得是一种胜利。现在的压迫跟马科斯时期的压迫性质不一样。马科斯不仅压迫工人阶级，连统治阶级内部都压迫了。马科斯说菲律宾要发展，就要有纪律性，有纪律性才能发展。“纪律性”跟“自行车”两个词的发音一样。当时一些反对派评论家骑着自行车在市内转了半天，来讽刺马科斯。现在台上的、在野的争论都是公开的，但是底下的人跟他们离得远。工人阶级跟他们立场都是不同的。

关于工贼

南部某省有很多匪帮，工厂去雇了很多人。这是厂方经常用来对付罢工者的方法。工人的纠察线很强，厂方停工损失很大，就雇这些人来破坏罢工。

刚才提到的那个电子厂罢工，当时那些工贼成功进入工厂。五一工联动员了北部很多工人过来加强纠察线。他们都是业余帮助纠察线，上班走，下班来。因为人多，纠察线重新建立起来，成功阻止了货车出入，货没法运出来。坚持了几个星期，罢工成功了。

对付工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纠察线人多，声势大，工厂就不敢跟工人对抗了。最好是能把工会的大多数人动员起来，瘫痪生产。工贼即使进了厂，也不懂得开机器。

集体谈判

每年五一工联都搞大罢工。五一工联领导根据通货膨胀、物价、维持生活水平的标准是多少等等，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罢工争取的目标。最后政府对付罢工的办法，就是由各地区自己决定，政府不出台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办法是政府偷偷决定的，是它塞的一个私货。1987年涨了10比索，1988涨了25比索，1989涨了20比索。但1989年时，标准改由地方决定了。

我们厂从1988、1989年开始有集体谈判合同，每次签三年，后来变为五年。所以我们要求提高福利时，厂方说在合同期满之前，再要求就是不合法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上级（五一工联）要求我们加最低工资的。我们厂效益好，加就加了，也就没罢工。其他厂就是不同意，说是已经有合同了，罢工是违法的，不给加。

除了全国性的提高最低工资之外，正常情况下，工人自己也会提出加薪。我们工会在集体谈判合同期满前一年就开始调查，分析工厂的利润，工人生活水平有何改变，工人生活开支占工资多少。做了好多调查研究之后，在小组讨论。工会领导再向工会提出议案，把方案贴到信息栏让工人看，然后再召集会员开会讨论。最后工会会员再让工会领导跟厂方谈判。

参加劳资谈判的代表总共25人：一、工会委员会15人，其中10人是正式代表，是执行委员会的人；二、理事会10人；三、车间工会小组长挑出五个工人代表。主席、副主席、工会理事会人员跟厂方谈判，其他五个是旁观的。第一次谈判哪五个人，第二次哪五个人，车间小组长轮流参加，把谈判的情况反馈给工人。工人有什么抱怨，会先反映给车间小组长，再报上去。

谈判的时候，老板会雇很多专职人员，心理专家，律师，专业谈判人员等。工会也不简单，我们也有培训，做大量准备，虽然没有什么职

称、头衔，但非常有经验。

谈判过程一般需要六个星期，每星期两次，共 12 次。中间有很多准备过程，可以采取集体行动，给厂方施加压力。还有，谈判时有最低和最高要求，资方不知道我们最低要求。只要准备做得好，往往能达成最高要求。

准备工作有好几种。一，先要做好调查，如工厂每天的产量，生产什么产品，价格多少，占领市场份额多少，这些底细都要查清楚；二，有时候厂方不同意，我们就采取行动。比如谈判开始前，工人就准备好哪一天集体请病假，但要提前准备好，要去诊所看，要有记录，到计划的那一天就请假。有十分之一的工人不上班，产量就下降 10%。或者定好哪天贴标语，工人把标语藏在衣服里带进来，趁厂方不注意，贴到厂里的各个角落。厂方看到这么多标语，就让保安给清出去，但是一会儿工人又给贴上了；三，如何谈判，我们也是有培训的。我们了解工厂工资总额占销售额的百分比非常少，比如卖 100 比索的货，只有 3.5 比索是工资。谈判时我们说，工资只占产值的 3.5%，你的广告费呀，给其他厂的回扣呀，都多得多。东西是我们生产的，但你给我们的工资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让你赔本，其实你照样会赚钱；四，讨价还价的技巧。谈判列出的要求，这个不行，就谈那个。打个比方，最低工资要求增加 10 比索，但厂方说不行，不能加在最低工资标准里，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当作过节时的奖金发；五，通过申请罢工来施压。比如说哪一天谈判僵持住了，我们就提前 30 天向劳动部门提出罢工申请。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就能迫使厂方答应你的要求。

我们搜集的数据做不到精确，只是大概。但知道产品卖多少钱，零部件成本，卖废品的情况，出货出的是二等还是一等的。这些可以从仓库的工人那里得知。其它如工厂在市场销售方面的情况，工资总额，等等，都能掌握到大概情况。这样，他就没办法反驳了。

对于利润低的工厂，也需要做调查研究。比如说服装厂，计件



图上文字：“降低定额！”（Ibaba ang Kota!）

工资，工人可以不要求加工资，但是可以要求计件定额合理，八小时可以完成，不能让大家加班加点完成任务。或者不增加工资，但是要把劳动条件改善。

一般来说，只有工会最上层的三个人知道谈判的最低要求（上级工会也知道）。要是消息走漏到厂方那里，就很容易查出来。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消息让厂方知道了。经调查发现，原来是一个谈判代表告诉老婆，他老婆告诉她朋友，她朋友告诉她丈夫，她丈夫跟他圈子里的人讲，被厂方知道了。出这种事的往往是新工会，经验不足。

制订最高、最低标准时，要参照上一个集体谈判合同期（以前是三年，现在是五年）的情况：工资总额有多少，加班费、医疗费有多少，每一项福利各多少钱，合同涵盖多少工人，在计入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能再提高 50%，就可以了。

正常工作情况下，工人对工会没有什么不满。工会领导老是说，只要得到大多数人支持，认同集体谈判合同，就可以了，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但是工会有派别，不管你谈判谈得怎样，总会有人不满意，特

别是对工会领导。这些不满，一般不会在车间里表现，而是在工会里面搞阴谋诡计。

搞工人运动，家人持什么态度？

我一个月 3000 比索生活费（约合 450 元人民币），以前是，现在还是。结婚时我已经是组织者了，生活比较难，没钱买食物。老婆抱怨我为啥不找其他工作，起码可以活下去，但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有一次旁边有个电子厂罢工，我去支持，那天正好是我老婆生日，我没去给她庆祝，却跑到纠察线上。结果工贼和罢工工人打起来，我被扔过来的石头砸到脚，受伤了。回家后，老婆很生气，说要是砸到头上，死了怎么办呀。也有的人家庭压力大，以离婚相威胁，坚持不下去，退出了。我的房子是当工人的时候买的。现在生活费都困难，我老婆没有工作，自己做一些针织品卖，没有固定收入。



修女

修女事先特别嘱咐过，请我们不要迟到。可能在菲律宾，迟到是个流行病吧。不过，因为司机不熟悉路况，绕了好几圈，结果我们还是比预计时间晚到了一个多钟头。刚下车，就看见修女在门口等我们。修女微笑着迎接我们这些迟来的客人。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修女。她的外表跟普通人没有区别，连衣服都差不多。修女很健谈，她自豪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使我们原来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起先我们还担心修女会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呢。她谈到自己和其他修女、神父们以前怎样帮助工人进行组织，谈到组织工作中的技巧，谈她们的电影，批评一些组织者太狭隘，只注重组织技巧，却对工人和生活本身缺乏感情，谈她们对工人运动的观点——不能只要面包，还要有玫瑰。

修女年纪大了，身体还有点不适，但仍以最大的热情接待前来学习的我们。谢谢你——修女！

个人经历

从 1978 到 1997 年，我一直在做工人工作，开始是工厂工人，1992 年开始做女工工作。菲律宾的阿迪达斯鞋厂有一万多工人，70%是女工，工会的主管人员全是男的，后来慢慢地有所改变（女性增加了）。这个厂是我的学堂，我在那里学到关于工人、组织的一切。我亲眼看到了工会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光在工厂，街区，还有国际上起到的作用。这对我和工人都有意义。组织工作很辛苦，秘诀在于努力工作，还要和其他方面一起进行，文化教育，社区服务，国际合作，还有培训等很多方面。

通过在鞋厂的组织、学习，跟工人接触，得出初步经验，包括调查研究，撰写教材，工人教育等。最后我们把这些经验总结在《真正的工会》（GTU）这本书里。1980年代菲律宾有一部商业电影，讲修女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些修女因为这个电影，也开始参与到工人运动之中，去帮助他们。

1978年戒严时期，我去工厂找工作。我不能说自己是修女，只说自己未婚，没有孩子。但我当时已经四十，岁数太大进不了厂，试过一次没成功，就放弃了。我跟着五一工联的人一起在工业区租了一间房，工人可以去那开会，我们也可以去工人家，这样可以渗透到各个工厂去。当时工业区的大路两边都是大工厂，我们要找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工厂，这样可以影响周围的小厂。

另一组修女在1976年的时候已经在另一个街区参加了工人斗争。她们刚开始有四个人，一个在教书。她跑到我们的街区，间接地帮助工人，其余三人直接跟工人在一起。



鞋厂经验

我们通过很多方式来帮助工人。比如工人用我们的房子做开会地点，在那里吃饭睡觉，我们不在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也帮着做教育工作。那时《真正的工会》那本书就已经着手在写。我们帮他们找一些可

用的数据和理论，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我认为，工人不光要学习组织工会，还要学习怎么整理文件，怎么记录，怎么观察工厂里发生的事，学习怎么演讲，怎么使斗争戏剧化，比如唱歌啦，朗诵诗歌啦，各种的艺术形式；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一些服务，送病人去医院等等；帮助他们建立国际上的联系。我们曾帮助菲律宾的阿迪达斯工厂跟德国的阿迪达斯工人建立联系。这个项目做了好几年，德国工人过来这边，这里的工人也过去德国交流。后来发生罢工的时候，工厂管理层主动要求和工人对话，因为他们从德国总部那边得到消息，两国工人有彼此联系。工人要联络社区居民时，我们也来帮忙，以引起居民们对工人的同情，最后这些社区里的贫民、教师、中产阶级都开始跟工人建立联系。工人跟老板谈判时，或者去劳动部时，我们就陪着他们；游行的时候，我们开车送水，保护他们；我们到纠察线上当帮手，工人被抓的时候，就陪着他们，防止他们挨打。大致就是这些。

1978年那会工资低，一天4比索，工厂还经常拖欠，社保也没有。最危险的是生产中用的胶水，有些工人闻多了会晕倒；工人没有医疗保障，得什么病都吃阿司匹林；没有组织集会的自由。我们主要培训工人学习如何对付厂方管理层，如何与他们交涉。戒严令遭到全国反对时，这个工会比较有力量，可以跟厂方讨价还价，厂方同意付钱找人给工人培训，工会也答应一些公司的条件，但同时要求20多个工人去参加集会，游行，但是工资照拿，厂方答应了。这在别的公司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教育工人参加到组织工作中去。工人的会费会用在工人教育上，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等



1985年某鞋厂工人罢工

等。他们在圣诞节时到外面举办演唱也会挣一些钱，还能跟街区联系在一起。工厂工资涨了，福利也改变了，当地无论哪个厂工人罢工，文化小组都会在业余时间去唱歌支援，讲课，摆摊，庆祝生日，洗礼等等什么活都干。但是胶水的问题没解决，只是给他们一些口罩。

造纸厂罢工

工业区有家造纸厂，发生了工伤事故，厂方不想赔偿，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造纸厂罢工了。附近的工会组织者云集在这里，给工人做些简单的培训，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演讲，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工作。他们分成好几组，一组工人在当地路边搞募捐，很多路过的人都会捐款；一组管生活，买盐，买米，做饭，等等，还要摆摊，因为罢工期间没有收入，没有饭吃，工人一家大小都在纠察线上吃；还有一组专门去各地募捐，学校，商店呀；有一组负责卫生保障，有医生去给工人做体检。我们教工人唱一些歌，在各个地方唱（比如有一个小孩病死，我们去那儿唱悼歌）。教会里有些人会给厂里死者的家属一些钱，主要是修女来帮忙，精神上的支持，神父主持弥撒，超度死者。工人的斗争持续了近六个月，最后呈报到劳动部门，赢了。

罢工一开始，我们先去了解事情的起因，厂方情况，和工人的情况。我们找厂方交涉，想到事故地点看看机器是怎么回事，厂方不让去。我们也没有坚持。工人去劳动部门，打官司。我们陪工人去法院，问官司进展得怎样了，也跟律师谈问题。我们走访罢工工人的家庭，了解他们的具体困难：父亲失业，没有收入了，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呢，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我们的主要角色是社会服务，工人没时间承担社会服务，所以我们去承担。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一个可以相互支持的联络网。我们拜访各机构时总是带几个工人，这以后工人就可以独立接触他们，不需要通过我们。我们也联系一些学校、机构，让工人去自我介绍。

1984年有次罢工，工人搭个帐篷。警察不让搭帐篷，把他们驱走。警察走后，工人又回来把帐篷搭上。工人得到这么多支持后，警察也就无计可施了。后来劳动部门发出他们罢工的通告，也就是承认工人属于合法罢工了，警察就不能用恐吓把工人吓跑了。避免跟警察起冲突，这非常重要。他们来，我们走；他们走，我们再来。罢工期间有人被杀。听说警察当时乱开枪，打死了一个年轻人。

马科斯时代只要出现工人罢工，工会组织就会去声援。自发罢工如果有工会组织者参与进去，就会转变为有组织的罢工。自发罢工六十年代比较多，戒严令出来之后就很少了。八十年代的罢工高潮，都是有组织的罢工，自发罢工一般在镇压不太严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人罢工需要组织起来，这样才更有战斗性。

政府对罢工的压制与对策

现在政府换了一套对付罢工的方法。他们不说罢工非法，而说是刑事案件，犯罪，偷东西，抢劫什么的。我参加了很多斗争，其中有很多成功的罢工。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经验。但我发现妇女普遍都很消极，所以从1992年开始，我致力于在出口加工区组织女工。她们都是劳动法“灵活用工制度”下的所谓临时工，五个月换一拨人，非常难组织。我们就利用周日去工厂周边洗衣服时，找女工们聊天。但女工不敢跟我们聊，知道被发现了会被开除。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工，你见了两三次面，就找不到人了。那里从不承认工会。快要成立工会时，要么老板关厂，要么组织者被杀。零散工，派遣工，临时工，都很难组织起来。工厂工人从不同的地方过来，流动性又太大。在出口加工区，工人很难成为正式工，工厂每五六个月就换一批工人。我们组织正式工成立的工会，政府不予承认。那一带有许多工厂，工人被解雇后，再找一家工厂。

这个工业区以电子厂和服装厂为主。服装厂很脏，毛、灰尘，都会

吸到鼻子里。但对我来说最难忍受是电子行业。女工每天要做的动作非常简单，简直想象不到工人一天到晚都在做同一个动作，我认为这比毒气更惨无人道。我最多干五年就干不下去了。不过电子厂工资高，厂服挺好看。

工人住在厂区外面。厂区里面有银行。我们就在银行里设个账户，以这个为借口，发生罢工的时候可以进到厂区去观察。有个神父在工厂区里设了个教堂，开始接触工人，工会组织者通过进步的神父跟工人接触，搞培训，进行教育。工会组织者可以通过中心跟工人交流。对女工进行思想教育很困难，时间太短，达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教育，需要长期的接触。这个中心建立以后就很好，因为工人转来转去总是在这个地区，可以长期跟踪教育。我们在这个中心培训教育工人，即使一个两个工人也会正常培训，有时也组织工会，政府或厂方不承认，很难维持下去，但还是有几个工会继续坚持下来了。不管有没有工会，成立了不同的工厂工人协会，通过这个协会在社会上表达工人的意见。我们准备了好多书，但是知道工人不会去机构看的，我们就送到工业区，这也包括帮助那些研究人员和学生之类的。我们有流动图书馆，有一些简报之类的。罢工时可以提供给工人，工人很喜欢。

但是这个成功相对于造纸厂是微不足道的，付出那么多，得到很少，不过还是有成就的。

组织工会的经验

我们有几本材料给工人进行教育。但还需要收集更多材料。开始没有办公室，没有黑板，只能在柜子上画。在工人家里就在墙上画，也会做一些图画挂起来，给他们做演示。第一次上课时只有一个工人，但是我们还是教。两个组织者和两个修女教一个工人，慢慢地人就多了。工会有拨钱专门教育工人，后来可以租房子来做办公室，开始办幼儿园，

以免那些孩子被独自扔在家里。我们还搞消费合作社，收集钱，买糖，盐，然后低价卖给工人。

我们总结工会成功的经验，一个好的工会不光是反映工人工厂里的情况，还关注工人日常生活问题。曾经有工会干部的老婆给我们抱怨，说丈夫一天三顿饭都是关于组织工会的事。组织原则不能当饭吃，饿了也不能油炸工会，需要吃饭，所以必须根据工人的实际需求满足他们。这是组织时的一个关键环节。工厂有工厂的问题，工人家庭有家庭的问题，不解决家庭的问题也不行，所以工会有专门的家庭委员会。如果有人病了，我们会陪他们去医院等等，全部是些小事。关注工会不是虚无缥缈的，还要关注工人的胃，是非常具体的。

教会人士如何逐步参与工运

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教会人士就开始被工会组织者影响。他们告诉我们要进行工厂调查，观察工厂结构，工人行动，调查工厂的各个细节，了解工人的想法和不满。我们就请求工厂管理层，允许我们到厂里参观，借此机会了解各个部门的分布，观察工人的工作环境，工人是怎么沟通的，调查工厂的情况。我们发现，厕所、食堂、工人常走的小路都是他们交流的好地方。

做这些工厂调查主要是让我们学会分析，对社会有个判断。开始我在教会也是做慈善工作，一些工会组织者帮助我们学习、分析理论，经过系统学习之后，我们开始看到整个社会结构，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这样我们从开始只是做慈善的心，慢慢地就被转变了，被“赤化”了。通过这种教育后，我们再看圣经里关于自由解放的教义，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这些工会组织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就被上级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这些人曾经聚在一起反思自己是否变成共产党了。从理论上讲我们接受了马克思理论对社会的分析，

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我们觉得共产党和宗教信仰这两个不冲突。如果变成唯物主义跟宗教可能是冲突的，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个。我们有些人觉得马列主义和信上帝不矛盾，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的教会上司是支持我们的，但是顶头上司怀疑我们，不被他信任的人就不给安排教会工作，不让我们跟其他修女接触，怕影响她们。不过我们很高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常常找借口说出去买东西或者去做布道，实际上是偷着去开会。虽然那时候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很开心。

教会里有公开支持、秘密支持我们的，也有不支持我们的。这在国际上也一样。我们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我们承认思想意识上存在着不同的倾向，但不是信仰问题——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不是关于上帝的问题。他们说我们的信仰动摇了，这是强加给我们的说法。宗教里面分两个政治阵营，一方是反共阵营，一方主张社会民主。

政府如何迫害参与工运的教会人士

在菲律宾，天主教的影响非常大，一般人对神父、修女神职人员都很尊重。如果神职人员被骚扰，就像是一个学生骚扰他的老师、他的偶像一样的性质。（但尽管如此，）有些修女居住的地方被抄家，上司办公室被搜查，档案被拿走，等等。我们被列入黑名单，但没有被查抄。我们那个房屋非常引人注目，我们不保留任何文件。每月都演习警察来了怎么办，面对警察的问题怎么回答等等。还好，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工会组织者不光找修女，也找中产阶级寻求帮助，罢工的时候采取措施保护工人。医生，教师，中层阶级，都在工人一边。政府资方镇压工人时，这些人过来帮忙，把工人藏起来。我们有很多暗语，以前没有

手机短信，不直接说开会，都说吃饭什么的，为了防止警察知道我们的动向，给住的地方取了很多名字，现在都不记得了，什么青蛙房，绿房子。

经验教训

我们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记录。现在正在搞这种工作。我对鞋厂的罢工非常印象深刻，那时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是理想的环境，理想的事情，整个力量都合在一起了，只是没有记录下来。早就在戒严时期，就有人约我采访，到现在还没实现。

组织工人这个土壤是非常坚硬的，我们的任务是松土，撒把种子，工人运动才能成长起来。过去的组织者比较好，今天的组织者光坐办公室了，没有那种个人与工人的交流。当时为了工会生存，必须扩展工人运动，去组织新的工人。我们也劝说工人不要太冒进，要一步一步的，扎扎实实的，不要太感情冲动，寻找时机非常重要。在菲律宾各种组织都一样。告诉他们怎么去庆祝，好多零碎的小事看起来不起眼，其实那是工人之间交流的很好工具，尤其是亚洲人喜欢握手，这是组织的人情味。现在的一些工会组织者不讲人情味，光一味讲组织，工会，原则，把人抛出去了，只有一个技术指南，完全不把人放在里面。比如说文化活动在斗争、积极工人的培养中很重要。通过文化还可以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向社会广泛宣传自己的需求。他们自己写歌曲，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处境。

欧洲工会也比较死板，只要求提高工资。他们目光短浅，不理解唱歌有什么用，要文化活动做什么，又不给你钱什么的。这也许在他们那个社会是奏效的，但在亚洲是全方位的，不光要面包还要玫瑰。

神父

神父的样貌乍一看简直就是个中国人，跟我们相近的黄皮肤，头发多处已经花白，面容是温和慈祥的。神父很忙，本来答应的是跟我们聊一个多小时，可架不住我们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最后不得不延长半个多小时。不论是讲述菲律宾工人的斗争，还是回答我们的种种问题，神父始终很淡定的样子，像一个历经风波的人，一切都成竹在胸，早就处变不惊了。对于在菲律宾行将发生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可能被暗杀的危险，从他脸上都看不出丝毫担心。倒是说起他来中国，看到中国工业区的情况时，神父脸上显露出些许的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太厉害了，把工人工作的地方跟生活的地方分开来。看来，神父毕竟是经验丰富，一眼就认出中国的一大“特色”，和中国工人斗争的一个难点了。

引子

大约五年前，我和菲律宾的一个华人团体去过一次中国，参观了工业区。留给我的印象是，在中国的出口加工区和在菲律宾的出口加工区组织工人一样困难。中国政府的安排很巧妙，把工人的工作区和住宿区分别集中起来，避免他们进行组织。

马科斯时代的斗争

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教会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在各种社会势

力中，教会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我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士，戒严时期就在南他加禄省传教。那里有菲律宾最大的出口加工区。我是当地工人援助组织的执行主任。我们中心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工人成立工会。从阿罗约时期直到现在，工会中好多人都被暗杀了，包括工会领导。现任总统当权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会领袖被暗杀。

戒严法是针对所有人的，工人受到的压制尤为严重，所有的组织都只能秘密存在。直到1977年一次工厂罢工之后，各种组织才逐渐开始公开活动。这以后，工会越来越多，罢工越来越多，工人斗争也越来越坚决了。我们那个地区就有不少罢工，

当地的神父对反动政府的面目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帮助罢工工人的形式有很多种：直接加入斗争；参与工人教育；发动工人罢工；斗争开始之后，对工人敞开大门，提供各种帮助。有些去纠察线上支持罢工者。纠察线被冲散之后，很多工人，甚至教士修女都被抓了，结果教会对政府更加反感。

1980年，马科斯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大肆逮捕工运领袖。一些主要的全国性工会的领袖纷纷被抓。教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保护联盟来声援大批被捕的工运领袖。在这段最为艰难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个联盟延续了工人的运动。有很多教士参加城市的合法斗争，也有很多到山区去斗争。教会人士对工运领袖的帮助主要是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或者在他们被捕之后，向政府施压，要求释放他们。

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前后

从1980年开始，马科斯在政治上日益孤立，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戒严法，反对他的个人独裁。1986年的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了马科斯。阿基诺夫人上台。这时，人们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分歧，运

动中各团体的领导层里也有一些混乱的认识。大家不知道如何理解这场人民运动。有的认为运动取得了胜利,革命已经成功,有的认为只是换了一拨政府掌权者。某些工人领袖也错误地认为阿基诺政府是个自由民主的政府。一批人开始分裂出来,这批人是改良主义分子。但是群众,尤其是组织起来的群众没有跟着他们



走,因为人民在政府里仍旧没有力量,群众面对的处境和以前一样,并无改变。他们还要继续斗争。走错误路线的都是脱离群众的。和群众结合的好领袖仍会继续革命,看清事件的本质。当时这些判断都是基于我们和群众打交道的经验。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领袖避免犯错误的唯一途径。脱离斗争的那批人在新政府里谋得了职位,当了官。

对那些抱着错误观点的工人领袖,我们主要是通过辩论,在群众面前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就好了。现在除了在一些经济问题上有些共识以外,这两种领袖的界限已经很明白了。

阿基诺以及现政府都是美国扶持的。现任总统比阿基诺更亲美。1986年之后,政府和各社会团体有过一段蜜月期,因为阿基诺许诺改革。蜜月期之后,领袖们就开始向群众揭露政府。我们没有要推翻它。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抵制它,比如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还有进入议会参加选举。

1986年的主要教训是,“人民运动”仅仅更换了一个政府,整个社会体制没有改变,土地问题等等也没有解决。

新政府:暗杀成风,严控工人

五一工联的主席在马科斯专制时期只是被抓起来,但最后却死在了阿基诺的民主政府手上。马科斯之后,总统一个接一个登台,我们想不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指暗杀)。根据我个人的政治经验,阿罗约比马科斯还糟糕。(对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来说)马科斯时代最大的危险是被抓,阿基诺时代却是被暗杀。很多人在马科斯时代幸存下来,后来却被杀害了。

直到现在,这些运动领袖,包括我自己都有被暗杀的危险。马科斯时代各种活动都是地下的,现在都是公开的,地址也都是公开的,反而更容易受到威胁。最糟糕的是,这些人不是在抗议或集会时被杀,而是在私人时间遇害。前阵子有个主教在自己的屋里睡觉时被暗杀了,有的人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被杀,还有人在商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被杀。

1986年之后,新政府照搬了旧的经济政策,又引进了某些迎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工人的经济情况则每下愈况。当前出口经济区的政策就是不许有罢工,不许有工会。这个压制措施不比戒严时期宽松些。

工业区布局发生了变化,更难和工人接触。组织者受到暗杀威胁,组织者内部又发生分裂,所有这些使组织工人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在工业区的援助中心是1995年设立的,相对来说很成功,在加工出口区严苛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出口加工区有严格的规定,工人年轻,法律苛刻,因此组织工作非常需要有创新。虽然最正统的方法是要组织工人成立工会,但是也要有其他办法。当时我们的方法是组织外省工人的同乡会。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工人有了集体行动的经历之后,比方说,如果工人能预先成立自己的一个组织,他们就会更有信心去组建工会。

有些工人找到我们,抱怨加班和其他一些不合理情况的时候,(如果举行罢工很困难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们搞一些其它的集体行动,比如

戴一样的袖章、穿一样的T恤等等，向资方显示他们是有组织的，以此施加压力。

教会与工人斗争的关系

在“人民力量”之后，有一些教士和领袖认为一切都正常了，便回到自己的教区，自己的小花园，重新过他们的平常生活。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直到现在还劝说更多的教士重新加入工人斗争之中。

1986年主教号召群众上街反对马科斯。革命之后，教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一如既往。但要想在教会内部形成当年支持工运的那种力量，已经很难了。一是因为教会人士和工人接触，就要接触共产主义分子，要和信仰不同者共事，不愿意；二是一部分教会人士本身就是靠压迫工人来谋生的；三是怕被暗杀。现在教会的积极作用只表现在宣传教育上强调，一是劳动比资本重要，二是不能剥夺人权，三是不能单纯追求利益，要追求大众福利。

我认为即便和工人接触要冒着生命危险，作为一个教徒也应该义无反顾。现在我还在考虑如何让教会人员去接触工人，帮助工人。我们的努力取得了一点成绩。某些主教、神父和修女也和工人接触。现状就是：既困难又有前途。

我不否认教会的领袖得益于1986年的政权更替，教会势力在阿基诺时期得到了扩张，有些教会人士利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一些曾经参与革命的教会人士从政府拿到好处，被贿赂了，这也是他们日渐脱离群众的原因。相比之下，第二次“人民力量”，即推翻埃斯特拉达的那次运动，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再是教会，而是人民自己的组织。

南他加禄省工业区简介

这片工业区是1980年代末继巴坦加工区之后最大的出口加工区，70%的工厂都在高速路边上，方便运输。后来，把工厂设在高速路和工人居住的社区边上的坏处显现出来：工人罢工，容易得到社区的支持，还会影响交通。1990年代以后建立的工业区守卫森严，没有通行证就不能进。一般的访问者都进不去。如果来访者被认为与工会有关系的话，更会遭到严密排查，拒绝入内。工厂的集中使安保力量也集中起来。这些做法，一方面是为加工出口的企业着想，避免工人阻拦企业运输货物，另一方面则便利和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不许罢工、不许成立工会，是工业区里的不成文规定。

这边工业区里的工厂，90%都是日韩台美等外资企业。有很多汽车厂，丰田、本田、尼桑、福特等等。这些外企享有很多特权，比如5年免税。东芝的厂最大，有一万多人。本田之前大概有1500人，实行机械化以后减到300人。还有一个较大的厂，7000人。里面还有一个轻工业园，有服装厂，电子厂。由于全球性生产过剩，目前不少工厂都关了。12月份有4家美国的汽车厂关闭。

菲律宾的宪法规定，凡是外商投资的工厂，菲资至少要占60%的股份，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0%。现实中，很多企业都不守这个规矩，而是通过法律手段绕开它。但仍有人力图要修宪，因为限制总归是限制，绕道走也是麻烦事，不如废除掉这个规定来得方便。这些要求修宪者的目标是：允许外资占有100%的股份，并且对在菲购买的土地有永久的所有权（现在只允许有75年的使用权）。

1990年代后建立的加工区，共计有100多家工厂，以重工业为主，但往往没有核心技术和工序。比如，最主要的引擎是在日本生产，菲律宾的厂子只生产其他一些零件，然后组装。汽车厂以男工为主，电子厂

以女工为主。只有很少数的工会属于五一工联。其他许多工会只承诺给工人争取很少的工资，这当然深得老板们的欢心。

工资普遍按最低工资标准给，一天 315 比索，甚至更低，尤其在那些没有五一工联工会的厂里。本田公司比较高，工人每天大概能挣 1000 比索，因为厂里有五一工联领导的一个工会。而在菲工大下属工会所在的厂里，工人的工资还不如没这个工会的时候高。

1993 年我们组织本田工会的时候，有过一次罢工，罢工了将近一周。那以后，这个工业区里就没有工人自发的罢工了，只有那种由工会支持，上面的联盟指导的罢工。2001 年，我们通过建立秘密小组的办法，在出口加工区里面组建了 3 个工会。

这边自发罢工很少，不像中国。政府控制得很严，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不断地、全方位地妖魔化工人的集体行动和五一工联，并且颇为成功。就连学校都教育学生说：罢工、五一工联是不好的。高中刚毕业的年轻工人尤其容易受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敢拿起罢工武器的原因，因为这个武器被贴上魔鬼的标签。

目前工人找工作很难。没有新厂开办，原来的厂又在缩减。不光是工厂工作难找，各种工作都难找。工人找工作，一般不直接去工厂应聘，而是去中介机构填申请表，再由中介分派到各厂。工人虽然在工厂工作，但是法律上和工厂之间没有雇佣关系。¹²这样一来，不仅没法建工会，有什么问题也不能找工厂。现在，这些中介更多的只给工厂招临时工，合同期限很短，一般五个月左右。临时工没有福利，得不到最低工资。他们只能和公司签个人合同，要谈工资只能个人去谈，而与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无缘。公司借此削弱工会的力量，工会被削弱或赶跑之后，工人的工资随之下降。有些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到海外去找工作。

前面提到，最近几年关了不少厂。假如厂里有工会，工人就有解雇

¹² 这种雇佣方式，就是所谓的“劳务派遣”。

补偿，通常赔给法律标准一半的钱。要是没有工会，那就要看老板的心情了。老板当然都会说没钱。厂方不想给安置费的话，会找一些借口提前开除工人。因为罢工被成功地妖魔化，以至于没有因关厂出现过罢工。有的工人会去打官司，有时是单个人打，有时几个人一起打。但要打官司，你得准备耗上 10 年 20 年，就算到时候打赢了，工厂也早没了，谁赔钱给你呀。

总之，现在工人对付关厂的斗争手段很有限。1980 年代我们可以拉纠察线，堵住厂门，不让他们搬机器、货物，就有可能赢得斗争。现在不一样了。工厂在经济开发区里，里面保安、雇佣兵、警察多得很，工人没办法拉纠察线。工人要是发起抗议，还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排斥，使自己陷于孤立。

对那些加入战斗性工会的工人，厂方会百般威胁，或者炒掉，有时干脆用关厂来对付工会。现在最常用来抹黑五一工联的一个借口便是说：有五一工联的工厂，工人工资高，老板就会赔钱，最后只能关厂，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工作。成年累月的宣传给工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加入五一工联意味着丢工作，关厂。很多年轻工人不知道七、八十年代的斗争。即便听说过以前父辈的斗争，也都被政府、资方妖魔化了。现在和 1980 年代相比，组织工人越来越难。不仅斗争被妖魔化，而且组织者屡屡被暗杀，南他加禄省只剩下几个战斗性工会的组织者，有这种全面的组织技巧和历史经验了。资方压制工人斗争的经验不断延续和丰富，工人自己的斗争传统却青黄不接。

工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工厂总是解雇一批，再雇佣一批。很多老工人被解雇以后，拿了赔偿，开吉普尼或者做小生意。很多年轻工人都是工人家庭出身。他们的父母七、八十年代在工厂里工作，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退休工人生活很悲惨，他们没有工作，靠儿子养活，只有最低工资。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说有 1100 万失业者，又说提供了好几十万的工作岗位，所以失业率没那么高，其实当然是假的。

“伟大领袖”老沃

“伟大领袖”是老巴对老沃的称呼，带着点同志间的玩笑，又带着几分敬重。老沃黑黑壮壮的，走起路来不太灵便。嘴唇挺厚，声音低沉沙哑。他喜欢搞笑，聊天的时候时不时做个鬼脸，或者来点小动作。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有活力的人，曾经中过三次风，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即便如此，他还是躺在床上，或者拄着拐棍给找上门来的同志和工人们讲解问题。

他和老巴一起接待的我们，但因为每次只能访谈一个人，第一天他主要是作陪，第二天又请他过来，才是真正给他做访谈。他跟我们讲了个人思想的转变过程以及1985年在厂内领导的一次改选工会及罢工的活动。正聊到兴头上，他因为还有事情，只好离开。他后来的很多经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机会了解了。听老巴介绍说，老沃的妹妹也是工人组织者，2002年在家门口被暗杀。老沃现在虽然参选地区议员，仍然有被暗杀的危险。

1972年，我13岁的时候，家里条件虽然不算很好，但也不是很差。爸妈都有工作，姐姐嫁了一个小店主。我下学以后就在姐夫的店里帮忙、打杂。那个时候，因为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各种各样的关注社会问题的组织也很多。我们社区的神父成立了一个反政府性质的秘密青年组织，我和我很多亲友都在这个组织里。平时除了一些文体活动，神父给我们讲一些社会问题，讲政府如何压迫人民，带我们参加小型集会，搞一些倡议活动，去看城市贫民的生活等等。因为我们看到的就像他讲得那样不公正，都觉得神父讲得很对，便慢慢开始关注这些社会问题。1979年神父因为被军方通缉逃掉了。

1976年，我高中毕业，通过姑姑的一个朋友介绍进了一家大型石化厂。这家厂是我们地区待遇最好的，有1200人。三班倒，一周七天不能停，如果没人接班就要一直做到有人来接班为止。那个时候进这种大厂很难，很多本地人挤破头皮也进不去，我已经非常幸运了。进厂以后，除了使劲工作，多加班多挣钱，我还上夜校，梦想着成为工程师。当时我们那个200来人、都是不到20岁年轻人的车间，有三四个正在读夜校的工人，他们大概也和我类似的想法，希望以后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其他的工人更多的是靠喝酒赌博来打发业余时间。

1981年我兼职做了社区干事，每三个月有120比索的津贴，负责社区里的青年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对工人问题有什么特别的关注，只是会和其他年轻人在一起偷偷讨论一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不过，那时做得最多的还是工作、上夜校、去教堂祈祷这类青年人的日常事情。

当时厂里只有一个属于自由工联的工会。这个工会不作为，每次集体谈判的工资上涨很少，没争取到什么福利，工作环境糟糕。虽然这个厂比其他厂工资都高，但和不断飞升的物价相比，还是很少。有工人被厂方不合理地停职或者开除，工会却无所作为。一个月会费5比索。直接从工资里扣，想不交都不行。工人不知道会费都用在哪儿了，很生气。有时会有会员和工会干部冲突，质问他们钱花到哪儿去了：“又拿我们的钱去喝酒赌博了吧！”

1983年，一位五一工联的工会组织者认识了我们，他表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厂里工资和非法解雇工人的问题。这个组织者活动经验丰富，是我的老师。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组织工作的原则和技巧。

他先带着我们了解一些工厂基本情况：有多少工人，工资情况，福利待遇，集体谈判情况，老板情况，厂内工会情况等等。然后从对外公开的政府信息部门得到厂内的财务信息，教我们怎么看财务报表，看工厂利润、资产性质等等。那个时候厂里管理层的警惕性还不很高。虽然这个部门在我们拿到工厂信息之后马上就通知了厂方，但是厂方不认为

这几个人在搞组织，便没有放在心上。

接着，组织者开始教我们组织工人。先找了四个和管理层、工会没有关系，信得过的工人学有关战斗性工会的基础课。然后由这四个人带十个信任的人来学基础课，他们这四个人则去学习稍高级的课程。那十个人再各带一些人学基础课，他们自己去学高级课，这样滚动学习。从中选出最积极的人再去学法律、集体谈判等等，一直到民主政治课。总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有 200 人学了基础课，50 多个人学了高级课，10 来个人学习了民主政治课。很多工人参加学习之后都很受启发。

我参加学习之后哭了。因为以前在秘密组织的时候是爸妈给我钱，没有经济压力。经过学习之后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得到的工资只等于我们 1 小时 50 分钟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其余都被老板拿走了！这以后，我对其他工厂的情况和斗争了解得更多了，也更关心了，还参与集会并组织声援。这是教我们课程的结果，使我更深地涉入政治事务。1985 年 12 月我放弃了当初做工程师的想法，转变成全职组织者。

我们秘密地进行课程培训。厂里的工人大都有这种感觉，觉得有人在厂里搞组织，但在选举之前我们对不信任的人不承认有这个组织。即便选举之后还是有一部分人继续隐瞒身份做活动。

当时我们主要是写一些材料在工人秘密小组中传播，大家对改选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就改选工会的事情开过很多次会。有一天我们把改选要求交给工会主席，他很惊讶，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就同意了，签字了。倒班的时候大家把他签字的东西给别人看，让大家都知道他同意了。第二天他后悔了，但已经晚了。

我们准备得很充分，除了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等细节，还准备了选票、投票箱。向厂方申请地方开会，厂方不同意，后来我们就去厂门口开会。我们核心的几个人，还有下面的 200 个人，每个人都负责联系厂里其他五六个工人，确保会议能够成功。我们会开得很好。选举之后厂

方不承认结果，我们立马就搞了一个罢工，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资方想开除人，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所以厂方没敢开除，只是 45 个人停职了一段时间。

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做好了准备，如果厂方不承认选举结果，我们就罢工。不过这是政治要求，不能团结大部分人，所以我们罢工的时候还提出经济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等等。之前做工会选举动员的时候也涉及经济要求，这样才能团结更多工人。

当时 97% 的工人都支持我们的工会，因为他们吃尽了以前那个工会的苦头。选举当时是合法的，罢工是不合法的，所以鼓动罢工的时候更困难一些，因为工人怕马科斯。全厂一千多人，虽然很多人投票同意罢工，但五月初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警方的骚扰，只有 100 多人在纠察线上。很多人罢工的时候只是待在家里，不敢去纠察线上。

我们就给那些不敢参与罢工的人做鼓动。我们按地区分组，挨家挨户给工人们做动员，给他们讲罢工进展。我作为工会主席，要去劝最顽固的工人，给他们说其实罢工是我们的权利，只不过马科斯把它变成不合法的了，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这是正当合理的。在警察介入之后，很多工人更加害怕，我们又召开会员大会，给他们解释我们的行为是合法的。渐渐地很多人都不担心这些事了。大家轮流去纠察线，三天轮一次，然后可以自己去找活做。我们还成立了医疗小组，谁家孩子有病了就去谁家里照顾。有一些工人领导后来也害怕了，比如家人不支持，我们也去家里做工作。罢工期间，有些工人家里吃不起饭，就让他们带着孩子去纠察线吃，让他们知道工会是团结的，为大家服务的。

罢工期间纠察线一共有不到 200 人参与。其余 1000 多人，开会员大会的时候会来。工人家属一般都很支持，也有不支持的，会吵架。除了给家庭困难者以支持之外，还有人专门负责注意各地区工人家庭的情况，谁有问题了就想办法解决。厂里男工比较多，绝大多数都结了婚。尤其纠察线上的工人，家里经常会因为没钱吃饭吵架，所以不光要开大

会，更常开的是各地区的小会，解决具体问题。

社会宣传争取人心的宣传很重要，不光是工人家庭支持，还有社区，我们做了很多通讯稿，报道罢工进展，因为厂里抹黑我们，开始社区里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罢工是非法的，害怕和我们接触。经过我们宣传、解释罢工的合理性之后，社区人们的态度就转变了。如果不团结社区的话，很多负面情况就会出来。这些在组织过程中能够看得很清楚。社区里组织起来的青年人经常来拜访我们。还有农民每两天就带一次吃的来，米饭蔬菜等。我们的纠察线就像个聚会场所，各种人都来。有一段时间我们被警察赶走了，我们就去城里待了2周，厂里只找到一些工人和外面的工贼复工，没有找到足够工人替代我们，因为工作有一定技术含量，特别是加热的工位一般人做不了，而且其他一些工人也不愿意破坏我们的罢工。那些在家里的工人被警察骚扰威胁去复工，但是只有很少人去，所以工厂还是不能开工。

之前我们做过社会调查，知道这个厂是马科斯的地盘，所有他的领地上的工人罢工都会有兵力镇压，我们也预料自己会被镇压。但当时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来这么多人，因为我们工厂是单独的一个地区，离其他地方有三公里。当时有一个排藏在甘蔗林里瞄准我们，另外还有50个雇佣兵，80个来自不同公司的保安，40个女警。指挥他们的女上校还演过电影，是个有名的人物。

因为之前社区的人已经给我们报信说，三点多时候有部队的人埋伏在甘蔗地里，还有警察从后面进到工厂，还有很多警车等等。那天早上我们召集了200多人去纠察线。我们社区有一个传统，家里有枪一类的武器。之前有工人往纠察线上带过武器，短刀、自动步枪、火筒一类的。我让他们把武器带回去，因为这样政府会有理由屠杀我们。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木棍和盾牌，这是允许的。有一些工人看到这次来了这么多兵，生我的气，说“我就说我应该拿枪”，我就跟他们说：拿枪就完了，他们会屠杀我们。

我们拉起胳膊抵抗他们的进攻。很多工人被打，我被踢了好几脚，11个人被抓。后来好多家属去警察局门口抗议，过了几天市长就让警察局长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从1985年12月到1987年，本地区有200个工会是在我们指导下成立的。虽然工会数量一直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方向被误导了，在整个菲律宾的行动都有问题。1987年以后组织扩展得就越来越慢了。1996年我中风，半身瘫痪6个月，但还是坚持教工人怎么组织。到1998年之前我是OLALIA的主席，当地某政党的议员。1998年之后我开始组织老家的社区，从工人到居民，开始组织工会。我还组建了三个地区工会，包括新工业区里工会，积累了一些经验，写了一本如何组织工会的书。2002年我被派到某党里，2004到2007年我在三特老三市的社区里，参与了本地的竞选的策划，策划谁去竞选议员。（嘿嘿笑）我不喜欢选举，但是组织让我去，我就去。现在我是进某议会的第四人选。2009年11月我被提名做议员的候选人，2011年我被派到现在这里。



本田工会主席老罗

老罗外表 30 多岁的样子，其实他已经五十出头。说话时他常常皱紧眉头，偶尔微微笑一下，看起来比较严肃。因为遇到两批工人来找他咨询问题，我们和他访谈的时间并不多。从晚上 6 点左右一直等到 10 点多，工人们才散去。老罗眼睛红红的，我们很怀疑他还有无精力接受访谈，但他还是全神贯注地听我们问的每一个问题。结果最后，倒是我们没精力继续了。快到 12 点的时候，访谈了一天的我们撑不住了。我们很快在铺好的垫子上进入了梦乡。而老罗就像他宣称的自己是 7 天 24 小时工作制那样，继续工作。第二天一清早我醒了一次，看到他就睡在那条宽度不到他肩膀三分之一的长木凳上。大概 6 点多钟，我磨磨蹭蹭地起了床，老罗已经喝完咖啡又在桌边工作了。

我父母是无地农民。1978 年我高中毕业，在一个小农场做了八年，给地主种可可豆。我们每四个月收获一次可可，期间还种稻谷，但还是缺钱。1986 年我去了马尼拉。那会就想找工作，没想别的。所以二月革命的时候我没上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工人问题什么的都不知道。我看到那么多人上街，很吃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做什么。我那会有朋友在马尼拉的公司里做工，他也没有上街，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我在马尼拉先是做了两年建筑工，后来通过街头和报纸上的招工启事做了焊工，到 1992 年我已经是个熟练的焊工了。然后我进了现在的汽车厂，做了一名正式工。1993 年厂里有一千多工人。在加班、工资、福利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1990~1995 年厂里只有资方的工会。集

体协议中每年只涨 5 比索的工资。工人对此很不满。1994 年我开始考虑工人相关的问题，和其他八个工人商量如何建立工会。后来我们找到五一工联，接受教育。我原来是个挺害羞的人，不怎么和人说话，在五一工联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听着，看着，经常提问题。后来参加课程培训，培训我们如何讲话，成为领导。我们用建立秘密小组的办法组织工人，最后全厂大概有 80% 的工人接受过培训。厂里始终不知道组织者有哪些人。1995 年的时候，在工会选举中，我当选为新工会的主席。以前的资方工会只得到 86 票。当时我们是这个工业区成立的第一家战斗性工会。做建筑工的时候，我喝酒赌博到处闲逛。当了工会主席之后，戒酒了，也不赌博，只剩下吸烟这个小嗜好。

公司不承认我们的工会，工业区也有不许罢工、不许建立工会的不成文规定。但工人要成立工会的意志很坚定。上班前后，工人们在公司门口轮流抗议，有人给他们送水送饭。警察用水枪喷散工人，把我们赶到厂内去。我们在上班前、下班后或者小休的时候敲打东西，把管理吵得逃回办公室。我们搞怠工，产量从一开始的每天 40 个降到每天 2 个。这样持续了一周。因为所有工人都参加了，如果要惩罚就得全体都惩罚，所以厂方也拿我们没办法。厂方问罪我们工会干部，说他们损失了好几百万。我们说，还不是因为你们之前不承认我们，要是承认了，工人就不会做这些了，就会恢复生产。

后来，我们的工人搞了一个示威游行。工业区里的工人早上 6 点和下午 2 点是早班、午班的上班时间。早上 5 点的时候，我们厂要上早班的工人们沿着通向工业区大门唯一的一条路示威游行。这样一来，其他厂的人就上不成早班，迟到了两个小时。那些厂的老板就着急了，跟我们的老板说“你赶紧解决你们的问题，让我们厂的工人能上班！”警察虽然也来了，但是因为堵了很多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进不去，也没办法靠近工人们。我们堵在路上，给其他厂的工人发传单。其他厂的工人很支持我们，还一个两个比索地捐给我们。下午 2 点下班的工人和赶来上

班的工人又把路堵上。经过这次游行，厂里只好承认了我们的工会。

我们工会会员每个月交 50 比索的会费，这些钱用于工会举办的一切活动，包括教育、示威等等。当时厂工会主席的工资还是由公司支付。集体协议中有相关条款，工会主席每周在厂里工作三天，有工资，另外三天可以做工会工作，没有收入。

现在厂里只剩下 300 多人。公司从 1998 年开始，2001 年、2004 年、2011 年各搞了一次自愿离职计划。公司说要搞自动化，不用那么多工人了，鼓励工人提前退休，给很多补偿，能有 120 万比索。有些工人就拿了补偿去海外找汽车厂的工作。但后来工人发现 120 万看起来很多，但其实用不了多久。狡猾的老板并没有真的更新机器，只是缩减了产量。现在留下的工人都是正式工，没有合同工。¹³原来厂里试过雇佣合同工，但是工会要求厂方把合同工转成正式工。这个官司从 2005 年一直打到现在。那些合同工也要求转正，但后来公司还是开除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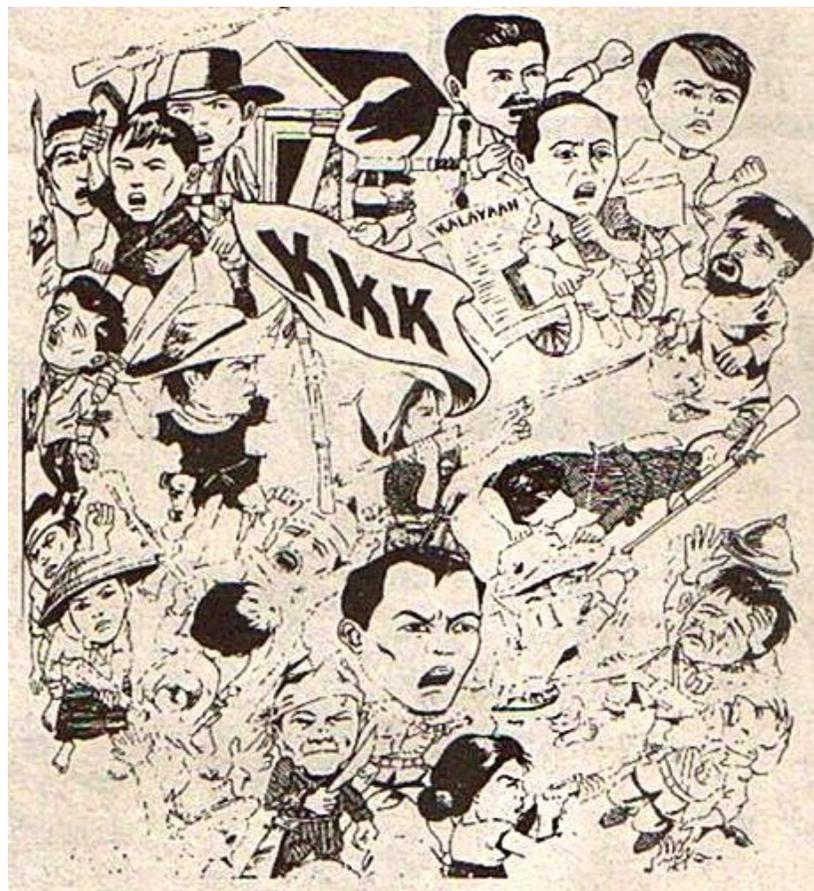
2001 年我成为本地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后来成为这个省的工会主席，2005 年以后全职做工人组织工作。2008 年，政府说我是棉兰老岛的共党恐怖分子，警告说随时会逮捕我们这几个工会组织者。这以后，我不能回家，住在工人家里。为了妻子女儿的安全，只好把她们送回老家去。我自己还是继续做组织工作。

我也有过失败的案例。2000 年有一个厂，其中 700 多名工人都是合同工，有不少已经工作 8 到 10 年了。在我们的帮助下，工人罢工两次要求转正，遭到军队警察镇压。两年以后，工厂不仅没有给工人转正，而且决定关门，并且声称是因为工人闹事才被迫关门的。工人失业了。有些人归咎于我们，还有工人去投诉我。我们却很难向工人解释。

现在的工人和以前的想法没有什么区别，工作很难找。很多工厂要求工人学过两年的大学课程，即便招聘流水线的普工也是如此。因为失

¹³ 即签订短期合同的“临时工”。

业率太高了，政府让高中又延迟两年毕业，小学延迟一年毕业。



纸鹤老巴

老巴看起来温和严肃。他随身带一个小黑包，里面装满了彩纸和气球。访谈前，他先是教我们叠了会纸鹤，最后又吹了两个气球，一个做成剑，一个做成贵妇犬的形状，送给我们。别小看这些玩意儿，它们是老巴发明的新型组织工具。老巴从事工人组织工作已有30年了，1986年“人民力量”之后是南他加禄省战斗性工会最兴盛的时期。然而1990年代以后，工人组织活动变得越来越难。政府、资方对于工人集体行动和战斗性工会的大肆抹黑，使得一般工人一听说“罢工”、“工会”这些字眼，都远远避开。要是工人知道他是一个组织者，很可能会对他畏而远之，怕的是因为参加工会而被资方炒掉。但是一边玩一边聊天就会好得多。一边折纸鹤，一边聊工资待遇一类的话题，就显得轻松自然。他们还用这招来逗小孩喜欢，这样和他们的爸妈也拉近了距离。

在南他加禄省，我们遇到了很多从事了几十年活动的工人组织者。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这种从叠纸鹤着手的组织方法，或是某个成功的案例，更是他们执着的精神。如何在长期的工运低谷中继续坚持下去，比起面对酷刑和暗杀，或许更考验一个工人活动者的意志。

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有十个孩子要养活，所以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挣钱，没有参与过六七十年代的斗争。1977年到1983年，家里供我读大学。那时候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不多，大概只占30%。入学考试竞争激烈，穷人家的孩子往往竞争不过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虽然公立大学的学费较低，对中等阶层的家庭来说不算多，但是工人家庭依

然难以负担。

在学校时，我是菲律宾大学学生议会的主席。当时我看到社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还不理解根源在哪里。我更关心的是和学生有关的问题。戒严法时期，每个大学生都要接受两年的“军训”。有一次我们罢课，抗议教官对我们实施的体罚。

不久，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学生联盟，从这以后对社会问题开始感兴趣。通过这个组织，我了解到工人的诉求。这个组织会做一些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有一些参与学生运动的人被抓或者失踪，我们就参加搜救他们的工作。学运分子在学校内搞活动，也到社区里做组织工作。我们在社区里的活动经验，既有自己一步步学的，也有其他有经验人士教的。我们学生组织先成立小组，有的在暑假组织工人，互相交流经验，也和一些因为做工人工作被学校开除的学生交流。

当时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都是禁书。我们把书藏到天花板上，要偷偷地看。我从这些书里得到很多启发，知道了工人的重要性，感到自己应该为人民服务。后来我又意识到，做一个学生还不够，所以我没毕业就离开学校去了一家工厂，体验生产和工人的切身处境。放弃了做工程师的课程，去做人民的“工程师”，也因此没有拿到学位。那个时候，像我这种选择去工厂长期工作的学生很少。大部分学生都是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我的同学毕业后一般去跨国公司当工程师，生活比较优越。

1983年，通过在厂里做工的姐姐介绍，我进了一家美资的开关厂。我在厂里是普通工人，做焊工，后来去产线上做装配、操作大机器。进厂以后，发现工人和学生有很多不同。工人们什么都被安排起来，一起上下班，吃饭，睡觉，要遵守规则，大学生的生活则是单独的、随意的。也说不上多长时间，慢慢地我就适应了纪律。没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最后才有几个人知道。因为我总是很严肃，有人还觉得我像神父。



进厂前后，我的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看到了工人是生产的主力，他们制造机器，从事生产。我了解了工人是怎么被剥削，被欺骗，我计算过工厂的利润和剥削率。工厂会想各种办法压榨工人。比如，厂里从日本

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经常让工人开会讨论如何改进生产效率。工人想了各种办法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但结果几个月后，就有人被炒掉了。因为原来做一个工作要用十个人，改进后只用五个人，劳动效率提高了，老板就要裁人。还有，工人们提高效率之后，每天的生产定额跟着提高，劳动强度还增大了。

我在这个厂工作了一年。进厂之前还没有想到要去组织工会。进厂后，发现已经有劳工教育中心的人在厂里活动，有一些工人已在着手准备组建工会。我便直接参与了。我和积极的工人们聊天，去他们家里，收集支持成立工会的签字，争取其他工人的支持。然后，如果人够多的话再开一次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成立工会。有时候会碰上某些工人是厂方的眼线，假装支持成立工会，再把情况报告厂方。当然，这时候大家会明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那个时期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熟练地组织工人，觉得好像很简单，以为马上就能上手，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后来学到了一些方法，渐渐知道了怎样一步步地组织工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接触的对象，只要有一个人泄密，小组就完了。有过教训和经验以后，组织起来就更聪明了，眼光更敏锐了，知道什么样的人能组织，什么样的人不能组织。

后来有几个工人向管理层告密，说厂里有人在搞工会。厂方控制的一个雇员委员会就开大会，一再向工人们宣讲：工人是厂里最宝贵的财

富，工人和工厂利益是一致的，工人没有必要成立工会，等等。因为我属于临时工，不是正式工，厂方可以轻易地开除我。我希望能有正式工站出来说话，驳斥他们。但没有正式工站出来，我就主动站出来，向工人说，工人和老板的利益是冲突的。我解释，工人的工资不增加，老板的利润才会增加。当时我希望会有人站出来支持我，但是他们没有。后来管理层约我出去单独谈，大概我说话的方式让他们猜到我是大学生，他们问我是不是菲大的。我说是菲大的普通学生。他说他也是菲大的，以前也是活动家。我说：那你应该很清楚工人的情况。他没吭声。那个经理可能确实是个活动家。他做这个厂经理的时候，对老板说，他有经验，保证不会让工厂里出现工会，不然他就辞职。我被叫去谈话以后，有些工人害怕了，但还有些工人说还会继续搞工会。

虽然在那次会议上，没有人公开支持我，但是工人都受到了启发，觉得我说的在理。以前他们都很怕管理，不敢和管理争辩，但是我和管理的辩论，让他们觉得管理不那么可怕了。后来厂方又开了个会议，宣布月工资增加 60 比索。工人很高兴，纷纷鼓掌。其实这是因为得知我们想要建立工会，管理们被迫先做让步，并改变他们的管理方式。我趁热打铁跟工人说，你看，我们还没做什么，他们就给涨工资，如果我们真的建立工会的话，会得到更多。

两周以后，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订单已经做完了，我没有活做了，我是临时工，所以要先解雇我。我说：好的，那你把没有订单的事情给我写出来。最后他也没有拿出要开除我的证据。

两年以后，这个工厂建立了工会，隶属于五一工联。管理层已经看到工运的形势，有些害怕，就和工会签了合约。

工人没有被组织起来之前，发工资以后往往喝酒，赌博。平时只关心工资，不关心政治问题。工人住得离工厂都很远，下班之后就分散了。工人之间不怎么聊天，除非下班后几个人出去玩会，才聊聊天。

根据我们的经验，主要是年轻工人更活跃一些，尤其是还没成家的，

业余时间比较多。不过当他们刚刚成为工人的时候，特别是女工，因为没有经历过剥削，动员她们建立工会就很难。等在工厂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剥削后，就是比较好的教育、组织的时机了。这是因为刚进厂的时候，他们比较自由，又有一些钱，家里还能支持他们，没有经济上的问题。工作了四五年之后，感觉到自己工资比较低，没有福利待遇，又受到公司工会的欺骗，知道了公司工会是厂方一伙的，会和管理层一起欺骗工人，这时再和他们解释公司工会是怎么回事就很方便，也比较容易组织了。

在自己最信任的、关系最好的工人之间建立秘密小组。一个人联系十个人——和管理层没瓜葛，不同情厂方的。再由这十个人联系另十个人。单线联系，一旦一个小组出现告密者，厂方也发现不了所有其他的人。

用这种秘密小组的办法，我们把全厂一千多人当中的70~80%以上都组织起来了。每个小组有几个很有献身精神的代表。我们分两批来组织，一批临时工，一批正式工。对临时工，主要宣传要有组织权利，对正式工主要是提工资待遇。两方面都壮大了，再合到一起。等到支持的人数占到70~80%的时候，再向厂方提出成立工会的要求。这种组织方法就像空气一样，管理能感觉到工人在搞组织，但是他们只看到个别小组，会以为人数很少，不在意，但其实已经有好多小组。我们就像冰山，开始只在水面露出一个小角，一旦准备好了，就完全从水底下冒出来，是坚固的一大块！资方靠开除甚至杀人都不能阻止我们成立工会了。工人们有时会问组织者发展了多少人。我们就说有很多了，让工人们再等等。我们之前有过教训，组织工作没有秘密地做，一旦有人泄密，组织被破坏，重要的组织者被全部开除。

我从厂里出来以后，就去了劳工教育组织，开始做工人工作。我在那里从事一个培养工人领袖的项目。周末授课8小时，然后就是“真正的工会”课程。平时时间短一些。先讲什么是工人，我们是谁，我们从

哪里来，把自己的历史讲清楚。在菲律宾，大部分工人是从农村来城里找工作的。这是第一部分，也是基础。再讲切身利益，受剥削的情况，讨论工人的低工资，恶劣的劳动环境，缺乏劳动保护。讲解了工人的处境，我们再讨论该怎么做，然后介绍怎么组织工人，组建工会。不只讲到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求更高工资，以及工作环境，还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没有剥削的社会，也就是谈一点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是入门课。我们不仅要在自己工厂里搞工会，还要帮助其他厂的工人建立组织，参加集会等等。当罢工的工人被警察骚扰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工人去声援。

我一边讲课一边组织工会。当时有很多独立的劳工联盟。1985年之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南他加禄的联盟(OLALIA)。原来这些松散的联盟效率很低，只提供法律援助，在我们的领导下改善了。我们在没有工会或只有黄色工会的工厂里开办这些课程。我们做过教育的工厂后来有好多都罢工了。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厂方没有同意，或者谈判失败，工人就会采取罢工行动。工会领导被开除的话，也会罢工。1987年，为了要求增加最低工资，发动过全国总罢工。

有一些机构属于菲工大、自由工联。有些是站在公司一边的。有些只关心提高工人待遇。我们和他们的主要区别是重视工人教育，教育工人不光当工会领袖，还要做社区乃至国家的领袖，给他们进行一些国家民主政治方面的教育。这是我们和其他经济性工会组织最大的区别。我们有很多关于法律的教育，比如在罢工中如何做到不违法，还要进行“真正的工会”教育和讨论。还给售货员开设课程。我们和EILER（教会背景的左翼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开设工人图书馆，有一些关于中国、俄国的书。还有专门教如何写各类申请、宣传材料、工厂通讯的写作课。工厂通讯的内容是有关工厂里的问题，工作环境，工资等等。在工厂里组建工会的时候，我们会派一些志愿指导员（工人）去建立工会。我们的工作大致是以上这些。工会刚成立的时候，工人们会很热心参与教育课程，不过，和厂里的集体谈判成功、工人得到利益之后，就不那么热

心了。

1987年阿基诺上台后，推行民主政策，工人可以自由组织，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罢工。新政府宣传说，目前政府还不稳固，如果工人罢工，导致经济不稳定，政府垮了，工人到最后就不能享受革命果实。政府呼吁工人和各工人组织忍耐，共渡难关，采取措施来限制罢工。当时很多人听信了，以为阿基诺会进行改革。有些工会干部阻止工人罢工，说要给阿基诺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现在回想，当时是犯了错误，不该听信这些谎话。

1987、1988年我亲身经历了两次屠杀。第一次我们组织农民去总统府请愿，要求落实土改政策。当天是总统接待日，按规定总统府是开放的，可我们却遭到屠杀。1988年我们在某市进行五一节的集会，当时已取得市长的许可，却仍然遭到了军方的机枪扫射。我们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屠杀我们？戒严令时期已经过去，阿基诺承诺民主了啊！

后来的几年，不少同事因为各种原因被暗杀。家人担心我的安全。我就想办法出国打工，成了外劳，并且在海外参加了外劳组织。现在我在一个政党里工作，正在为2013年大选作准备。我们是每三年有一次地方议会、政府选举。我们会动员工人、农民和社区的人。我们有三个工会的领导参选。

我们认为要选一些进步的人到政府里去，维护工人的权益。



“艺术家”老波

老波是我们探访南他加禄省的一家工人教育中心时遇到的一位钢铁厂的工会书记，50多岁的样子，肤色黝黑，中等个头。也许是因为长得太瘦的缘故，那双黑框老花镜后面的大眼睛，在微微凸起的颧骨和深陷的两腮中显得格外醒目。他留着长发，上身穿了件印有奇特图案的T恤，外边套着一件有很多兜的马甲，活像一个拍外景的导演，或到野外写生的画家。他身上戴的装饰品可真多，木珠手链，戒指，古怪的项链。刚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是一个钢铁厂的工人——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来这里的工人没有一个是他这样的。

不过，老波并不是真格的“艺术家”。之所以给老波起这么个译名，是因为后来聊天时，他说自己是学艺术出身的，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进厂做了工人——这也许是他的玩笑话吧，他平时就喜欢不动声色地开玩笑。记得那天早上我们拿出刚买的面包请他同享。他说他习惯吃米饭，因为他不想变胖，说完就从包里取出一个不知用来装什么的小铁盒，指着上面的一幅超肥裸女像，一脸正经地说：“我可不想变成她那样。”

他是来中心交流的，因为他所在的工厂裁员，厂里的工会正在组织反裁员的罢工。我们约他第二天来聊一聊他们厂的事情，但也不确定他是否有时间接受访谈。第二天他不但来了，还很认真地做了准备，给我们带来了他们厂里的一些资料。从访谈中得知，他们厂的工会有一个良好传统，会把每次劳资谈判和罢工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他说英语时口音很重，碰到我们听不懂的地方，他干脆就在中心院子里的一块黑板上写给我们看。他写的英文字母全都是大写的，像是一种艺术字。我们的英文水平也有限，表达不清时也学他的样子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就这样，双方居然聊得煞是投缘。

1977 到 1985 年，我在政府的金属研发部门工作。1981 到 1982 年，政府派我去西德学习、工作了一年，然后回国继续工作。政府的工作很枯燥，里面的人很腐败，所以我对很多事情都格格不入，却不能表露自己的愤怒。我想试试看能否在私人公司工作，便于 1985 年去了一家私营钢铁公司。这家公司做金属垃圾桶。厂里有很多女工，还有 16 到 19 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受过工伤。1986 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工人都很想上街，厂里不让。

那个时候就连政府雇员也不喜欢马科斯。他倒台前，我们对阿基诺都知之不多，只晓得他是个商人。我们当时一心就是想换掉马科斯，因为他当政太久（把工人都折磨得够了）。阿基诺夫人刚上台时，我对她抱有希望。但她的很多承诺，教育啦，住房啦，医疗啦，人权啦，统统没有兑现，我很气愤。1987 年 1 月 22 日，一些农民、农场工人、学生、教会人士组织游行，却遭到屠杀。这使我对她更加愤怒。

我身边的工人们也不喜欢阿基诺，因为她只答应工人涨 1 比索的日工资。政府部门里的一些官员也不喜欢她，因为她承诺改革（这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1986 到 1987 年期间，自发罢工还是很多。

1988 年，我进了现在这家钢铁公司。1997 年我成了厂里的工会书记。工会附属于五一工联，现有 55 名会员。厂里一共有 85 个工人。工厂想雇佣年轻人，降低成本。昨天厂里开除了我和其他 13 人，我们都是正式工，也是工会会员。在我们与资方的协议里有规定，一般情况下，不能解雇工会会员。而且，公司只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数额的 50% 赔偿。所以我来中心这里寻求帮助。

工厂是 1979 年建的，老板是菲籍华人，和马科斯有点关系。产品是房顶铁片。美军基地也用我们的产品。1980 年厂里有 150 人，那时没有工会。1981 年厂方建立了他们控制的工会。1982 年建立了另一个 R&F 工会，有会员 130 人。1983 年，工会在劳动局注册，老板认可了。1985

到 1987 年，工会与资方进行第一次集体谈判的时候还是独立的。1988 年，工会加入五一工联。

我进厂前，厂里曾发生过三次罢工。1985 年罢了一周，1986 年罢工了二周，1987 年罢工了四周。每次都是工人自发罢工。

后来在集体谈判时，为了迫使老板同意我方提出的要求，工会又组织了三次罢工。1988 年罢工了两个月，1991 年罢工了四个月，2001 年罢工了 27 天。

2010 年到 2011 年，资方拒绝按照集体谈判的结果给工人提薪，而且开始解雇员工。当时工会和资方的谈判进行了一年半，期间没有举行罢工。2011 年 9 月 17 日，劳动局做出裁决，支持工人的要求，包括涨工资和服务金，让被开除的工人回厂工作，发放停职期间的工资，等等。但是资方借口资金短缺，拒绝支付。劳动局再次判决，要求厂方于 2012 年 3 月 3 日前支付。结果厂方拒绝谈判，还向另一个政府部门提起上诉，要有 2~5 年的时间才有结果。如果维持原判，我们还会上诉。两年之中，工会一直在和厂方打官司，我们的工资也一直没涨。

2012 年 6 月 29 日，我们工会通知厂里和劳动局，如果厂方还是不执行裁决，我们将在 7 月 17 日罢工。我们进行了投票表决，工会会员里 53 票同意罢工，1 票反对，1 票弃权。管理层的对策是，一周之内雇来 20 个保安（原来只有 8 个）对付工人。

有两个监工也被解雇。他们向来站在厂方一边，但这次也被开除了。他们没有参与和支持工会的集体行动，我们就没再跟他们联系过。

我们工会的前主席就曾经不间断地记录工厂的历史和工会的历史。每次行动中工人如何组织，资方如何反应，他都像写日记一样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些不是上级规定的，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其他厂的工会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做。

汤老伯的两次罢工

汤老伯曾是南他加禄省一家罐头厂的工会干部。1984年，他参与了厂内的第一次罢工。罢工后，他加入了当时在厂里进行秘密组织工作的战斗性工会，后来他成了工会秘书。2001年，他组织了该厂的第二次罢工。现在他退休了，用公司支付的退休金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以此维持生计。

汤老伯十分守信。我们和他聊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只讲了讲第一次罢工的大致经过，就去参加由退休工人组织的合唱团的活动了。他答应我们第二天有机会再聊。不巧，当晚他就得到通知，第二天有事情要处理。他对不能如约接受访谈表示歉意，并且连夜写了一份记述2001年罢工经过的手稿，交给了我们。

还记得汤老伯和其他几个退休工人在简陋的工会办公室里唱歌的场面。七八个老工人聚在一间小屋里，或站或坐，有的用手和脚打着拍子，有的抱着吉他——昏暗的灯光映出他们斑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当那低沉而有力的歌声传来，我们不禁吃了一惊。此情此景，让人恍如隔世，仿佛一下子带我们回到了菲律宾工人光荣斗争的岁月。不错，这就是菲律宾工人群众当年传唱的歌曲，是从阶级的激战中诞生出来的、真正的战斗之歌。虽然当前的斗争已长陷低谷，但昔日的传统和斗志并没有完全断绝。这些老战士唱起自己的歌，还是那么自然。我们这些外国访客虽然语言不通，但也能从他们的歌声中全身心地感受到工人的斗志和力量，而沉浸在那战斗的气氛中。

访谈间歇休息的当儿，几个老工人出来跟我们闲谈。他们看起来精神很好。一位老大娘是汤老伯的老同事，身材微胖，面色红润，眼睛闪闪发亮，虽然和我们交流很困难，总是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但还是很喜欢讲话。她微笑着不断用手比划，想为我们讲述她的生活和斗争。

1984年罐头厂第一次罢工

我工作的这家200人的罐头加工厂是1975年建的，老板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公司有一个工会，但啥事都不干。1972年戒严令之后，工人处境艰难，每天仅得8比索最低工资，外加一点加班费。后来政府将最低工资上调2.5比索，但公司只给加薪1.7比索，于是引发了罢工。

那时我在公司做杂工，事前对罢工并不知情，也没参加。后来我才知道，罢工前，厂里就有一个五一工联支持的、秘密的工人小组。小组在罢工前开了两次会，征集大家对罢工的看法。厂里大概有一多半的工人跟我一样，事先都不知道要罢工。事发当天早上，我才知道罢工了。那天早上去上班，一到厂门口就看到了纠察线，一群工友堵住了厂门。纠察线上的工友对我解释，罢工的目的是要厂方按照政府的规定涨工资。我听了以后很支持，就跑回家去做横幅。其他工人也大都欢迎罢工。组织者后来分配我去搭建棚子，接待厂外的支持者。在罢工现场，我们接受了一个月的“真正的工会”教育。工人们各自都有分工，有搞教育的，有的负责安全工作，有的负责财务，还有的做后勤。

工人在外面干得热火朝天，厂里那个工会的干部却呆在老板的办公室里袖手旁观，所以通过这个工会筹集到的钱很少，只有两万五千比索。罢工期间工人首先要维持生计，要有罢工基金来保证每个工人的基本生活。工人们轮流去打零工，也千方百计搞募捐。附近其他工厂发工资的那几天，我们会带着募捐箱去，有时还去赛车场附近募集。那时罢工比较多，有劳工联盟帮忙，也得到很多外面的帮助。有很多人来支持我们的罢工：附近的菲律宾大学的学生，其他工厂的工人，其他工会的组织

者。他们教给我们一些基本的东西，组织唱歌演节目，还同前来支持我们的其他厂工人交流如何罢工。

罢工的第一天，工厂就知道这次罢工是经过谋划的，对工人不做任何回应，而是找来军队的直升机，在第二天帮忙出货。军队、警察也来威胁、骚扰我们。我们对直升机放炮（烟花），还试过放风筝来阻止它，但是没用，直升机飞得太高了，还向下开枪，还好没有伤到人。工厂存货很多，厂外面还另有一个仓库。所以我们要把罢工长久坚持下来才行。最难办的是，厂方雇了很多保安骚扰我们，外面的存货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厂方又临时雇了很多工人来当工贼，承诺给他们2~3倍的工资，试图让他们进厂恢复生产。菲律宾大学的学生也加入到纠察线。有人躺在纠察线上，不让工贼进厂。厂方调来高压水枪对付我们。但我们还是坚决地把他们挡在了门外。

我们坚持了7个月，最后获得了胜利。厂方同意日工资增加2.5比索。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公司付给六个罢工领导者遣散费，把他们开除了。

罢工后，在五一工联的帮助下，我们把厂里的工会改造成了战斗性工会。我也加入了工会。2001年我组织了厂里的第二次罢工。

我们附近的很多工厂有过罢工。哪里有罢工，我们就前去支援，跟纠察线上的工人交流，了解他们厂里的情况和工会的情况。那些罢工有的自发，有的有组织，成功的约占70%。我们第一次罢工成功后，就更主动地去一些厂交流经验，教他们怎么搞罢工，也给其他罢工的工厂工会捐款。

2001~2004年罐头厂第二次罢工

2001年，厂里一共有332名工人。

我们的工会和公司签订的集体谈判协议（CBA）有效期是1999年

5月1日到2001年4月30日。4月29日，工会向公司提交了约谈通知，双方同意就以后的集体协议进行讨论。谈到那些非经济性的议题时，都很顺利，工会和资方没有发生什么分歧。只开了两次会，双方就谈妥了CBA协商的基本规则。但一谈到经济性问题时——我们提出的有关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资方表示，因为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公司财务紧张，负担不了；不仅如此，公司还要缩减工厂运转相关的所有支出，以维持工厂运转和保持工人的工作岗位。

从2001年9月23日起，我们开了37次谈判会，公司的立场始终不变。工会干部和会员们开会，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向厂方施压，以促使他们做出让步。

工会采取的行动如下：

- ✎ 工作安排
- ✎ 休息时制造噪声来抗议
- ✎ 绑上带子以示抗议
- ✎ 小休、午饭时在公司大厅组织小型集会（流动纠察线）
- ✎ 在厂房前挂飘带
- ✎ （2001年9月29日开始）抵制公司产品
- ✎ 其他相关行动

尽管工会搞了很多行动，资方还是很顽固，拒不同意我们的经济诉求。他们对工会进行报复，尤其针对当时的工会主席，现已过世的A同志。他们要解雇他。总之，谈判陷入僵局。工会干部和会员商讨后决定，不再和资方继续谈判了。为此向某部门提出申请，经调解又和厂方交涉了很多次，仍无结果。于是，工会进行了罢工的投票表决，大部分成员都同意。我们便向政府劳动部门发出了罢工通知。按照法律，因集体谈判引发的罢工，要提前30天申请。

罢工过程

2001年11月23日午夜，我们开始了罐头厂的第二次罢工。针对罐头厂对工会的非法行为，所有成员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我们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下设：教育委员会，财务、后勤委员会，福利委员会，法律事务执行委员会。

第二次罢工和1984年的第一次罢工有所不同。大部分工会干部和成员已经都受过“真正的工会”课程和厂内外的形势的教育，有政治觉悟。相比1984年，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持罢工。我们有大概100万比索的工会会费和罢工基金。但是因为罢工每天都要消耗资源，公司还起诉我们给厂里造成损失，要我们赔偿，所以罢工基金只够坚持一年的。

罢工期间资方的行动

和1984年一样，他们使用直升机把厂里的货物运出去；找工贼来生产；答应给每个成员提供离职补偿；进行秘密交易，特别是对工会干部。

罢工中，有一名工人因抵抗强行逮捕（carjack arrest），死在了纠察线上。

前面提到，我们的经费只够用一年，所以到了罢工的第二年，我们发动协会中的其他工人，还有社区，来支持我们的罢工。我们举办宣传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罢工，并得到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派了很多个代表团，去罐头厂的总部设立纠察线。我们向办公室人员散发传单，让他们了解罢工的原因和正当性。经过这些行动，资方终于答应继续谈判。但谈了几次后，资方表示，他们将关闭这家工厂，

同时给每个工会成员及工会干部一笔离职金。工会不接受资方的条件，我们想要的是继续在厂里工作。但是资方坚决，坚决，坚决不同意我们的要求，不让我们回去工作。

罢工进行了五年之久。很多工会成员都想结束罢工，接受公司的离职计划。工会干部和成员便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最后做出决定，通知厂方坐下来谈他们的离职方案。

我们又开了大概五到七次会，来讨论有关离职金的问题。最后在2006年2月23日，工会和资方达成协议。



丰田工人访谈

小飞二十多岁，我们见到他，访谈了两次，时间都不太长。虽然没有翻译，彼此的英文水平也都有有限，但也许因为是同龄人的缘故，磕磕绊绊的交谈并没有破坏无拘无束的气氛；此外的特殊印象，当时好像并没有。

回到到现在，时间也过了一年多，兴奋的感觉早就没有了。一边照老样子过活，一边整理着访谈得来的材料。这样就得到了些整体的认识，也因此就有了几个对比，那么现在倒可以说几句关于他的印象了。

对他的印象，就是单纯、憨厚、踏实、不做作。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大眼亮晶晶的菲律宾帅哥；可能是有东亚血统的缘故吧。他身体结实，两腮厚实，眼睛不大，上眼皮也微微有些厚。别看他一副娃娃脸的样子，但却已经同敌人有过多次短兵相接的经历了。说起那些殴打、镇压、抓捕和呼啸的子弹，他憨笑着，好像邻居家的善良小哥，没有做作，没有任何夸张和炫耀。

真是担心对血腥暴力的“迟钝”会害他白白牺牲，但现在终于明白，那正是他们力量的所在。他周围工作着的，都是依然在“前线上”出生入死的老战士，他这个新人的样子就不足为奇了。

首都组织的中心就不是这样了。也许是离“前线”太远了，那里的一个学生出身的新人，大约同样的年纪，言谈举止中就多有轻浮，对失败的罢工，对失败而失业的工人，他的评价，就是“毕竟提高了政治觉悟”。

我进丰田厂的经历

我爷爷是农民，在日本侵略菲律宾的时期参加过游击队。有一次他被日本人抓到，绑在树上，但是后来逃走了。我父亲 13 岁的时候离开家，到城市里当了工人。我父亲和我母亲是 1979 年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母亲是服装厂的工人。我父亲不怎么关心政治，也没有加入过工会

2001 年我 18 岁，技校毕业后，进丰田做了焊工学徒。当时工资是最低工资，每天 250 比索。我经过了两个实习期，第一次五个月，第二次六个月，最后在 2002 年 12 月 3 日成为正式工。

焊工应该算是厂里比较重要的岗位。工厂生产的一般流程是冲压，焊，喷漆和组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丰田工作到现在（2012 年 7 月）。

丰田正式工的工资会随着年资调整，每做满一年，月薪上调 900 比索。本田的工资要高。丰田资方的工会则会告诉工人，本田的工资其实不高，只是因为本田建厂时间早，老工人多，工资才比较高。

2003 年 12 月我成为工会会员。我是被一个在 2001 年罢工的工友介绍进去五一工联的工会的。我们一起喝酒，然后他给我介绍五一工联。他常给我讲一些工会的事情。我在 2004 年 3 月接受了一些政治教育。当年有四五十人参加了五一游行。后来我还学习了菲律宾历史。

我刚加入五一工联的工会的时候，并不害怕丢工作。那时是秘密组织的，我还年轻，在厂里公开给工人发传单，厂里就知道我是积极分子了。在厂里发传单是传统，我们每个月都给工人发传单。当时黄色工会的工人都怕被解雇。

2012 年最后一季度，这个教育中心（该省的工人机构）雇佣我做他们的专职人员。我的老婆也在这里工作，比我早三个月。她当执行主任，没有工资。我岳母资助我们在这里做事情。我老婆来自中产阶级，她是菲大的学生，原来是当地女权政党的主席。

呵呵，明天是我在丰田最后一天上班了。我辞工了，要做全职的组

织者。终于从工厂解放出来了（笑）。

2001 年的罢工

日本丰田汽车在菲律宾拥有整整一个经济特区，也有自己的零件供应商。这和其他的经济特区不一样。其他经济特区一般都有许多工厂。

我进厂那一年，丰田的经济区还在大马尼拉地区，而且刚刚发生了一次为期 10 天的罢工。

在菲律宾，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一家企业内可以成立多个工会，只要有一定数量的正式工发起成立即可。但是工会要想获得代表全体工人与资方谈判的权利，还必须进行代表权选举，即必须获得超过一定比例的工人的认可，此后经过谈判，才能与资方签订有一定期限的集体协议。工会的谈判权不是无限期的，每隔一定的时间就要重新经过工人的投票确认。

丰田的工人是 1998 年开始筹划成立工会的。2000 年，工会赢得了代表权选举。但是，2001 年初，工会向劳动部门申请注册时，公司否认工会赢得了代表权的选举，并以此为由要求召开听证会。

2001 年 3 月 14 日，233 名工人到现场参加听证会，支持工会。在工人的支持下，工会赢得了听证会，代表权获得确认。

2001 年 3 月 16 日，公司以非法罢工为由，对参加听证会的 233 名工人做出解雇决定。

2001 年 3 月 28 日，丰田在马尼拉的两家工厂共 700 名工人开始罢工，抗议公司对工会和工人的报复性措施，要求公司撤销解雇决定。罢工工人在工厂的各个大门设立了纠察线，但是公司使用直升机外运零件。同时，丰田日本总部派人到菲，向阿罗约政府施压，要求菲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否则将撤资。政府派出两个营的军警到工厂清场，武力驱散罢工工人和纠察线。坚持十天后，罢工失败。

有媒体对这次罢工进行了报道，但是工人当时没有寻求外界组织的帮助，因为害怕被认为与五一工联有关。当时工人的年龄大致在 27 到 35 岁之间。

冷酷的丰田·被镇压的工会

罢工失败后，因为很多工人被解雇，厂里只剩下 300 多个正式工，于是工厂陆续雇佣了 400 多名实习生，也就是合同工。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招聘进厂的。这 400 个实习生最后只有 100 多人转为正式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继续做实习生。

大批工人被解雇的另一个结果，是工会失去了代表权。为此，被解雇的工人和工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打了两场官司，分别是起诉公司非法解雇和要求承认工会合法。经过漫长的诉讼，2004 年，最高法院判定工会有资格代表工人谈判。但是到了 2007 年，最高法院就非法解雇一案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工人集体参加听证会是非法罢工行为，解雇合法，工人无权获得赔偿。这个判决结果被我们称为大屠杀，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会写入法典。

2004 年关于代表权的判决，工会虽然胜诉，但是资方却趁机成立了自己控制的一个工会。这个黄色工会没有得到超过半数的工人支持，但是资方却向劳动部谎报代表权选举结果，使之在劳动部获得注册，有了谈判权。于是我们又把劳动部告上法庭。

2006 年 8 月 16 号，我们组织了一些工人去劳动部抗议，前前后后去了三次。第一次有保安守在门口，没进去。第二次，我们进去了，劳动部的人承诺会帮助我们，但是第三次去的那一天让人终身难忘。劳动部的人躲着不见我们，还报了警。我们遭到了警察的殴打。我的头两次受到枪托的重击。有一个工人腿被打断了，另一个被打成重伤。警察直接就在那里开枪，子弹从我耳朵边飞过。最后 21 个人被抓，关押了 3 天。

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会成为少数派。公司的工会则拥有足够的会员。在资方的操纵下，公司的工会在 2007 年与资方进行了集体谈判，签订了第一份集体协议。

2008 年，我们搞了一次长途跋涉，到首都去请愿，去市政厅抗议，当时阿罗约在场。工人抗议阿罗约连任舞弊，结果全部被抓，关押了 6 到 8 个小时。当时我们是找了合理的理由向工厂请假后去参加抗议的。记得几乎所有的日企都有工人去参加抗议。工人还到汽车销售点，向人们讲解工厂对他们的剥削。后来又去了劳动部，又一次被镇压。警察把我的腿打断了，那一天警察太暴力了，像禽兽一样。这事也揭露了跨国公司对工人有多么冷酷。

2009 年 9 月，国际劳工组织在菲律宾搞了次人权调查，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调查丰田。工会的事情被国际劳工组织曝光后，丰田的总裁就从日本来菲律宾的工厂视察。工人举行了示威，口号是“丰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毁灭者，是人权践踏者”。

2010 年的时候，丰田被美国整了一把，说丰田车有质量问题。工人趁机宣传说，丰田雇佣工人六个月就解雇，所以质量有问题。丰田是日本的经济支柱之一，几乎可以和日本政府等同了。其实从 2006 年 9 月开始，每年 9 月份我们都会搞反丰田的宣传攻势。国际劳工组织调查完后，就曾建议丰田接受五一工联的工会作为合法谈判代表。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得到了国内外的舆论支持。但是，2010 年 6 月，丰田的反应是先把我们工会的三个干部开除了。

当时工厂吩咐监工关停生产线，然后嫁祸给我们的工会干部，声称他们破坏生产，以此为由开除他们。资方连着搞了两次，但因为工人迅速合闸开线，他们的阴谋没有成功。

就劳动法来说，每过五年可以重新选举工会。我们开了个会，讨论工会副主席被解雇的问题。公司经常辱骂我们是共产党，是捣蛋分子，想把我们的干部开除。2011 年 5 月，原工会代表权到期，于是我们趁着

这个机会又搞了一次签名。但是公司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色恐怖，吓得工人不敢加入我们的工会。于是我们决定换一种办法，要有 25% 的签名，我自己也签了，但是公司说我们还是那些人。由于只剩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所以我们又输了一次。

2011 年 9 月搞了一次联合抗议，一边在日本，一边在菲律宾。我们跟日本工人一起抗议丰田。在马尼拉，也搞了抗议，还去了日本大使馆。

回来后，工会开了一个会，决定今后改变方法，从内部改造黄色工会。我们的设想是，加入以后，一步步地做工作，比原来更好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意识，然后逐渐在选举中夺取黄色工会的领导权。本田的工人活动分子就是在黄色工会内部活动，没有再另搞一个工会。我们有时候会利用菲律宾本田公司工会的例子来鼓励工人。但是本田工人的斗争有 20 年的历史了。我们的斗争时间还很短。

目前的另一个问题是：菲律宾的临时工没有权利组织工会，而现在正式工不敢加入工会。由于国内失业率高，有技术的工人，都出国去加拿大做外劳。



吉普尼协会情况

五一工联下属的“交通业、司机及业主协会”的秘书长给我们介绍了菲律宾的特色交通工具——吉普尼 (Jeepny)，及其行业协会的情况。这个在马尼拉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的，浑身上下涂得花花绿绿的大甲壳虫，这道外国游客眼中的风景线，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故事。

吉普尼小史

在菲律宾，公共交通一直是私人经营的，政府一般不提供相关服务，所以我们不把这种情况叫做“私有化”。轻轨（地铁）算是有政府背景，但也是半私有的。其他交通工具也都是私人所有。

最早的时候，在菲律宾，公路一类的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路上跑的大多还是马车。后来一种叫做吉普尼的交通工具成了城镇中随处可见的客运车辆，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侵略。战争给马尼拉带来了严重破坏。像前些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一样，当年的日本军队对这座城市也是先来一通狂轰滥炸。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开战，菲律宾又沦为战场，马尼拉再经浩劫。在日军的轰炸中幸存下来的东西，被美国人摧毁了。美国人这样搞，是为了让菲律宾一直依赖他们，而对美国的各类老板来说，城市重建是一大笔生意。战争结束后，美军留下很多装备，包括一些越野车和通用的运输车。因为把这些东西运回美国太贵了，不得已只好留下，但美国人却美其名曰：这是给菲律宾的援助。

菲律宾政府接收了这些汽车，然后公开拍卖。车主把汽车改装成现

在这种可以载人的吉普尼，开始做载客生意。一直到 1970 年代早期之前，这种吉普尼还只能乘坐 3 个人，烧汽油。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所以 80% 的车主都只能买一辆车。不久这些车主就开始组织起来，划分固定的运营路线，这些路线后来成为协会成立的基础。

此后的几十年中，吉普尼的车型和发动机都有改变。马科斯说汽油贵，柴油便宜，要把汽油机换成从日本引进的柴油机。工业化国家都有汽车报废年限，他们的报废车就弄到我们这里来。这些车在日本是垃圾，但是马科斯还是要进口。日本的柴油机个大，马力大，车身经过相应改造后，变得更长，有的车能乘坐 20 多个人。

有的吉普尼的司机就是车主，有的则是车主雇来开车的。协会既包括了车主，也包括了车主雇来开车的人，所以名叫“司机及业主联合会”。我们把车主划为小资产阶级，司机是半无产阶级（租车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成立工会，因为它更像一个行业协会，比工会低一个层次，建立在司机与业主的共同利益之上。车主们都拿出一些钱，合在一处，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

除了关乎各自利益的线路划分，车主们还会遇到其他问题，比如交警的敲诈，黑社会的敲诈，但当时大家的想法还是顺着他吧，谁也别得罪，否则会自找麻烦。

吉普尼协会和群众运动

1960 年代，车主们开始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协会和联合会是有区别的。以前的联合只是一条运营线路的联合。线路划分后，在某条线路上运营的车主们成立一个协会。现在的是全市的联合，更高级。1970 年代末出现了新的青年运动，塞松组织的民族青年协会去组织司机们。司机们对进步青年是非常欢迎的，尤其是在组织反对汽油价格高涨这件事情上。当时国际上石油价格上涨很快，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是固定汇率，2

比索换 1 美元，菲律宾的汽油价格也同步上涨。每升汽油每年涨 1 分钱。几乎所有的社会商品价格都跟着上涨。1970 年代初出现了高涨的群众运动，几乎每周都有示威游行。吉普尼司机也参与了运动。在一次吉普尼司机的示威行动中，有一个司机没参加，跑去拉客，结果他的车被其他司机烧掉了。别人罢运，他的生意就好了，其他人当然不干。这种事不多，罢工时只发生过这一次。

1970 年代初期，大部分吉普尼司机参与运动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吉普尼司机是租别人的车，司机自己要出油钱，汽油价格高了，司机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们对油价很敏感。但也有一部分司机有明显的政治诉求。马科斯政府采取了分化协会的措施，还找了一些协会干部，有的干部妥协了。汽油价格继续上升。后来整个吉普尼行业的联合会向政府妥协了，于是我们就分裂出来，组成了战斗性的组织。这些都发生在戒严法之前。到了戒严法实施后，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非法的，不能有工会联盟。

戒严后，很多人被捕。颁布法令的时候就已经列出了一份抓捕名单。政府还实行宵禁，晚 10 点到早 6 点。这段时间呆在户外就要被抓。

问：戒严令之前，协会有没有保护司机不受敲诈？

当然有，这也是成立协会的一个原因。但是有的司机出身的吉普尼协会的领导也和黑势力沆瀣一气。这些人对司机们说，只要我们每个月给钱，就不会骚扰我们了。在协会分裂之前就存在这种事情。而战斗性的协会都是好人，不和黑势力搅和，会保护司机。那些腐败的协会领导则从警察那里分成。

吉普尼司机犯点小错，警察就会故意刁难他，这时司机就要把钱夹在证件里给他。当时我们这个协会反对司机去贿赂警察。如果警察要抓，就让他开正式的罚款单，然后去投诉他们。有一个交通法庭，司机和警察可以去那里说理（仲裁）。仲裁有效吗？有效。连着三次都证明是交警的问题的话，要么是警察不懂法，要么是腐败，他们必须处理这个人。这个警察就要被派到别的街区去。

怎么对付流氓？最麻烦的是流氓和司机串通一气，就不好办了。如果是外面的流氓的话，我们可以对话。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因为在城市里，这些黑帮和政府有勾结。如果没有警察支持，那些黑帮是无法立足的。最难对付的是抢劫，车上乘客的钱、司机的钱都会被抢走，我们只能报警，但是警察不作为，听之任之。只能找更高一级的警察局去投诉。

一直到现在，80%的车主还是只有一辆车。部分车主有两辆，超过十辆的很少。车主车多的话就卖给司机——每个月交多少租金，以后这个车就归司机自己的了。因为自己有车也不会太赚钱，所以在吉普尼这个行业没有大规模经营运输的公司，都是个体户。想经营吉普尼运输，必须有运营证。现在政府规定吉普尼车辆的总数不可以变。以前一个许可证是几千比索，现在新增一条运营线的话，要核定是多少辆车；以前交了钱就行，现在政府要拍卖许可证，我们反对这样。

政府现在要限制吉普尼了。它要推广的，一是大出租车，一是电动车，要用天然气的。

为什么没有大巴士？菲律宾不生产巴士，都是进口零部件，自己组装。我们认为政府有意要用其他交通工具替代吉普尼，因为吉普尼协会的战斗性太强了。现在的公共交通工具中，包括轻轨和其他的交通工具，都没有工会，也很难组织工会。

菲律宾约有 24 万辆吉普尼和 48 万名吉普尼司机。我们的协会有 2 万名成员，不全是吉普尼司机，还有三轮车司机，各占一半左右。协会中没有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有个体户也有大公司。出租车大公司里也有工会，也是管得很严。

我们吉普尼协会组织的斗争分为多个层次。有时是在一个地方集会，向群众解释，争取支持。有时司机开车去游行，去石油公司门口示威。有时去总统府，抗议政府不作为。如果连续几个月油价上涨的话，我们会停止运营，一些学生也会加入抗议的队伍。

停运期间市民有没有抱怨？协会会对市民进行解释，而且市民对政

府也没有好感。停运期间，政府会给市民提供车辆。提供公共交通服务本来是政府的责任，他们不但不这样做，还拒绝控制油价上涨，这就很过分了。政府不控制油价，那我们就不提供交通服务。

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和平游行受到警察的骚扰，有人会被抓走。现在比较平静了。因为油价上涨影响了很多人，政府开始担心在油价问题上丧失民心。油价问题很重要。

个人经历与斗争

1973年我上大学。1978年离开大学。1970年代末的时候，整个社会还处在严密的控制下，学校内有一些组织，除了学术类社团，还有老乡会之类的社团，除此之外还有 ILPS，也是关注社会的组织。虽然有戒严法，但是在校内活动没关系，在校外就很难搞活动。被警察抓走还好办，知道被抓到哪里，可以和警察谈判，要求他们放人。但是被便衣抓走了就麻烦，不知道被带到哪里了，他们也不承认抓人。所以在校外搞活动很危险。即使在学校里面，也有很多便衣在监视。便衣主要是警察，但也有学生。有些学生拿到一些奖学金后，就帮着警察监视。大家都要小心说话。谈论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谈总统，不能谈戒严法。

1989年，我进了一家专门帮助司机的非政府机构工作，帮忙解救协会领袖。机构是教会背景的，有很复杂的结构。那一年，联合会的主席因为举行交通部门的罢工第二次被捕。我们忙着给他找律师，打官司。1994年左右我离开这家机构后，就到工会去工作了。马科斯戒严的时候，我就参与过非政府机构的活动，帮助进步学生，耽误了大学课程，导致毕业延期，最后没能拿到毕业证。

教会的人员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行动小组，他们会联系律师。第一步，先找到被捕的人，由专业律师去确定被捕的人是否安全（他们常常会遭到拷打）。在戒严法下，他们也有可能被送到军营里。第二步，质问政

府具体是以什么罪名抓他们，然后和政府谈判。还要考虑保释出来要花多少钱；帮助家人去探望他们；筹集保释金。但很多时候都不能保释，警察有时会把一颗子弹放在人犯口袋里，然后说是非法持械，就不能保释了。我们协会的主席被抓进去一次，一年半才允许保释，打官司，政府败诉。当时我们协会的主席和五一工联的主席一起在监狱里。被捕者的亲属组成代表团，去政府要求释放，这是1983年的事情。

这里说说我们参加过的具体斗争案例。

2005年，在某地区，我们组织一些吉普尼司机搞了一次抗议油价上涨的示威活动。有20名司机在吃午饭的时候被捕。我们去监狱，确认被捕的司机是否安全。他们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会，在监狱里过了一夜。我们找警察。警察说是上司让抓的，让我们去找他们的上司。我们找市里的最高领导谈，后来把他们放出来了。他们抓人就是为了破坏示威活动，而司机们本来也没有打算长期示威，所以第二天就放出来了。司机示威游行、组织行动不需要向谁申请，因为，一，司机从技术上讲不是工人；二，我们吉普尼行业在政府里找不到任何一个主管部门。

具体组织行动的时候，先得有一个议题，比如油价上涨（路线是固定的，问题主要是油价）。

说到抗议的效果，即使没有让油价立即下跌，也会对石油公司有压力，让他们不敢随便涨价。

我们当时设了几个集会中心，每个点是50~200人，除了2000司机之外，还有学生加入。好多人留在家，不参加集会但也不去开车。我



吉普尼协会抗议油价的游行

们把集会点设置在比较繁华的地方，也能监督别的司机。我们所做的，就是向市民解释原因，宣传我们的抗议目标，这也算是一种纠察线吧。

至于那些人呆在家里，是因为觉悟没那么高，又担心被警察伤害。这次行动就有一些人被捕。

我们的协会在采取行动之前，会争取其他协会及司机的支持。其他协会的司机说，我们的领导不会同意我们参加行动，但是如果我们不出车，他们也没办法。

吉普尼司机罢运的时候，三轮车司机就会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客人就多起来。我们不堵路，还会劝说三轮车司机不要漫天要价。马尼拉也有三轮车司机的协会和联合会，但是比较少。外省的三轮车司机的协会就比较多，有些地方组织得还很不错。在这些地区，只有三轮车司机搞罢运。

全国三轮车司机大约有 100 万。协会很多，按照线路来分，一条线路就有一个协会。三轮车把乘客从小路带到大路上，所以吉普尼和三轮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大巴士则是跨省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主一般就是司机自己。许可证由其运营路线所在街道的地方政府发放，谁能开都是有规定的。三轮车司机要给他们的协会交会费，否则就不能开车。这些会费本来是给会员作为福利的，比如医疗保险，但是很多都被贪污了。

组织与管理

吉普尼司机一天交 30 比索会费，几乎是收入的 10%。2 比索给总部；5 比索交给合作社一类的组织，需要时可取出；5 比索给协会的调度人员；还有 2 比索用于医疗；2 比索是给执照的续签费用，等等。司机生病的话，协会支付给本人 1000 比索。如果是司机的妻子生病，可得 600 比索。人死了的话，得丧葬费 5000 比索。会费中还有一部分用

于培训、教育和集会。交给老板六七百个比索。汽油费约 1500 比索。每天交一次会费，出车了就交 30 比索，不出车不交钱。

有的吉普尼司机一周出车三天，然后把机会让给其他人。有的车有两个司机，两班倒。

调度人员一般的工作就是收取会费，因为不知道司机什么时候来，所以往往要在线路上的某个地方站一天。

联合会和协会的关系：上层和基层的关系。协会和联合会都有章程，各层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基层的义务是交会费，上层对基层日常事务的管理无权干涉，除非下边协会的干部请我们协助，或者有会员投诉，要求我们出面干涉。

问：如果协会或联合会里某些干部有腐败现象，司机们除了联名投诉外，还有什么其他更直接的方式？

我们的协会和联合会是民主管理的。基层协会内部如果有意见，可以换领导。一般情况下，协会的领导不去收钱，收钱的事由专人负责，或者雇一个人去收会费。

不过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司机总是可以容忍很多不同的东西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机多么能忍。我们一天只收 5 比索会费，而有的黑社会收 40 比索，这样他们都能忍耐，所以我们收的会费远低于司机的承受能力。其他协会的会费很多都是黑社会拿走了。这些协会跟警察、地方官员有勾结，胡作非为。

有人说会费太高了。我们就分析一下原因。我们的会费要给几类人：地方警察，大马尼拉警察，社区的（街道），等等。我们也会想办法怎么降低负担。有时候司机被抓了，我们就去找警察交涉，告诉他们我们是交了钱的，如果还要抓人，那以后就不交钱了。

协会必须拿出很多钱给警察。司机们（因为搞活动）被警察抓进去的时候，甚至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会交保释金。这样我们就对会员进

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认识到他们其实是替政府执行社会责任（公共交通方面）。

我们也会劝那些司机，不要给那些人钱，口子开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要钱，但现实中还是有很多司机给他们钱。

菲律宾政府不管这些事情，政府借口说缺钱，只想着怎么制定收费的规章制度。政府把这些小业主当奶牛，榨取他们的血汗。

问：有没有什么时候司机们强大到足以组织起来对抗警察和黑社会？

小的组织，即协会，只能保护自己的线路。但是联合会的力量就会大一些。有一次，甚至有一个警察主动来给我们道歉，说是他有罚款指标要完成。

政府有各个层级，我们也要有各个层级的组织，我们有相应的等级和他们（政府）对抗。

协会和联合会刚成立的时候，组织力不够强，太依赖具体事件来团结了。有事发生的时候才团结。以前抗议游行的时候，来参加的司机就是我们的会员。2000年以后，建立了会员制，组织建设逐渐完善。各地的基层协会都要和联合会签订协议。以前都是口头的协议，现在都是书面的协议，还会做各种统计和记录。各省的情况，市镇的情况，街道的情况，都有记录。但是戒严时期我们非常谨慎，我们的日程都没有记下来。那个时候不能留下书面的东西。



标语意思：降价；加工资；等。

N 公司工会访谈

我们到场时，两个工会正在举行讨论会，约三四十人参加。讨论的内容是近期的两个行动。有人用他加禄语做报告，我们听不懂。我们在听众席刚坐下，就有人端来咖啡，过了一会儿又分发鸡肉粥。相比其他工会来讲，条件算不错的。N公司的日工资 605 比索，比当地最低工资 337 比索高出不少。

阿瑞是我们的第一个受访者。他 1998 进厂，做过车间代表，2004 年当选工会教育委员，2009 年当选 N 公司工会主席，成为该工会第三任主席。工会于 1982 年成立，1984 年开始有集体谈判，每年都能获得工资增长。今年是工会成立 30 周年，他们正在筹备纪念活动。

阿瑞谈 N 工会

N 公司前身是著名的 F 公司，在马尼拉附近。最早有三个部门：照明（台灯之类），半导体，视频（电视、DVD）。1996 年半导体部分搬到另外一个省，照明和视频部分迁去国外，马尼拉本地工厂则关闭了，工人全部解雇。公司主动提出给员工每年一个月的解散费。工会提出谈判，坚持要把工人转移到仍在生产的公司。但绝大多数工人接受了解散费。照明部门近千名工人转移到老公司。视频部门的工人全部接受了解散费。离职的年轻人尝试另找工作，不幸撞上 1997 年经济危机，工作难找。上了年纪的人拿到解散费，一般能做点小生意。到了 60 岁退休，也可以享受退休金。菲律宾的政策是，不论男女工人，只要缴费满 10 年，到 60 岁退休，就可以领取养老金。

到 2006 年，公司共有 3100 名工人，其中 2600 名是工会会员，10 ~

20%为合同工。美资私募基金摩根斯丹利买下 F 公司半导体部门的 81% 股权，成为 F 公司最大的股东。公司改名 N，工会亦改名为 N 公司工人工会。

公司被收购后，推出了一个退休和返聘方案 (Retired and Rehired Program)，即所有人员全部辞退再返聘，工人只能拿每年一个月的补偿，返聘后只能拿最低工资。这样一来，1984 至今争得的待遇就会被一棒打回最低工资标准。工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之前 X 厂实施过这样的方案，结果工会干部则统统被清除，没有返聘；另一个厂实施了返聘方案后，立即宣布关厂，迁往别处去了。资方通过解雇工会干部，或建立黄色工会，彻底打散原来的工会组织。

由于工会的坚决反对，第一个方案搁浅了。后来公司又声称要“瘦身”（减员增效），解雇了全体派遣工，并且推出第二个方案：自愿辞职方案 (Management Decide Separation Program)，主要针对有 15 年以上工龄的长期雇佣的工人。辞职者可获 2.2 倍赔偿。从经济上来说，这比之前的方案好得多，工人可以自愿选择拿钱走人还是留下。按照菲律宾的法律规定，这种自愿辞职方案，赔偿金是月平均工资 × 工龄。N 公司条件开得很好，不仅多付 1.2 倍，还扩展 3 年的医疗保险。年龄大的工人容易动心。在这个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很多老工人辞职了。

但年轻工人和一部分老工人没有接受。年轻的工人工龄短，钱少，不划算。接受了补偿就没了工作，找工作又很困难。18 ~ 27 岁是找工作的黄金年龄，超过就不好找。这个方案起先只对 15 年以上工龄的工人开放，有 300 人离职。到 2008 年，因为没有达到减员目标，这个方案扩展到所有人了。于是有 200 名工人主动离职。他们都是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在外面找到工作；还有一些人身体有病。他们是自愿解除劳动关系的，没有资格再回去。

我们试图说服这些工人不要接受这个方案。我们解释说，这个方案是为了工厂“减员增效”，减少劳动力成本。但劝说无效。很多年轻人

接受这些条件时，并没有意识到后果。例如这些钱用不了几年；做小生意的话，钱可能不够；经济危机之下工作难找，出国也不容易找到同样的工作。当时工会印发小册子来做宣传、教育。其他员工之所以没有接受这个方案，原因可能是：受到工会宣传教育的启发，知道这个方案是糖衣炮弹，为了减员才开出这个高价，但是离职者拿到的钱不能够长期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继续留在工厂，通过集体谈判协议每年工资都可以增长。

2006 年，工会 15 个干部中有 9 人接受了自动离职项目。他们大多已过 50 岁，在工厂工作了 20 年以上。这 9 个工会干部辞职后，其中 3 人马上领取了补偿金，另外 6 人并没有离开工会，他们 2009 年才拿到钱。保留工会干部职位还会有补贴。他们可能跟厂方管理层有私下的谈判。我们发现工会的妥协趋势后，就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方式进行活动，把老干部踢下去。早年这些工会老干部是很有战斗性的，工会主席做了 28 年，后来有点倾向资方了。2004 年换届选举，一些人想去竞选工会干部，以此给工会内部换血，让老干部下去，新干部上来。我当时支持老干部，还当选为教育委员。

全职工会干部可以停薪留职，他们的补贴，按集体谈判协议由工厂支付。工资是基本工资，当时的工会主席约 900 比索 天（她工龄 28 年，每年工资都有增长）。交通、通讯补助没有限制，通过会费支付。每个月管理层直接从工资中扣除会费，打到工会的账户。补助是由工会支付的。这一届新工会对补助的数额做了限制。

9 名老干部接受辞职项目后，2008 年换届选举，老的工会主席继续当选。管理层同意他们再干三年，以培养新干部。但他们没尽到这个义务，这导致了 2009 年公司拒绝执行集体谈判协议中增长工资的条款。这一年，工会内部重新选举工会主席，踢掉了 8 名老领导，只剩下一名在新的领导层帮助培训。

2006 年推出的辞职方案，使得员工的人数减少了。2006 ~ 2009 年已

没有临时工。工人总数只剩下 1/3。2007 年，公司把一部分业务外包给某电子厂，员工人数进一步减少。那家外包厂没有工会。N 公司还有 1700 名正式员工；400 名合同工（一般只工作五个月，如果公司需要增加雇员，有机会成为正式工）；以及 200 名派遣工（一般工作一两年，没机会转正）。工会会员计 1500 人。工会会对合同工和派遣工的数量进行监控。合同工、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工作不一样，有的工作必须由正式工来做。

工会现在尝试把合同工也组织起来，并且力求把他们也包括在集体谈判协议中。工会提出两项要求，1、所有人都享有所有福利（包括管理层、技术员、正式工和合同工）；2、临时工比例不能高于 10%。工厂不同意，但答应把合同工逐步转正。合同工跟派遣工做的事情一样，但派遣工的工作条件更差，拿钱更少。

2009 年公司削减管理者和部分经理的福利，如教育、医疗、交通补助等。公司想把每一个等级划得一清二楚，不同层级的工资、福利待遇都不一样。这使管理者和经理跟工人感同身受，能够跟工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去要求提高福利了。为此，公司又使出了如下手段：1、分化——2009 年提出给所有雇员加工资，后来公司分化工人，只给一个部门的管理者加工资，用金钱收买其他管理者；2、劝说，即声称“我们公司要在全球竞争，必须提高生产效率”；3、威胁：“你们要这样，再过几年我们就迁到中国去”。

线长及以上都算管理者。线长下面有自我管理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从工会会员中选出来的，其职责是保持生产进度。

N 公司层级结构

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不加入工会。我们工会试图联合他们，但不接受管理层入会，只是和少数经理保持良好的关系。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经理、工程师，下面又有自己的管理干部。线长不干活，生产很繁忙的时

候才帮下忙。组长就是操作工。

一般来说管理者和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大。管理者新入职时，月工资约 21000 比索，工人如果达到 20 年左右工龄，工资才有可能高过刚进来的管理者。教育程度方面，管理者都是大学毕业；工人当中，大学毕业的也多，最低学历是 2 年职业教育。



B 大姐的介绍

工厂之前在马尼拉，1997 年迁到这个出口加工区。这里实行“无工会，无罢工”政策，但我们成功地坚持把工会保存下来了。工业区里大约有 50 家工厂，有五家工厂的工会跟 N 厂的一样强大。但组织新的工会很困难，组织集体行动也很难，我们也只能在工厂内组织集体活动。

1980 年，最低工资是一天 9 比索，那时很多工厂的工资都是 2 比索、4~5 比索。1983 工会成立，开始跟资方谈判协议，工资比其它工厂略高一些。根据劳资谈判协议，1983~1985 年，连续三年涨工资，从 9 比索增加到 12 比索，平均每年增长 10%。1986 年，劳资谈判陷入僵局，那年马科斯倒台，接着是阿基诺时代。1987~1989 年连续三年全厂罢工，但工资增长很少。每次全厂罢工，工资就增加 10 比索，第三年只增加 5 比索，三年总共增加 25 比索。1989 年，管理层说政府制定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办法，开始由各地区自行制定最低工资。这个做法使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工资拿得最低的那部分人（而不是各地区工人的联合与斗争）。那时候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当道，正式工关注的是如何成立真正的工会。

工厂是 1982 年建的。因为刚开厂，当时招了很多高中毕业生，都很年轻。我是 1983 年入厂。年轻工人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别的事很

少关心。附近的工厂不多，隔得比较远，其它地区的厂有罢工。我们工厂到了1986年才发生全厂罢工。

1986年4月19日早上，N公司罢工了。我住得离工厂很近，看到有工人聚集在公司门口，敲锣打鼓、举牌子，煞是热闹。第一个班有400人参加了罢工。当时厂里正在进行劳资谈判，谈了六个月，一直谈不下来。工会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执行主席）同意罢工，另一派（主席）想继续谈判。工人们突然发起罢工，让工会主席很吃惊：“我们还在谈判呢，你们就罢工了。”但面对既成事实，工会主席只好加入罢工，“我们继续罢工吧，虽然这样不好”。罢工坚持了大约2周。工厂里一千多工人，绝大多数是支持罢工的。这期间，企业开出了一个名单，要辞退罢工的工人。工会据理力争，工厂没有得逞。资方还向工人及家属发出通知，威胁要开除工人，称谁谁谁被解雇了。后来资方在签署协议的时候收回了之前的话，可能是因为劳工部承认我们是合法斗争。

罢工期间，工人夜里就睡在纠察线上，蚊子很多。我们把路堵了大约四天。厂方试图从外面招进些工人，但罢工者把厂门锁了，厂方只好作罢。厂方也收买罢工者，说回去工作的话，可以提供食物、给好处。有15~20人被说动，进厂继续生产。罢工者知道了，说要锁上大门，但他们还是进去了。头两天他们还能工作，但管理者一走，他们就没办法继续生产，在里面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内衣内裤洗了都晾在里面，只能把厂服直接套在身上。他们跟工厂后面的社区联系，索取食物。几天后他们被迫离开了工厂。罢工工人还用鲜花欢送他们，而没有责备他们。

两周后，集体谈判协议达成了。那位工会主席后来留在工会里，继续从事会员教育工作，教育基本的工会权利，真正的工会是什么样的，等等。那时我们工会隶属于五一工联。



IBM——工人团结之光工会

IBM 是他加禄语“工人团结之光”（Ilaw at Buklod ng Manggagawa，直译：光和工人的团结）的缩写。它下属的成员工会所在的公司是菲律宾本土资本中最大的食品、饮料及包装上市公司——生力集团。该公司成立于1890年，一度是菲律宾唯一的跨国公司。作为少数几个实力雄厚的菲律宾资本之一，它大打捍卫菲律宾民族资本的招牌，来维护老板利益。但老板是没有国界的，不管是国外资本家还是本地资本家，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各国工人共同创造的。老板也不会因为雇佣的是本国工人而把压榨的力度减轻一些。

IBM 的工会主席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把资方工会转变为战斗性工会之后，为工人争取实际利益的过程。

IBM 成立于1966年。此后一直到1986年，它隶属于菲律宾工会大会。1986年以后，IBM 加入五一工联。

我1984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很长时间是做临时工，卖过保险。1988年我有两个哥哥在集团的养殖场里，介绍我进去，才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那里负责发薪水（可能类似出纳）。我们那个分厂最后有250名工人加入IBM工会（上级工会有1200工人，再上级共有26000人）。

进厂的时候，我没有加入当时属于菲律宾工会大会的厂内工会。那个时候，每次工会开会，都有管理层在场，不会对工人讲什么。工会和资方的集体谈判，只开两次会就结束了。谈判的结果是，三年内工人日工资一共只增加34比索。工人也很害怕资方，见老板来了，没活干也要赶快找活干。

工会里的一些领导想把资方工会转变成战斗性工会。通过平常的接

触后，他们找我谈话，了解到我学生时代就是积极分子，便让我加入工会。从 1989 年开始，我成了工会副主席。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们把工会转变为战斗性工会。之前的资方工会干部或是退出，或是留下。这期间，我们对工人做了很多教育工作。通过教育，工人胆子大了，见了老板还会主动打招呼，站起来背着手问：“嘿，有什么事吗？”

我们的工会成立后，1990 年开始同厂方集体谈判，主要要求就是大幅提高工资。三年内日工资涨 150 比索。我们提出的加薪要求，一是根据农场的收入情况，二是根据整个行业的情况。因为我们是个大公司，利润丰厚，所以只要公司愿意支付，就付得起。

但是整个谈判并不轻松，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中间采取了各种斗争方法向资方施压——静坐抗议，怠工，罢工。静坐抗议是这样的，先经过工会内部的民主讨论，决定静坐。到了上班的时候，把猪喂了以后，本来应该去做别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干活了，而是聚到一起开会，或者学习。有时候管理会在外边听，他们就会知道工人不满。有些管理同情工人，也会支持这样做。农场内的静坐，天天都可以搞。在农场外静坐或抗议，就需要请假，或是在休息时间。静坐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我们场内有用于生产中联系工人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要进行集体行动的时候，操作员就在无线电设备房内彼此联系，然后告诉其他工人。管理层不会知道谈话内容。

所谓怠工，比如说，一般早上 8 点要喂猪，工人拖到 11 点，或者有时候拒绝加班。

至于罢工，就是组织工人在圣周期间不上班。管理层十分生气，因为家畜每天都要喂养饲料，所以工人通常也是不休息的。罢工后，管理者问工



▲ 上图标语文字：
抵制加班（Boycot Overtime）

人为什么不上班。大家一致回答：因为圣周，耶稣死了，我们必须纪念，所以不去工作。本来假期有好几天，我们可以罢工更久的。管理层很快同意了要求，所以只罢工了两天。罢工的时候，场里没有找工贼接班，而是安排经理、文员、保安那些人扛着饲料去喂猪喂牛。

制造业的工厂工人，工作时没有空闲时间。我们养殖场不同，只有四到五个小时比较忙，其它时间可以休息，或在场内的免费空地上种菜。有一些工人住在养殖场里边。厂方甚至提供拖拉机给他们耕地。厂方还会组织劳动竞赛（种菜）。之所以让他们种菜，只是为了补偿他们太低的工资而已。养殖场有很多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但管理者一般是大学生，对农活并不了解，比如怎样给猪进行人工受孕等等。

2000 年那次集体谈判，我们组织了一场为期 7 天的罢工。一般罢工期间是没有工资的，但我们在谈判中跟厂方达成协议，因为谈判期间母猪仍需要喂养，所以我们要求厂方支付一天工资，然后工人去喂猪。罢工期间支付工资在菲律宾是很少见的。

2003 年的集体谈判，持续了几乎一年。在谈判中，我们向劳动部备案，要进行罢工。劳动部提出要审查罢工的合理性，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两次谈判，要求涨工资。管理层借口说在审查时期工会谈判是怠工行为，于是把工会的所有 17 个干部解雇了。我们认为这次我们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我们的工会比较强大，但没有想到资方会向劳动部申请审查工会罢工的合法性。

17 人被非法解雇后，先去劳动部上诉，输了，再上诉，又输了。不过有 7 个人胜诉。但是资方拒绝支付这 7 个人的工资。他们又上诉到最高法院，结果只有 3 个人胜诉。我认为这样的判决结果是为了把我们不断分化，削弱我们的力量。前前后后，上诉了将近 10 年。总公司想利用这种手段把我们工会完全清除掉。

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座谈

菲律宾农业、农民现状

在菲律宾的经济中，农业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全国有一千万公顷土地，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稻子，此外是养鸡和其它家禽、养鱼，还有森林，矿产。2006年，全国37%的劳动力从事打猎养鱼。

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土地。70%的农民耕种的土地不是自己的。绝大多数土地控制在大地主和一些农业资本家手上。全国75%的土地归50家地主所有，其中最大的地主（总统家族）拥有全国20%的土地。现任总统的叔叔，或是搞合作租赁，或是合同种植，使出了浑身解数来阻止和规避土改。

在菲律宾的主要社会矛盾中，土地问题是举足轻重的。土地改革不仅是农民的要求，也是农业工人的要求。政府想通过土改来缓和矛盾，但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的代表，它又用各种手段避免把土地分给农民。比如，名义上给农民股份权，但是种什么，怎么种，都是地主说了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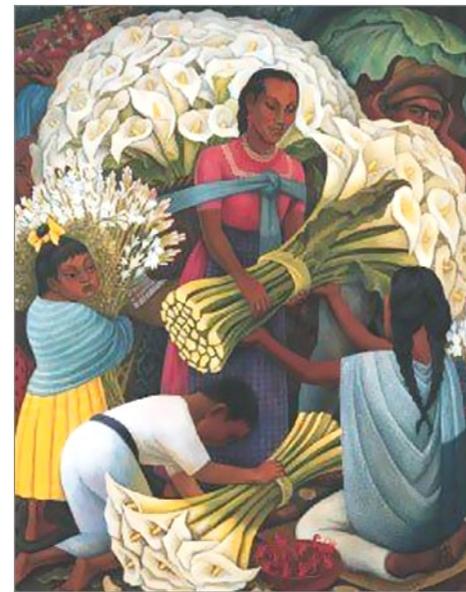
因为贫穷，生活艰难，某大庄园在2004年11月4日举行罢工，蔗糖厂都停工了。当时庄园里有农业工人6千人，蔗糖厂工人200人。罢工是三个组织联合搞的，一个是五一工联下属的蔗糖厂的协会，另外两个是庄园工人协会，其中一个隶属于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以下简称“菲农运”）。罢工时五一工联、菲农运、新爱国联盟都支持他们。其中一个庄园工人协会有600成员，准备了好长时间，2003年就开始讨论过罢工，要求停止股份制，将土地平分。2004年蔗糖厂11个工人被炒鱿鱼。工人要求让他们复工，还要求停止欺骗性的股份制改革，实行真正的土改。

农业工人在支持糖厂工人斗争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要求，即平分土地，自己决定种什么。结果16日那天发生了大屠杀，不仅震惊菲律宾，也震惊了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个地区的土改问题，反映了全国性的问题。

菲律宾农业工人全都受着大地主控制，工资非常低。如果各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151~212比索，那么全国农业工人平均起来只能得到20~30比索。工资不是从地主那里领的，而是由工头来给。还有大量的季节性工人，雇主不提供住房，只能自己搭个棚屋。

农产品的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地租昂贵。一个调查显示，每一公顷土地上花费的化肥、机器用油等等需要15000比索。有些地方，佃农户占农民的三分之一，有些地方是四分之一。这些租地农民要将收成的75%交给地主，还有很多惨无人道的规定。种粮食的小农可以吃种植的庄稼，但是种植菠萝、椰子这些经济作物却不能当饭吃。

菲律宾农业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技术落后，零碎小块的土地多，基本上没有灌溉，靠天吃饭。椰子的价格非常低，收购的商人也是奸商，经常不够秤。椰子的水分如超过14%，价格会被压得很低。椰农也要把三分之二的收成贡献给地主。



土改

为了规避土改，很多地主改变了土地用途，由种粮改为种植经济作物。政府最新的土改措施，就是在 2009 年通过一项新法律，要在三十年内让农民把土地买下来。今年是土地改革法实施三周年。

土地改革从马科斯时期就搞起了，但至今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土地。1988 年土地改革所包括的土地是一千万公顷，但是每年供土改的土地越来越少，后来变为六百万公顷。这几年成功分给农民的有四百万公顷，还有二百万公顷的土地没有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是政府的土地，不是地主的土地，真正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很少。2009 年的新法说要地主拿出 130 万公顷的土地给农民，当地每个农民能分到三公顷土地。说是“分”，其实是政府按照 15% 的利息，以按揭 30 年的方式卖给农民的。农民要分期付款，利息付给土地银行，银行交给地主，或者农民直接给地主。在还清按揭之前，土地还是地主的，农民和地主关系毫无变化，照样要给地主交租。付给银行的按揭款是有收据的，农民交地租有时则没有收据。地主可以钻空子倒打一耙，向法庭起诉你没有交租金。为此好多农民还在打官司。政府说还有 130 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于土改，同时又给商业资本家 140 万公顷土地——其中 110 万公顷是本来要用于土改的土地。总统去日本招商引资时，宣布土地归日本资本家使用。那家跨国公司在土地上种植甘蔗，做生物油项目。这些土地原本属于政府公地，土改时农民已开始交钱，很快就要归农民自己了，却被政府宣布作废，要给跨国公司，农民的钱也白交了。去年六月，新人民军把那家跨国公司的大卡车烧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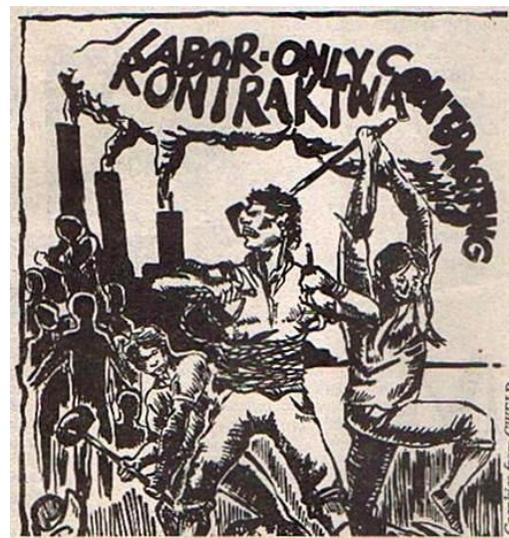
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拨款，由 1997 年的 1.7% 降到 2007 年的 0.7%。粮食补贴本来就少，又全进了贪官口袋。补贴主要是通过种子，对大米的补助是每一公顷 151 比索。从机械化水平来看，每一千公顷有 102 辆拖拉机、6 台收割机。相比之下，泰国是 1130 辆拖拉机，370 台收割机；

越南是 1689 辆拖拉机，收割机将近 3000 台。菲律宾只有 25% 的稻田水利化，泰国则达到 96%。WTO 要求自由化，市场化，取消补贴。菲律宾政府本来就对农业不作为，加入 WTO 之后，生产粮食没有补助了，同时放宽进口，大量美国廉价农产品涌入，打击了本国农业，导致粮食产量一直下降。2008 年发生了一场大米危机，大米全部进口，农民呢，仍然得不到利益。真正的土地改革是农民自己进行的，新人民军也在很多地方为农民争取土地，政府搞的土改都有名无实。

农民自发的斗争到处都有。1981 年，农民成立要求减税（椰子税）的组织，这是菲农运的前身。当时各地区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进而形成农民联合组织。1985 年成立的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的宗旨是：要求土地改革、保护农民的人权。我们有 15 个地区，65 个分支，要求无偿分给农民土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产品深加工、工业化、国家服务。

村里的农民组织起来了

我是椰子农的儿子。我家租了亲戚的三公顷地种椰子树，还有半公顷稻田，2/3 的收成要交租。那地是我亲戚在马科斯搞土改时弄到的。椰子每 45 天收获一次，一年四季都需要工作。收获干果，水分不能超过 45%，所以要在太阳下晒好长



时间。烘干则需 4~6 个小时。干了就拣出来，切成小块，装进袋子，卖给来村子收购的人。这些小商贩用水牛车把东西拉走。菲律宾有 330 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种椰子，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椰子树全身都是宝，叶子可以搭棚，椰子水可以药用，还可以做椰子油。

由于学生运动高涨，马科斯就把青年组织起来对付它，台面上的说法是为了避免青年吸毒、赌博、反社会行为。这些官方组织经常宣传：新爱国联盟、五一工联、菲农运都是恐怖组织、共产党，你们要小心，他们是共产党人，专门组织学生闹事。官方青年组织和新爱国联盟的青年，互相渗透。我当时是年轻人，也有加入官方组织，参加文化活动。

1981 年，有青年学生来我们地区帮助组织农会。我就是那时变成组织者的。他们搞组织的方法跟组织工人很相似，先做农村社会调查。由于奸细多，有的组织者就死在村里了。组织农民需要一对一，一个地区有少数几个农民认同你的目标，就可以了；需要秘密地工作，人多了就可以公开；需要防暗杀，防地主的狗腿子。组织形式跟工人很相似，只是纲领不一样。在工厂里，需要超过一定比例的工人投票才能赢得代表权。在农村，利益相同的人走到一起，就可以成立村支部、乡支部。

到我们村搞组织工作的年轻人属于新爱国联盟，头一次见面就给了我一本《菲律宾社会与革命》¹⁴，还表示自己是组织者。我和他聊了一些问题，觉得那人比较直爽。一读那书，发现里面讲的跟在学校里学的大不相同。跟好多人一样，看完这本书，我被革命化了。

先是组织进步青年。三个月之后，有游击队员前来，腰里别着枪，跟我们谈更高一层的斗争方法。第一批组织者已经在村里调查过，分析好了形势，游击队员过来再进一步组织我们。原来那个青年组织者继续往别的村子去。这时我们开始组织椰子户。因为是本村人，知道谁信得过，通过家访来提高农民觉悟。然后跟其他村子搞串联，慢慢把他们也

¹⁴ 菲律宾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赛松的著作。

组织起来。每个村一百来户人家，一个乡上千户人家。六个月内，三四个村就成立了小组，头一个是十五家，另一个也有十五家。接着就可以成立乡组织，搞协会，可以讨论很多问题。比如有人偷你家的椰子，有协会，比较强大，小偷就会害怕。我们每周开会，谈家里、村里的问题，讨论生产。第二步就开始组织学习。

组织是一步一步的，从第一个人开始，组织几个人，成立小组之后，把小组里进步的人派去别的村组织，这样越来越大。每个小组的先进分子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怎么加强农村的青年、妇女运动，并成立了青年小组、村民小组、妇女小组。其中的优秀分子有的去参加人民军，有的参加培训，学习毛泽东思想。先是速成班，高级班，最后进一步深造，成为党员，就是中心了。这些教育都是入党之前的核心教育。从群众里面筛选，提高他们的觉悟，最后吸收到党组织里来。每个人经过各个阶段都有一个名单。每个成员什么程度，经过什么培训，都有记录。

青年们在组织起来以前，多数是消极的，喝酒赌博都有，也不明显反对马科斯。组织起来之后，觉悟提高了，开始改变了。农村基本都是信教的，老人总吓唬青年说有鬼，后来青年组织起来之后就不怕有鬼了。我 24 岁第一次见到组织者前，已经听说了农民运动，农民会请求政府、教会主持公道。农民已经有了一些斗争的历史，都是组织起来的。

要求取消椰子税的斗争

1973 年政府开征椰子税，一百公斤的椰子粉收 0.5 比索的税，三年后涨到 15 比索。我们把椰子农联合起来，组织了 5~10 个小组，又组成了支部。有四个支部可以成立市级支部，三个市级支部可以成立省级支部。各级领导都要经过培训，学习怎么建立统一战线，同时继续发展联络网。组织运动以前，要把提纲先写出来，用它来联合本地区的人。

建立联合会以后，再吸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成立各个委员会、动员小组、宣传小组、联合阵线小组、财务和运筹小组等，还有把运动落实的小组。比如，运动委员会打算开一个讨论会，那么最后落实小组要把谁发言之类的具体事项落实，包括发言人要着重谈什么方面的内容。维持秩序小组：不管是农民起来占领土地，还是大的游行，都需要这些组织。还有一个谈判委员会，比如警察不让你游行集会，要有人出面谈判。

那次要求取消椰子税的运动，整个地区都参加了。有一个主要会场，各个地方都派代表去会场集会。先在各省游行集会，然后再派代表到一个主会场集会，有上千人。只要跟椰子有关的人都去游行了。最后，政府妥协了，于1983年取消了这个税。



矿区工人的斗争

在矿区，我们遇到了很多工会干部。矿区工人的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每个人也都经历了很多。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了解一些大概信息，以及尽量挖掘矿区工人组织工作的一般特点。矿区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招待，感谢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们！

唐尼——我们一下车，来接我们的就是他。他瘦瘦小小，有点像国内的南方人。比起另一个干部“土匪”来，他很健谈，关于矿山的基本情况都是他介绍的，我们访谈的对象也由他来安排。唐尼思路清晰，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很灵活。他经常摆弄那个在他们办事处的收音机，那里面时刻在放送着新闻。可别小看了不起眼的收音机，这可是他们跟外界联系的重要工具。闲聊时，得知他的大脑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每天要靠酒精麻醉才能入睡，而且只能睡四个小时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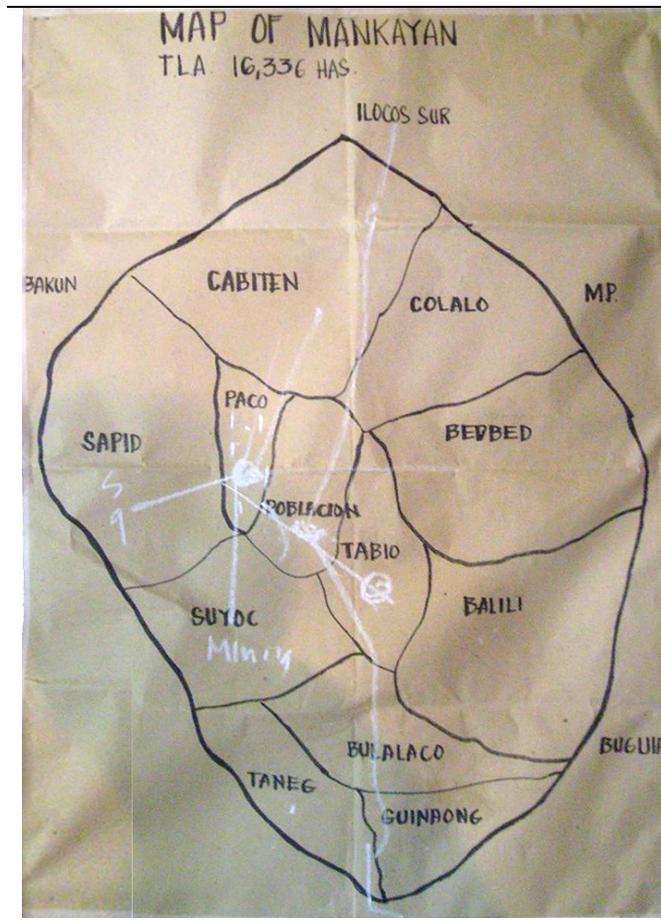
唐尼的爸爸是矿工。他很小就知道矿山的事情，对那些矿山主痛恨至极。在大学的时候，他参加游击队，后来成为全职矿工组织者。这么多年里，无论是过去的斗争，还是现在的困难，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去面对。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

“土匪”——第一次见到他，中年男人的壮，穿着发白的毛绒外套，中分头，长着两撇小胡子，脸上还有一颗痣，驼着背，走路大摇大摆的，这不是典型的土匪形象吗？

土匪话不多，看上去有点忧郁，感觉不是太好相处。正因为如此吧，我从见到他，就对他特别好奇，想了解他，想知道这么一个感觉上拒人千里之外的人，是怎么做组织工作的。在访谈过程中，他一直在嚼槟榔，嚼得嘴唇红红的，好像喝过血一样；回答我们的

问题时，也很随意，甚至有点心不在焉。访谈时他跟另一个矿工抢槟榔吃，我不仅没有觉得他对我们有点冷，反而觉得这时的他很像一个孩子了。

土匪 2002 年成为全职组织者，和当矿工的时候相比，工资非常的少。也许这是没办法的事。自从加入工会，领导了两次罢工之后，他就上了黑名单，甚至连他儿子都被列入了黑名单。访谈时他说，失业时是他人生中最低落的时候。



山脉区 (Cordillera) 的金、银、铜的储量居全国之首，以前有七家矿业公司，目前剩下三家。

一、1949~1972 年 自发工人运动

这一时期工人没有组织，但有自发斗争。后来受到 CLO 的启发，想建立工会，但尚无具体的行动。

1948 年本格特公司的巴拉托克矿井 (Benquet Balatoc Mine) 发生了第一次罢工。罢工后，工人成立了 BBWU 工会。公司不予承认。工人再次罢工。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了 LCWC (Lepanto Civic Wilfou Club) 互助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工会，也组织罢工。BBWU 和 LCWC 都是罢工后产生的。1957 年该地区出现了第三个工会，在 Suyoc 建立，接着 1959 年在 Philex 也建立了工会。他们是受到 CLO (Congress Labor Organization) 的启发。CLO 是早期建立的一个战斗性工会组织，戒严时期消失。当时还没有 CLO 的组织者来到这个地区，工人通过新闻获知这些消息，知道他们在争取工人的经济、政治权利。

因为担心自发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和资本家于是联手压制工人。他们用一些法律来调教会，引导它们“依法”维权，比如建立 ALEC (Asia Labor Education Center, 亚洲劳工教育中心) 教育工人要和资本家友好相处，防止出现战斗性工会。这一时期，自发性工会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ALEC 则教导他们不要考虑政治要求，关注经济要求就够了。当时工人斗争中所提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承认工会”。这是因为当时工会还没有被承认。一旦被承认，工人就开始提出增加工资和福利的要求。

为什么政治诉求 (组建工会) 比经济诉求 (加工资) 更重要? 菲宪法规定，公民有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工会才有权跟资方谈判，为工人主张权利。没有工会就没有办法进行组织、谈判。一盘散沙的工人也不可能要求任何经济权利。菲律宾的失业率如此之高，工厂会迅速从外面招人来顶替罢工者，到最后，工人的经济要求也很难实现。有组织、能行使政治权利的时候，才有实现经济权利的手段。

ALEC 就像驯狗一样教育工会领导，资方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想通过这种方法把局面扭转过来，防止工人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解决劳资问题。他们培养工会干部的目的在于控制工会，后来也的确控制了工会。他们给工会领导者提供职位、金钱，把他们变成黄色工会的领袖，使工会不罢工。政府还组成了劳资关系法庭（NLRC, Court of Industrial Relation），把所有的劳资问题都引向法律渠道，也就是说，所有的劳资问题都要通过谈判或诉诸法律程序来解决。当时出现了很多工人官僚。还有很多专打劳资官司的律师，他们一边跟工人谈，一边跟资本家谈，两头捞好处。

尽管有一些工会变成了与资方合作的黄色工会，工人的斗争仍然在继续。Philex 和 Soyoc 出现了黄色工会，其他工人仍坚持要求自己的权利，1963 年 BBWU 举行了一场 3 个月的、以工资和其它福利为目标的罢工，结果胜利了。

1963 ~ 1972 年，学生开始积极地参与工人运动，和工人建立联系。他们还组织了山脉区（Cordillera）黄色出租车公司司机的罢工，帮助他们提高工资。其中很多学生是本地区矿工的子女。1972 年 9 月马科斯宣布戒严，所有组织都被取缔，学生活动也停止了。所有的工人斗争也都停止了，因为工会被禁止。

这个时期参与斗争的学生主要来自碧瑶市（Baguio），是组织起来的自愿者。在学校里他们就组织好了，然后前往矿山地区。戒严时期，工作仍然在继续，但转入地下。很多人去了乡下、农村地区掩藏，也处于地下状态。

1978 年，工人在躁动不安，秘密地进行组织，来反抗马科斯的禁令。那时候工人工资仍然维持在 80 比索一天，工作环境更趋恶劣了。工资停步不前，物价却持续上涨。工人搞过怠工。矿方一旦发现，就会强迫工人提高生产率，给矿工们规定更高的额定产量：例如平时每天生产 100 吨矿石，矿方要他们生产 300 吨。工人做不出来，就会被解雇。

各地的斗争彼此孤立，但存在相互的影响。某个地方的成功的斗争，会增强其他地方的工人的信心：我们也可以做到。戒严时期，连黄色工会都停止活动了。工人权益受到侵害后，黄色工会无所作为，这就促使工人自己成立工会来取而代之。

概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兴起——政府压制——戒严禁止

工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首先，同一个公司的工人都住在宿舍，互相沟通交流很方便。其次，有一些不同的矿业公司，安排的宿舍彼此靠得很近。最后，工人宿舍位于社区，分布在不同的矿周围。组织者不仅组织矿工，还组织社区居民和农民。

工人的声音又如何传播出去？有媒体、电台，会公开报导。这使工人产生了如何组织工会的初步想法。在自发阶段，站出来的是普通工人。斗争中，通常有 95% 的工人能够组织起来去争取他们的利益。要是人数少了，就无法成功地组织工会。

二、1972 ~ 1981 重大的突破

1978 年，本格特公司（Benguet corporation）BCI 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了为期三天的罢工。导火线是资方安装金属检测仪，用以检查工人有无偷带矿石。那时因为工资很低，一个矿工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挺不容易。偶尔会有人带一些矿石出去卖。公司安装检测仪，自然会影响这些人的收入。而对其他工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侵犯。妇女反对得最为厉害，说资方这样对待她们的丈夫（金属检测），会导致他们没法生孩子。担心金属检测影响生育的想法逐渐扩散、加强。三个月后，矿工和妻子团结起来罢工了。有一些教会组织也参加进来，和妇女一起斗争。所有的工人组织都被视为非法，教会却可以合法活动，帮助工人组织、教育，给他们提供物质帮助（食物之类）。

这是一个大突破。马科斯时期没有工会就没有罢工，但这次罢工打破了这个规矩。当罢工已是既成事实之后，工人就不再害怕戒严了，还可以进而展开其它斗争。罢工中，人们意识到，如果能够阻止公司安装检测仪，为什么不能够组织一个工会？原来的黄色工会 NAMA WU 在戒严时期也被禁止了，在事件中没有任何行动。这也促使工人想到：不如自己来建立一个工会。

1979 年 12 月 29 日，工人们正式成立了工会 BTMB，并与黄色工会 NAMA WU 竞争，在换届选举中取得了胜利。1981 年开始了第一次集体谈判，要求提高工资。老板不同意。大约 6000 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山脉区（Cordillera）戒严时期的第一场罢工，所有的工人都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

三、1981 ~ 1985 巩固和扩张

1、Philex 黄色工会。一名来自全国工会联盟（NAFLU）的组织者试图影响黄色工会的领袖，使之转换方向，但管理层很警觉，控制很严，最后组织者被抓，并且赶出，不许再进入 Philex 的地盘。保安对工人也严加管控。受到压制的工人不敢组织工会，需要有人鼓舞士气，而组织者遭驱逐，令他们更加担心。黄色工会则继续存在。

2、Lepono。黄色工会当道。组织者开始进入工人中，逐渐扩大影响，后来成功申请换届选举。工会领导让那些未受战斗性工人影响的人不要选择新工会；对战斗性工人，则威胁他们不许抱怨，否则开除。

3、Sangilo mine。1981 年再次发生罢工。这次斗争是在五一工联的影响下爆发的。该矿的工会是一个战斗性工会，名叫 UMISM。罢工的目标：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结果成功了。

4、Lepono。1982 年进行工会内部的换届选举（Local election），推选了一些战斗性工人干部，但都落选，因为他们的选票没有被正确计

算。工厂声称这些候选人对工会不够忠诚，并以此为由解雇了他们。计有 12 名战斗性工人被解雇。他们上诉到法院，直到 1988 年终于取得了胜利，资方给他们补发了这 7 年的工资。他们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光是印材料，花费都非常高。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有可能走到半途就破产了。五一工联提供了免费的律师（官司胜诉的话，律师费由资方支付）。这 12 名工人一边另找工作，一边打官司，没有遭到公司的其它阻挠和对付。其中一个工人去别的地区工作了。还有一个去 Philex 做了一年的矿工，公司发现他曾是 Lepanto 工会领导，就解雇了他。有的工人回家务农。官司的胜诉，对工人来讲是很鼓舞士气的事。

5、Baco Kelly 公司的工人于 1992 年发动静坐罢工，抗议资方不执行集体谈判的协议。罢工后举行了换届选举，把 NAMA WU 选下去了。静坐罢工确实是非法的，但也有争议，因为黄色工会无所作为，于是工人未经任何宣告就罢工了。本来法律规定，罢工必须由工会去申请。但是如果工人和工会够强大，就可以突破这个程序。静坐抗议过程中，军队被派去清除纠察线，但工人靠着人多势众，坚持了下来，军队就撤了。

6、1985 年，Philex 资方违反集体谈判协议，黄色工会装模作样搞了个罢工，只持续了两天。因为工人当中积累了很多的不满，如果不罢工，工会领导在选举中就会失利。黄色工会为了争取选票，搞了这次罢工，以显示自己在为工人争利益。实际上资方和工会领导早已经私下达成了一些协议。罢工的结果不成功。

四、1986 ~ 1989 真正的、战斗性工会的成长

1、Benguet Exploitation 的工会也处于 NAMA WU 的控制下。我们 1986 年就去组织工作，成功申请了换届选举，用现在的工会 BOMBEX 取代了 NAMA WU。战斗性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取得了巨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待遇。

工会影响到了其它地方的工人运动，包括很远地方的 Acoje mine 和 Radio Vunte。影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工人之间的亲戚往来，以及 BEX 的专业组织者前往组织 Acoje mine 和 Radio vunte 的工会。他们还组织了一些电台的播音员之类。

2、Lepanto 有三千多名工人，采用新的作业方式后工人逐渐减少，1989 年举行了换届选举。之前 Lepanto 的那个黄色工会换了个名字：LEU，ANGELO 在换届选举中与之竞争。公司管理方极力支持黄色工会，选举中，真正的工会以微弱票数之差失败了。

3、本格特公司（Benguet corporation），也就是 1978 年发生第一次罢工的那家公司，资方于 1989 年把原作业方式（从底下挖）改成从上面削，并因此把雇佣人数从 6000 人减少到 1000 人，大量工人失业。矿工举行了 11 天的罢工，但是没有成功。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解雇。此后，不少工人成为组织者，有些人去了其它矿找工作，有的去了别的地方。

五、失去地盘，但继续战斗

1990 年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包括本格特市（Benguet）在内，Baco Killy 地区受到了巨大损失，需要重建。各种组织，包括教会、社区、矿工、工会，都参与到救援工作中来。有的房子倒了，美国专家来了都没法救出下面的人，矿工下去救。本格特公司倒闭了，资方搬走了机器。工人没有拿到工资，更没有得到赔偿。工人向劳动部上诉。企业说自己没钱了。劳动部表示，工人可以拿资方的材料来抵工资，但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1992 年，BC 的金矿关闭，因为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开矿，并改用从外面削的作业方法。但因遭到社区人们的反对，最后没搬成。Lepanto 则以亏损为由，打算在 2002 年解雇 500 个工人。工人们发起另

一场换届选举，资方工会被选下去了。当时，菲律宾正在争取加入 WTO。企业千方百计提高效率，用机器代替工人，为加入 WTO 做准备。在这期间，BX、BC、Lepanto 共有 2000 人遭到解雇。BC 解雇的一群工人里，有一些积极分子，后来受雇于 Lepanto，并成为工会的领导。

六、继续战斗，站起来

目前还存在的矿业公司：Bago（工会隶属于 NAFLU-KMU），Sangolo（工会隶属于 NAFLU-KMU），Philex（工会隶属于 NAMAWU）。我在 Philex 活动了三年，差点被抓，由于工人保护得以脱身。1998 年 Philex 申请了一次重新选举，战斗性工会 PUMP 和 NAMAWU 竞争。资方出了 280 万比索资助 NAMAWU 竞选，实即搞贿选，给矿工家属每人发一袋米、糖、酒，当然，是有条件的。他们告诉矿工的妻子们：“你如果想要，就告诉你丈夫别投 PUMP 的票”。资方在给矿工妻子们各种好处的同时，让她们转告丈夫：如果你不投 NAMAWU 的票，就会被辞退，咱们一家就会衣食无着了。还说五一工联跟游击队有勾结。这些威胁对矿工们影响不小。后来 PUMP 以微弱的差距落选。

1994 年前，有两家矿产公司的工会，已经从五一工联的工会变成了 NCL 的工会。这两个黄色工会只维持了六个月，五一工联的工会通过申请重新选举再次上台。

2001 年，Lepanto-NAFLU-NCL（NAFLU 分裂出来，不再属于五一工联）决定要改变以前的黄色工会。2002 年，他们申请对工会进行重新选举。为此需要先征集足够的工人签名，作为申请的依据。很多工人签了名。最后，他们成功地通过内部选举改造了工会。战斗性工人上台，换下了黄色工会领导者。2003 年罢了一次工，要求增加工资、节假日。Lepanto 有三个工会：LEU（工人工会，1760 人）、LLSU（职员工会，200 人）、LSFU（保安工会，36 人）。由于在工资、节假日等三个问题

上有着同样要求，2003年，ALLA 职员工会和 LLSU 结盟。保安工会和 LEU 一起加入了全国工会联盟（NAFLU）。2003 年为期一个月的罢工非常成功，生产全部瘫痪。保安工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罢工，主要是通风报信（比如“老板要来了”）。LLSU 坚持了一个月。LEU 的人表示：如果资方使出什么手段对付你们，我们一定会支持你们。LLSU 会员里面有工程师、技术员、文员之类，开始不支持他们的领导，资方试图解雇 LLSU 的 13 名工会干部。工会成员都表示：如果你们被解雇，我们会继续罢工。但最后 13 个 LLSU 工会的人被辞退了。办公室人员害怕被解雇，所以抛弃了工会干部，使他们陷于孤立。罢工结束以后，他们又选出了新的工会干部，工人的工会试图向他们传授一些经验、技巧，但是新的工会干部拒绝了，担心像以前的干部一样被辞退。

2004 年集体谈判时，资方不答应工人所提出的要求，结果谈判陷入僵局。

七、2005 年 Lepanto 的罢工，及我们的组织工作

2005 年 6 月，工人举行罢工。资方两次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罢工合理性进行判定（如果官方认定罢工“不合法”，工人就不能罢工），工人都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理会他们，所有要求都得不到满足。但是，拒绝政府的判定，军队就会出动，且不再遵守什么 50 米的规定（警察、军队要至少离开罢工纠察线 50 米远）。罢工期间，工人在五个重要的关口设置了纠察线，每处有 160 个工人，两班倒轮流看守。矿工的家属都去纠察线支援。大约 200 名军人和 15 名警察来到纠察线。如果有一处纠察线遭到袭击，其它地方的工人都去支援，晚上跑来跑去都睡不好觉。罢工坚持了三个月。很多人给罢工工人捐款，捐助的大米共有 300cavan，即 30 吨（每天要消耗 3 吨的大米）。捐助有的来自附近的地方政府、NGO、国会议员。社区居民送来蔬菜：胡萝卜、大豆。没

有这些支援，就不可能坚持这样长的时间。这次罢工还形成了如下组织：LEU 保安工会、LSFU 普通工人工会、TBML 妇女组织。但有 19 名工会干部被解雇。

这里 80% 的矿工都已婚。矿工的妻子就是一千多人的队伍。当时有三个组织者。我和另一位男性组织者主要关注 LEU 和与 LSFU 的联合。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性组织者 Hasel（24 岁）负责组织青年人，2005 年 1 月起又着手组织妇女。我们的想法是，把妇女和孩子团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丈夫和父亲——矿工们——罢工。2005 年 3 月，有 280 名成员的妇女组织 TBML 成立了；4 月又成立了青年组织，有 35 个成员。

通过这些组织，我们举办了很多培训，内容包括：如何进行组织工作；父亲和丈夫的工作、工资跟他们如何密切相关；家庭多少涉及到消费多少。2005 年 6 月，在罢工开始之前，妇女组织和青年在这个区域就组织了一个游行，进行集体谈判，资方不同意要求，妇女和青年就组织起来抗议。第一次集会 1200 人参与的游行，第二次是 2300 人。虽然是不到 300 个人的组织，但他们发动了各种人——整个家庭都支持矿工。保安的工会也开始支持我们，给我们通风报信。

工会有详细的分工。宣传委员会接受地区媒体的采访，对外呼吁；财政委员会，通过各种进步组织、NGO 寻求支持和捐助，包括获得很多外国人的支持；后勤委员会，负责搭帐篷，炊事等；食物委员会；罢工护卫军，专门保护罢工的顺利进行，例如部队来了，就在路上放钉子；发现有工人回去工作，就用弹弓射他们。某蔬菜种植园还让妇女去收菜，为他们提供食物。种植园规模很大，那一年蔬菜价格大跌，运出去卖还要亏钱，不如捐给工人。纠察线上堆满了蔬菜，但是缺米，必须限量供应，每人一缸子。妇女组织起厨房，分配食物。那时天很冷，很多年轻人组织起来读书，烧火取暖，做饭，运送物资到纠察线去。女性、青年人、工人在不同的组织中分工合作。

因为工人的工资太低，就无法养活家人，因此他们所提的要求完全

合情合理。但他们的要求只得到一点点满足，工人对结果并不满意。

2006年1月我开始组织TBML，难度很大。作为男性，去组织女性是比较困难的。她们的住处狭小。有时候四五个妇女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听课。我一个男性去讲课，还得关上窗户，否则让别人看到了会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后来就用工会的大厅秘密举办学习之类的活动。我们鼓励Hesel去组织妇女——她是我们三人中唯一的女性。罢工中，妇女站纠察线的最前方，把自己的父亲、丈夫、儿子——矿工们保护起来。警察和军队在对付她们的时候，比对付男性要有所忌惮些，不敢把她们怎么样。如果她们被打，她们的控诉和抱怨将会唤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在纠察线上，警察和军队有时发动突袭，用水枪攻击矿工。有一次，他们把工人们铐起来，有一个兄弟在警察局工作的妇女就弄来钥匙，给工人们打开手铐。后来军队很是吃了一惊——明明那些工人在别处被他们上了铐，怎么又现身在纠察线上了！

这次罢工后，TBML有了680个会员，其中有62个妇女积极分子；现有会员37人，只有15个积极分子。到2012年4月，LEU工会会员只有630工人。工会要求把一些合同工转为正式工，有39个人转为正式工并加入工会。其他妇女积极分子，有的因为丈夫被解雇，而离开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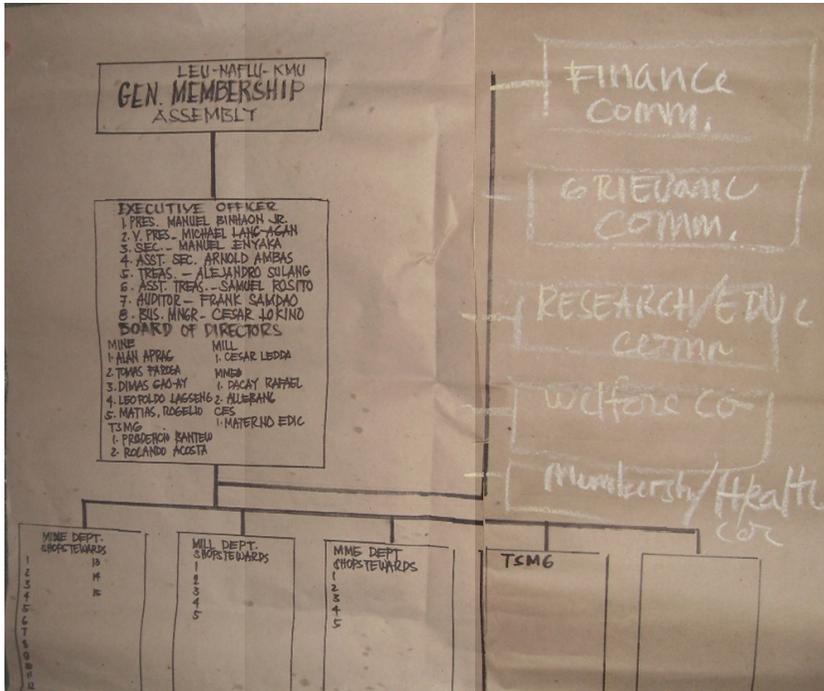
2007年，一些工人打入黄色工会，想通过选举让NAMA WU重新取得工会的主导权。征得超过半数工人的同意之后，申请批准了。不过换届选举还是五一工联获胜。五一工联的工会取得胜利后，设法让被黄色工会挖走的221个人回来，但资方用优惠条件收买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让他们不要加入工会。这样，工会的力量削弱了，集体谈判时，只达成一部分条件。目前只有一半的工人是工会成员。

2010年~2011年间，资方两次裁员，2010年裁了114个工人，2011年裁了140人。工会干部受到威胁。两次裁员时，都解雇了三名工会干部。

2012年，LEU-NAFLU-KMU有18名工会干部。资方拉拢其中3人，让他们搞分裂。于是这3名干部就另立山头，搞了一个工会(Leponto Local Employ Union, 简称LLEU)。原有工会的成员总数是669人。搞分裂的新工会欺骗工人说这是以前的LEU的决定，并且声称已有402名工人签字(加入他们)。LEU原干部于是开会，请大家不要听信谎言。后来统计说LEU工会会员还有482人。这个假冒的LEU工会要申请进行换届选举。真正的工会尝试说服其余(脱离原工会的)187人回来。好在换届选举的申请遭到拒绝，因为2007年才搞过换届选举，工会有5年任期。2007~2010年是第一个换届选举的集体谈判年，应该是2012年12月到期。总之，换届选举不合法，要申请的话，应该在2012年9月~12月之间的90天内申请。这三个被收买的干部唯资方之命是从，但对相关法律不熟悉，缺乏经验，申请得早了，碰了壁。集体合同到期前还有几个月，但预计这个假冒工会还将再次申请换届选举，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办法就是举行教育、办论坛。

工会每年召开两次会员大会。现有的15名干部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部门领导等，都是选举出来的。执行委员会每6个月制订出一个计划，在全体会员大会上汇报，通过后才能执行。工会内部每个月举行一次会议，相关领导做汇报，看是否完成计划。总车间代表从各个车间代表那里获取信息，并在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出席，说明下面各车间的情况。

参与工会工作人员有：执行委员会19个人，车间代表35个人，加上各个部门的成员(不是选举而是指定的)。假设每个部门6人，一共就有84人在工会任职，相当于1/8的会员。前两个委员会(财政、安全)有日常事务要处理，其他委员会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工会有什么样的缺点(例如设了很多虚职)大家也都看得到。我们想把目前的工会体制巩固下来，这就需要举办讲座，搞教育，所以研究、教育部门的工作很重要。但现在没做什么事情。



有关工会的问答——

1、资方裁员时，会留下哪些人，是否会优先裁掉工会积极分子？

是的。裁员是资方的特权。它们会有这些借口：声称生产率低，对生产进行重新组织（例如底下挖改成从地上削），重新定岗定员（一个岗位一个人），把“多余的”工人辞掉，此外，违反规定（偷窃等）的工人会被解雇。

2、如何发现积极分子、挑选积极分子？

工会要物色积极分子当车间代表。做法是：去不同部门，看谁愿意

做车间代表，签个字，主要靠自愿。在运动中挖掘积极分子，留意谁在纠察线上表现活跃，特别在台风时期，以及帮忙分发大米等事情上。工会组织罢工时，会把罢工的原因写成小册子去散发，在这类的种种活动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应特别留意。

3、组织者如何接触工人？

如果工厂没有工会，组织者会先通过亲戚、朋友的亲戚寻找关系，建立联系；或者通过老乡关系（province mate）建立联系；进工人社区时，就跟保安说进去找某某人，有个联系人就可以进去了。接下来就是认识周围的邻居。

第二步：询问/社会调查。了解谁是工厂主，厂里有多少人——多少管理、职员、普通工人，工作条件怎样，职安健等，工人的反应如何。

如果是老乡，知根知底，直接告诉对方你要干嘛。是否理解目标是什么，是他的事了。如果通过某种关系间接认识人，需要的过程就会比较长。

4、如何对付工贼？

罢工过程中，如果出现工贼的话，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的，就打电话警告：“如果你这样做，直接把你从工会会员名单中踢出去”。工人看到自己的福利跟工会相关（在工会中，工人的福利会好很多），就会屈服。可以让进去做工的人当卧底，提供工厂内部信息，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工会的忠诚，否则就开除其会员资格。

2005年那次罢工，矿里没几个工人充当工贼。公司从外面找人顶替工人工作。工人对付的办法是，在门外查车，小巴、中巴要进矿场，就上去说：“我们这儿在罢工，有没有人可以支持我们？”很多人慷慨地给他们捐钱。又问“有没有新来的”。如果答说是进去上班，就拦下来，

说服他不要进厂。那次罢工中，有 36 个工贼这样给堵在大门外。后来公司让工贼走路进去。保卫队的人还用弹弓打工贼（一般是打脚，不打头），赶走了 12 个人。工人花 300 比索买了好多钉子。一般人的车子就放过去，如有警车前来，就把钉子连成一排安在路面上，结果共扎坏 32 个轮胎。最后还是 82 个工贼进了矿场。他们一身警察、军人打扮混进去的。我们的保卫队的任务就是制造麻烦。保卫队是一个秘密小组，外人未必能知道有哪些队员。那些工贼只是临时招来对付工人的，罢工结束后都要辞退。有的工人很生气，等他们离开时，用石头砸他们。矿井因罢工停产后，里面会有很多毒气排不出来，工贼进去干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供工人进出、原材料进出的通道，都是“战略要地”，必须把守住。那 82 个工贼进去后三天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把路拦了，食物送不进去。工人很聪明，知道矿井有哪些地方是要害，例如电源供应线路，一旦切断可以令整个矿区瘫痪。当然，不到最后关头，就不必要用这个办法。

2003 年的罢工就是好例子。工人是通过电梯下矿井的。矿井的最下面有一个水泵，因为水平面低于海平面，必须用水泵不停地排水，否则井下设备就会被淹。当时负责水泵工作的工人罢工了，造成了 396,000,000（三亿九千六百万）比索的损失。工人早已算好了，假如一个月不排水，矿井最上方的贵重机器也全部会给淹掉，工厂的损失更大。结果一个月后资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再说 2005 年的罢工。当时工会里有人私通管理层，透露了罢工日期。资方提前在矿井了存了 1000cavan（十万斤）的大米，足以维持一个月的时间。有六名工会成员复工，做了工贼。工人就在外面喊：“有没有看见好几个男的进了你们家，找你老婆去啦！”三天后，这几个人就不干活了。

罢工结束后，经集体谈判，工资获得增长，这六名工贼也包括在内。他们心存愧疚，就在全体工会代表大会上捐献了一头猪，值 12000 比索。

当时会员有 1640 人，不够吃。他们又添了些别的，总之请大家吃了一顿。

5、为了保持工人的战斗性，平常做些什么？

1) 工会本身要保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部才会比较稳定。2) 有个别工人出了事：被资方解雇、惩罚等，工会就要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抗议工厂不合法、不合理。前者有赖于合法途径；后者则有赖于战斗性的行动，必须随时做好集体行动的准备。

工会在假期举办活动，主要是给积极分子教育、培训，读理论书籍，学到什么是工会、工会做什么。这些活动都是秘密的。普通工人和积极分子的学习材料是不一样的。我们会给工人讲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阅读五一工联的报纸，了解各地工人运动。如果材料数量有限，工会不会自己再印刷，通常是分组，一个部门一本，自己进行学习、讨论。材料多的话，就可以给每一个会员人手一份。女工也一样会讨论这些问题。

6、1995 年菲律宾加入 WTO，对矿区的工人、工人斗争有何影响？

一是企业以机器代替劳动力，造成了失业。加入 WTO 后，生活必需品涨价，工资却没什么增长，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政府推行了很多私有化政策：NFA 国家食品总局私有化——大米涨价；OIL 私有化——石油涨价；公共厕所也私有化，要收钱。方方面面什么都有影响，就是没有革命。

这个时期，工人变得更愿意加入战斗性工会，因为要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一年有六名积极分子被辞退，其中有一个全职工作者，一个去了五一工联工作，一个竞选本地议员。

7、厂外组织者和工会干部的分工，及相互关系。

在那次持续三个月的罢工中，大家有时候 24 小时连轴转，一天只睡两小时。把纠察线变成学校，进行教育工作。组织者不参加工会与资方的谈判，但一直在幕后。有什么问题在谈判桌上决定不了，就申请休息，出来大家讨论后再做决定。其它工作还有：更新信息、培训、法律服务、调查。工会干部的任务是：搜集资料、数据，介绍人来参与培训，培养成积极分子。五一工联组织者把知识都传授给工会干部，这样，即便外来组织者不在了，工会也可以继续做事。

8、五一工联通常会提供哪些支持？

2010 年，Lepanto 管理层拖欠三个月工资。五一工联的山脉区支部组织了集体行动，在办公大楼门口设立纠察线，派代表向政府请愿，向企业施压，但没有回应；还向省政府反映，仍然没有用。全国工会联盟总部和五一工联总部都到 Lepanto 公司总部门前集会。当时只有 15 个代表去了马尼拉，有 180 个人是五一工联组织的。这 15 个代表加上全国工会联盟全国主席，一同去公司跟老板谈判，最后讨到了工资。全国工会联盟总部也会向本地的工会提出建议。我们需要和他们沟通，把整个事件搞成全国性而非地方性事件。当然，遇到事情自己先动手解决，而不是马上发起全国性运动。工会要自食其力，而不应事事仰赖总部。地方也同时举行抗议活动，形成压力。没有钱派人去马尼拉，全国工会联盟就地抗议，也形成压力。那次斗争了四个月，才解决问题。

9、其它。

SUYOC 地区，有一些土地是私有的，在土地下面发现矿藏，就跟邻居一起挖。但目前只剩下三个大矿：Philex(现有 1800 名正式工，2000

多名合同工)，Leponto(现有 669 名正式工，2000 多名合同工)，Balatac mines(3000 名全是合同工，承包给别人，挖完了就走，一半给归承包人，一半归公司)。以前的很多公司现在都没有了(倒闭了)。政府介入，想把小矿组成合作社形式，便于控制价格。有好多小矿被大矿排挤出去了。这边的矿工很多都受雇于 Leponto，但也有其他地区来的，比如 Hogon, Monkaym 等。Monkaym 有很多人因为当地开矿，不能继续种地了。这些当地农民可以优先在矿上工作。



首都某年轻工会干事访谈

2009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头一年，我在某社区里工作，后来进入工会工作，现在是全职的工会干事，针对菲律宾一家大公司开展组织工作。现在的大学在校生，有的也去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但是毕业后，就很少有人去做工人的组织工作了，至少与过去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少得多。

介绍一个今年（2012）发生的罢工案例。罢工从5月份开始，7月11号结束。

这是一家美资工厂，老板是华裔。工厂里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很多，他们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容易被解雇。包括办公室职员在内共约200名职工，其中有60多人是正式工。

工厂有个部门是库房。2012年1月，我们的人开始在这家工厂的库房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会的工作。5月份，厂方察觉了，立即解雇了103名工人，其中有98个是临时工。

老板以为工人会去打官司，没想到工人采取了罢工行动，还组织了纠察线。因为临时工习惯了经常换工作，所以不少人被解雇后就离厂了。纠察线上只有约40名临时工。

这是第一次罢工，共持续了三天。最后，工人同厂方达成了口头协议，罢工结束，工人复工。但是，一周后，厂方开始逐个辞退这些临时工。于是我们组织工人进行第二次罢工，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并取消对工人的解雇。这次罢工中，我们没有能够使工厂停产。

但是，这次资方的态度强硬，不仅向法院起诉，要求工会赔偿罢工给资方造成的100万比索的损失，而且还在武装警察的保护下破坏罢工，找来工贼代替罢工者。当时来了100多名警察，拿着长枪，维持秩序。

厂方和政府宣称他们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都是合法的，其实他们依据的法律都是马科斯当政时期制定的法律。

最后工人还是被解雇了，只有20来个正式工拿了解雇赔偿。现在工厂库房部门的正式职工只剩不到10个。

罢工失败了。对觉悟不高的工人，我们就告诉他们，如果不组织工会，就连解雇赔偿都拿不到。这家工厂的老板是中国人，被解雇的工人就开始恨中国人。我们就对工人解释，老板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属于剥削阶级。

斗争是失败了，但是使工人看到了政府是和资本家站在一起的，这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是有好处的。……输了经济战争没事，输了法庭诉讼没事，但是工人政治觉悟提高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赢了。

而且我们还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发展了新党员。有些人还去了游击区。这次罢工结束后，就有两个工人到游击区去了。他们的老婆还不知道，问“我丈夫跑哪里去了”。

感觉现在对罢工的武装镇压更严重了。



上图文字：Kontraktwalisasyon（临时工）；Pasok！（来吧）；Layas！（滚！）

服装厂的罢工

1980年，工人斗争非常非常多。很多工厂都成立了工会。我以前在一个出口加工区工作，那儿的十家工厂都有工会。后来我到B地区，这个出口加工区的政策是“没有工会、没有罢工”。即便如此，1990年我所在的工厂还是发生了几次罢工。

那是某意大利服装厂在菲开设的唯一的一家工厂，生产丝质手套。总厂在香港有仓库。我们这家厂有百来个工人。1990年地震前，我们在三楼工作。地震后，原来租在一楼、二楼的两家厂搬走了。厂里就租下来，三层一起占了。管理层有时会把单价高的货分配给比较熟的人做。工人如果对单价不满意，只能找小组长提意见。计件工，一件10个比索，一天做三件，工资太低，工人就罢工。现在全部都是计件工。这个工业区只有在这家服装厂会有罢工。其它厂，比如电子器械公司，都没有罢工。

第一次罢工是在1990年，跟地震有关。在地震中，厂房变成了危房。工人在三楼工作。当时还有余震，工厂主都不敢进去，却要求工人继续在里面工作。我们对管理很生气。管理说，你们不去做的话，老板会很不高兴，会开除你们。但工人不怕，直接走下楼，罢工了。罢工持续了一个月。我是最早的发起者，罢工前跟很多工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每天在工厂聚集，在厂门口设置了障碍，只有管理人员进出。厂方想雇佣新的工人，但我们不让他们进去。罢工的那一个月没有工资、没有工作。后来厂方给我们在空地上建了棚子，继续工作。

第二次罢工是在1992年。罢工的原因，第一是超时工作；第二是厂方没有按照协议发放年底奖金；第三是工资很低。我们要求跟资方谈判，资方不想谈。老板还找人跟我说，想涨工资可以给你涨，但不能给

所有人涨。工厂有三种工人，一种是正式工，一种计件工（有奖金），一种是临时工，按天算工资。这次罢工期间资方也没有招新人来顶替我们。罢工一个月后，资方同意了工人的要求：超时劳动的问题解决了，奖金也发了，还给了每年十五天的病假，十五天的带薪假。但还是没有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从1984年起，我工作了23年。2007年试图建立工会而被解雇，因为我是领导者。当时11个人被炒，都是工人积极分子。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只有周日才有时间。要一家一家去讨论问题，进行教育。

我跟工人关系很好。现在很多工人遇到事情还会找我，比如遇到骚扰、工资低。2007年开始我在五一工联全职做组织工作。这之前我跟五一工联就有联系，工人也知道这事。有些工人比较担心，有些工人觉得没问题。但是经过教育，工人知道了五一工联是干什么的，知道它是工人斗争的唯一组织。

1986年，马科斯倒台的时候，我还在服装厂工作。2月16号那天上街了，步行了一天，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口号是打倒马科斯独裁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当时很兴奋，不害怕。工业区两万多工人，有数千人上街，队伍很长。有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上面的听到，但是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阿基诺上台，工人都合同化了（即普遍成为短期合同工）。



烟草公司的罢工

1980~1986年，我在一家烟草公司工作，工资按计件。六个月后我转为正式工，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工厂六十年代就开厂了，多数都是手工操作，没有多少机器。七十年代添置了一些机器，效率提高了。工厂很大，有七千多名工人，有很多车间。有的加工烟叶（从农民那里收来烟草加工成卷烟），有的专门制造烟草盒，有的包装（把香烟装进烟盒）。厂里有黄色工会，不关心工人利益，更没有为工人而斗争。

有一个进步工会来跟我们这儿的工人接触，希望把我们的工会变成战斗性工会。当时我们要求通过集体谈判来确定工资，不是工厂想给多少给多少。我们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首先是别纪念章、戴袖章；更进一步，则是签名运动，向资方施压。就这样一直增加声势，到1986年罢工了。一般罢工要提前15天通知备案，但是我们在第13天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工会领袖被枪杀了。凶手还把他指甲拔出来，用棍子扎眼睛，非常残暴。军方以这种残暴手段来恐吓工人：别去斗争，否则这就是你的下场。工人就提前罢工了。

罢工两个星期后，资方口头答应了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要求，工人复工了。但一个月后资方解雇了工会领导。工人们发起第二次罢工，长达两个月。纠察线把工厂瘫痪了。警察和军队都来了，用高压水枪镇压纠察线工人，还把帐篷之类的清除掉。工人怕挨警察的打，不敢再去纠察线。一些工人在协商期间就复工了。复工后，谈判还在继续。但不到一个月，厂方就通知所有工会干部（共52名）全部被开除。正在干活的工会干部被资方驱逐出厂。双方进行了谈判，五一工联还安排律师参加了，但是厂方不让步，甚至用大规模裁员来恐吓工会干部。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52个工会领导集体辞职了。虽然他们失去了工厂工作，但

仍然是工会干部。集体谈判的结果最终达成，52个被开除者离开工厂。但留下的工会干部，仍然是五一工联的人。他们继续斗争。我当时也在被开除之列。

事后我们总结的一个教训是：第一次罢工结束并复工时，厂方只是口头答应工人们的要求，没有文字协议。工会领导轻信了厂方口头承诺，以至于复工不久，资方反悔，且不用背上任何责任。工会和工人则陷于被动。

罢工期间，我们成立了纠察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这样吃饭有保证。有专门做饭的，分配的，在纠察线搭帐篷、睡觉休息，保证材料、货品不能进出工厂，等等。我们还到街区搞宣传、联络，获得社区的支持。罢工期间，纠察线上只有一半工人。其他人多数回家了。

1986年以后，厂里的工会越来越弱，1993年后变成了黄色工会。烟草公司的老板跟马科斯是朋友。马科斯在公司有70%的股份，所以马科斯下台后，政府接管了这家厂。老板本人也是菲航的老板，是菲律宾最富的几个人之一。

被管理层开除后，我们继续做组织工作。厂方派出好多奸细跟踪、威胁我们。我们建立了一个互助小组，出去办事就两人同行，互相帮助。出门都多带一套衣服，发现有人跟踪，就换身衣服。不能穿有五一工联标志的衣服，否则意味着要掉胳膊，掉脑袋。我离开工厂后变成了全职组织者，去组织其它阶层、中间势力的人，让各个阶层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都要关注国家的命运，一直在斗争。现在我是公众人物，经常跟市长座谈等。这样其实挺安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我是镇里的一个代表，有合法公开的身份。我丈夫是这里的居民，他也不害怕。

台资厂女工：为反对转成派遣工而罢工

我 1995 年进了一家台资箱包厂。这家厂在马尼拉有很多分厂。厂里有 250 个工人，大部分都是女工。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中间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

厂里曾经发生一场大火，我们怀疑是管理干的，他们想把正式工人赶走，改用派遣工和临时工。因为正式工有最低工资（250 比索）、病假等福利，而临时工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没有福利，五个月签一次合同。

当时我们厂的工会是资方工会，我是工会的职员。2003 年，因为不满厂方把正式工变为派遣工和临时工，101 个工人罢工了。罢工是合法的。其他没有罢工的工人被资方转成派遣工或临时工，继续在厂里工作。从 2003 年到 2005 年，我们每天待在纠察线上，在工厂旁边的小房子里面吃住，没有影响工厂生产，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厂里的资方工会一味劝说我们不要罢工，也不帮我们跟厂方谈判，在纠察线上什么也不干。我们不听工会的话，自己选了代表，想跟厂方谈。我们的要求，一是正式工身份不变，二是罢工期间的工资照付。但厂方根本不搭理我们。

2004 年的时候，老板雇了 100 多个警察，带着枪，前来破坏我们的纠察线。那时候工人士气低落，有 32 人没有要任何赔偿就走了，只剩下 69 人，根本对付不了警察。幸好附近社区来了 300 多人帮我们，阻止了警察的破坏。他们觉得我们被欺负了，所以为我们仗义出头。

罢工期间，为了维持生活，有的人白天工作，晚上来纠察线值班；还有的人去别处工作，每周捐给罢工工人 100 比索。我们还在纠察线旁边搞了个小商店，卖水果、蔬菜、小食品等给社区。

2005 年，我去教堂寻求帮助，教堂的人介绍我去五一工联。五一工

联的妇女工作者开始帮助我们。她们帮我们分析社会形势，帮助我们募捐，寻求各种支持，介绍律师为我们打官司，还为我们培训什么是真正的、战斗的、爱国的工会。工人听了之后感觉很好。

从此，我们开始在五一工联的指导下进行罢工。我们做了分工，有食物协会、财政、纠察线值班表、谈判代表等。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工人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按法律规定拿了工龄补偿，走了。但他们的心还是跟工人在一起的。

2006 年我们开始堵厂门，不让厂里把产品运出去，还去大商场号召顾客抵制我们厂生产的产品，以此来影响工厂产品的销量，最后才迫使厂方跟我们谈。2007 年厂方答应给我们剩下的工人如下补偿：一，无论工作多少年都给 3000 比索；二，每工作一年赔偿 15 天工资。罢工结束。现在，我是斗争集体中唯一还在做工人组织工作的人。



▲ 图左文字：正式工名额已满。图右文字：急招临时工。

一次组织工会失败的经验

我们这个出口加工区有 20 家企业，有美国的，澳大利亚的，还有中国的。最大的一家是德国的“德克萨斯”公司。加工区有 15000 名工人。政府对资方有特别的照顾，使他们免受劳工组织的“骚扰”。政府从各方面保护企业，工会则很难维持下去。工人知道组织工会有好处，问题是很难组织起来。五一工联已经被逐出加工区了。

虽然这个出口加工区没有工人组织，但我们一直在做组织工作——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社区组织工人，目的就是不被摧毁。

东营厂是一家韩资企业，在许多国家都有分厂。2001 年，我们最近一次尝试组织该厂的工会。我是 2000 年加入五一工联的，这以前一直关注妇女、城市贫民工作。那次组织工作是我的第一次在职训练，结果工人被驱散，工厂被关闭，我伤心地哭了。

2001 年我开始尝试跟工人建立联系，发现工人对“外部势力”想要去跟他们建立联系的做法是非常警觉的。于是我们在厂外做调查，了解工人的情况，发现了几个问题：工厂没有活干的时候强制放假，有时长达两个月；工作时间过长；厂里答应的一些福利，工人也按规定交费了，工厂却没落实；工资给得不够；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东营厂有 360 人，70%是女工。如果淡季里没活干，两个月不开工，工人们就必须另找工作。旺季忙的时候，有的女工连续加班 36 个小时。

我们对工人进行教育培训的内容有：工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给她们算剥削率是多少，公司只拿利润 3%的钱给工人作为工资。我们通过朋友介绍一些工人，先跟他们聊，接着就有更多的工人来聊。有时候去一个废旧的机场去聊。我们跟工人熟到什么程度呢，有时甚至可以进到工厂去聊，没有保安阻止。工厂有时会安插间谍到我们的组里。有一

次交流时，一个被经理收买的小伙子问我们在干嘛，很多人就很害怕，但是大部分工人都很坚定。我们尽量小心，避免工人因为违反工厂规定而失业。

2002 年 3 月，进入工会注册阶段。注册前要举行民意调查，由工人投票决定是否成立工会，这是法律规定的。除了一部分人没去投票之外，所有的工人都投票同意建立工会。

工会全名是 DONGYINKF（工会名）- NAFLU（全国工会联盟）- KMU（五一工联），我们认识的一位人权律师建议不要用这个名称，因为它表明了工会与五一工联的关系。但工人们没有同意，他们喜欢战斗性的工会。

资方马上出来宣布说，工厂将在数天内关闭，理由是亏损了。工人不答应，建立了纠察线。当时工人面临几个问题：1、工资未完全付清；2、社保还没有交；3、福利也没有支付；4、工人想跟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然后我们开始收集证据。他们不是说企业亏损吗？我们就搜集证据，工厂生产了多少产品，特别是通过最后的包装工序来了解企业在过去的六个月中生产了多少。如果产量很高，那么所谓亏损就是假的。后来劳工部召集资方和劳方开会。资方答应支付拖欠的工资，很多工人已经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同时，我们去劳工部申请了罢工备案，并在工厂建立了纠察线，不让资方把机器什么的运出去。当时厂里想把机器运到公司的另一个分厂中去。另外，我们向媒体寻求支持。许多媒体进行了报道。

劳工部牵头的劳资会议开到了八月份，工人至少在这三个月中没有任何收入。罢工虽然备案了，但是处于谈判阶段，所以工人一直没有上街，资方则成功地削弱了工人。在警察和保安的掩护下，厂方趁午夜的时候把机器撤走，工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抵账的东西了。当时消防队和消防卡车也在那儿，警察也在那儿，但是纠察线上只有几个工人，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搬走东西。好多工人因为要养活自己和家人，需要去找新的工作，所以罢工失败了。

后来，工人接到了法院的判决，说资方关厂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就输掉了这个案子。但是工人继续斗争，把被拖欠的工资、福利保险还有退税都讨回来了。有些失业工人在附近或在社区找到了新工作，但是大部分人都离开这里，去别的城市找工作了。

后来五一工联内部也开始讨论是否要在这种出口加工区里建工会，因为法律规定要保护这种出口加工区里的企业，不允许建立工会。工人组织工会一旦失败，代价会很惨重。后来就想，既然不能在工厂里组织工人，那还是在工厂外部（社区内）来组织工人比较好。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要把工人成立的工会挂靠到五一工联。因为无论是政府也好，资本家也好，对五一工联都相当警觉，相当仇视，认为你是共产主义者。结论是，新成立的工会不必非要挂靠到五一工联；只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并进行教育，就够了。直到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在这个出口加工区里组织起任何工会，但是我们在对这个社区对工人进行了组织工作。

在这个出口加工区，大概 80%的工人都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很难组织。怎样组织他们，是最核心也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动员各种力量来促使就业正规化，然后让政府、让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放弃临时工制度。在这种临时工条件下，工人无法自我组织，也没有长期工作的权利。

刚才提到的几个矿山公司，也是争取从黄色工会内部夺权，最后控制了工会的整个组织权。2007 年的时候 Leponto 里面有两个工会，一个是黄色工会，另一个是五一工联的工会。五一工联的工会通过选举获胜了。2012 年的 11 月份将面临另一次选举，由于受到黄色工会的威胁，他们有可能失败。

问：资方做了什么事情来威胁工会组织者？是在工人当中做反面宣传，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答：Leponto 这个矿业公司有两个工会，一个是多数派工会，一个

是少数派工会。少数派工会是受公司支持的，它是一个独立工会，不附属于任何工会联盟，但是有厂方的资助。

Philex 矿产公司里面也有两个工会，一个是现在占多数的劳工协会（ALU）工会，它是一个黄色工会。另一个是 PUMP 工会，占少数的工会。它是一个独立工会，现在还不属于五一工联。他们打算通过最近的选举变成主导工会。他们承诺，如果他们成为多数派的话，就会加入五一工联。他们也是通过内部工作来把劳工协会选下去。这个工会每年都进行选举，选出工会的领导者，其中有些人 and 五一工联的关系很好。如果这些人当选，对劳工协会也会有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转变劳工协会的主张和定位。工会每年的换届选举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实际上这场斗争就是真正的工会主义和黄色工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工会内部的斗争，很多人都想参与进来。包括生意人、地方政客和政府都想参与进来。有一个“工会果汁”的说法，就是说交的会费都去了工会领导层那里，工会领导层怎么用的会费，就不得而知了。与此相反，五一工联就会把会费控制在最低的额度上，并会对下面的工会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教育指导等等。曾有一个商人当上了工会的领导者（工会主席），他把工会变成了最大的“奶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工会变成了一个用来盈利的东西。这个工会就被腐蚀掉了，不会再为工人的权利而斗争。

问：你们在东营厂建立了工会，然后工厂搬走了，工人们有没有抱怨工会？

答：是有抱怨工会的。有些人说，要是不组织工会的话，他们可能还在厂里工作。我们就是据理力争：工厂不是我们关的，是资方关掉的，资方和政府这些人都是一条船上的。肯定会有一小部分工人抱怨，但是大部分工人明白资方和政府的本质是什么。

那些抱怨的人之前也很积极。我们在废弃机场的跑道上组织公开的

菲访谈见闻琐碎记

范世刚

抵菲

离开机场的路上，问出租车司机要多久才能到工联总部，司机说要看情况，交通情况还好的话，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开始车行驶在一条大路上，两边也是高楼和广告，路上的汽车以丰田居多。公交车身上的广告又大幅又夸张，电视广告的风格和广告中的俊男美女，也都是按照美国主流的审美观制作的。

不久车就开到了小路上，大巴士消失了，小轿车也少了，满街跑的都是叫做吉普尼的客车，作用和公交车差不多，但都是私营的，也是菲律宾街头的特色。

在小路里七拐八拐之后，车终于停在了一个紧闭的铁门前，我们一看，真好，直接送到门口了。

这个铁门的左边生长着茂盛的植物，厚厚的一层深绿色的叶子把整个墙都遮住了。在这些叶子中，有一根绳子从墙里面垂下来。我们拉动了绳子，果然，绳子的一端连着的一个铃铛发出了清脆的声音。有人来开门了。

里面是一幢三层的建筑。一楼是办公室和厨房；二楼有四间屋，一间大屋子有放满书的书架和几台办公用的电脑，其他三间小屋子是宿舍。三楼是一个大一点的会议室，有一张椭圆形的长桌，还有很多叠放在一起的塑料椅。所有的东西都很老旧，但看上去却很整洁。



这附近的很大一片街区没有高楼大厦，全是低矮的平房，最多有几个二层或三层的小楼。走在街上，感觉就好像回到了1990年代初的家乡城市的街道。连街上的小卖部也让人产生怀旧的感觉。

休息了一会之后，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 M 来了。我们的翻译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的，他们要到晚上十点才到，所以我们就用蹩脚的英文跟 M 在三楼开了个小会，介绍自己的情况，以及请她介绍接下来的日程安排。

我们强调了一个请求，即一次只同一个人聊天。M 非常有耐心，听我们说明，记下我们的请求。她的热情和耐心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感到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访谈

第二天我们没出门。上午在三楼开了个小座谈会，我们全部参加了，对方参加座谈的是总部下属的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主持会议的是他们的秘书长。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此行的目的。秘书长介绍了工联的原则，组织结构和一点历史，然后扼要地介绍了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状况，工业状况和工人的情况。

下午对秘书长做了专访，地点是一楼的主席办公室。总共八九个人挤进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

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问问题，也有不好的地方。第一，如果被访者是像这个秘书长一样的经验丰富的老活动家，那他就会比较淡定，不会

因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被一群外国人围着问问题而局促不安。第二点就是访谈者方面的问题了：如果提问的人太多，在访谈前又没有充分沟通、协调，在访谈中还缺乏默契，那就会出现混乱，甚至会因为问什么、怎么问而争论起来；可以设想一下，被访者看到一群访谈者用他听不懂的外国话吵来吵去，会是个什么感觉。

秘书长今年 60 岁了，花白的短发，黝黑的皮肤，上嘴唇留有浓密的胡须，中等偏上的身材，很壮实，只是肚子有点发福了。跟我们在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眯着眼睛，微笑的样子，感觉精力充沛。而且从早到晚整整一天陪着我们，也没有看出他有疲倦的样子。

1970 年代初的时候，他是大学生，在校的时候就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做了工人，开始做工人的组织工作，一直到现在。

要想详细地了解一个人二三十年的斗争经验，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够用呢？从这一天开始，往后几乎每一天的访谈对象都是参与领导工人斗争的“老人”；这是我们的好运气，因为他们每人都是一个宝库。唯一可惜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宝库留给我们挖掘的时间都太短了——往往是刚刚打开大门，露出宝藏，或者仅仅拿出一颗珍珠，我们就要匆匆赶往下一个去处了。

跟秘书长聊天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我们问他是不是有事，他抱歉地说，只能再陪我们半个小时了。

他还是比较坦率的，有事儿要走就跟我们直说了。后来几天的访谈中，据接待我们的 M 说，有的被访者本来有事情要去处理，但是见我们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就不好意思离开。也许我们的确很难缠吧；对方刚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已经想到了好几个问题。当然，我感觉这个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太强的缘故，而的确是因为我们太想去了解各种对被访者来说或许“琐碎”、“平淡”的细节。一句话，我们太想通过访谈去还原工人集体斗争的现场画面。因为，对于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来说熟悉的东西，对既没有经历过严肃的斗争，又缺乏

斗争传统的中国工人来说，就未必是熟悉的东西了。

说到这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访谈对象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的有六七十岁了，小的一般也都四五十岁。下边就统统简称为男人和女人。我发现的这个有趣现象，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叙事方面的一个明显不同。

男人一般都是从原则、理念开始讲起，而且每个人讲的都一样，都是他们组织的理论基础，当然，我没有轻视理论的意思，而且也理解他们接受访问时的谨慎。但是，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我们不得不打断每个男人必讲的这一部分，而请他介绍个人经历。在介绍个人经历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插进一两个问题，请他们适当详述，他们就会把本应很精彩的故事叙述的像宣读人事档案一样简单，只剩下时间、地点、人物。男人们介绍完自己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要求他把个人经历中的一两个案例详细地讲一讲。同样，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男人们好像依然没有打算让你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还是那样不动声色。但是，灯不挑不明，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于是，我们本着刨根问底的精神，不断的提问，试图使详尽的斗争过程和宝贵的斗争细节从他们的脑袋中走出来，重见天日。有的时候，在不断的追问下，他们似乎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回想起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慢慢地好像也有些小激动了。

女人们不一样。她们中很少有人会一本正经地从原则讲起。我们访谈到的几个女人都相当有亲和力，跟她们做访谈就像是听邻居家的老奶奶或大婶讲故事，开始时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们经历过十几年或几十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她们善于描绘场景，塑造人物，绘声绘色，手舞足蹈。但有的时候，情节上会不太连贯，或者不太完整。不得已，我们依然要追问，以便搞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大致的时间顺序。当然了，不是说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样系统连贯地讲事情，而是她们一旦知道了我们想了解具体的细节的时候，就能够马上进入一个她们最擅长的讲故事的状态，感情丰富，富有感染力；而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要让他们也能像

女人那样讲述，始终是一件难事。

从第三天开始，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到不同的地方，拜访不同的机构。每天都按照计划，由 M 或 S（都是联盟专职人员，负责接待我们，同时也是我们向导）带领，匆匆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一般来说，我们向导的车费和饭费都由我们负担。

言归正传。头几天我们走访的都是工联中比较重要的会员组织或部门，见到的都是当年的工人组织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都是各种机构或部门的负责人。

第三天上午拜访了工联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妇女事务的部门。

照例，先是双方的自我介绍。被访者是联盟前主席的女儿，80 年代初开始到一线做工人的组织工作，现在是联盟妇女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应该有 50 多岁了，胖胖的脸，圆圆的眼，带着一副花镜，亲切和蔼。开始的时候双方都有点拘束，可能是因为房间太过狭小的缘故，空气不流通，人也显得有点多。她先是讲起了年轻时刚刚做组织工作的经历。她本来是学医的，后来跑到工联里来了。开始，她父亲想让她在办公室里当秘书，但是她凭着热情和冲劲，直接去了工业区同工人接触，尝试去做组织工作。

访谈结束时，她去拿了一些印有她父亲头像的 T 恤，有黑色的，有红色的，250 比索一件。当时我们六七个人，总共买了三件。我感觉，她当时可能以为我们会每人买一件的，但是结果我们只买了三件，她好像是有点失望的样子。听说，他们的机构都是很穷的，所以募集资金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这个我们也都理解；我们自己在工作之余也要访谈，也要印书，有时也会恬着脸到处伸手找人要钱。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她都是一个热诚厚道的人，推销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太在行，但还是不得不做呀。

之后我们又拜访了一个修女。这个修女现在应该是“退休”了，住在自己的家里。这次工联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辆车，可惜在去路上出了

点小状况：司机迷路了。我们的向导也不知该往那个方向走，结果边兜圈子，边找人问路，终于在晚饭时间之前赶到了她的住处。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跑了两个多小时，结果访谈的时间几乎少了一半。

我们赶到的时候，修女正在门口等待。把我们让进屋后，大家围坐在客厅的一张大圆桌旁。她也是 70 多岁的年纪，身材比较高大，面孔较黑，也带着花镜，笑声爽朗。她笑着说，一个修女给你们讲组织工人的事情，感觉很奇怪。

一个老人讲起年轻时干的荒唐事儿，通常都是从十几二十岁开始的，而她干“荒唐”事儿的时候已经是 40 来岁的人了。那个时候大概是 1980 年前后，当时有一些工人组织者找到她，希望能借助她的宗教身份，为组织工人和帮助工人斗争的提供帮助。当时她想进厂做工，以便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但还是因为年龄问题而被工厂拒之门外。说起这些，她还是自嘲的笑着，但是很从容。虽然没能进厂，她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做就是好多年，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菲律宾的第一个周日很快就过去了。按照计划，周日是安排休息的。我们的向导每天跟着东奔西跑，很辛苦；我们自己从早忙到晚，不停的找人聊天，也不轻松。但出来一趟不容易，而且刚才也说了，我们恨不得跟他们每一个人都聊上三天三夜。于是，在我们的要求下，对方不断的调整计划，安排我们对其中一些人做二次访谈。我们知道不断更改计划会很麻烦，但是为了尽可能了解他们的经历，也就顾不得礼貌了。不过，对方似乎也能够理解。

从第二周开始，我们几个人分成两组行动。我们三个人去了外省一个出口加工区比较集中的地方，那里也是历史上工人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按计划，我们要在这里住两天。但一到那里，我们就知道两天是不够用的，于是就多做了一天的不速之客。总之，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这里的老工人组织者爱笑，但的确是一种深沉的乐观。从他们热情、轻松的讲述中，我们却分明感到了斗争的持久和艰难——斗争本身要求严

肃的战士，并会淘汰那些轻浮的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周就过去了。刚刚渐入佳境的访谈，就要结束了。

第三周，我们参加了一些交流和体验的活动。包括工联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游行示威集会、一次由我们向菲律宾朋友介绍中国情况的论坛，以及最后的团结之夜。

集会

集会的组织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一个全国性的大联盟，那么多的会员机构，要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在烈日下浩浩荡荡地向国会进发，要保持游行的秩序，鼓舞大家的士气，预备武装警察的监视和骚扰，都不简单。集会对一般的参与者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对于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工人来说，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要直接面对武装警察。这次集会就被警察和车辆拦截在离国会大约两公里的地方。组织者在总统发表公开讲话之前发起了一次对警察封锁线的冲击，但是失败了。上千的武装警察打退了工人的冲击，迅速堵住了缺口。冲突中约 90 名工人受伤，其中几名伤势严重的被抬上了救护车。

在菲律宾这个定期举行大选的国家，集会呀，示威游行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参加者都把集会当成了交友、募捐的机会，像是赶集一样。这种赶集式的集会，对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看上去意义很有限。

团结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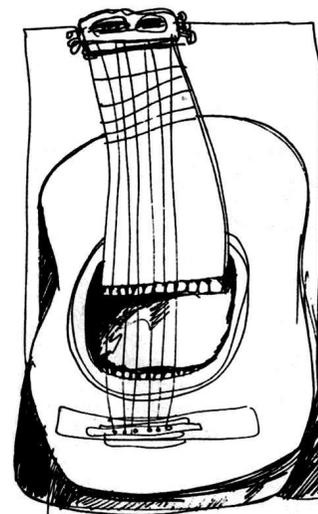
最后是团结之夜。包括三个内容：双方致辞，唱歌，吃饭。这个团结之夜是在联盟办公室的院子里搞的。地方不大，摆了两张小方桌，上

边有他们准备的炒面、烤鱼、奶油蛋糕，我们则买了两只烤鸡，炒了一盘土豆丝和一盘荷兰豆。然后大家团团坐。

他们唱的是菲律宾语的工人歌曲，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工人文化。吉他伴奏的旋律优美，歌声悠扬。不是说客套话，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那种斗争中产生的歌曲，由他们的老战士唱出来，确实使人精神振奋。

我们也干唱了几首中国的老歌，但是完全不带感啊。要不是脸皮厚，真的张不开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在菲律宾的最后一顿晚餐。又说又唱的，大家应该都饿了。菲律宾人似乎对土豆丝很感兴趣，他们好像从没有这么吃过土豆。有几个人还专门来问它的做法，要自己也炒来吃。看来中国的家常菜绝对有国际竞争力呀——寻常食材，制作简便，营养丰富，老少咸宜，哈哈……



菲律宾见闻

郝仁

穷工会和富工会

工会都要靠会费来运作。组织者没有工资，只有所谓的津贴（allowance）。如果工人工资比较高，会费多，工会就比较“富”；反之，工会就很穷，组织者的工作条件也很差。

我印象最深的是，某矿区工会的办公室。他们租用了一个两层的、木头搭建的小楼作为办公地点。一楼是会议室，二楼就是一个厨房，饭厅，客厅和一件卧室。卧室用布帘隔开，两个组织者分别使用一张床。如果他们有朋友或亲戚来了，就只能勉强挤一下了。我们去访谈的时候，凑巧其中一位组织者的女儿来了，晚上就只好父女俩挤一张床，我们同去的两个女性挤一张床，同去的男同胞和另一位组织者在客厅打地铺。客厅很小，上面挂着一张小黑板，上面写着一周的每日工作计划。他们有一台老爷电脑，但因为太破烂而永久地罢工了。其中一位组织者说，他每半个月去一次网吧，写东西，回复邮件。这也够难为他们的了。

到矿山的第二天，其中一位组织者用了整整一天给我们介绍了当地工人斗争史。现在普遍都使用投影仪了，但因为矿山条件艰苦，用的仍是粉笔和黑板。讲了半天，他满手、满身都是白色的粉末了。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大口地吸着烟，跟我们说，很希望能有一部投影仪，可以在培训工人的时候用。起身时，他那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不小心掉地上，他熟练地抠出电池，把用胶布固定的 SIM 卡重新固定了一下，装上电池，开机。他说那手机也很老了，以前用它拍过许多照片。后来他专门

给我们展示了自己拍的游行、纠察线的照片，拍得不错，美中不足是手机的像素太低，颜色也有点失真。他又说了一次，希望我们可以帮忙募捐电脑、投影、录音笔等。我们都在工厂上班，没什么钱，心有余而力



罢工中与警察对峙的矿工

不足啊。最后我们把一只录音笔留给他了，希望能派上用场吧。

后来我们又遇到两个很“富裕”的工会。有一天我们去访谈一个电子厂的工会干部，当时他们正在与一家牛奶工厂的工会在一起做培训，会场租在一个类似内地“农家乐”的地方。我们刚进去，他们就端来了加奶和糖的咖啡，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分发鸡肉粥，每一碗都有一大块鸡肉。中午吃饭时，菜量很足，还有香蕉和一种当地的水果。

N 厂是德资的半导体工厂，在中国也有分厂。据工会主席介绍，他们的工作一般比较有技术含量，工人的学历也比较高，大学毕业的很多，最低学历是两年职业教育（中学四年后接受两年职业教育）。该厂的工人工资比其它工厂工资高：日薪 605 比索。而当地最低工资是每天 337 比索（1 元人民币 = 6.65 比索）。跟他们一起开会的牛奶厂，工人工资可达每天 1000 比索。回去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在路边的小卖部躲雨等车，看见牛奶厂的工会干部开着小车，N 厂的工会人员也搭顺风车走了。

贫民谋生方式

菲律宾有很多贫民窟。某些繁华的商业区附近，就有大片的贫民区，像补丁一样密密扎扎、高高低低地盖在一起。听我们的向导 M 说，当

地政府为了把贫民区清除掉，有时候会放火烧房子，把人赶走。如果这些城市贫民也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话，就只好去别的地方再找一块空地，另外盖一座破房子。政府把这些难看的“补丁”都清除掉后，就可以建商业区了。

我和 G 曾跟着 M 去过一个贫民区。因为房子盖得乱七八糟，里面的小道也就歪歪扭扭。我们顺着一条小道去村子里发传单。那村子跟中国内地的农村有点像，他们直接从井里压水。房前屋后通常会种上几颗菜，还养着一些鸡鸭之类的家禽。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几个十来岁的小孩跟着我们去发传单，忽然窜出来一只“怪物”，那家伙跟鸡有点像，不过个头要大整整一倍吧，头红红的，脑袋下面吊着一堆鸡冠状的东西。那“怪物”盯上了一个小男孩，追在他屁股后面要啄他。男孩子到处躲都躲不过去，最后吓得边哭边跑。他是本地的孩子，我们也不担心他走丢，就继续发传单。发完回去的路上，男孩子若无其事地向我们走来，他妈妈对他说：“它咬你是因为你长得帅”，男孩子天真地说：“是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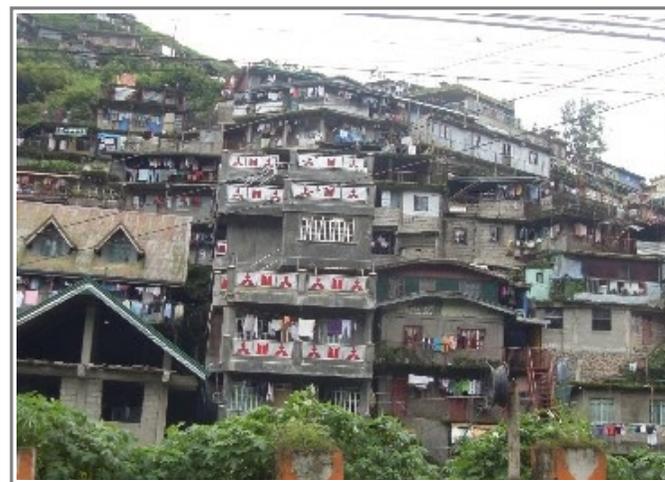
街上到处都是小孩。以前听说广东人生孩子多，好多都生四五个。现在，当我听说这里的贫民平均生 7~9 个小孩的时候，你不难想象我是多么惊讶。他们生孩子多，是因为这儿的人大部分信仰天主教，而教义不仅反对堕胎，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生育的。另外，估计他们也不懂得避孕。因为没有工作，很多成人也在村子里玩，有的打麻将，有的干脆互相捉虱子。

城市贫民到底怎么谋生呢？后来我们专门问了一个城市贫民的组织者。她说，他们主要做建筑工，力工（按天付钱），建房子、帮别人洗衣服，走家串户给别人做饭等。她自己在社区做垃圾分类。每个月 1000 比索收入。城市贫民一般来自周围或其他省的农村，也有一部分是被工厂炒掉后，无法再找到新的工作，就变成了城市贫民。以前了解到，有的工厂为了对付罢工工人，会到贫民区招一些人去顶替罢工工人的位

置。可是这位组织者说在菲律宾没有这种现象，因为菲律宾失业率高，大量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就更没有理由从贫民中雇佣工人了，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读书也往往比较少。

贫民区有各种组织：社区有妇女、青年组织，还有消费合作社。会员在消费合作社买食品等商品，还可以赊账消费。有的机构也会建议他们少生孩子。这些组织当然不可能让贫民的生活有大的改善，因为穷人太多，物价攀升，收入又低。但不组织起来，情况会变得更糟。组织起来互相总会有所帮助。他们的小孩大多数读不起书，将来多半还是贫民。很多五岁左右的孩子就开始自己出去捡塑料瓶去卖了。

城市贫民对未来没有什么期望，过一天是一天。当 G 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设想时，那个组织者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每天不停工作，只是为了有饭端上桌子”。



菲国游记感想及见闻

早 早

菲国的机场很冷清，而我也终于到了一个别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别人也听不懂的地方。从机场很顺利地到了五一工联的办公地点，来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问了我们是谁之后，我们就进去了，见到了我们在以后要访谈的 NT、RG 等。

晚饭是跟五一工联的人一起吃的。他们把米饭、椰汁鸡块、白菜胡萝卜辣椒炒面条分别盛在一个方形的铝制方盘里。吃饭的人自己选择吃什么，盛到自己的小盘子里。可能是因为饿了，我觉得饭菜还不错。而在接下来的日子就很难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了。五一工联的人晚上没事了，就看电视，据我观察，基本上都是偶像剧。

第二天终于到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把自己当外国人，不要怕丢人，一切都有翻译呢，呵呵。开始正式会议差不多要到十一点了吧。后来会开到一点，主持人 S 还没有提醒大家该吃饭了。我开始怀疑他们有没午饭吃了。我好饿，幸好，等我们问题问得差不多的时候，终于有人说该吃中午饭了。唉，这时间观念，真是不敢恭维，在以后的几天表现也很明显。基本上我们去访谈的地方，不是没有挂钟，就是表针停止，要么不准。我们开始猜测不守时的原因：物质贫乏，温饱都没有解决？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我们的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他们也根本顾不上看是否到了吃饭的时间。

在这次访谈中，很多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对我有了一些启发：

第一件事：那天去一个女工组织部见 O 时，我们以为是在四楼，但

是当走到三楼时，有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站在楼梯口凹进去地方，好像在等什么。我们就向她打听女工部在哪里，虽然没有提要访谈的人名，但经过询问之后，我们知道她就是专门接我们的。在她的引导下，我们一个个进了旁边的一个小屋，大概也就五六平方的样子，中间有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我进屋时，她正在把摆在角落的凳子一个个的搬出来。我开始以为她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客人。可是，我想错了，当她坐到桌子的旁边，我才意识到她就是我们今天要见的 O。看着眼前差不多五十岁，身体发福的她，我不禁又联想到之前访谈的 RG（其实后来的很多受访者都是这样）：他们从表面看跟平常人一点区别都没有，甚至很不起眼，但却有着非常精彩的故事。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职位，你在他们身上都看不出来。最让人舒服的是，他们谦卑，热情，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跟他说话的人。我们几个人每天一般都拎着水壶到处跑，而他们，说几个小时的话，虽然一口水都不喝，但仍能保持热情，太让人钦佩了。也许这就是经历过斗争的人的真实表现吧，对比国内我知道的很多人，除了口水多点，想出头，估计就没怎么把工人当回事。

第二件事：在访谈了几天之后，我们发现，菲国简直是个工人斗争的大宝藏：每个受访者都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经验。我们就像是入侵的掠夺者一样，不仅想从他们口里问出些什么，还想打包带走关于那个时代的资料。不过很可惜，基本都没有资料。我记得，O 讲了她当时如何组织工会，如何跟厂方斗争之后，我们向她索取那个时代的资料。她说：没有资料，因为那个时候有戒严令，别说没有资料，就是有也被查收销毁了。不光她这么说，C 也说没有资料，虽然是研究机构，但是资料也有限。当然，有很多资料是菲语的。所以很可惜，我们想要从菲带一些资料的愿望，就在一次次“没有”的回答中破灭了。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记录历史是这么重要的事呀。虽然以前我也认真做事，但总是跟一个小迷糊一样，有时还不明白状况，老是需要别人提醒，但是，以后应该不会了吧。斗争的经验永远都需要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当下，

更是为了以后工人自己的事业可以少走弯路，多一些经验，少一些失败。

除了上面的启发，我还简单记录了一些在菲时的琐碎见闻：

菲的交通工具

在菲的街上没有自行车、电动车，但却有由自行车、烧柴油的摩托车改装的“三轮车”：通常是在自行车、摩托车的基础上，再多加一个车轮，中间是一个铁架，搭上帐篷，帐篷里设一个排座，可以坐两个人。当然，菲人民很聪明，往往会在排座的对面再加一个排座，或只加一个人的座位。这样帐篷里面就可以坐三到四个人，而车后座还可以坐一到两个人，全车最多可以坐六个人。怎么样！这里的人民够聪明吧。当然，摩托车还好，但要是人力自行车，那就未免太残忍了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就坐在一个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里，虽然路程不远，但刚好是上坡，看着“司机”蹬着那么费力，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但是你不坐车，也许他今天就没饭吃了，所以还是残忍一些吧。

地铁

菲国的地铁站还是很国际化的，当然这只代表地铁口跟那个入口的电梯。我们每一个进地铁的人都要被搜身、搜包。记得第一次去地铁，几乎没有看到人。我以为地铁是高级交通工具，一般人坐不起呢。当穿过空旷的入口，特别是刚好有一班车到达这里的时候，忽然好像从地下冒出了很多人。再看看排队买票的人，足足有十米。要怪就怪只有一个售票口呀。进到地铁里面，空间就越来越小。站台那么窄，连空调都没有，闷热闷热的，我看见很多菲人都拿着扇子扇风，我们没扇子可挥的就只好挥汗如雨了。不过上了车就好了，有空调了，可能是为了证明有

空调，我们上的那节车厢上面居然漏水，真是清凉了一把。菲国的地铁设有专门的女性车厢，并且男人要给女人让座。我就眼见一个男的给菲女让座，那女的年纪不超过 25 岁，没有怀孕。不过很可惜，没有男的给我们几个女的让座。

菲国的饮食

记得在去菲之前，我们一直担心会没有肉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菲国穷嘛。可是，我们完全想错了，菲国除了肉就没别的了。每次去吃饭，看到的都是纯肉。那个后悔呀！怎么在国内就不多吃点青菜呢？可能会有人以为菲国没有农业。错了！菲是个农业大国，75%的人口在农村，但他们很少种大米、蔬菜，因为他们加入了 WTO，签有协议，包括大米、蔬菜等很多东西必须进口。同时很多土地改种了经济作物，如椰子、香蕉等。

菲国的肉比蔬菜贵不了多少，但做出的东西却比蔬菜实惠呀，所以，很少人奢侈吃菜，大家都吃肉。但不要误会，便宜是相对的，要说绝对的，那分量都是很少的。打个比方，在菲国的饭店，一般就是国内的那种快餐店吧（大饭店好像我都没有遇见过），一份米饭是标准的咖啡杯一平杯，菜则是盛在标准的咖啡杯杯垫那么大的盘子上，妈妈呀，这个份量，实在是超级减肥餐。当然，你可以多要米饭多要菜，可是那需要钱呀。如果实在吃不饱就只能加米饭了。

在这种蔬菜不足的情况下，菲人民又有一种吃饭的方法：那就是拌酱油下饭。如果觉得太单调的话，可以在酱油里面加一些小辣椒，加一个金桔般大小的酸橘子汁，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但我希望不要永远这么吃，太坑人了。我想菲人也不见得喜欢吃吧，因为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跟我一起的工作人员还是喜欢吃菜的。说起橘子，除了喝粥要放酸橘汁外，菲国的其它很多菜都做得酸酸的，比如我们最后一天买的

烤鸡。平常吃饭的排骨呀，五花肉呀，都有酸味。所以他们饭店一般都放几个瓶子的调料汁：一个番茄汁，一个酱油汁，一个用醋泡的辣椒汁，一个醋汁，对了还有胡椒面。唉，整个一个汁拌饭店。

菲国的风土人情

菲的人确实穷的太多了，我们访谈的好多人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们有的人却会拿出钱来给我们做饭。我知道也许他们知道我们会给钱，但是这样做还是很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去钉子厂访谈抗议工人时，他们就给我们买了可乐，面包，虽然我一口没喝，一口没吃，但那种热情还是感觉得到的。

在菲吃的最好的饭也许是在矿山了，不知道是因为跟市中心离得远，还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口味，他们的饭做得很合我们的胃口：一是有蔬菜（豆角）和另一种他们本地的蔬菜；二是不像在别的地方吃的那样，放好多这个酱那个汁，这里除了盐就不放别的了，比较清淡；三，他们自己装的那个肉肠（本地人装的，他们买的）也特别好吃，好像国内安徽的风味，不错。那几天估计是吃得最舒服的了。呵呵，到最后，那边办公室的人居然还开了红酒，好热情呀，虽然才认识不过几天，却感觉似乎是很有交情的朋友。哦，忘了说一下那边的风景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只能说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那么美的景色：天地合一，山被不同形状的雾笼罩着，颜色搭配得那么协调。我突然想，自己如果是诗人就好了，一定要用语言把这美丽的景色表达出来，而不仅仅是用相机拍下来，可惜，我不是，所以，我不能表达出来，我给别人形容时，只能说：比电视上的“请您欣赏”还要美！同时，这样的环境下，我怎么也不能把斗争跟这景色联系在一起，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舍得把这么美的地方变成斗争的地方呢？我还在想，在这个距地面几千米的地方，又是怎么跟下面的人共同作战的呢？因为我们上山的那一天，刚好

是主席演讲，很多组织游行的日子。我想，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么好的风景，而别的地方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出现暴力冲突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一点感觉。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这里跟那里要怎样才能连接在一起呢？甚至在下山的时候，我一想到要革命就要有牺牲时，我不知道谁会有勇气牺牲自己而为后代谋福利呢？

扯远了，话收回来，菲的治安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至少没有出现被偷被抢的情况，虽然五一工联工作人员一直提醒我们在车上不要把包背在背上（坐吉普尼，如果把包背在背上，背包对着大街，很容易被抢）。但是却有很多拿着信封要钱的孩子们，他们个个又脏又瘦，可能只有十来岁，有的甚至怀里还抱着一个。他们会在车停的时候上车，然后挨个发信封，然后再挨个收回去，他们很聪明，知道哪些人有钱，知道要向哪些人要钱。除了这些小孩，晚上商场墙角随时可以看见有小孩露宿街头，有的小女孩化妆抽烟，瘦得皮包骨头，很可怜。在菲国，很多抽烟的都是女人，据我观察，男人抽烟反而没有女人多。抽烟的人买烟不是一包包买，而是一支两支的买，糖果也是一颗两颗买。哦，对了，他们也有很多人喜欢嚼槟榔，但他们的槟榔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的一般都是味道极重的，菲国的没有味道，但是嚼了之后，嘴里红红的，好像喝了鸡血。

还要提一点，菲国的街道那是相当干净的，虽然穷，但好像街上也没有垃圾，垃圾桶也没见到过，只是偶尔会在某个路口看到一个大大的黑塑料袋是用来装垃圾的，并且他们的垃圾是分类的，可能是跟美国学的吧。说到这个我又联想到，菲国应该没有地沟油吧，吃的都不够，怎么炼地沟油呀！

菲国的贫民区（城市贫民）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记得那次跟 M 一起去

参加一个给城市贫民培训的演讲，坐车经过一个贫民区，看到好多人都在捡垃圾。M 告诉我们，马尼拉的垃圾就是运到这里来，这里的人就是靠捡垃圾为生的。我们只是经过那里，一股股臭臭的味道就扑面而来，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在那里安家，生活下去的。

因为菲失业人口巨多，很多人都沦为了城市贫民，而他们的子女又因为没钱读书，很多都是五岁就开始捡垃圾了，即使长到十七八岁，有的是力气，他们也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并且也许是因为穷，爸妈们都想着有一个出息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生很多小孩，少的要七个，多的有九个，我们去的那个贫民区，就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在他们住的地方跑来跑去，初步数了一下，感觉似乎比那里的成年人要多很多。可是，往往这些人很少有出息的，还是要继续当城市贫民，一直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建设，又把这些人的赶去，还烧毁他们搭的窝，使他们的生活更增加了一份艰难。

菲国的尾气

在菲国，只要你用手擦一下额头的汗，指甲缝里就全是黑乎乎的汗水。这个跟菲国的工业可能无关，但跟菲国的吉普尼一定有关，它的尾气不仅看着颜色重，闻着味道重，而实际产生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菲国的水果

菲国的椰子汁很便宜，可惜，我没买过。菲国的菜里经常会放这种汁，因为实在不喜欢他们放这个汁那个汁，所以我连带纯椰子汁也不喜欢了。菲国的菠萝很大个，比国内要大，吃起来也甜，就是太贵了，一

个菠萝要 50 个比索（相当于不到十块钱）。国内的个有点，但也不过四块钱吧。哦，忘了菲国的香蕉了，那可是我们在菲吃过的最多的水果。在菲国见到的香蕉，个头都不大，卖相也不好，皮都是有点发黑的，但吃起来很不错，有红瓢和白瓢两种。价格与国内也差不了太多，算是比较好吃又实惠的水果吧。

菲国的蔬菜

说真的，在去菲之前，我就没见过那么小的茄子和胡萝卜，怎么比喻呢，比手指略粗，跟手指长短差不多，嗯，差不多了，就这么大了，茄子可能会长点。西红柿，我说的是西红柿，比圣女果大一号，颜色黄不黄，红不红，青不青，当然，好一点就是红色的，吃起来味道也是西红柿。唉，营养不良呀。不仅这些长不大，土豆个头也不大。其它的如豆角，长得也很丑。与国内菜市场各种光鲜的蔬菜比起来，菲国的菜简直还不如菜市场交易过程中丢掉的烂菜。不过有一样菜便宜又新鲜——空心菜，5 比索一把，真是很实惠。怪不得在菲饭店难得见到蔬菜，空心菜倒是很多都有。

菲国发生的趣事（仅供自己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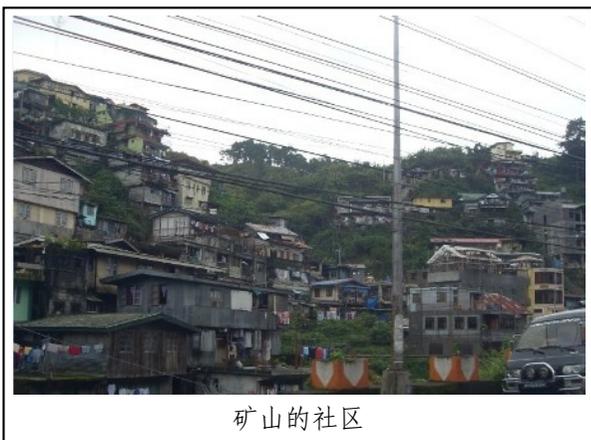
1，在矿山，我们访谈一个刚当选为工会秘书的小伙子。他知道自己英语实在是太差了，所以每次说不出话就自己使足了劲，憋红了脸，握紧拳头，低下头，狠狠地哎呀一声，那表情简直太好笑了。当然，最后访谈很不顺利，就搁浅了。但他可爱的形象还是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呵呵。

2，我们去矿山坐了一趟超豪华大巴：座位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车内有空调，电视，还有漂亮的乘务员小姐，并且居然还发水发糕点，飞机上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到了矿山底下，我们还享受了超豪华早餐：差不多一份早餐要一百多比索，为了省钱，我们三个人要了一份经济早餐——海鲜饭。这也够豪华的。饭一上来，看着跟豪华游艇一样，吃起来味道也不错，大出血，五个人早餐吃了 434 比索（相当于人民币 70 元吧）。

似乎还有好多没有写出来，但是又不知道还有什么，也不知道该放哪里合适，暂且写这些吧。

其实，后来我已经慢慢习惯喝冷水，用冷水洗澡，用冷水洗头发，习惯每天吃七分饱，习惯每天起来见到别人微笑说你好，习惯访谈时听他们讲故事，我们提问题了，习惯在任何地方大声说话而不用担心别人听懂了骂我，习惯了每天穿着人字拖鞋到处跑，习惯了菲国蚊子白天“八小时上班制”，但二十天总是要过去的，在这段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开了一些窍，并且更加享受自己以后的生活了！菲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呵呵，菲国的帅哥们，不要变样子哦！



矿山的社区

菲律宾行纪

小 武

印 象

同行的朋友在飞机上遇到一个女孩，她的爸爸是跨国公司老总，在菲律宾推广了奥利奥饼干，使得每个超市货架上都有奥利奥、每个人都吃奥利奥，她很为她的爸爸骄傲。也许当她从云端降下来，看看那里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样子，就不会再这么想了吧。马尼拉地区的最低工资是 426 比索，一家按五口人算，这些钱扣掉房租和水电开支，仅够吃两顿饭。在马尼拉街头会发现，每餐的饭量少得惊人，米饭一份只有 1 两多，菜也只是一小碟，很难吃饱。

在马尼拉上空，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看到马尼拉湾周围散布着一些小岛，陆地上是拥挤的成片的红顶小平房。从云端回到了地上，天气不再那么“不错”了，阴沉沉的，不时掉下几滴雨。这里一般从早上到中午是晴天，被太阳一晒，太平洋里的水变成了云，聚拢在菲律宾诸岛上空，变成暴雨降下来，把城市变成一片汪洋，然后再流回到海里去，循环往复，在这个季节每天如此。在后来了解到菲律宾人民斗争的历史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历史简直就像这里的天气：积蓄、斗争、镇压、黑暗，缓和、再斗争、松懈、被反扑……经过了漫长的革命的 20 世纪，仍然保留着令人发指的现代奴隶制和无耻的政治暗杀。这里的人们很喜欢谈论“长征”，他们的抗争的确就像一场长征。这里有很多中国革命的元素，我们的向导 M 抽完了烟之后，会像中国早期共产党干部那样，把烟在鞋底上一按，熄灭烟头，看到这一幕我在心里直乐，感到很亲切。

地铁和超市

为了“振兴经济”，菲律宾政府在各地划分出一些经济特区，再额外附加一些优惠。以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中心的一处商业中心为例，由于那里是副总统家族的地产，还是很多银行总部的所在地，所以这个地区也有很多其他的优惠措施。他们的地铁线路规划都是围着这个特区转的。这里恰好是轻轨换乘站，但是人们不能下了这一趟车直接换下一辆，而是要走上十五分钟，穿越副总统家的商场，才能换乘到另外一条线路。饶是如此，资本家们还是不满意，在菲律宾的报纸上经常能够看到“Cha Cha”，是“Charter Change”的缩写，也就是要求修改宪法。不管与现实多么脱节，宪法中毕竟还规定了工人有结社、罢工的自由，规定外国企业必须和本地企业合资，这些都是大资本不愿意见到的。

本地的制造业非常落后。在我们驻地附近的超市里，本土生产的产品不超过 30%，连一些日化用品都是印尼、泰国生产的。一个简单的铝制饭盒都不是冲压的，而是用铝条焊接的。由于本土缺乏产业，从事的只是最低级的“三来一补”，工人的就业状况很糟。大学生也是一样，文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去做外包公司的接线员了。

南他加禄省是吕宋岛乃至全国的重点工业区，64 个 EPZ（出口加工区）中，有 32 个在这里。ML 为我们做过一个粗略的估算，按每个厂 500 人算，工业区至少有 30 个企业，在他们那个省就有 50 万工人在经济区里“服劳役”。这部分工人的组织工作怎么完成，一直是一个大难题，在他们的内部也有很多的争论。

城市社区里的人分为几类：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中产、小资），城市贫民。城市贫民一般靠开三轮车、摆小摊这些“非正规经济”来生存，状况要比产业工人差很多。那里的香烟都是论“根”卖，可见人们的购买力之萎缩。

BL 和 VL

我们在外省的工人组织中遇到了这两位神奇的人。

VL 大概有五十好几岁，黑黑壮壮的，很结实，脸上总是露出调皮的孩子一样的神情，不管说了一句什么话，总是会缩着脖子捅捅你，好像两人之间有什么好玩的秘密一样，然后开心地仰起头来嘿嘿地笑，露出白白的牙。当我们神情严肃地采访的时候，他又特别耐心地配合，也是非常严肃地回忆。

VL 探讨了他早年组织的一次罢工的全过程，大概是在 1985 年，他当时是工会的主席，带领工人们搞罢工。一开始有些工人抄着家伙就去堵厂门了，“家伙”居然是冲锋枪。VL 说那个地方“文化”就是这样。他说他当时不得不耐心劝说工人把武器拿回去，不然他们会因此被屠杀的。说到这里，VL 手舞足蹈，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开心。不过话说回来，他总是一副特别开心、特别不着调的样子。

我们刚到那个工人教育中心的时候，VL 和 BN 坐在一起。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互相揶揄，BN 指着 VL 说，这是我们的“伟大领袖（Great leader）”，VL 听了一副无语的表情。

BN，参加革命前是菲律宾大学的学生，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像他的同学一样去跨国公司工作。结果他后来改变主意，想当一个“社会工程师”，去组织工人。BN 也有五十开外，神情安详而略带一点孩子气，但是眼神犀利，看起来坚毅又温和。我们刚围着木桌子落座，就看到 BN 手里拿着一只纸鹤。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这是他们接头的信物，他说这是做工人工作作用的道具。

BN 说，他会边折纸边与工人攀谈，教他们叠一些其他的好玩的东西，因为这里的人没有童年，他想让人们自己做一些玩具，算是一些弥补。

在和 BN 做了一上午严肃的访谈之后，我们着急从他那“榨取”更多的经验。他说叫大家放松一下，教我们折这些纸鹤，BN 简直像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耐心地解说，“这里折一下”，“翻上来”，“这样就有了两条长腿，长征需要长腿，向着自由的长征”（Long march needs long legs, long march to freedom）……

BN 会给我们展示两幅面孔，一面是安祥地折纸鹤，一面是架起胳膊，摆出斗争的神情。他说我们要既能显得“无害”，也要能显得“有害”，不同的面孔做给不同的人看。

政治暗杀

BAYAN（新爱国同盟）副主席说，前几天刚刚有一个叫威廉姆的荷兰传教士被枪杀在 BAYAN 的办公室里。歹徒冲进二楼，用枪指着传教士，让他跪下，说“你在暗中为人民军工作”，然后一枪打在头上，当场毙命。刺客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巧妙，是在教士刚从银行取了一大笔钱之后，尾随到了办公室，这就造成了图财害命的假象。警察侦查的结论当然也是一样：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是谁都知道，不是这样的。这个传教士长期在菲律宾从事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组织工作，早已经成了有钱人的眼中钉，一般会从军方或者警察里选出一些人，做这些肮脏的勾当，这些人在执行完暗杀活动之后往往就消失掉了。这是今年的第二起暗杀了，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同样被枪杀。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正赶上威廉姆的家属从荷兰赶过来参加追悼会。我们几个中国人和他们握了手，表达了哀悼。家属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都已经上了年纪，身材魁梧，表情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悲伤。在我们离开后，他们将就地进行一场漫长的弥撒，以纪念逝者。

BAYAN 组织有很多律师，在他们不大的四层小楼里面，专有一层就是律师的办公室。这些律师一般出身于学生运动活动家，隶属于进步

团体中类似“共青团”的组织。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傍晚，几个女工和我们讲述了他们律师的经历。那位律师专在各类劳资纠纷中为工人辩护，终于在去年的一次谈判之后，被资本家雇人杀掉了。

救市

BAYAN 副主席在提到政府的时候总是笑，仿佛那是一件很好笑的东西。他说，菲律宾政府花费十亿美金去救欧洲政府债券的市。这些存在银行的钱都是海外劳工汇回来的，可是银行不在国内对产业资本放贷发展本国工业，没处投，只好投到了欧洲债市。政府的说辞是我们的很多外劳在欧洲工作，不能让他们的经济垮掉。

E 修女

E 修女年纪也很大了，看上去快有七十岁，穿着一件黄色花衬衫，一头银发，说话的时候总是和蔼地笑着，眼神看起来很坚强，很睿智。在她住所的路上，我们花掉了将近三个小时。朋友说不敢相信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去拜访一个之前完全不了解的人，对于我们有限的宝贵时间来说，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她最好是个有趣的人”。实际上，她非常有趣。

回忆到当年政治活动，她说，虽然自己遭到了迫害，但是自己很快乐。她们很喜欢一群人偷偷做一些事情的感觉，而且是非常积极的事情。

当谈到她们活动的成功经验时，她说，最重要的是为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做一些温暖的小事。因为工人们的老婆总是抱怨说：你们总是在谈论原则、工会，但是我们不能油炸“原则”，我们得炸鱼吃啊！斗争和

生活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她们甚至教工人们怎么庆祝，庆祝节日，庆祝自己的生日，这些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没有用处。

谈到现在的工人活动家，她惋惜地说，现在很多人的视野太狭窄，只是看着政治活动的这一块，没有注意到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切入点，而且人们越来越依赖现代通讯手段，组织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系不如从前紧密了。说完了之后，她还自嘲道：“我觉得自己真像个觉得原来什么都好、现在都坏的老太太！”……

J

J是马尼拉地区一家制钉厂的工人。工厂有个很山寨的名字，叫“五角大楼”（Pentagon）。J全家四口人都生活在工厂边上，他的工资收入是全家的经济来源。可是半个月前，他被工厂不公地开除了。

在此前的数年内，工人们由于厂方提供的劳动条件太差、待遇太低，工人们多次组织抗议，后来工人们与五一工联建立了联系，活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所提要求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在前不久的一次厂区内的抗议中，带头的几个工人被老板开除了，其中就有J。很多工人为他们鸣不平，也被老板停职一个月。于是五十多名工人们聚集在厂门口进行抗议，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在厂方的车进出厂区的时候发出嘘声……

组织这次示威的工人领袖带我们来到他们租的一间办公室里。经过了窄窄的胡同，我们来到这间办公室，其实就是一间低矮的民房，建在洼地上，又热又闷。一起的还有几个工人，其中就有J，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访谈。

J有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了小学，一个还在幼儿园，他的老婆最近又怀孕了。对这样的一个家庭，失去唯一的经济支柱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敢想。可是在访谈中，J一直在腼腆地笑，和不久前在厂区门口抗议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斗士，而我们显得很紧张，不

知道做什么，现在掉了个个儿。J说他15岁就从外省来到了马尼拉，像很多年轻的中国工人一样，想到大城市来转一转，逛一逛。两年后他开始在这里工作，一直到现在。由于存在着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超过30岁的人非常难找工作，所以这次被工厂开除，对于J来说意味着他很可能不会再有这样一份稳定工作了。可在整个访谈中，除了做出简短的回答外，他就一直在笑。虽然能看出他很紧张，但是这个笑却不是像城里人脸上经常能见到的那种紧张兮兮的笑，而是非常放松非常自然的笑。当说到被监工欺负的时候，他在笑；说到失业的时候，他在笑；说到借高利贷的时候，他在笑；说到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笑……

最后在夜色中，我们搭上一辆吉普尼，离开了工厂。回头看看，工人们还守在厂门口，在边上搭起了一排窝棚。一个精瘦的小女孩百无聊赖地坐在路边的土坡上盯着我们，工会主席和J站在路边挥手道别。

笑

J总是在笑。不仅仅是他，我们见到的所有人都总是笑。谈到令人伤心的事情、令人愤怒的事情、无奈的事情、棘手的事情，他们总是在笑。可这笑不是苦笑，不是愤世嫉俗的笑，更不是罗素当年见到的底层中国人的温和笑容。

BAYAN的副主席在提到被暗杀的教士时，脸上挂着的就是那样的笑容，提到政府救欧洲债市时也是那样的笑容。他站在BAYAN的阳台上，隔着花盆指给我们看街角的一处房子，说就是在那里，一个进步人士和他的弟弟在上周刚被枪杀了，脸上还是同样的笑。

广告与电视

广告总是充满了欢乐过度的声音和表情，这里的广告更是如此。广告演员们会在句子中发出不自然的上挑音，脸上堆着僵硬的大号笑容，推销着跨国公司的产品。

广告占据了电视播出的大部分时间。在广告的间隙，电视台也会插播一些电视剧，一般都是男默女泪的本土或是韩国偶像剧。里面的演员皮肤白白的，带着宗主国殖民者的特征。男主角都涂着发蜡，女主角说话甜腻，和我见到的菲律宾人没有一点共同点。大街上的菲律宾人长相不同。有的有东亚人的特点，单眼皮，扁平脸。有的带着加勒比海一带的特点，卷发，大眼睛，深眼窝，厚嘴唇。大部分则是明显的马来人。但是，没有一个长得像电视里的那些明星。

偶遇资本家

19号晚上，我一个人从南他加禄坐大巴回马尼拉，在车上遇到了一个60岁左右的华人老太太，一打听，居然是一个工厂主！不过现在已经把厂子兑给了别人，自己只做一些顾问了。这种感觉真是奇怪：刚刚还在和工人活动家谈事，一转身就“撞到了资本家的枪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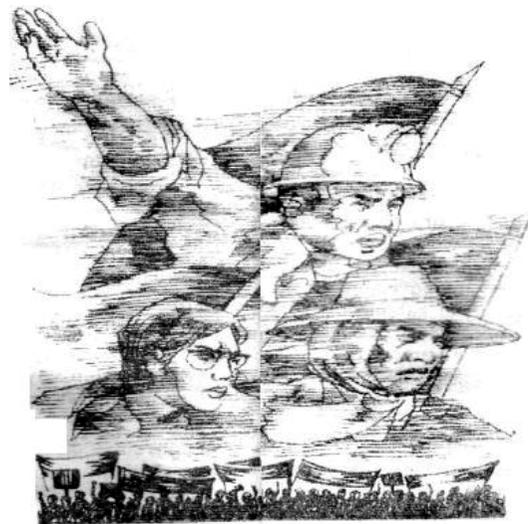
老太太见到中国人估计感觉还很亲切，主动和我攀谈。她告诉我，自己之前开了一家塑料厂，“提供了100多个工作岗位”，翻译成正常人的话来讲，就是雇了100多个工人。后来自己累了，就把厂子卖给了别人，她的合作伙伴是台湾人。我试图问她在厂里工人有没有提出过一些要求，她没回答，而是一直坚持和我拉家常。

老太太说，在这里用钱什么都能买得到，政府腐败得不成样子，报纸上除了日期什么都是假的。说她自己对菲律宾的认同感不强，虽然已经经过了三代人，但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她1980年代的时候在菲律宾大学学会计，据说也是个“激进青年”，后来就回到了人生正轨上，闷声发大财。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在IBM工作，一个还在大学学财务。

她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一路上看到的建筑。那里有巨大的厂区、私人的种植园，豪华的贵族国际学校，贫民生活的棚户区……看到街边躺着一个乞丐，她问我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没有。一进马尼拉市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到汽车站，我们在大雨中告别。

.....

我们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老奶奶尼塔，已经70多岁，又瘦又小，回忆起当初的斗争，她又开双臂，说，你要坚强，你要斗争。



菲国游

米 图

菲国电子厂普通工人的收入，折算成人民币和国内工人差不多，物价也差不太多，可是看起来却比国内工人的生活水平差很多。除了工业不发达，很多生活必需品都依赖于进口，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国内的失业率太高，所以普通百姓整体看起来就是很贫困。另外，因为天主教国家鼓励生育，他们标准的家庭人口是五口之家。越穷越生简直成了定律。记得去贫民窟的时候，被访者之一已经 40 多岁了，她正怀着第 10 个孩子，挺着大肚子接受我们的访谈，预产期就是当天。对于他们这些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群，孩子就是将来养老的保证。而他们最希望孩子以后能做的工作就是在工厂做一名正式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其实即便是在工厂工作的老工人，如果工厂不倒闭，不裁员，不关厂，能够幸运地顺利退休，也只能得到一笔一次性的养老金，用不了多久就会花光，以后的每个月只有 1000 多比索的退休金，连一个人吃饭都不够。而如果一个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以前去世，伴侣到退休年龄，子女到成年，每个家人都可收到固定的抚恤金。难怪 ML 嘲讽地说，在菲，退休还不如早点死，给家人的实惠还能多些。

M

长着一双菲国人的大眼睛，脸圆圆的很可爱，说话柔和，时常微笑。之前就猜想她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因为我们实在提了太多要求。说句不好听的，我们几个真是又穷又难伺候的访问者。

像其他很多菲国人一样，M 看起来也比她实际年龄小。我开始以为她只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但她其实已经有 30 了。M 在大学里就参加学生运动，也参加过很多政治游行。在 23 号的集会上，我问她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她说已经数不清了，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参加。问她参加过这么多游行有什么想法，她笑着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她很多大学同学都进了 Call Center（呼叫中心），工资和普通工人也差不多。毕业后她来到五一工联。五一工联的职员都没有工资，曾经因为孩子生病缺钱，她进入一个工厂里打工，做文职工作。因为工厂在工业区，办公室在市区，她经常要在办公室和工厂之间来回跑。她试图在办公室里组建工会，但是那个办公室是很多不同公司合租的，人员太分散，最终没有成功。问到为什么会想在办公室组织工会，她说，走到哪里就要组织到哪里。

M 带着我们跑这跑那。看她经常忙忙碌碌满头汗的样子，我对她表示了谢意。M 笑笑说，她没有觉得累，平时总在办公室里待着，能出来走走感觉是种放松。而且和我们一起做访谈，她自己也了解到很多东西，觉得很有价值。他们平时也会对工人做访谈，了解工人的情况，但可能因为做得太多了，有时候就是例行公事，忽略了一些工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通过和我们一起做访谈，她也学到不少。我不觉得她说的是客套话，所以也挺高兴，因为我们做得事情不只自己认同，也得到菲这些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的认同，感觉挺好。

有时候我们从外面回来很晚了，M 给我们安排好第二天的事情，也不着急回家，而是在院子里抽根烟，可能是放松吧。开始看她抽烟我还挺不适应。后来发现很多女的都抽，也就那样了。M 说话一直很温柔，只是在最后给我们办的欢送会上，当我们起立合唱国际歌之后，她突然弯腰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口号，呵呵，可爱的 M。

工运史

到现在我也没记住或者说没弄清给我们讲课的人的具体身份。只记得他表情严肃的学者模样，用着一个苹果电脑。虽说课程的标题已经订好是菲工人运动史，但开始的时候，这位老师还是先问了一下我们具体想了解的内容，因为他也没有准备一个很固定的讲稿。后来我们要求先介绍一下政治经济背景，然后再分时期讨论工运的特点。这位老师水平还真的是很不错。我们在政治经济背景上提了不少问题，这些和预先设定的标题相差比较远，但是他还是讲得挺清楚，说明他知识储备很丰富。而且也从来不会不懂装懂，有不知道的，就直接说不知道。没有东拉西扯，或者含含糊糊的搪塞。

ST

去之前听介绍说这是菲的重要的工业区，全国一半的出口加工区都在这个地区。但也不清楚会是怎样的情形。

下了车见到 ML，带着我们拐了几个弯就到了他们的活动中心，是一个两层小楼。进去之后，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我们来到院子里搭的棚子下面的长桌旁。和坐在那里的 BN 和 V 打了招呼，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访谈。

几天之内，我们和不同时期的工人组织者们进行了访谈。他们有的是从 1970~1980 年代就参与到工人组织中去的，有的是从 1990 年代，也有 2000 年参与的。他们参与的时间或长或短，但直到现在都是活跃在一线的组织者，直接和工人们接触。

工人活动中心有一对小夫妻在那里看门做饭，大概就是二十刚出头，也是没有工资的。两个人都是黑黑的，我猜是菲的土著民族的特征

长相。女孩子胖胖的，眉心有点痣，很喜欢开玩笑，很热情。吃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她是女版的毛主席，只是痣长错地方了。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一个印着主席头像的钥匙链，但是主席头像被拉长了，变成加长版了。后来我们在集会上又遇到她，她高兴地笑个不停，拉着我们去认识从 ST 来参加集会的其他同事。

贫民区

马尼拉临省的一个山上有很多外地贫民搭建的棚子。比起在垃圾山附近建的那些贫民区来，那里应该算好的了吧。那里有不少青年是做建筑工的。安排我们就是去那里访谈在一起事故中遇难的建筑工家属。那天一早就下大雨，E 机构的同志建议我们取消访谈，因为山上的家属来信说，雨太大会山体滑坡一类的危险。无谓的危险当然不要冒的好，但既然来了，能访谈还是去访谈，我们就说先等等看，如果下午雨小一些，能去还是去。同时也在想，那边那么危险，天天住在那里的人可怎么办？

我们上午就先在机构里了解了一些建筑工人的大致情况，也便于下午再去访谈具体问题，顺便请他们复印了之前要的资料。下午雨小了，山上的家属来信说，那边可以去了，我们就出发。因为是看望遇难者家属，就在路上买了些香蕉，表示点意思。

车还算顺利，没遇上堵车，大概半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马路的侧面有条小路，通向他们住的山上。有一个类似大门的铁架子，上面写着菲语，大意是欢迎你来到×××，还挂着一些小彩旗。CLS 介绍说这是一些村民自己做的。真是穷也不忘美化自己的门面。在我看来，我们走的路没有他们描述的那么危险。有一些村民自己铺的石头台阶。小路太多了，CLS 自己都忘记该走哪条路，找人打听了一下才找到地方。

问了 CLS，之前也有外国人来看望过他们，所以家属对于我们不会感到太别扭。我们到了一家门前，女主人和几个孩子在家。CLS 介绍了

我们，女主人没有表示特别的热情，就是请我们坐下。可能开始跟我们还是有些拘束吧，后来我们越聊越多，问起她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跟她们介绍一些国内建筑工人的情况。女主人和后来赶到的那位孕妇，都渐渐放松下来。

因为建筑工家属只会很简单的英语，所以 CLS 要再把我们的英语翻译成他加禄语。我们讲着讲着，那位孕妇突然起身走开，我担心是不是跟我们说烦了？女主人解释说，今天就是她的预产期，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站起来走一下。好窘迫啊，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还跟我们在这里做访谈。CLS 说没关系，这是她第 10 个孩子了。看来她已经很习惯生产了。不过既然今天这么特殊，我们也不适合多待。和孕妇确定了她身体没事之后，我们又谈了一会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给她们照了一张相。她们也给我们照了一张。女主人显得比刚来的时候高兴多了，也算是和我们比较熟了吧。

集 会

游行队伍一早就出发了，我们在院子里等到十点多，M 终于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坐吉普尼到了游行队伍所在的地方。我们下了车，跟在五一工联的大旗后面走。五一工联的大旗很大，三个壮男举着很粗的竹竿，还有三个人拉着绳子，根据风向调节用力。

有很多团体参加集会。有工人，城市贫民，学生老师，医生护士，妇女团体，环保团体。他们沿着不同的游行路线汇合到我们行进的主干道上，然后停下等着五一工联的人走到前面去打头阵。路一边的绿化带边，有出口的地方都站满了手持盾牌和木棍的警察。路旁酒店的保安手里握着像散弹枪一样的长枪。这个让我有点搞不懂，为什么警察只是木棒，保安却能有这种装备？去年去菲大的时候，学校的保安也是配着手枪。

问 M，游行有没有经过政府批准。M 说，申请了，但是没有批准，

不过游行照样进行，而且往年都是这样。我问警察会不会来抓，她说，只要不堵路，就没事，但是如果冲破他们设置的路障就会发生冲突。又问道冲破路障的时候谁会是在最前面，M 说，五一工联的人冲在最前面。五一工联的人里有工人、城市贫民、司机等等，其中又是工人冲在最前面。大家都是自愿来参加集会，没有补贴，请不下假就要旷工。

那天的太阳很大，游行的人们有的打着伞，有的用毛巾搭在头上。还有很多小孩子，被大人拉着，抱着，或者让他们骑在脖子上。可能之前对我们这些外国友人的安全提示过多了吧，参加游行总给我一种紧张感，看到这么多小孩子，有点担心这种集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太不安全了。我们路过一辆吉普尼，里面有七、八个小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参加游行的人的，六、七岁的样子，他们从车里探出头来跟着游行队伍一起喊口号，声音不大，却很整齐。我们听不懂他们喊的什么，但是小孩子稚嫩的声音和天真的面孔，让人看了实在忍俊不禁。

走了大概不到两公里，因为不舒服，感觉步伐越来越沉重，巴不得赶紧到集会场所，好找个地方休息。走啊走，终于看到大批人群聚集的场所。再往前走两公里就是国会大厦，阿三世下午要在那里进行国情咨文的演讲。沿路摆了不少喇叭，里面的人喊的口号震天响。人们其实是被堵在这里的，因为正前方就是警察设置的路障，还有消防车，防暴车一类的在路障后面停着，右侧是一个商厦，路边搭着红十字会的临时帐篷（五一工联联系他们来的），还有好多电视台的记者，在不同的位置



吉普尼
停车点

拍摄；左侧是公路中间的绿化隔离带，缺口处用铁丝网封着。

我们停在这里，但是并不无聊。旁边有辆集装箱车被拆掉一边做成了临时舞台。有各个机构的组织者上台演讲，欢呼，带领大家喊口号，还有表演，唱歌，诗朗诵等等。很多小商贩也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地卖东西。甚至还有小贩在没有冲突的时候跑到旁边镇守的警察面前推销冰镇水一类的。有一个小贩拿着几条印着中国字的，很像陕北老农用的那种白条毛巾来跟我和 L 推销，还一直说毛巾很好看。

五一工联有一辆著名的宣传车，据说马尼拉的警察们对它都十分熟悉。那个老车门是要抬着才能打开的。现在这辆车变成了小型卖场，出售印有菲民族英雄的红色 T 恤，还有花生米。另外还免费供应饮用水。开车的司机是一位干瘦满脸皱纹寡言少笑长相很苦的大伯。他给我的感觉最神秘，独来独往，很少说话。常见到他吃的晚饭就是咸鱼干加米饭。有时候想找他搭话，又不知道说什么，偶尔说几句，又彼此听不懂。

记不清什么时候了，突然看到眼前的人都往左侧呼呼地跑，然后有人说他们冲破绿化带的铁丝网了，我就跳下车去看热闹。跟着人群跑到绿化带的铁丝网旁，没一会就又看到有人呼呼地从铁丝网那边往回跑。我心想，坏了，肯定是警察又冲回来了，呀，可别把我们抓去问话或者一顿乱打就麻烦了，我就又跟着人群往回跑。边跑边回头看，那边警察好像也没冲过来。就是把那个缺口堵住了。我看着他们三又走回去，这才壮着胆子又靠近那个被警察堵住的缺口。难怪那些人又跑回来了，调来了一卡车警察，没有七、八十人也有五、六十人。他们堵在缺口处，很多都是年轻人，有的还在咧嘴笑，除了警察身份本身带来的压力以外，其实看他们的表情一点也不觉得恐怖。不知道他们是对这种场景见多不怪了，还是怎地。

我站在那里呆看，大喇叭里不知道喊着什么。后来听说当时冲破缺口之后，喇叭里就在调度人群，并且告诫游行不要向警察投掷石块，或者攻击警察。眼前不知从哪里过来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妇女，不知道

她的身份，大概是工人或者贫民。她溜到绿化带旁，从草丛里翻出一块近乎椰子大的石头，两只手抱着。我心想这石头也太大了，砸过去保准有人头破血流。她扭头看到我正惊讶地望着她，微微一笑，就往警察站着的地方凑，但是又不挤到最前，而是混在人群里。最后她应该没有扔出石块吧，不然眼前的警察们肯定不是这么安静了。

我转过身去，又看到一个男青年提着一根很粗的竹竿在人群里跑，看样子是要冲到绿化带附近，不知道要做什么。赶来支援的警察已经把先前冲开的缺口堵死，看到冲击无望，聚集在附近的人群也逐渐散开。

后来我们跟着 M 跑上天桥去看。天桥上一直都有很多人在那里看热闹，十分拥挤。还有某电视台的记者一早架了摄像机在那里拍。我们都有点担心这么多人站在上面，天桥可别压塌了。因为站得高，从游行开始就盘旋在上空的直升机离我们更近了。我努力想看清机舱里有没有机枪一类的东西，但是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每次直升机逼近我们的时候，马达突突的声音，好像随时会对人群进行扫射一样，都会让我胆战心惊一下下。

我们望着远处的路障，消防车，警察，还有冲破封锁的一部分人群。但是离得太远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陆续有几个示威者被抬上救护车。

下了天桥，又回到车边，待了没一会，人群就逐渐散开了。五一工联的人告诉我们说人们冲破了第一道防线，但是没有冲破后来的防线，所以游行结束，准备回去了。呃，怎么觉得有点有头没尾呢……想起来开始 M 说，游行的目的主要是抗议阿三世的政策。从表示抗议的角度来看，倒也应该是完成了。

撤退的时候，可能是几个女学生吧，跑去和仍然堵在绿化带的警察照相合影去了，看她们笑呵呵的样子，都让人疑惑刚才是否真的有过冲突了。虽然各组织的人渐渐散开，但是几个一直在马路上涂鸦的学生还在专心地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涂鸦就是讽刺阿三世的漫画。

零散印象

回去问 G 这里的游行和美国比起来怎么样。G 介绍说，美国的游行种类很多，有的就是一些人在街上走一走喊两声，也不会发生冲突，有的也会像这里一样发生冲突。美国的游行往往比这里的要热闹。人们的口号更幽默一些，类似克林顿是个大猴子一类的。还有很多讽刺画，一些人会边走边弹吉他，表演节目等等。卖的东西种类也会很丰富，除了 T 恤，还会有袜子，手套，帽子等等，更像一个临时集市。G 说，有些人对游行乐此不疲也是因为可以多认识人，因为游行就是个大聚会。提到游行能起的作用，G 说要看游行的要求了。那会美国的反战游行，虽然参加的人数很多很多，但是没有用啊，国家是不会因为有人游行就停止战争的。她认为罢工当然是最有力的手段，但也不是说否定游行的作用。好像是墨西哥吧，有一些母亲每周都会在市政府门前游行，要求政府对她们失踪的女儿负责，因为有成百上千的年轻女孩在边境处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这个惨状也要问罪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边境开放政策。这个游行持续了几十年，好像是成功了吧？忘了她怎么说的了。总之，这些母亲就像是蚊子一样，用游行的方法一直在市政府门前嗡嗡个不停。

隔了一天，电视里播出游行的镜头。场景比我所看到的要激烈的多。当然，电视台并没有播出警察如何殴打示威者的画面，只是反复播放示威者如何冲击警察，如何手持竹棒木棒砸碎汽车玻璃，如何把赶来堵住缺口的垃圾车司机从车上拖下来，等等，诸如此类。游行前组织者说大概会有两万人参加游行。而报纸上的报道也很夸张，说是 6000 警察对抗 5000 示威者。虽然示威人数可能到不了 2 万吧，但是肯定是比警察多的。五一工联的人说受伤的示威者大概至少有十多个，但是报道说只有两个，警察受伤的倒是一大堆。嘿嘿，媒体啊。忘了听谁说到，菲律宾是有自由，五一工联就可以建自己的电台，发行自己的报纸。但是，根本没钱弄，所以自由也是白费。

在菲见到的各类机构、工会中的各类职员，组织者，很少有那种一看就很浮躁，或者轻浮的。要么是上了岁数，饱经磨难；要么是很年轻的，看起来很单纯，淳朴。

在 ST 的时候，ML 告诉我们，社区里刚搬进来一个陌生人，他们怀疑他是特务。因为那人只背了一个背包就住进来了，说自己是做保安的，但是皮肤却很白，不像一般的保安。他分析说应该不会是因为我们把特务引来这里的。因为安全需要，他们对于社区里常住的人都很熟悉，也会和他们搞好关系，以防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支持。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因为担心我们的安全，那个刚从丰田辞工的年轻人主动提出要送我们去车站，那个胖女孩也笑呵呵地跟着要送我们。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他们安全多了。他们把我们送上车，然后就下去了。没一会他俩又上来，我正纳闷，他们掏出相机说，我们待了几天还没有跟他们照相呢，嘿嘿，我们就在车里把脑袋凑在一起合了个影。

去年的大会上，菲的活动家们就最喜欢喊 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ies! The people united can never be defeated! (国际团结万岁! 团结的人民不会被打败!)。口号很有力量和节奏感。通信的时候，也会在信末尾说几句国际主义万岁，工人团结万岁一类的话。甚至发短信的时候，他们的祝福也是团结万岁。



第 1 章 马尼拉的五一劳动节

资料篇

GTU in the PHI Report of the UK Group 1985 1985 年英国团体关于菲律宾“真正的工会”的报告



作为来自 PSG TU 委员会的代表，我们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际团结大会；这场大会由五一工联（KMU）主办，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召开。国际团结大会的目标是：第一，促进国际团结；第二，为代表提供一手资料；第三，为“菲律宾和国外的劳工组织提供接触与合作的机会”；第四，使 1985 年 5 月 1 日真正成为国际劳动者的团结日。

五一劳动节正值菲律宾夏季最炎热之际。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们在马尼拉及周边参观了一些地方，这是实现大会目标的一部分。

瓦伦瑞拉（Valenzuela）的游行

我们最早的体验之一是从马尼拉市中心的北部贫民窟到菲律宾劳动就业部的一次游行。瓦伦瑞拉工人联盟（the Alliance of Workers in Valenzuela, AMVA）组织了此次游行。当地的十八家工厂是戒严法颁布之后第一批举行罢工的地方。我们加入到 Artex 厂的队伍中，到中午的时候和其他几支队伍一起在纪念碑前集合。五千人浩浩荡荡向市中心进发。

游行队伍的气氛很活跃。人们高喊，“工人必胜”，“罢工是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今天我们拿起了武器”。他们高呼，“K-M, K-M, K-M-U”。原来“KM”代表 Kabataang Makabayan，是被取缔的全国民主阵线的青年组织。当队伍出现空档的时候，他们就高喊，“集中！集中！”，人们就会立即跟上来填补空档。菲律宾的游行采用防卫战术，人们手挽着手，在队伍侧翼高举着和队伍一样长的条幅以保护侧翼，并避免队伍出现空档。在 1984 年的五一游行中，警察就曾从游行队伍中抓走了一些人。

我们到劳动就业部（人们把它叫做劳动剥削部），谈判就在那里举行。集会的发言人对政府进行抨击。去年瓦伦瑞拉有三名工人被杀害。劳动就业部的办公人员从楼上俯视，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也发了言——右翼媒体

把这种场面形容成一处观光景点。

小品在街头上演。戴着高帽的美国佬指示要获得更多的利润。监工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干活。工人的劳动成果被美国佬拿走。枪手强迫工人继续工作，而监工和美国佬挥舞着 BP 130 和 BP 227 两项反工会的法律。而后工人们抢夺了武器并制服了监工。美国佬落荒而逃。观众们热烈鼓掌，高举手臂，齐唱《国际歌》。

几周之后，劳动就业部副部长卡梅略·努里埃尔（Carmelo Noriel）先生对我们表达了他对瓦伦瑞拉发生的罢

工的担忧，说这些罢工是不合法的；他所谓的法定的解决办法是就劳资关系问题进行地区性商谈，他是在 5 月 13 日开始说这番话的。

我们的左翼报纸《论坛报》的第二天头版标题是《马科斯 VS 劳动者》。马科斯总统说过，没有官方许可，在 5 月 1 日游行是非法的。五一工联的主席奥拉利亚说无论是否许可，工人们都将举行游行。五一工联并没有申请官方的许可，以前也从未申请过。这或许是场心理战，但是五一工联不知道军队是否会阻挡游行路线。美国的代表致电一位在某个委员会任主席的议员说，五一劳动节不应受到干扰。菲律宾的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劳动者的状况

工人的斗争性源于他们的经济状况。

1984 年 11 月，普通六口之家的贫困线是每日 105.38 比索（5.10 英镑），而在马尼拉，包括生活津贴和额外的工资奖金在内的全部最低工资只有 57 比索（2.51 英镑）。工人还常常拿不到最低工资。工资落后于物价上涨；1984 年 10 月的通胀率高达 63%。菲律宾官方标榜的小时工资在亚洲排名垫底：

在新加坡，每小时工资是 1.75 美元，在菲律宾只有 0.36 美元，在美国则是 14.4 美元。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的人口营养不良。菲律宾大学在 1984 年一份报告说，“政府在工资问题上的态度和公司经理们一样；工资主要是一项生产成本，而不是劳动者所理应得到的产品的一部分。”

菲律宾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有文化而且勤劳。菲律宾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土地和资本被外国人占有，53%的投资是在美国业主的控制之下。

在瓦伦瑞拉游行的标语中，人们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菲律宾的外债高达 260 亿美元，意味着每个菲律宾人欠债 600 美元。1984 年菲律宾的国际收支赤字是 22.7 亿美元。

经济学家 Alejandro Lichauco 证实了上述状况，“我们的民族为了服务于美国在亚洲的军工复合体而正在被无情摧残；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荒芜之地，丧失了发展自我生存条件的机会，被迫以祖产偿付进口商品及换取贷款，倍受外国人的掠夺。”

半数劳动力（约 1100 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劳动就业部说这一数字是 200 万，因为他们把只要在过去三个月中工作过一个小时的人都算作就业人口。计入全职工作人的口中，有一半其实是处于兼职状态，每个季度的工作日不到 65 天。

处在日益恶化条件下的工人们很容易采取斗争行动，对经济困难不满的群众也支持工人斗争。去年，93,386 名工人被解雇，2212 家企业倒闭。1984 年有 9820 次罢工通告，实际举行了 282 次罢工，63,478 名工人参与了罢工，因此减少了 1500 万个工作小时（劳动就业部数据）。据说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罢工太频繁了，以至于政府不再记录罢工数量。88 起罢工持续到了 1985 年，并且从 1985 年 1 月至 4 月爆发了 127 起罢工。

福布斯公园和斯莫基山

马尼拉有 800 万人口，比伦敦还多。这里街道破旧，污染严重。

然而在马科斯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推动下，马尼拉观光景点颇负盛名，比如马尼拉的国际电影中心和菲律宾亚洲心脏医疗中心。

马卡蒂市的阿拉亚大街是银行区，到处是新建的高楼。我们开车经过福布斯公园，看到近郊的豪华别墅和草坪装饰的大道，以及保安人员。武装保安守卫着马尼拉保罗俱乐部的入口。鲜花和绿植都是极好的。到处干干净净。

穿过市区就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通都（Tondo）。家家户户在“垃圾山”（Smokey Mountain）捡破烂过活，并且住在那儿的窝棚里。

拥有一切的富人和一无所有的赤贫——这种社会能持续多久？

1985年5月1日

五一劳动节揭露出工人团结中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三场独立的集会都在举行。

去年，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与五一工联在工人反抗贫穷全国联合会（PKMK）的组织下共用了一个平台。TUPAS 主席今年暗示说，五一工联对他出任 PKMK 的副主席大为不满，而 PKMK 跟五一工联是有关联的。据说，莫斯科敦促作为世界工联（WFTU）一员的 TUPAS 组织自己的集会。

5月1日，在邮局大楼前波尼法西奥广场（Liwasang Bonifacio）的传统集会地，TUPAS 于上午10点庆祝劳动节。有5000人参加。

在参加集会的人中有俄国记者和工人领袖。来自苏联的 Allain Stern 和 Valentin Gorschiwki 这样总结他们此行的经历：“第一，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达不到标准；第二，工作没保障；第三，保护工人反抗压迫境遇的权利的劳动立法不够；第四，跨国垄断集团勾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导致第三世界在经济上遭受奴役。”

菲律宾工会大会（TUCP）是此时人数最多的工会中心，他们在马尼拉东北部的奎松市（Quezon）举行了集会。媒体报道有1000~2500人参加。菲工大的内部刊物《菲工大本周报道》否认道，“我们自己录制的四小时视频以及从中截取的图片证明早前的报道不实。”从视频中截取的图片上是一部分群众，计约200人。

在菲工大三个小时的集会中，银行职员焚烧了央行行长的模拟像，以抗议银行结业。其他的要求包括增加工资，举行三方会谈，以及重新雇佣失业的菲律宾国营铁路工人。与往年不同，菲工大没有邀请马科斯总统参加集会。菲工大还提到全国农民组织代表大会（NCFO）的参与，这一组织和菲工大有联系。据五一工联提供的信息，“一半集会者听说他们的某些领袖去总统府听马科斯总统的五一演讲后，立即就离开了。”

在五一工联的五一活动中，集会游行从早晨开始，英国的三人代表团在巴石市区（Pasig Rotonda）加入进去。我们举着一面印有“联合国”字样的旗帜走在马比尼（Mabini）观光大街上。游行者突然一阵慢跑，并且呼号——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兴奋，倒不是想吓唬资产阶级。墙上的标语写着，“打倒美国—马科斯独裁”。一张海报说，“所有挥洒汗水劳作的人们，五一是我们的节日！”反金融压迫组织（FIST）说，“工作量如山，工资一点点，是何道理？”

天气很热。我们唱到，“马科斯总统下台啊，下台啊，第一夫人也下台。”我们的游行由五一工联的一个地区联合会领导，我们举着一条巨大的条幅，上书“打倒美国—马科斯独裁”。那里没有警察。

下午两点半演讲开始。不同团体登上讲坛，包括 Butz Aquino，他是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兄弟。主持人是来自五一工联执行委员会的 Lolly Gozum，她的声音清楚且铿锵有力。奥拉利亚抨击马科斯的“均等牺牲”的号召，他说：“正是跨国公司、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公司以及政府本身，才应该承担紧缩财政开支的压力。”

在众多旗帜中有卫生工作者联合会（他们的主席 Minda Luz Quesada 做了演讲）、联合银行职员组织、ACTO 和 PISTON 等运输工人组织、SAMAKANA 妇女组织以及 ATOM 组织（阿基诺的八·二一运动）。那里还有一个12英尺高、长着三个头的怪物模拟像，三个头分别是马科斯、美帝国主义和菲律宾军方，塑像最后会被焚烧。

国际代表在下午七点半开始登台演讲。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大会、荷兰工会联合会（FNV）、美国六个城市支持菲律宾的团体、福特工人国际联合

会以及英国公共行业工人联合会（NUPE）的主席都发来了团结信。团结信一共有 59 封，其中 18 封来自美国。

所有演讲者都讲菲律宾语，一个演讲者开玩笑说有个资本家只会几个菲律宾词汇，比如“剥削”和“解雇”。英国代表的发言如下：

“兄弟姐妹们，英国工人阶级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我要为讲英语而抱歉，我意识到这是帝国主义和剥削者所用的语言。我也学到了一些菲律宾语。我要用菲律宾语向菲律宾工人致以热烈的问候！”¹⁵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谴责对菲律宾工会活动者的谋杀、折磨和压迫！我们要对菲律宾政府说：全世界谴责你们反人类的罪行！任何自命为文明的社会，都不应发生此类事情。我们向五一工联的烈士们致敬！他们的鲜血将换来明日之自由。我们为五一工联的勇气和力量而鼓掌。我们见到了被关押在克雷姆集中营（Camp Crame）的工会的兄弟姐妹。真正的工会主义建立在坚持罢工的意志上，正如自由包括反对政府的权利。”

“如果五一工联的领袖被捕，国际工会运动将捍卫他们。菲律宾的航运业和菲律宾航空公司将会被列入黑名单。我们要对五一工联说：你们并不是孤军作战。”

“菲律宾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真正的工会主义的进步。反劳工的法律将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如同黑夜过后光明一定到来一样，解放定会来临。历史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我们必将胜利。”

“在伦敦，我们有首歌这样唱，‘伦敦桥快塌了，伦敦桥快塌了’，在菲律宾，某些东西也快要塌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在伦敦，一位工人的预言家说过，‘我们得到的将是全世界。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团结起来的工人永远不会被打败。”

“5 月 1 日是世界各地工人的节日。将来每一天都是工人

的节日。工人阶级万岁！国际大团结万岁！”

最后，38 名国际代表唱起了《永远的团结》之歌。

在同一天，其它城市也举行了集会。五一工联称有 35 万人参加。在巴戈洛市（Bacolod），五一工联称有 40000 人参加了 5 月 2 日的集会；另据商业日报（Business Day）报道，“三分之一的群众是从山区下来的新人民军。”5000 名工人从巴坦省（Bataan）出口加工区游行到 47 公里外的巴兰嘎省（Balanga）的首府。30 到 40 名新人民军身着制服出现在路旁。他们紧握着拳头向游行队伍致敬，高喊“工人必胜”，并向游行群众发放糖果。新人民军出现在五一集会上，这还是第一次。媒体不予报道。一些日本的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也在现场。

在马尼拉以外，有六个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5 月 1 日在总统府举行了庆祝活动。总统签署了关于对罢工强制实行劳动法的命令，建立了由总统领导的劳资和平委员会，鼓励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并发展海外就业。总统还建议暂停解雇人员。第一夫人出席了两个颁奖典礼，奖励 20 位“共和国的杰出工人”。

庆祝活动的工人回家以后，警察就准备强行在清晨闯入美国医院供应处雇员工会所组织的罢工纠察线。两天以后，在另一处 Metaphil 公司的纠察线发生了政府参与的暴力事件。5 月 7 日，Jenoschik Paul 在一场 Silicon 公司的罢工中遇害。5 月 9 日，Marlon Latina 在内湖省（Laguna）的 BLTB 巴士公司遇害。5 月 13 日（及 5 月 16 日）在 Antonio Agro Trade 公司警察和军方采取了镇压行动。5 月 16 日，Roberto Moreno 在 Mabuhay 纺织厂遇害。5 月 20 日，有人攻击了 Filsyn 公司的工人纠察线，而在 21 日，Fantastic 制衣厂的罢工遭到攻击。

1985 年 5 月 1 日没有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法西斯主义的马科斯体制与工会成员的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如果劳动节是团结的高潮，那也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¹⁵ 末一句是用菲律宾语说的——译者注

第 2 章 马尼拉工厂中的工会组织

Grosby 鞋厂

这家位于大马尼拉地区南部工业区的鞋厂系澳大利亚人所有，设备完善，生产轻便鞋。鞋厂经理不让我们进厂，我们与工会官员和工会代表聚集在会议室里。我还简单地和经理说了话。

L.D.是工会官员之一。鞋厂工会附属于五一工联的菲律宾联合木材与一般工人工会。L.D.在这里已工作六年。1983 年，由于劳资集体谈判出现僵局，工人们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罢工。1984 年 10 月的第二场罢工中，工会的立场更坚定了。罢工针对的问题很多，其中特别是强制超时劳动问题。工人们拒绝超时劳动，和平地组织起纠察线并散发传单，问题在第二年 3 月得到了解决。第 6 号工资令实施了，正式工人的基本工资总计每日 64 比索（3.2 英镑），包括 5 比索的餐补和 1 比索的交通补贴。加班工资比正常工作时间（40 小时）的工资少，因为加班没有补贴。临时工的工资是每日 54 比索。总共 1000 名工人中约有 400 人是临时工。工作五个月后，经理就会把临时工解雇，而不让他们成为正式工。

工厂实行三班倒，中间有一次茶歇和一次 25 分钟的午餐休息。好几名工人，主要是临时工，都在工作中被切断了手指，而公司并不提供医疗保险。工人受伤后即被解雇；工会为工人争取永久工作的权利，却遭到拒绝。社会保险只提供少量的补偿。工人一年休假 12 天，大多数是公共假日。工人休产假会在六周内获得总计 1500 比索（75 英镑）的福利。

澳大利亚代表报告说，他们那里组织过对这些罢工的支持行动。在澳大利亚，Grosby 对工人们说过，他们的工资应该降到菲律宾的水平。

集体谈判并不包括临时工。安保人员和办公室职员也都不是工会会员。我问一个保安，他是否工会会员，他说他是，但 L.D.否认了这一点。

后来我们了解到，1979 年 8 月，最初举行工会选举时，资方宣布选举日放假，以此打消工人们前来投票的念头。但工人还是来了，之后资方改变了策略，邀请工人吃饭。投票结果压倒性地支持成立工会。资方想给新选出的工会秘书长升职，但被她拒绝了，于是她就被安排到二线工作。

世纪罐头厂

这个工厂生产 Ligo 牌沙丁鱼和金枪鱼罐头产品。在潮湿的大棚中，约 1200 名挤在一起的工人手工剪切鱼肉并装到罐头里。该厂工会附属于五一工联。

在时钟旁边有一个说明，告诉工人们如何看工作时间。

工厂总裁试图向我们证明管理工作的合理性。“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们究竟是把工人当做人，还是当做动物。你们不能把我们和日本或者欧洲的工厂相比，那里经济条件不一样。”

问：你想要让工人的条件领先于其他工厂吗？

答：我们的日工资是 3 美元（54 比索，2.7 英镑）。我们与泰国的 37 家工厂竞争，他们的日工资是 2 美元。我们是在车间里安装空调的。

问：如果实现了自动化，你会减少工人数量吗？

答：在日本，我参观了一家工厂，那里的工人数量只有我们的 25%。我们是在想自动化，可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必须使用人工。

问：你赚多少利润？

答：去年我们亏损 500 万比索。政府允许我们不执行第 6 号工资令，但我们还是执行了。

问：在欧洲我们听说菲律宾的工会会员如何如何被杀害了。

答：是这样，但发生在别的地方。

大陆面粉厂

我们拜访了面粉厂的工会，这家工会和 ALMAGO 联盟的官员有联系。这个联盟下有 12 家公司的工会，所有公司都属于大资本家 John Gokongwei。面粉厂除了生产面粉，还生产通心粉。

工会办公室是一间木棚，在工厂的一块地面上，但经过了工人们的大力改造。我说，“要是把你带到英国工会的办公室，你会立刻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在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制作条幅和标语。

棚屋外面贴着“工会办公室”。那里有一张工会结构图。在工会委员会（9 人）之下，有一个执行委员会（5 人），一个特殊行动小组（9 人）和一个专责谈判小组（11 人）；而后是申诉委员会（5 人），工会代表委员会（3 人），教育研究委员会（4 人）和信息委员会（4 人）；而后是分布在 6 个部门的 24 名代表。面粉厂工会有 260 名会员，只有 3 名工人没有加入工会。拿月薪的办公室职员有自己的工会，附属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

工会秘书长 Cesar Bristol 在 1984 年 7 月被捕，关押在比库坦（Bicutan）监狱。

人们对目前的集体谈判意见很大，谈判只同意工资增加 4 比索，而工资令要求增加 5 比索。工人工资要求是基于企业的利润和剥削率。圣约瑟机构（St. Joseph）帮助他们进行研究。我们讨论了为期三年的集体谈判协议的缺点，包括在通胀严重的情况下工资协议所面临的问题。

共和玻璃公司

共和玻璃公司的工会如同英国的一家组织完善的工厂一样。我们会见了工会官员，并参观了他们的工作。菲律宾所有的玻璃面板都在这里生产。除了武装保安（数量是经理人员的家庭保安的两倍）之外，工人们看起来都处在控制之下。工会最初在 1960 年注册。这里的集体协议规定公司只能雇用该工会的会员。大多数办公室职员也是工会会员。经过多年斗争，他

们已争取到每日工资 70 比索（3.5 英镑）。

R.J. 是工会官员之一，他画出了企业的跨国结构，即共和玻璃公司联合体及其在英国、美国和瑞典的附属公司。公司的主要股东包括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公司的债权人包括 Banque Bruxelles-Lambert 和 Landesbank 等银行。由于近来（购置）计算机的投资，公司去年支付了 3100 万比索的利息。

菲律宾经济的下滑预计将使该公司的 1000 名工人减少一半。工会会员带着红丝带以示抗议。罢工通告已经发出。工人们反对强制裁员。遣散费是每年工龄获得一个月的工资，但工会要求获得两个月的工资，这一要求在其他公司实现过。

工会会费每月 8 比索（40 便士），另有自愿捐献（通常每周共收到 300 比索，上周由于要为劳动节做准备，所以收到 600 比索）。会费从工资中扣除，这在集体谈判协议中很常见，扣除的会费就交给企业的工会。有时，50% 的会费直接交给当地的工会联合会。这里有 21 名工会代表，R.J. 说有 1000 名会员（劳动就业部所列的该工会名单为 629 名会员）。工会的主席同时是全国工会联盟（NAFLU）组织的副主席。在工会的院子里有一张通告牌和五一工联的海报。

熔化的玻璃从炉中升起，以凝结成面板。“这是我们的战术优势。去年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停工。三小时内整个生产过程停顿了。”他们还采取集体请假的策略，每个部门在不同日子里集体请病假。

R.J. 寻求有关职业健康和安全的资料，并且希望从英国的皮尔金顿（Pilkingtons）玻璃公司得到回复。他们没有任何健康和安全的资料。“有空调的计算机房是天堂，而在炉子上方工作则是地狱。”许多人受到肺结核、化学物质和高温的折磨。工厂某处噪音超过 200 分贝——工会早已要求加装消声器。玻璃划伤的事件也经常发生。

斯坦福微处理器公司

这家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位于马尼拉南部郊区，有 5000 名拿周薪的雇员。雇员工会附属于菲律宾自由工联（FFW）——五一工联称之为“黄色

工会”。836 名拿月薪的工人参加另一个工会。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餐厅会见了这一工会的三名执行委员。

三名委员中有两名女性，担任会计文员，另一名男性是个技师。他们的日工资是 70 ~ 80 比索（3.5 ~ 4 英镑）。工会会费每月 5 比索，其中有一半交给他们工会所同样附属的自由工联。不过，他们称自己的工会较为“独立”，并解释说他们与五一工联领导的当地的 ALMAPAS 联盟有密切联系，我们就是通过该联盟安排的此次会见。

虽然要是工作 5 天的话能拿到 6 天的工资，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工作时间不足。眼睛疲劳是使用显微镜的生产工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另一家工厂，我们询问为什么工人都很年轻，和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不一样；他们说资方会解雇所有超过 30 岁的工人。我们问，“对这种解雇没办法投诉吗？”显然没有。但是在这家公司里，我们的受访者说可以采取申诉程序，分三步分别向管理层、人事部和负责劳资关系部的副总裁申诉。此后，还可以申诉到劳动就业部，今年已有三起这样的申诉。

1982 年他们举行了首次罢工，因为有 150 人被解雇。只有 90 人被重新雇佣，其他人只得到优先受雇权。后来，镇压开始。工会主席被捕，三年之后这件案子仍在等待开庭。工会主席不得不每周向军方报到两次。

公司想要实行劳动纪律条例。到目前已被工会所抵制。工会官员担心工会可能遭破坏。他们受到警告说，散发工会刊物将视为“颠覆”。

公平购物中心

我们会见了公平购物中心雇员工会的部门官员。这家商场是马尼拉最大的商场之一，有 223 名雇员。按照惯例，在共计一个半小时的雇员休息时间里，商场由于“安保原因”不许他们走出商场。这看来违反了劳动法，也违反了国际劳工公约。与商场其他工人取得联系很困难。

全国矿山及相关工人工会（NAMANU）最早和该商场接洽。一些异分子被开除了，NAMANU 得到为注册工会所需的 30% 的选票。后来，工人得知，一项集体谈判协议并未告知全体雇员就签了字。NAMANU 附属于菲

工大（TUCP）。商场工会成为 NAMANU 的一员，而非独立工会。NAMANU 有 200 个分会。工会会员每月 8 比索会费，其中 5 比索交给总会，3 比索留给分会。工会会员质问集体谈判协议提供了哪些好处，因为他们拿到的还是全国最低水平的工资，甚至还达不到。7 名积极分子，包括工会主席在内，被诬陷与一起所谓盗窃有关而遭解雇。NAMANU 说他们羞于帮助这些积极分子辩护。

商场与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YCW）签订了合同。该组织的一位领袖 T.O. 说，“我很困惑，但只有这个组织给我指明方向。”该组织可提供法律帮助。

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 FCEO。5 月 21 日，他们举行了罢工，要求重新雇佣 7 名被开除的雇员，并且执行第 1、2、3 号工资令，实行假日津贴，以及停止破坏工会的行动。在卢纳塔公园（Luneta Park）集会期间，他们发现被军方情报人员监视。工会有 8000 比索的资金被 NAMANU 扣留。商场的每日营业额从 70 万比索降到 1500 比索。1984 年 11 月，经劳动就业部裁决，资方承认了 FCEO 的地位，并同意给被开除的 7 人支付三个月的工资。

最初的集体谈判协议过期了，NAMANU 也已退出。FCEO 认为，NAMANU 这个组织作为驯服的工会卖身于资方，通过由资方代扣来获取工会会费，从会员身上牟利却不为会员提供福利或服务，一有问题就不见人影。资方目前正筹办另一个公司工会，间接附属于世界工联（WFTU）组织。该工会已经取得了选举申请。

上个月，商场工人联盟组织（ALMADES）成立，它每月向每个工会成员收取 1 比索的会费。在这一组织的帮助下，FCEO 工会希望站稳脚跟，绝不让公司的工会欺骗雇员。

总结

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些比较好的工会组织。

我们在英国通常会有全国性工会的分支机构，而在菲律宾则是地方工会。地方工会附属于其他工会，上缴一定比例的会费，剩下的自己保留。

地方工会，无论是否得到它所附属的工会的帮助，都可被承认并在某个期限内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一般工会组织的结构很明显——车间代表、工会官员和公告栏，申诉委员会等等。

1984年，公民与公共服务协会曼彻斯特分会的一名代表 Barry Rawlinson 记述道：“许多菲律宾工人对待工会的态度比我们严肃得多。许多工会实际上只让公司雇佣本工会成员。工会的例行会议是强制必须参加的，工会对无正当理由的缺席者处以罚款。”我们并未证实此事，但工会的集体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以下问题也很明显：工资低得让人气愤，甚至低于法定或谈判商定的最低水平，缺乏职业健康和安全保障，滥用临时工，强制加班现象成风，工作没有保障，不断有受到责罚的威胁，以及公司工会的问题。

“World Class” “无国界的阶级”



第3章 碧瑶市的工人

我去了吕宋岛北部山脉区（Cordillera）的碧瑶市（Baguio），从马尼拉到这里需五个小时。

该市的主要工作分布在采矿、伐木与航运、旅游、农产品贸易（蔬菜、棉花和烟草）、水泥、出口加工区、纺织与手工业（比如木雕）、银行业，以及运输业。

工人面临的问题

在马尼拉以外的地方，基本日工资是 36 比索，外加 17 比索的生活补贴，总计每日 53 比索（2.65 英镑）。种植园工人及其他农业工人的工资更低。家庭工人的情况甚至还要糟。在零售和服务部门，法定工资取决于人口规模；少于 15 万人的地方，工人的工资较低。

第二个问题是工作没有保障。对失业者与廉价劳力的雇佣和辞退极为随意，反工会的法律使情况更加恶化。工作场所的组织者和工会成员首当其冲，任何对工作条件表示不满的工人也会成为辞退目标。滥用不受劳动法保护的外包工人，使工作缺乏保障的情形更为严重。

第三个问题是工人权利深受 BP 130 罢工法的侵害；该法的本质是：表面上你可以罢工，实际上不行。政府服务部门的工人不能罢工，包括教师和公务员。电子工业的工人不能罢工，因为电子工业被认为是国家的关键产业。其他许多部门也可以被认为是“关键”部门，因此禁止罢工，比如生产出口木雕的家庭工业就被认为是关键产业。

只有符合两个条件，罢工才能取得合法性：劳动规章不公平；集体谈判陷入僵局。其步骤如下：第一，对预期的罢工行动进行通告；第二，如果是劳动规章不公平，冷静期为 15 天；集体谈判僵局，冷静期 30 天；第三，工会会员投票，罢工必须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第四，在罢工开

始 7 天之前备案。如果不遵守这套程序，罢工就被宣告为非法，军方和警察就会干预。工会官员也可以被永久解雇。然而，在 1984 年，大多数罢工都不遵守这套程序，工人则必须准备好应对军方的干涉。

劳动就业部可以发布警告，要工人复工，这通常是在冷静期。罢工通告必须对问题进行详细说明。之后一个时期讨论这些问题，但不能再加进新问题。在此期间工人可以对罢工进行投票。如果三分之二的工人支持罢工，且如果此时总统没有发布制止令禁止罢工，罢工才可以合法地进行。

BP 227 是纠察线法，对工贼极为有利。该法规定罢工纠察员不得阻碍雇主运送货物和工贼进出。纠察线必须在工厂或建筑物大门的 5 米之外，且不得在“姊妹工厂”搞纠察。工厂把生产经营统统转移到另一个工厂，而后称之为原厂的“姊妹工厂”，这样就为罢工设置了障碍。

工人是不许就健康和安全问题举行罢工的；他们必须先找公司的职业健康和安全部门官员磋商，并要求检查。这需要很长时间。假如集体协议中没有具体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内容，后者就不成其为罢工的合法根据。假如它们被包含在集体协议中但没有执行，才可以看作破坏集体协议的证据，这样工人才有罢工的合法根据和提出罢工通告的权利。

工联主义

碧瑶市位于吕宋岛西北部，人口 350 万。失业人口占 46.9%，就业人口中有 59.6% 从事非全职的工作。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在 38.5 万从事工业和农业工作的劳动力中，只有 8.3% 即 3.2 万人加入了工会。

在当地 100 个工会中，有 25 个是独立的。其他 75 个附属于 22 个联盟。这些工会并不团结，因为一部分是黄色工会，另一部分工会则具有战斗性。25 个独立工会的大多数受控于资方。

战斗性的工联主义是历经许多年之后重现的，它在北部地区有历史可循。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工联主义很强大，甚至抵抗日本在二战中的占领。然而，由于美国的卷土重来，和它的“共产主义恐惧症”（表现在美国商人、企业家和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身上），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战斗性的工联主义被彻底清除。与此相关的，是对（太平洋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的人民抗日军（Hukbalahap，民抗军）的屠杀。他们受 50 年代初麦格塞塞（Magsaysay）任总统期间的一纸大赦协议所骗，放下了武器。接着，菲律宾政府要求劳工领袖先要接受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的培训，才能成立工会。劳联-产联在马尼拉成立了亚洲劳工教育中心（ALEC）。该组织的基本信条是“劳资和谐”。

在亚洲劳工教育中心的影响下，一种与民族主义、战斗性、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针锋相对的工联主义发展起来。亚洲劳工教育中心资助菲工大（TUCP），并通过劳资关系法庭（CIRs）强化律师的作用，在这种法庭上，只有有资格的律师才可以处理案件。

历届菲律宾政府通过劳动法规使法律程序日益复杂，这巩固了律师在工联主义中的地位。现在非战斗性的工会仍然受律师支配。工会会员成为专家和律师的提款机，而且被排除在集体谈判和决策过程之外。在 60 年代，左翼的工会变得更具有战斗性，但是直到 1979 年全国工会联盟（NAFLU）才开始实行战斗性的工联主义。

纺织工人

Easter 纺织厂位于碧瑶市 Happy Glen Loop 路 40 号。该厂生产手工编织产品，主要是部落民族传统图样的编织品。

最初工会由圣公会建立，是为了给被迫离开祖居之地来到碧瑶市北部的部落妇女提供工作。其中许多人来自崩托（Bontoc）。该厂最初的动机是提供生计搞慈善。从他们的宣传来看，该厂（仍是教会所有）雇佣女工，效益很好。利润还用来资助其他教会机构。工人们尽管对工资和工作条件不满，但又受着精神上的挟持而被迫接受这种命运。工人们感到对教会有所亏欠，因为教会建起了这个厂，给了她们工作，使其免受贫困之苦，而且如果工人们试图改变境遇，作为教会信徒会自感对教会不忠。

工人们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每年有 15 天带薪病假，工作一年以后工人们每年有 15 天带薪假期。这些妇女的工资是她们家庭收入的

重要部分。最低的日工资是 26 比索（1.3 英镑）。六口之家每天还需要 70 比索，仅仅为了生存！

有些人按月拿工资，最低月薪换算成日工资不到 30 比索（1.5 英镑）。也有拿计件工资的：平均来说每日 15~18 比索。就计件来说，每增加一年工龄，工人每月就多拿 8 比索（即每周多拿 2 比索）。每月还有 250 比索的津贴。每月扣除 7.5 比索的医疗保险和 22.5 比索的社会保险。多数妇女租住在小房间，有一张床，一个灶台和一把椅子，每月租金 150 比索（非常高）。扣掉房租后，工人每天只剩 19 比索。

织工准备织机的时间不付工资。如果准备机器花了半天时间，那么织工这半天就白干了，因为准备工作被看作工人的份内事。如果工人做一件编织品的计件工资是 2.27 比索，且如果够快的话每天可完成 7~8 件，那么花半天时间准备机器意味着工人只能在下午生产 4 件，获得 9.08 比索的收入。

织工做一种 6 英寸宽的牧师服，计件工资是 25 比索（1.25 磅）。别人告诉我，这种产品需要两天半完成。所以日工资是 10 比索。在编织车间旁边的公司展览室，这种产品零售价格 148 比索，毛利率将近 600%。由于耗费时间，女工们不愿意做。资方就强制规定某些人必须做此种产品。

织工轮流在展览室工作，只获得基本的每日平均计件工资。导游或出租车司机带顾客来展览室，可从每件出售的产品获得 10~15%的回扣。除去回扣，公司获得 585%的利润率；再扣除假定为 400%的各种开销（没有公司承受得了如此之高的开销），利润率仍有 185%。

工厂周围有许多小孩子。他们不能留在家里。这里也没有托儿所。他们处理羊毛，并帮助母亲准备机器。资方不反对这事，他们无偿使用着童工。

工人的健康受到损害，不仅因为工资太低，而且因为工作条件导致背部、胸部的疼痛和眼睛劳损。采用传统编织方法，工人就必需坐在冰冷的地面上，这使得风湿病很普遍。为了使织机紧绷，导致背部和腿部劳损。在农村，织工可以随时休息；而在工厂，休息是不允许的。

Easter 编织雇员工会成立于 1982 年。集体谈判协议始于 1984 年 3 月 7 日，有效期至 1987 年 3 月 6 日。工会的顾问是一名律师，名叫 Dominidor de los Reyes；他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名叫独立工会联合会（FILU）。他从一个黄色工会退出后成立了该联合会，旗下只有一个工会有集体谈判协议。这位律师是工会的谈判代表。从集体谈判协议来看，工会应该对目前的工作条件和薪酬没什么意见。

或许开明的资方，特别是靠着雇员对教会的忠诚来经营的资方，应该建一个托儿所，并增加比利润低得荒唐的工资。作为一名信教的工人，我怀着厌恶离开了这个地方。

酒店工人

碧瑶市位于山脉区（Cordillera），气温比马尼拉低，是避暑胜地。这里有许多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酒店。碧瑶市凯悦酒店（Baguio City Hyatt）是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位于城郊一个上层社会街区，临近 John Hay 空军基地。很多富豪到这座酒店来满足奢侈消费。酒店有高尔夫球场。一个房间不含早餐每晚 200 美元，顾客可能消费更多。酒店由菲律宾发展银行所有。该银行的主要股东是 Zamra 家族。1979 年 9 月以前酒店曾由碧瑶市休闲公司经营，后来被凯悦国际接管了。

酒店以前的工会是劳工协会（ALU），附属于菲工大（TUCP）。劳工协会在 1977~82 年受到管理层承认。工人们对这个工会日益不满，导致附属民主劳工组织协会（ADLO，与五一工联相联系）的 NUWHRAIN 工会在 1983 年对该工会进行挑战。在 1983 年的认证选举中，NUWHRAIN 取得胜利。NUWHRAIN 反对 1983 年工会联合会工资增长 2 比索的方案，并为会员争取工资增加 18 比索的协议。1984 年 11 月集体谈判协议达成，该协议追溯到 1983 年 6 月开始，从谈判前一年开始执行。

在酒店 400 名雇员中，有 279 名是 NUWHRAIN 会员，剩下的是经理、行政人员和被称作“机要雇员”的保安。他们不是工会会员，但是 NUWHRAIN 在谈判中会让这些人也享受到会员的福利。同时，这些非会员

也要缴纳同样的捐款，一种代理费。

在劳工协会时期，工资每半个月支付一次，每个月 500 比索，但常常只有 450 比索。NUWHRAIN 要求最低月工资为 899.9 比索，再加上 379 比索的生活补贴，总计 1278.9 比索。

然而，要记住，六口之家需要 2500 比索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全国经济发展机构的数字），因此所有菲律宾工人仍需面对长期的斗争。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1978 年的生活所需比酒店工人实际拿到的要多 50%，可另一方面政府却限制工资增长。按照政府的数字，这些工人的收入只达到贫困线的一半。

每日 17 比索的生活补贴是政府操纵有关收入的数字的一个手段。公司利用漏洞来避免支付生活补贴。生活补贴没有把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贫困线以上。

酒店工会的组织结构

工会有 11 名干部：

主席（会计）

第一副主席（园丁）

第二副主席（服务生）

秘书（服务员）

财务（清洁工）

审计（厨师）

公关（化妆室员工）

4 名理事负责酒店工会的不同部门，包括：

食品和安全委员会

会员委员会

体育和社交委员会

教育和研究委员会

最后这个委员会包括学习讨论小组。

除了两名干部之外，其他干部的职业很低。工会干部没有额外报酬，因为他们就在酒店工作（这与黄色工会不同），但是他们每个月从工会的全国总部那里获得 80 比索的奖金。工会干部每月开会四次，每缺席一次罚款 20 比索。

在 NUWHRAIN 下，工会干部从事工会工作或者开会仍可获得工资，而在劳工协会期间工会干部则得不到工资，并且在会后还要补足工作时间。在劳工协会期间，工会很少征询会员的意见（这是黄色工联主义的共同特征）。而 NUWHRAIN 工会则每月召开分会会议，没有紧急情况时定期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全体会员大会在会员休息时间召开。

工会会费一半交给全国总部，一半留给地方分会。分会用会费为工会办公室提供资金（地方由酒店提供），以及支付纸张、材料、补给、大会交通费等的开销。分会还把钱花在对会员的教育计划上，比如学习工资法令和集体谈判技巧。学习讨论小组的花销由全国总部和地方分会分别承担 75% 和 25%。全国总部向所有会员提供“会员基本训练课程”。这在黄色工会是没有的。真正工会的原则之一就是在本质上和实践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工会。

在 NUWHRAIN 成为有认证的工会之后短短的几年间，工会在集体谈判协议中为会员在酒店中争取到了一个社交中心。工会可以使用酒店的一间会议厅。而在劳工协会时期是没有这项便利的。

申诉程序

申诉程序分为五个阶段：主管；部门经理；人事部；总经理或工会主席；劳动就业部的仲裁。除了劳动就业部，每个阶段之间相隔 5 天，而劳动就业部的仲裁可能持续数年。有这些阶段的原因是，如果直接去仲裁，对管理层是有利的。

我得知这样一个申诉的例子：一名客人错误地指责一名工人没有退还找零。工人被无限期暂停工作，直到证明清白之后才能重新录用。他没有

拿到工资，也没有社会保险。工会试图尽可能地帮助工人度过难关，但是工会的资金有限，而且让工会去耗用资金，对管理层是正中下怀。我离开之前，这名工人仍在暂停工作。

工会认证

经过认证的工会按照劳动法拥有三年的集体谈判权。如果黄色工会得到认证，对雇主和政府就有利。这一制度及早阻止了经过认证的工会受到挑战，因为工人即使想撤换工会，但他们还是要遵守这个工会谈成的协议。只有在三年认证期满之前 60 天内，工会才会受到挑战。

NUWHRAIN 在 1983 年以 11 票的优势赢得了认证。劳工协会向劳动就业部的地区机关进行了抗议。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无法决定，把案件退回了地区机关。本格特公司的矿工也遇到类似案件，所以他们和 NUWHRAIN 联合了起来。60 名酒店工人和矿工在地区机关的内部设立了纠察线。这一行动为他们赢得了有利的结果。

NUWHRAIN 工会的成果

工人如今有 15 天带薪病假。NUWHRAIN 所争得的工资是以前的 7 倍。在劳工协会时期，职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打车要自掏腰包，花费约 10.5 比索。如果三个人一起打车到市中心则分担车费。1977 到 1984 年一直如此。在 NUWHRAIN 工会下，所有职工都可以免费乘坐酒店巴士上下班。

工人们说，劳工协会时期工资增长以分（100 分等于 1 比索）计算，而有了 NUWHRAIN，工资增长就以比索计算。我问莱潘托公司和本格特公司的矿工，劳工协会和菲工大是不是这样，他们轻蔑地笑着说的确如此。

仍有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就是酒店雇员的住宿问题。大量雇员挤住在酒店后面客人们看不到的棚屋。每间的月租 300 比索，对工人们来说是一笔大开销。劳动法打击了酒店工人。旅游业被认定为关键行业，这样政府可以借口有违国家利益，禁止该行业工人罢工。

吉普尼司机

通常的运输工具是“吉普尼”。这是二战时的美国吉普车，改装成搭载乘客的车，一辆车可乘坐 12 名甚至 17 名乘客。在碧瑶市，吉普尼司机被分在不同地区。他们通常为拥有许多吉普尼的老板从早上 5 点半工作到晚上 7 点。很少司机有自己的车。

司机在扣除汽油和维修费之后得到 30% 的净收入。在碧瑶市每天的总收入约 120 比索。净收入是 80 比索，其中 70% 归老板，司机拿到 30%。在马尼拉则不同。那里老板从每天的总收入中收取 160 比索，剩下的就是司机的收入。

政府规定车票价格。当车票提价时，政府命令要先缴纳 372 比索的税，然后司机才能执行新票价。此税是每个经营者或老板要交的最低限额，拥有的车辆越多，税率越高。这笔税费由司机和老板各承担一半。即使国际油价下降，票价也不会降。菲律宾的油价由美国人控制，价格高于世界油价。

我出席了吉普尼司机联合会与 NUWHRAIN 共同举办的一场会议。司机认为从市中心到郊区五星级酒店的票价过低，不足以弥补成本。当地的地形使汽车非常耗油。前往位于郊区的宾馆和高档休闲娱乐中心的普通乘客的票价已经上涨。酒店雇员实行的是特价，而司机想把它提高到普通乘客的水平。酒店雇员本来就不宽裕，提高票价将使他们的境况恶化。

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对话进行得有声有色。酒店雇员工会 NUWHRAIN 正确地指出司机们的理由中的根本矛盾。光是把问题转移到乘客身上，不足以解决问题，尽管对司机来说这是个现实的办法。在对话中，真正的工会活动者能够阐明司机的根本问题：他们的工资过低；政府设定的票价不够高；汽油价格上涨；对美国及其拥有定价权的石油公司的依赖；司机缺乏组织。

双方同意，酒店雇员的票价将比政府订的基本价略高一些；如果油价下降，则票价回到原来的标准，希望司机争取把油价降下来。如果油价继

续上涨，雇员的票价只能涨到目前这个水平。司机同意在早上 6 点到 9 点之间对直接去酒店的雇员实行特殊票价，保证雇员不迟到。

NUWHRAIN 起草了协议，工会干部将召开全体大会，以广泛征求意见并正式批准。

只在一个地区而不是整个城市进行组织，会降低司机们的凝聚力和提出要求的能力。在马尼拉，许多吉普尼司机组建了名叫交通组织协会（ACTO）的战斗性组织。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联盟，附属于五一工联。

政府力图通过建立合作社来分化司机，从而破坏交通组织协会。司机们按照行车路线来组织。这听起来或许符合逻辑，但是如果某条路线乘客很少，司机就得不到什么好处了。另一个问题是，司机要向政府交钱来加入合作社。这些费用过高，合作社卖给司机的零部件也比其他地方贵。只有政府获益，因为多了个财源，并且更有力地控制司机。政府的如意算盘并未成功。



第 4 章 考迪莱拉山区的矿工

在吕宋岛北部的考迪莱拉（Cordillera）山区有大概 20000 名矿工（占菲律宾全国矿工总数的 50%）。在 1981~82 年四家矿产公司关闭之前，这里有 26000 名矿工。这些公司关闭是因为黄金和铜的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操纵下的比索贬值。在矿山的社区中，有人计算出矿工每拿到 1 比索，矿山的股东就会拿到 17 比索；而在铜产业中，工人每拿到 1 比索，股东就拿到 10.7 比索。

莱潘托（Lepanto）金矿的矿工

曼卡岩（Mankayan）位于碧瑶市以北约六个小时车程，人口 10000 人。黄金开采是这里主要的行业，雇有 4000 名矿工。一些矿工与家人住在简易宿舍里，通常一排宿舍住 5 户家庭。

一个家庭每月的房租是 60~90 比索。住房条件十分拥挤，平均每家有六口人。住房有免费的水和电，电只能用于照明。职员方面的住宿条件大不一样，他们的洋房坐落在宽敞的花园中，大门内的停车处周围是一片精心维护的绿地，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福利。

2000 名矿工住在简易宿舍里，还有 2000 名矿工租住私人的房子，每月付 50~120 比索的房租。我们拜访了其中一个家庭。他们住的房间是 10 英尺×7 英尺，一块搁板就是他们的床。全家就在这里吃饭、睡觉、打发工余时间。每个这样的房间与一条公共走廊相通，人们在此碰面。请人来家里做客是不可能的，因为空间实在太小了。我们前来拜访的两个人就把这里挤得不行了。用作床的搁板和房间一样宽，此外再没有其他家具。房东是当地政府的一个话务员；矿产公司的简易宿舍不足，他利用这一点而得以把房子租给了矿工。

虽然开采的是黄金，并且矿工被认为是“高”报酬的职业，但实际上

矿工的工资低，生活条件差，特别考虑到黄金的购买力，这种对比就更为强烈。矿工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周日经常工作，工资是平时的一倍半。每日工资是 42 比索，工人的配偶每日 39 比索。此外，生活补贴是每天 17 比索。许多雇主都按月支付生活补贴。

报酬每十天支付一次，就像在英国一样，要弄明白工资是怎么算的可并不容易。

以十天支付的报酬为例：

基本工资 410.13 比索，生活补贴 153 比索，奖金 44.51 比索，退款 0.21 比索，总共 607.85 比索。

其中扣除：153.4 比索，用于扣除 24 公斤大米的费用；

42 比索，用于偿还贷款，利率 10%；

25.2 比索，用于储蓄。

所以这名矿工十天的净工资是 387.25 比索，即每天 38.73 比索。实际到手的要少些，因为生活补贴是按月支付的。

矿工经常在一个月之内每天都要工作，干满 30 天。带薪的假期有圣诞节、元旦、圣餐日和耶稣受难日。与我们交谈的一名矿工从 1 月 1 日起一直工作到现在，仅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休息，而他的家庭仍然一贫如洗。有时矿工疲劳过度，因此休假一天的话，就没有工资。矿工没有带薪病假，但如果矿工发生工伤，公司的医疗中心会免费治疗。在过去 8 年中有 20 人在矿井中丧生。许多人遭受了与采矿有关的职业病的折磨，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风湿病。

这里的工会是“莱潘托雇员劳动工会”，是公司的工会。一名矿工以前是 NAFLU 的成员，1981 年他离开了这里，原因是，他的工友由于支持工人而在公司工会和资方的合谋下被解雇了！

工资的涨幅取决于工会的能力，黄色工会只能取得微不足道的加薪。很多人说，管理层给了当地黄色工会的主席一大笔钱，以阻止他为工会会员谋求足量的工资增长。

由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下跌，对工人的需求下降，许多工人被解雇。1984 年 10 月，公司裁掉了 1000 名矿工，使得他们和家人无家可归。有些人，

像我们遇到的那位，用定期存下来的钱买下了位于北部的他父亲的邻居的一块地。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军队被新人民军打败之后，他就回去种稻子。讽刺的是，他的家庭世代耕种，他却不得不出钱购买土地。

公司的解雇补偿是：对于 3 至 7 年的工龄，每年给一个月（26 天）的报酬，即 42 比索 × 26 天 × 工龄。这样的话，最高补偿就是工作七年得到 1092 比索 × 7 年 = 7644 比索，这一补偿并不多。许多人拿不到这么多。

本格特公司

本格特公司（Benguet）的主要产品是黄金，副产品是锌和铜。公司在豪瑟曼（Hausserman）的领导于 1903 年成立，他是个地质学家、采矿工程师，一名参与美菲战争的战士。从国际采矿联合会获得资金，豪瑟曼建立了一家运输公司和一家供应本格特公司的木材公司。

20 世纪 40 年代，独立工会成立。工会发动了第一场罢工，一名矿工被害。从 40 年代到 80 年代，这里只有过 4 场罢工。到 1979 年为止，工人们的工会一直是附属于菲工大（TUCP）的菲律宾自由工会协会（PAFLU）。14 年来他们的最高工资涨幅仅仅是增加日薪 1.4 比索。1979 年，工人们加入了全国工会联盟（NAFLU）。第一年他们发动了罢工并增加了 6.5 比索的日工资。

本格特公司由六个矿井组成：安塔莫克（Antamok）、阿克由派（Acupan）、巴拉托克（Balatoc）、巴口（Baco）、凯利（Kelly）和叙拉（Sierra）。工会干部告诉我们，井下工作最低的工资是每天 40.03 比索，外加法定的每天 16 比索的 MELA（矿工应急生活补贴）。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 6 天，这样每周的工资总计 348.18 比索。每天三班：从早上 7 点到下午 3 点一班，下午 3 点到晚上 11 点一班，晚上 11 点到早上 7 点一班。夜班工人（主要是井下工人）的工资高出 10%。并非所有人都是工会会员，但是非工会会员也被要求交同等费用。

矿区走访

在去往矿工居住地的路上，矿工的异化和边缘化益发明显了。我们离开碧瑶市的豪华居住区，离开那些巨宅华屋、开阔的街道和绿地，来到我称之为地狱的地方。距离“文明”越远，情况变得越糟，路况也变得越差。距离城镇中心越远，道路和物质条件就变得越坏。

从碧瑶市坐 45 分钟吉普尼穿过没有铺就的道路进入山谷，我们来到了矿工社区。到了其中一户家庭时，邻居的孩子们出于好奇围着我们，吃吃地笑着，问我们的名字。这里的人们友善好客。每个人都穷得很。他们是一个美丽的民族。（我想——就像某祈祷文所说的——什么时候能有改变，使他们可以过上好点的生活！）他们的孩子是菲律宾的未来，但是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矿工的家庭十分简陋，一半空间被睡觉用的夹层占去了。我们睡在地板上。上楼需要穿过一个 3 英尺 × 5 英尺的房间，顺着一个靠墙的梯子往上爬，钻过天花板上的一个洞就到了夹层。

他们告诉我们，每周从矿工宿舍附近的公司商店购买的 20 公斤大米，一个家庭很快就吃完了。这些大米花费 170 比索，所以他们 240 比索的工资所剩无几。公司商店里的罐头食品非常昂贵，但这里没有其他商店或市场，只有碧瑶市有，但来回一趟每人要花 11 比索。

公司提供水电免费的住房。燃气需要付钱。我们以为一切都用电，但是买一个单环的电炉要花 600 比索（将近 3 周工资），所以免费用电的唯一好处只是照明。我们逗留的那一夜停了两次电。他们告诉我们停电是经常的事。

矿工家庭在简易宿舍里彼此住得很近。单身职工另有宿舍。宿舍周围堆着采矿废料。道路未经修筑。火车把废料运来倾倒在宿舍附近，而小孩子就在附近玩耍。这里能闻到从地里挖出的石头持久难闻的味道，带有腐烂气味，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住在矿区小镇上闻到的气味。40 个家庭只能共用一套包括洗衣机在内的服务设施。人们在宿舍后面的公共厨房中做饭。

约翰·巴博德（John Bubod）是当地工会的主席，他告诉我们，他从 1954 年开始当矿工。和许多矿工一样，他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被迫迁移出来找工作。在这一地区有来自伊洛坎诺（Ilocanos）、伊戈洛（Igorots）、

伊夫高（Ifugao）和明多兰（Mindorans）等地的人。约翰在他的故乡省份上了高中，但因没钱付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离家南迁，到考迪莱拉山区找工作。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他都在菲律宾自由工会协会（PAFLU）之下工作。“这个工会毫无希望，对会员毫无作为。”约翰 1979 年开始换到目前这个矿工作。

巴口矿（Baco）由一家名为阿兰内塔（Araneta）的菲律宾公司所有，十年前它参与了本格特公司的业务，以承包的方式运营该矿。另一个地方的矿工告诉我们，本格特公司的矿井有更好的设施，包括通往营地的道路（矿山社区被称作“营地”，每个营地依据矿的名字命名）。这个矿缺乏设施是因为它仍属于阿兰内塔。

阿兰内塔同时还拥有当地的洗矿厂。工厂距离宿舍很近，是一座巨大而高耸的建筑。1978 年因破产而关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被搬走，工厂现已破落，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危险。本格特公司所拥有的米拉托厂（Milato）现在通过地下通道清洗当地所有矿山开采出的矿石。

教育与前景

我们见到了一名矿工的女儿，她是碧瑶市圣路易斯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她在矿山办公室做一名簿记员。这个迷人而又聪明的姑娘每天的工资是 26 比索，外加每天 5 比索的生活补贴（本来应该是 16 比索）。她从事这份工作已经一年，仍然没有成为正式工（即仍然是临时性的）。与她一起的三个姑娘每天只有 17 比索工资，并且没有生活补贴。她们是高中毕业生。我问她们是否在那里工作了很久？她们回答说，人们不会待太久，因为这么低的工资根本无法生活。如果那个大学毕业生成为正式工，她的日工资将会增加，生活补贴也会比矿工高 2 比索，即 58 比索。她每周工作六天，共 48 个小时，加班工资按 1.5 倍算。节假日按照法令规定，每年有四天。

我们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矿工，他在年轻时不得不放弃学业选择工作。如果他的子女坚持学习，那么他们的未来将会如何？

读高中每学期需支付 600 比索。去学校来回需要 6 比索，即每周 30 比索。每周工资是 240 比索，其中 170 比索用于购买大米，因此上学既没有经济条件也没有动力。不上高中就上不了大学，上大学还是要花钱。高中费用不包含书本和文具费，这些要另外交钱。甚至连小学也要交钱。当地的公共学校比私人学校便宜。我问道，教会学校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那是私人的。许多家庭有六至九个孩子，没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也觉得不可能让孩子获得教育。

健 康

矿工社区有为矿工及其家属服务的诊所。我们见到的一家诊所，相对于矿工及其家属的数量来说规模很小。诊所有一个全职的护士和兼职的医生。周日的时候医生不上班。

护士每天换班，周五休息，周五从其他矿来人替换。护士的日工资比矿工高 3 比索。她们留在这里服务社区。她们在公司的报酬比在公立医院高。

培训一名护士需要五年时间，个人仅学费每学期就要 1500 比索，一年 3000 比索。书本、纸张等等需要学生花钱买。她们只能在马尼拉接受培训，这又增加了食宿费用。费用总计 15000 比索，超过了一个矿工一年的总收入。在取得资格之后，如果护士想要进修，她必须再筹钱上大学或花钱上夜校。

每天都有许多矿工由于工作条件和机器的原因而受伤。机器维护做得不够。另一个问题是瓦斯中毒。每个月都会发生几起。处理事故所需的氧气并不总是具备。呼吸性疾病很常见。矿工和家属由于供水少得可怜，以及吃不饱，而遭受肠胃炎之苦。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

到 1984 年 11 月开始才有一名医生在这里工作。这里的设备不足。用于分娩的设备只有不齐全的两套，而矿区每个月就有六到八个孩子出生。如果产儿在分娩过程中窒息，这里没有相应的设备来处理。

如果矿工发生事故后诊所无法处理，就会沿着尚未铺就的道路转送到碧瑶市的医院（这还要看能否弄到救护车或吉普尼）。

人们请求增加基本设备，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音信。公司（阿兰

内塔）的借口是矿山的生产没有做到应该做的那样好，所以没钱买设备。相似的理由也用来搪塞营区里的道路问题。

矿工社区

矿工来自哪里？他们是当地人吗？许多人是从北部山区省份来的。他们是卡林加（Kalinga）部落的人，习惯于捕猎和耕种。

这些人被跨国公司和军队抢占了土地。一个人告诉我们他的稻田是如何被军方宣布为“无主土地”的。这是由于支持当地人民的新人民军所采取的防御立场。他说，1975~1978 年之间，由于军方的骚扰和暴行，他被迫离开了村子。他五岁的外甥和怀孕的表妹在他们村子里被枪杀了。朋友和兄弟们逃到山上避难并加入了新人民军，而他被迫与妻儿老小逃到南方，在矿山工作。他极为厌恶这份工作。自他到这里的 8 年以来，生活变得更糟了，所有东西都更贵了，然而他上一次涨工资是在 1984 年 11 月，日工资仅增加了 2.5 比索。

矿区是美丽风景上的一道伤疤。除了职员房子之外，这里的房屋邈邈单调。基础设施很差。由于矿产公司渴求木材，山腰上森林遭采伐，水土流失。

在曼卡岩（Mankayan）的公共广场上有一处文化表演。这个文化团体是由作为考迪莱拉人民联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CPA）成员的年轻人组成的。该联盟意在唤醒人民对他们自己被剥夺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意识。这是一种通过戏剧表现工人和农民日常经历的艺术形式。戏剧表现剥削与边缘化，集体行动与团结。它不费功夫就能唤起观众对黄色工会、资方和封建地主的嘲讽，工人和农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

观众对他们的经历和文化——这文化至今仍教他们难为情——的戏剧性表现所做出的反应，以及文化团体的成员都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义务在这里工作，只要路费、一顿饭和一处睡觉的地板。他们与工人和农民建立联系，不是作为前来表演的专业人员，而是作为前来团结大众的人。这里没有精英主义，没有中产阶级价值观，没有屈尊俯就。

第 5 章 内格罗斯岛的糖业工人

内格罗斯岛 (Negros) 是维萨亚斯群岛 (Visayas archipelago) 最大的几座岛屿之一。它美丽富饶。英国人尼古拉斯·洛尼 (Nicholas Lonye) 1856 年写到, “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 美丽的内格罗斯岛上紫色的群山宏伟肃穆”。这个岛还以“糖料之国”闻名。

菲律宾 68% 的糖料种植场 (plantation) 位于内格罗斯岛。很多种植者是拥有不足 5 公顷土地的小农。大农场 (haciendas) 占有 65.6% 的糖料种植面积。

内格罗斯岛的制糖业, 是以牺牲人民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这里依赖制糖业的经济毁掉了人们的生活。近期, 制糖业的经营不善及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把大部分人置于饥饿的威胁之下。

制糖工业的起源

“糖料之国”是尼古拉斯·洛尼造成的结果。他曾被任命为维萨亚 (Visayas) 的副领事。他在马尼拉的上级写信给英国的海外办公室, 说道: “障碍消除了, 几周内英国国旗——即英国政府的又一个机关——将在沿海地区扎根。”当地的纺织工业 (每天有 80000 个纱锭在工作), 依托世界市场, 在几代人的历史中独立发展。洛尼剽窃了它最好的图案, 最终摧毁了这种本土工业。作为几家曼彻斯特大纺织品公司的代理人, 他回到曼彻斯特后, 利用英国的劳动力和机器大量生产这些图案的纺织品。这些廉价纺织品被运到维萨亚斯群岛出口商品市场上, 摧毁了这一本土工业。

失去工作的纺织工人, 为建立面向西方市场生产的糖料种植园做好了准备。洛尼运进煤和机器。居民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 糖料大农场建立了起来。

英国和美国向种植者提供作物贷款, 以便控制糖料贸易。不久, 佩恩-

奥尔德里奇法案 (Payne-Aldrich Act) 给予菲律宾向美国出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换取美国免税出口商品的待遇。菲律宾国家银行提供的贷款导致美国人控制了 4 家最大的集中化制糖厂 (有 18 家制糖厂, 叫做制糖中心。内格罗斯岛的北部和东部的制糖厂有: Bacolod-Murcia, Talisay-Silay, First Farmer, Hawaiian-Phil, Aidisa, Vicmico, Lopez, Sagay, Danao and the San Carlos。南部有 Ma-ao, La Carlota, Biscom, Sonedeco, Dacongogon, Upsumco, Bais and Tolong。)

古巴危机以后, 美国取消了对进口菲律宾糖料的关税配额限制。大种植园扩展到了山上, 把玉米地和稻田占去了。现有的大种植园都不是现代化生产。由于没有投入, 导致糖料产量下降, 每公顷产量降到世界最低。

1947 年, 菲律宾政府设立了隶属于菲律宾银行的菲律宾贸易委员会, 控制了糖料贸易。1974 年, 当糖价涨到每磅 65 美分 (即每担 678 比索, 一担等于 63.25 千克), 菲律宾贸易委员会、菲律宾银行和马科斯政府获利极丰。菲律宾贸易委员会以每担 134 比索的价格买进, 然后以 470 比索的价格卖给美国。糖料被大量囤积起来, 但是到了 1977 年, 价格跌至 7 美分一磅。

1977 年, 菲律宾糖业委员会 (Philsucom) 建立, 以组织制糖业。

糖业大亨

有几个名字反复出现在糖业大亨的名单中。内格罗斯岛最大的两个大地主是蒙蒂里巴诺 (Montelibano) 家族和民尼迪托 (Benedicto) 家族。此外还有洛钦 (Locsins) 家族和奥索里奥 (Ossorios) 家族。

老阿尔弗雷多·蒙蒂里巴诺 (Alfredo Montelibano Snr) 家族在整个菲律宾都有商业利益。他的儿子, 小阿尔弗雷多 (Alfredo Jr), 是内格罗斯岛的行政长官。侄子唐·奥里利奥·洛钦 (Don Aurelio Locsin) 也是大地主。

萨尔瓦多·民尼迪托 (Salvador Benedicto) 是某大农场最早的主人, 他的发迹要多亏蒙蒂里巴诺家族的帮忙。他的儿子罗伯特·S·民尼迪托 (Roberto S. Benedicto) 是内格罗斯岛最有势力的人之一。他是马科斯总统

的高中同学，他们在一起学习法律，二战时，他是内格罗斯岛军事情报部门的头。1954年，在总统麦格赛赛任内¹⁶，他成为菲律宾发展银行的总裁，而他父亲的朋友，大阿尔弗雷多·蒙蒂里巴诺（Alfredo Montelibano Sr），是经济合作发展部的部长。

蒙蒂里巴诺和民尼迪托组建了菲律宾商业银行（PCI），一个当主席，一个任总裁。在马卡帕加尔（Macapagal）总统任内¹⁷，他们未获恩宠。1964年，他们通过支持马科斯谋求自由党（the Nacionalista Party）的领导权，自己也变得有权有势。蒙蒂里巴诺告诉洛佩斯（Lopez）——另一个谋求领导权的竞争者，说他没有机会当选，甚至连洛佩斯的兄弟都投了马科斯的票，“马科斯是一个土匪，他会取胜的”。

军管法之后，蒙蒂里巴诺失去了对菲律宾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并被免去种植者产品组织（直到最近一直是肥料业寡头）总裁一职。民尼迪托也被免除了菲律宾商业银行的职务，由伊美尔达·马科斯（马科斯的老婆）接任。不过，他还是获准管理三家银行：皇家贸易银行，种植者共和银行（主要客户是糖作物种植者），和菲律宾国家银行。当他出任驻日本大使的时候，他放弃了第三家银行的管理权。在糖业繁荣时期，他成为了菲律宾糖业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建立了营销部门（NASUTRA）。通过这两个部门，他控制了菲律宾制糖业三分之二的对外出口和三分之一的国内消费市场。垄断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当有人问马科斯，为什么国际市场糖价高达65美分时，菲律宾种植者收购价只有18美分，总统答道：“这个问题要带到拘留所去”¹⁸。

种植者产品组织违反规定，世界银行对此非常不满。第一夫人伊美尔达和她的兄弟罗姆斯建立了PHILPHOS接管该组织的权力（PHILPHOS在莱特岛（Leyte）有矿产，用于生产肥料，与加工肥料的跨国公司也有联系）。在马科斯的影响下，中央银行收回了给予种植者组织的保证，虽然蒙蒂里

¹⁶ 1953-1957年——译者注。

¹⁷ 1961-1965年——译者注。

¹⁸ 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利益牵扯非常大——译者注。

巴诺与马科斯的的关系不比从前了，但是包括马科斯在内，所有人依然承认他在内格罗斯岛和巴戈洛市的强大势力。

奥索里奥（Ossorios）家族控制着内格罗斯岛地区最大的糖料中心。1919~1920年间，米格尔·J·奥索里奥（Miguel J. Ossorio）在内格罗斯岛建立了两个糖料中心。二战后，它们逐渐发展为现在的维多利亚糖公司（Vicmico）。产量居亚洲之冠。

弗雷德里克·奥索里奥（Frederic Ossorio）是Amstar公司12个董事之一，也是4个执行委员之一。Amstar是美国最大的精炼厂。维多利亚糖公司扩张为七个大公司，由美国资本控制，经营范围包括了土地耕作、收割、加工、精炼和贸易。奥索里奥雇佣了近4600名工厂工人和几千名农场工人。Amerop公司（全球最大的糖类进口商），Czarnikow-rionda（美国最大的糖类进口商），和Theo H. Davis公司（实际上控制了Bogo-Medel-lin、San carlos和Hawaiian-Philippines加工厂），这些企业是涉足菲律宾糖业的美国公司。

在糖业王国中也有例外。唐·奥里利奥（Don Aurelio）的儿子，格里·洛钦（Gerry Locsin），是受尊敬的《国家邮报》（Country Post）的编辑。大特奥多罗·M·洛钦（Teodoro M. Locsin Sr）是《菲律宾自由报》的出版者，这是一份支持工人的报纸，1972年被马科斯查封，他本人也于1972年至1980年被监禁。

公司工会

唐·奥里利奥·洛钦给他的工人建立了一个公司工会，菲律宾劳工联盟（Labour Association in Philippines）。这个组织直到1960年代都是全内格罗斯岛地区的主要工会。他的侄子蒙蒂里巴诺让他的大种植园中的工人全部加入了这个工会。这些工会都是亲老板的，搞这些工会就是为了这个。

为了让工人守规矩并维持低工资，弗雷德里克·奥索里奥在试用期满之前就会解雇他的工人，因为临时工不用支付最低工资。他的公司支持维多利亚糖公司工人联盟的黄色工会头头，该工会附属于菲律宾糖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Unions of sugar Industry in the

Philippines)。它是糖业中黄色工会主义的体现，宣称拥有三十万名会员。几乎没有做任何组织工作。它同劳工协会（隶属于菲工大 TUCP）一同建立，无条件支持政府损害工人的发展机械化政策。NACUSIP（菲律宾糖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同 CIO（独立组织代表大会）、FLO（劳工组织联盟）、以及 SAILO（糖业，农业和工业工人组织）结盟。其他大种植园的公司工会有：蒙蒂里巴诺的兄弟联盟会（CBU），洛钦和 Carlos Ledesma 的菲律宾劳工协会（LAP），Amparo L. Gustillo 的联合糖农组织（USFO）。菲律宾粮食商业和工业工会也是一丘之貉。菲律宾制糖工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基本依赖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的劳动仲裁解决争议，其会员在 1982 年的 La Carlota 糖料中心罢工中充当了工贼。

任何试图推动真正的工会运动的工人都会被开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劳动部都通过那些顺从的工会，满足马科斯总统的意愿。与劳动就业部（MOLE）接近的工会都是支持雇主和政府的。

全国糖业工人联盟

多年来，没有任何有作用的工会。

军管期间有两年，一位全国糖业工人联盟（NFSW，National federation of sugar workers）的成员，之前是一个制糖业的工人，每周有两天，晚上与糖业工人及其家人在一起，在他们下班后，有时甚至还在上班的时候，跟他们讲解工人的权利和人权。这些都是不计报酬的。

几个月后，在 1974 年，工人们决定组织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谋求自己的权利。地主已经注意到了全国糖业工人联盟的组织者，威胁要毁掉工人家宅附近的小块自留地。工人要求自我组织的权利，并保存他们的小块自留地。地主威胁要上诉。工人表现得坚定而团结。地主暂且默许了。

我曾经询问工人，在全国糖业工人联盟的组织者的教育课程中，哪些是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人说，课程非常好，能帮助他们进步，帮助他们面对地主、监工和军队。工人们能够知道他们确实拥有作为工人和作为人的各种权利。许多工人都处于弱势，特别是临时工。大多数工人都参加

了学习。

没有加入的一些工人做了地主的眼线，因为地主承诺给他们转正和提高工资。有一个地主在这些眼线不上班时也发给他们工资，这些都是对真正的工会主义运动的威胁。只有少数工人被地主收买了，大部分工人都团结在一起。

我问，这些“间谍”怎么样了？令我惊讶的是，工人说，他们对这些人给予引导，即，帮助这些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改变思想，因为地主过后并没有兑现承诺的好处。工会的成员们在个人、家庭和经济问题上相互帮助，通过这些例子表明工会是更好的解决办法。有时候工会甚至会对遇到困难的监工和间谍提供帮助，这些人就会看到差别，地主不帮他们，而工人帮他们。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人也加入了工会。

在军管时期，群众性集会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工人间的团结还是在不断地发生着。

一旦某个小组稳固建立起来了，组织者就会离开，开始在另外一个小组中工作，他会留下一个地址，以便工人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系上他。

面对地主和跨国公司的强大势力，工人有什么选择吗？我们已经引述了黄色工会的现象。然而，对我们来说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转向五一工联（KMU），转向真正的工会主义运动。尤其是糖业工人，他们开始转向附属于五一工联的全国糖业工人联盟，1974 年它刚成立时只有 6400 名会员，到了 1985 年，会员数就激增到八万多，惊人地增长了 1230%。

工会的活动不仅限于内格罗斯岛，还包括了其他很多地方，比如中吕宋岛、南他加禄地区和棉兰老岛。在一个工会入会率仅 25% 的行业里，他们的工作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它同国内外其他的各种真正的工会都有着很好的关系。1983 年，它成为组建米沙鄢劳工联盟（Visayan Labor Alliance, VILA）的领导力量，该联盟的成员还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NFL），Lakas Paflu，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CAILO，NUWA 和 KSO，以及全国糖业工人联盟米沙鄢分部。它是发起成立五一工联的成员之一，也是保护工人权利全国联盟（NCPWR）的成员。

作为一个真正的工会，他们谋求：(a) 帮助工人建立信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b) 用最有效的集体行动方式来锻炼他们；(c) 避免狭隘的本位主义，把自己的问题与其他行业的工人，以及社会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考虑，以便共同改善他们国家的状况，这就是说，推动对国家问题的理解与解决。因此，工人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还要考虑其他阶层，支持并加入他们的斗争，创建一个人道的社会。

制糖业工人自己致力的目标是：加薪，一份像样的工资；工作保障（避免 85% 的失业率）；为制糖工人提供公共农场——使他们能够种粮食，满足日常食品需求；结束美国、日本和跨国公司对菲律宾制糖业的统治；结束极个别大家族对土地高达 46% 的垄断。

全国糖业工人联盟还号召废除对罢工权和组织权的限制，废除禁止罢工纠察的法律。他们还要求结束对工人的压迫，结束对社会的军事暴力统治。最后一点得到了内格罗斯岛的大主教的支持。当有人问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怕的大屠杀，为什么这么多人遇害时，他评论道，答案当然是，用屠杀使人民陷入恐惧之中不能动弹。这符合国内和国际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这种情况保持下去，这样合法的抗议就被扼杀了。同时人民却日益贫困。

托伦蒂诺 (Tolentino) 庄园

在另一个大庄园，人们告诉我那里的工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他们等到 1981 年军管法结束时提出了第一个诉求。大庄园的主人是托伦蒂诺 (Tolentino) 医生，此人乘喷气式飞机到他在马尼拉的诊所办公。

工人要求：根据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工资和福利；每年支付 13 个月的工资；实行级别工资制和“改善费”。这些要求都有劳动法作为依据（庄园工人有权加薪 3%）。

托伦蒂诺按照法律要求，同意给 13 个月的工资，但是数额不对。改善费的计算基准也不合理。他只给工人 20 到 30 比索，而不是年收入提高 3%。他还拒绝支付加班费。工人们还要求，(a) 提高淡季的粮食配给量（那时

工人很少或没有工作），(b) 不得使用机械来取代工人，以及 (c) 保留他们用于种菜的小块土地。庄园主的回应就是派他豢养的打手和雇来的流氓来攻击工人。

不久，根据当地可靠消息，我得知，托伦蒂诺医生对他的朋友——伊斯卡兰特 (Escalante) 的市长——透露，“他宁愿卖掉庄园，获取进入议会的选票，也不愿给工人土地。”之后，他把农场的土地扒了一遍，故意毁掉了香蕉树，以防工人使用它们。

1985 年 4 月。托伦蒂诺的打手带着步枪和油枪，监视着工人，防止他们在地里种粮食。庄园是那么大，因此不让工人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块土地上种粮维生，纯粹是出于对工人的恶意报复。

工人的状况

代表团拜访了北部和南部的庄园。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一一列出。

内格罗斯岛五十万名糖业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不少家庭聚居在庄园附近的地方，儿童很多。我问他们在这里住了多久？有些人从上次战争之前就住在这里了。

那时，庄园有很多农场，种有大米、玉米和根茎类作物。那时的生活要好一些；人们有吃的东西。那时还是封建生活方式；粮食要分开——一份归农民，一份归地主。他们为自己种粮食，并到市场上去换鱼和肉。从 1947 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更多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甘蔗，起初只有那些靠近高速公路的土地。不久，地主就把种粮食的地都用来种甘蔗了。

地主强迫人们种植甘蔗，答应付给现金，像现在那样，人们用这些钱购买大米和必需品。欠债的人从地主那里借来口粮。地主的大米是 60 分一干特（1 干特 = 2 公斤），而市场价只有 50 分一干特。

工作方式也改变了，过去每天做 8 小时农活就收工，现在地主想让人干多久就干多久。1954 年，没有时薪，就是一天 1 比索，不管是干 7 小时或 10 小时或更长。到了 60 年代，每天是 2.5 比索——不论干几个小时。如

果地主想要夜里把甘蔗运走，卡车来了，工人就要去装车。没有额外的报酬。与监工的关系也变了，后者觉得自己也受制于地主，因此他们和工人的关系是两面性的。

工人的口粮严重受限。每个月只能吃上一两次大米（在一个出产稻米的国度），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通常，他们只能吃玉米粥，因为便宜。其他基本的食物是木薯（一种小个的甜土豆——富含淀粉）和煮熟的香蕉（在香蕉成熟季节）。今年，他们太饿了，香蕉还没熟就被他们吃掉了，现在他们没有东西吃了。

我问他们能不能吃上肉。“我们去年吃过一些肉。”鱼呢？只有走上很远到海边，才能有鱼吃；因此不常吃到鱼。蔬菜？只有住处旁边的小块地里种的一些菜。这些菜他们分着吃。他们说他们就是买盐来吃，代替蔬菜。

由于饮食如此低劣，儿童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我亲眼见到饥饿的后果，不仅在庄园里，之后还在巴戈洛市的省级医院里也见到。年幼的儿童和大一点的孩子都在啃甘蔗，只为了吃点东西。父母必须去找食物，就不能很好地照看孩子。只有少数孩子能上小学，但不久大都因为生活费和学费而辍学。

我见到一个叫 Toto 的 10 岁大的男孩，他从早上 6 点工作到 10 点，下午 1 点干到 4 点。他割甘蔗和野草。他徒手播撒化肥——没有保护皮肤的手套。除了搬运（太重了），所有的活他都干。每砍一捆甘蔗（20 条），他得 10 分（0.1 比索）。如果他收了 100 捆（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重的活），就能得到 10 比索。他告诉我一天最好的时候就是傍晚，因为那个时候他去放牛。那是他玩耍的时间。

收割甘蔗的成年工人的报酬跟孩子一样，但是每天能收割 150 捆，得 15 比索。工人们时常会分配到一大片地，比如一公顷，要在一天内干完。价钱是固定的，分摊到每个干活的人头上。这样挣的就更少了。

我见到一个 79 岁的老妇人，还要干活，因为她的家里没人能挣到足够的活命钱。还有一个 69 岁的男人，当了一辈子的糖业工人，他死了七个孩子。活下来的两个孩子也是糖业工人，但却没有能力养活他。他没有社会

保险，没有养老金或医疗保障。还有一个人，在这个庄园干了 61 年，陷于同样绝望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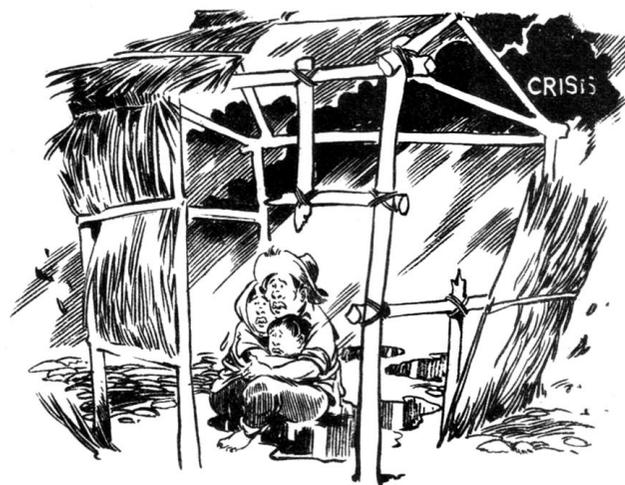
1985 年，因为糖业危机，三十万名糖业工人在旺季的时候被解雇。内格罗斯岛的饥荒在整个菲律宾最为肆虐。

危机如此严重，工人每周只有两到三天能挣到钱，大概每天 12 比索的收入，一周 24 比索或 36 比索。这还是在旺季（淡季无工可做）。庄园主限制工作量。收割了甘蔗堆在地里，会让甘蔗干掉，糖分流失；庄园主可不干。

他们也不会用车把工人载去种植园的其他地方，因为那要花钱。我们听说这里缺卡车。某庄园主的四个庄园有 5 辆卡车。这就是他们的投入！我们听说，庄园主们要什么有什么，而承受市场糖价压力的，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庭。

我问起他们的未来。

他们是农民，需要土地耕种，养活家庭。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说那样日子就能好过一些。“庄园怎么样？”我问。他们恨这些庄园，他们不想再见到这些东西，干什么都好，只要不干庄园的活。我问：“如果地主走了，这些地留给你们呢？”“那就是天堂了。”



第 6 章 巴坦出口加工区

菲律宾政府在国内某些地区建立了工业特区，其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并作为出口平台。出口加工区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隔离的工业区，区内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和关税优惠。

尽管这些加工区是 1972 年戒严令之前就计划的，但直到戒严令之后才落实。最初是计划建立 12 个出口加工区。只有 3 个在运作，其他都被搁置。这些加工区按道理是要给菲律宾引进资本，通过衍生技术（spin-off technology）和推广来自加工区的工艺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创造外汇，促进就业。但好几项对加工区的研究——最近的要数 1985 年 4 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表明，加工区并没有实现这些目标。

从劳工观点来讲，加工区的发展令人堪忧，特别是因为提供给企业的鼓励措施中，低工资被当作一大卖点。政府还努力在加工区实行严格的控制劳工的法律，包括规定罢工非法。加工区由特区政府管理，并有不同于国家其他地区的法律，全副武装、配有镇暴装备的特区警察，警察局和监狱。特区警察有自己情报机关及线人网络。

国际团结事务部的一些代表在与马尼拉隔着海湾相望的巴坦（Bataan）待了几天。在菲律宾历史上，巴坦在地理上一直以来都具有战略意义。现在它作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所在地，在马科斯政权和跨国公司、美国的关系中又有了战略意义。

我们进入巴坦的时候，在一个垒着沙袋、架着机枪的路障前被拦下，仔细检查我们的准入证。尽管检查站离最近的工厂都要好几公里，理由却是“生产安全”。很多人认为塞点“甜头”过关是必须的。

根据 1979 年马科斯总统签署的 5490 法案，1209 公顷的土地都划归跨国公司。这些土地涉及两个设施齐全村子：纳思科（Nassco）和卡玛雅（Kamaya）。它们有学校，一所初等学院，体育设施，三座教堂，两间影院，

和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市场。附近的树林出产水果，当地的渔民供给鲜鱼，人们还可以在船厂和采石场工作。对于政府要建立特区的计划，人们说他们不需要开发。马科斯总统宣称特区会带来进步，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地人可以低价购买那些出口产品，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人们仍然抵制，进行示威游行。1972（戒严令期间）开始对这片区域进行开发。政府调动了曾参与越战的一个营来清理这片地区。房屋被拆毁，人们被迁移到离他们生计很远的地方。比如，渔民迁至离海岸 27 公里远之处。

曾经平静的，拥有农民、钢铁工人、公共设施的马里韦莱斯市（Mariveles）变成了一个遍地失业者的棚户区。通过从外省引进移民工，人口从 1.6 万暴涨至 6 万。尽管人口大量涌入，公共事业投资却很缺乏，于是公共卫生问题凸显。驱逐、失业及犯罪日益普遍。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政府坚持认为巴坦出口加工区对于外商投资是必要的。外商投资能够增加就业，工人能够学习到先进技术并增加收入。政府指令巴坦省出资建立该加工区。为了帮助跨国公司在那儿建厂，加工区贷了 139 亿比索的款。1946~76 年间，跨国公司 80% 的资金都借自地方银行。跨国公司每投资一美元，菲律宾地方银行就借出 8.33 美元。而投资的每一美元所产生的 3.38 美元利润，都回到了美国。

政府保证低廉的工资和人工成本。对跨国公司给予税收鼓励，其产品免税，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也都免税。政府免征出口税、财产税和承包商的营业收入税。头十年的经营亏损可以延后六年处理，无需缴税。其法律依据是 1967 年颁布的投资刺激条例（RA5168）和出口刺激条例（RA6138）。除了这些免税优惠，跨国公司还受劳工保护立法的制约。

雇用条件

巴坦出口加工区究竟给当地工人和其他人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它是否实现了承诺过的就业和繁荣？在和工会领导和移民工长谈（整整一夜）之中，我们发现出口加工区既未给这些人或者地方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长

期维持就业。就业最高峰是在 1979 ~ 1980 年, 54 家公司雇佣了 26000 人。但到了 1985 年, 只剩下 14000 ~ 15000 工人, 80% 的劳动力是 15 ~ 24 岁的女工。这是特区内各企业的政策, 要维持这个年龄段。因为年轻, 他们有活力而且易驯服。他们来自外省, 彼此陌生而没有联系, 更不容易联合或是得到当地的支持。

因为公司宁愿解雇一个员工而不是让他转为正式工, 所以员工的流动率很高。这有利于削弱工会的力量, 因为法律规定只有正式雇员才能加入工会。60% 的工人加入了工会, 其他的都是合同工, 临时工或者实习生。低工资和恶劣的条件也是流动率高的另一个原因。工资比大马尼拉低, 食品价格却更高。生活成本比工资上涨得快。

在生产女士内衣的联合香港制衣厂, 工人一天工资 12 比索。但是有大量的强迫加班, 以此作为缩短生产周期的一种手段。订单中原本 6 个月的工作量可以在 4 个月内完成, 这样公司就可以省下两个月的劳力成本。工人就下岗, 直到有新的订单。工人们会连续三天每天被迫工作 10 ~ 16 个小时。这个叫做 “Stay-Ins”, 如果工人不 “合作”, 就会受罚或者开除。

MAC (马里韦莱斯服饰公司——外套和裤子厂) 的一个前雇员, 在厂里工作了 3 年, 他告诉我说工人数量从 2000 翻了一番到 4000 人。1978 年他们是 6.78 比索一天, 现在是 53 比索。制作芭比娃娃衣服的里韦莱斯厂有两个分厂, 雇佣了 4000 名工人。大马尼拉的超市里, 一个芭比娃娃的零售价是 42 比索, 而工人的工资每天只有 59 比索。

在另一个工厂, 女工不准用厕所。工厂竟然不给厕所供水, 减少照明。一个来月经的女工去厕所时, 昏暗的灯光下, 她误把一个罐子里装的酸性物质当成是水来用。女工因此丧命。

社会保险制度, 即 SSS, 加重了矛盾。工人们一个月交两次社保, 这笔钱被公司截留不上交, 直到工人生病, 公司才汇款到大马尼拉奎松市的社保中心, 由社保中心支付给工人。社保中心只有在资方交钱之后, 才会付给工人。而资方交钱之拖拉是出了名的。资方截留雇员的钱, 赚取利息, 雇员是没份的。社保不给支付的后果, 就是工人因此欠债。他们无以维生,

只好借债。一般的规矩是借五还六, 就是借 500 比索还 600, 20% 的利息。

从表面上看, 工人的居住环境还说得过去。在政府宣传画上, 那些宿舍看起来很吸引人, 特别是对于一个来自偏远省份、15 岁的、可能会打工的人来说。然而, 这些宿舍挤满了 4000 名工人, 其中多数是单身。12 ~ 14 个人住在一个 20 × 10 英尺的房间里。每间宿舍七张高低铺, 包括厨房, 每个人还要付 40 比索的租金。

在工业区为数不多的环境宜人的住宅区里, 中层管理者可以享受足够的居住空间, 房间, 和便宜的房租。附近是新建的漂亮医院, 路的另一头是一座新式教堂 (教堂是由开发区管理处出资修建, 是公司们献给马科斯总统的生日礼物, 以示感激!) 中层管理者们会去这家医院, 工人们也可以去看病, 假如你有钱的话。

巴坦出口加工区里别的工厂包括集成电子 (Integrated Electronics)、Soltron 电子, Selestra 电子、Sanros 贸易, Interasia 集装箱, Crismina 服装, Suitar 服装, Filforce, Lotus 出口专家, BASECO-Philippine 码头公司和 Mindex。1984 ~ 85 年, 这些公司雇用的 7939 名工人中, 有 4905 人被解雇。

很多公司开始撤离这个工业区。理由是多方面的, 包括: 免税期结束,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难以获得外汇, 担心工会组织和政治动荡。最近撤离的公司包括福特运营的一家车身冲压厂, Chemark 电动机厂, Astec 电子厂和美泰 (Mattel) 玩具厂。

这个出口加工区和英国的工会成员也有切身关系, 因为他们同样受跨国公司的管辖。在巴坦的出口加工区, 有两家英国公司, 国际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Baird 纺织品分公司 (生产女士内衣), 还有 Dunlop 国际体育用品公司 (生产网球)。



在 1983 年以前，这里还有第三家英国公司，Bsr 的附属企业 Antec 电子公司。后来一家工会成功地把全厂工人组织了起来，这家公司就撤离了。

健康问题

没有安全生产规划，也没有关于有毒有害物质的说明。卫生部称 40% 的菲律宾人患有肺结核，劳动法规定超过 200 人的工厂必须配备一名医生，但是工厂大都没有任何医疗设施。

工作条件通常非常恶劣。工人们经常抱怨因为疲惫和产量定额过高造成的贫血与精神紧张；视觉疲劳在手表厂和电子厂很普遍；在纺织厂和布娃娃厂，纤维粉尘造成很多肺部问题。由于缺少食物，通风不良和过高的产量定额，晕厥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采访到的工人抱怨因为粉尘和化学品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缺少厕所和上厕所的时间而导致的泌尿系统感染。这些全都和强制加班有关，很多工人还因为工厂巨大的噪音而患上头痛病。

一个工人说：“我们如同破布一样被丢弃，用完后就和垃圾一起被扔掉。厂里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牲口。工厂主们对待宠物狗要比对待工人好得多。他们让狗住大屋子，喂它们吃肉，还备着兽医。”

资本和工人

在出口加工区，“劳资和谐”是空话。加工区里的工人从不驯服消极。罢工从不仅限于经济要求，还因为如下的正当理由——工厂对待工人的不公平行为和对工会的破坏。

1976 年，出口加工区的第一家工会在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尽管为军管法所禁止）。1979 年 3 月 5 日，出现了军管法期间的第一次罢工。罢工者遭到逮捕和拘留。政府认为罢工者应被隔离。在当地社区以及一些神父和修女的帮助下，三天后工人被释放。斗争持续了 53 周，工人赢得胜利并复工。更多的工会以此为榜样发起了罢工。政府的反应就是颁布 BP 130 法令，

即“重要工业部门禁止罢工”。

1981 年，一家日资厂的工人发动罢工。54 名工人入狱。其中 24 人被关押在一间面积不足 80 平方英尺的小牢房里。

加工区工人与各工会和联合会的领导人组建了一个联合论坛（领导者论坛），试图在与出口加工区当局进行请愿对话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当局负责人承诺在一家纺织公司的纠察线上谈判，不会动用武力。但是军队袭击了纠察线。结果，20000 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工人，解决工人罢工提出的问题，即资方命令每个工人同时操作 6 架织布机。在与政府进行了 4 天的磋商后，工人被释放，引发罢工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启发下，建立了 AMBA-BALA 联盟，联合团结全省工人。“AMBA-BALA”还有“瞄准开火”的意思。它来自于 10 个地方工会领导的倡议，并成为菲律宾地方性工人联盟的先驱。

1983 年 9 月，Astec 电子厂罢工。Astec 一直激烈地拒绝组建工会。当工会会员被解雇时，导致了工人罢工。1983 年 10 月 20 日，全部由女工组成的罢工队伍遭到了军队的袭击。10 月 21 日至 22 日，加工区出现了第二次同情罢工。集会被军队驱散。罢工纠察线受到催泪弹袭击，被调来的海军陆战队，朝工人的头顶上方开枪。罢工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会代表权选举后，英国公司破坏工会的行为。资方开除了 365 名工人。政府迫于压力，命令公司重新雇用这些工人，并承诺对军队采取处罚措施。公司停业了。军队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英国公司的反工会行为造成的这一局面，应该成为引起英国工会运动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法案出台了：815 号决议禁止电子工业领域的罢工，8471 号决议禁止出口工业领域的罢工。

第三次同情总罢工发生于 1984 年 5 月 8 日。起因是 Interasia 厂非法解雇 11 名工会干部，以及学徒工的合同问题。Interasia 工人罢工两年后，政府宣布该罢工非法，并宣布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不得留在该工业区内。

1984 年，加工区发生了 16 起罢工。在诸如 Lotus 鞋业（制造耐克牌运

动鞋)一类的大公司,还发生了大罢工。工会还为非工业问题发起过工业行动,例如反对巴坦的核电厂。

除了禁止罢工的法律之外,针对工人行动取得的胜利,政府会加紧镇压力度。最近国会的动向就是,巴坦出口加工区现任行政长官 Renato Cayntano 提出了一条议案,不仅宣布罢工非法,还进而取消任何组织罢工的工会的代表权。这条法案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访问加工区的时候,目睹了一场反对通过该法案的罢工。工人在加工区行政大楼外集会,持续了数小时。我们的代表在集会上做了演说,表达团结之意。我们受到了欢迎。“近日公报”对我们不表示欢迎。我们中的3个人还想回到巴坦参加五一庆祝,但是在马尼拉,有人建议我们,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要再回巴坦了。

巴坦的工人组织

很多公司有工会组织,更多的公司中正在组织工会。工人们正在为用真正的工会取代听话的工会和黄色工会而斗争。工人们发现,通过不断扩大工会的团结,他们已经能够无视反罢工法令而不受处罚。这种团结自发地发展起来。

AMBA-BALA 联盟扩展到了巴坦全省。我们见到了联盟的主席,Ed Capuyoc,现已关闭的福特钣金厂的前任工会领导。联盟认为,光靠经济斗争,无法提高工人的地位。

AMBA-BALA 不仅同菲律宾五一工联(KMU)的工会有合作关系,还跟诸如青年天主教工人(YCW)一类的组织有联系。该组织是一个教育和支持工人的战斗性组织。顺便说一句,这个组织成员的年龄上限是35岁。

另一个与 AMBA-BALA 有合作的组织是政治被拘留者行动小组(TFD),该团体密切留意对工人及其家庭的迫害和虐待问题,收集证据,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个组织叫做“城镇传教士”。这是一群神父和修女,他们的首要工作对象是穷人和穷困的工人。他们生活在这些穷人中间,分担他们的痛苦,

通过有关工作问题的教育计划帮助他们,例如人权问题和公民自由权问题,也通过社区健康项目帮助他们。

这三个组织同 AMBA-BALA 一道,帮助改善工人的处境,为罢工工人提供社区支持,反对军事镇压。在这三个组织中,一提到菲工大(TUCP),就会报以嘲笑。

AMBA-BALA 目前正在开展工人培训课程和学习讨论会。他们出版通讯和教材,帮助组织工会,发起争取工人权利的示威游行。AMBA-BALA 的组织者没有报酬,他们提供的服务全部是免费的。

在巴坦,团结罢工或同情罢工的策略和地区性联盟的组织,已经成为菲律宾其他地区组织工会的榜样,尤其在马尼拉。

一些独立工会已经开始向五一工联靠拢,虽然目前仍保留独立姿态。黄色工会的许多会员已经脱离了工会。在巴坦的出口加工区,有两个黄色工会已无会员,各自只剩一名干部。菲工大三次邀请 AMBA-BALA 的领导面谈,都被告知没有共同语言。

1983年5月,巴坦出口加工区中的46家企业,有37家组织了工会。12家属于自由工联(FFW),7家属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9家属于五一工联。到1984年底,变为自由工联8家,TUPAS 4家,五一工联(包括全国工会联盟和民主劳工组织协会)13家。

搬迁安置

1972年,马里韦莱斯市(Marivelem)的人们被搬迁,为加工区腾地。纳思科(Nassco,由当地的“国家钢铁和造船公司”得名)居民区的700户居民共4000人,以及卡玛雅(Kamaya)居民区的75户家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大部分人没有得到补偿款。少数人仅得到了800比索,其中的30%还落入了办事官员的口袋。

纳思科的居民得到承诺,在他们即将安家的距离马里韦莱斯市25公里的地方,他们将种种便利设施,如供水,供电,等等。由于不断上涨的交通费用(占收入的20%),只有50%的纳思科人搬到了Alion。

30%的人搬到了与 Casoy 相邻的居民区 Cabcaben, 离马里韦莱斯市 15 公里。其他人搬到了巴坦船厂与工程公司 (BASECO) 在 Agwawan 的安置区, 离镇子 5 公里。卡玛雅的居民被送到了圣卡洛斯市 (San Carlos) 的居住区, 那儿是沼泽地。其他留在马里韦莱斯市的人陷于贫困之中。

代表团参观了这些地方, 见到了迁居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

受雇于国家钢铁和造船公司 (NASSCO) 的纳思科居民被告知, 公司将由 BASECO 接管, 工人在 NASSCO 时期所有的权利和福利将会得到尊重。NASSCO 有较好的劳资关系, 集体协议中包含有工人享受免费交通的条款。而在公司被接管之后, 工人数量从 1500 裁减到 300, 福利也削减掉了。

BASECO 为罗穆亚尔德斯 (Romualdez) 先生所有, 此人是马科斯老婆的一个侄子。他接手 NASSCO 的时候已经觊觎这个加工区了。人们被搬迁到 Agwawan 的安置点, 一个阴暗的山脚下。工人的工资被克扣, 据说用来购买 BASECO 的公寓。但是, BASECO 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购屋款交给政府的社保系统。当 BASECO 破产的时候, 政府宣布, 这笔早该交给政府社保系统的款子, 要用于赔偿 BASECO 尚欠的贷款。所以, 这些公寓不再属于其居住者了。而土地依然属于罗穆亚尔德斯, 他想收回。人们再一次面临搬迁的威胁。

C 先生, 这里居民的发言人, 告诉我们, 他在这里住了 24 年了, 一直在船厂工作。BASECO 试图破坏工会, 任命经理做工会负责人, 并成立一个由管理层人员组成的工会委员会。公司还把离职金减半。工会领导层试图反抗, 提交了 1984 年 7 月 22 日举行罢工的通告。后来由于受到军队干涉的威胁而放弃。

C 先生本应得到 16000 比索的离职金 (800 英镑), 但是数额减半了, 而且只有在他和全家从新公寓搬走后, 才能拿到钱。船厂于 1984 年 7 月关闭。C 先生 1984 年 8 月搬出公寓, 然而只得到了之前承诺的离职金的一半。因此, 最后 C 先生在为公司工作了 27 年之后, 由于罗穆亚尔德斯和资方的专横决定, 只拿到应得的 16000 比索中的 4000 比索 (200 英镑)。

我们问, 为什么船厂工人不去找加工区的工会寻求帮助呢, 他们一定会同情他们的遭遇的。他们告诉我们, 船厂工人最初不想要 BEPZ, 因此不会向 BEPZ 的工会寻求帮助。工人被分化了。

其余被迁走的人住在马里韦莱斯市的棚户区。移民工人也住在那里, 比住宿舍便宜。当地人建造了一些木板房出租, 租金比较低廉。一间屋子住四个人, 厨房在屋外。房屋建在沼泽上边铺设的木板和木桩上。水要一桶一桶的买。房东要向政府缴纳住房出租税。

孩子们不去上学, 因为, 虽然上学免费, 但是付不起赞助教材和教学设备等等的费用。马里韦莱斯市的儿童占人口的 50%; 只有 20% 上学。36000 的人口, 只配有 5 个医生和 10 个护士。一个“免费医生”上午 10 点上班, 但对已经开始工作的工人来说, 这太晚了 (没有时间去看病)。



第 7 章 碧瑶市的出口加工区

该出口加工区就在碧瑶市城外。高地的凉爽条件有利于电子厂的生产线。我与加工区一个监督政府政策的小组交流过。小组某成员曾在加工区工作，直到因为组织工会被解雇。他们都是大学生。

加工区建于 1981 年。区内有 10 家企业运营，而且还有很大的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入驻。这些企业不生产成品，只生产用于出口的零件。这类出口加工区对企业来说都是免税天堂。该加工区占地 64 公顷，区内全部企业总共雇佣 4000 名工人，这些企业有：电子领域的 Texas 工具公司，Arax 公司，Amang 公司；Caffco 公司（生产塑料花，250 名工人）；法资企业 Legris（生产塑料管）；意大利企业 Adriste（鞋厂）；Fils Zapato 公司；Tara 公司；和 Arbis Tech 公司。

政府用菲律宾纳税人的钱建立了这个工业区，区内的国内外企业不费分毫，但该区很多方面做得都不好。

工业区没有一个得到企业认可的工会存在。这个地区历史上就缺少工会传统。区内的大部分工人来自外省，对碧瑶市来说都是外地人。这是公司政策。大多数工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在这里工作是因为别无选择。

Texas 工具公司

这家公司（简称 TI）是区内最大的企业。平均时薪是 7.5 比索，每月最低生活保障（COLA）是 510 比索。这样的工资要低于该企业其他分厂的工资。

TI 公司拥有最现代化的工厂，在其雇佣合同中禁绝任何工人成为工会会员。当有人试图建立工会的时候，管理层会找工人家访，劝阻工人入会。带头的人和其他积极分子遭到骚扰和解雇。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专

门监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监视不仅限于工作当中，还延伸到工人的私人生活中去。

该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在妇女问题方面特别积极，有一次被请去在一个国际妇女集会上发言。当她刚要发言时，看到厂里人事部某人在观众席中，便略微修改了她的演讲。她回工厂后，在上班时被管理层叫去汇报她的演讲的事情。这种手段在其它案例中可以凑效，但她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对她不起作用。

TI 公司还向工业区内的其他公司提供情报服务，如果它们遇到了工人和工会的麻烦。TI 解雇了一名试图组织工会的女工。这名女工告知管理层她要参与一个会议而不能来上班，然后当她没来上班的时候，管理层以她旷工为由解雇了她。该公司夸耀，他们粉碎了分布在 29 个国家中的 54 家分公司中的工会。新进员工会受到严格的筛选，以便发现他们有无同情工会。公司设计了专门的测试，查找那些有支持工会倾向的工人。任何人表现出这种倾向，都不予雇佣。

在 TI 公司，闭路电视系统被用于监视工厂所有地方的工人。他们使用一种编码系统来追踪每一个工人的工作表现。这种方法使公司能够将某个问题产品的责任追查 to 具体的工人，以便采取处罚措施。美国国防部退回了一些 TI 公司的产品，因为这些用于哥伦布航天飞船上的产品存在内部缺陷，公司非常恼怒。我们明白 TI 面临的其他困难。1983 至 1984 年之间，1500 名工人中的 400 名被解雇，而且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人被解雇。

Commonwealth 服装厂

菲律宾 commonwealth 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针织品厂，老板是菲律宾人，经理是韩国人。他们为纽约的时装店生产服装。之前该公司全体 300 名工人因为试图组织工会而被解雇。不久公司新招了一批工人。

公司使用 150 名分包工人从事针织和编织作业。工厂中有 200 名正式工，在洗涤、熨烫和包装部门工作。只有这些人才能被组织进工会。临时工被排除在工会组织之外。由于是临时工，工会很难去组织这个部门，但

是仍然有人尝试去组织。临时工可以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被解雇。

临时工每天的基本工资 20 比索，外加最低生活保障 17 比索，总共 37 比索。正式工总共 53 比索。另一种雇佣形式是合同工，“快”的工人两天拿到 36 比索（每天 18 比索），“慢”的工人三天 36 比索（每天 12 比索）。后者每天收入的 12 比索中，交通费要花 4.4 比索，5 比索买食物；剩下 2.5 比索给家庭。五一工联（KMU）发起的运动要求每天 91 比索的工资，这样才能满足基本需求。

把工作带回家做是该公司的新措施。多数工人是计件工资。产量定得太高了。管理层规定，做不完的活要带回家，第二天上班前完成，这部分工作没有报酬。带回家的工作都够再开一家服装厂的了。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管理层会找工人的麻烦。

这些工人的正常的工作时间是从早 8 点到晚 5 点。订单多的时候，全部 380 名工人可以回家休息一小时，但必须在晚 6 点回来继续工作，然后工人们被关在工厂里工作到第二天早 6 点。晚 6 点到早 6 点这一班没有任何奖金，即不算是加班，因为他们全是计件工资。

这里流产频发。因为产假没有任何工资，因此，很多工人因为没有生活来源，便不得不尽可能多地工作。在暴躁的韩国管理人员的控制下，工人经常遭到暴力对待，韩国人经常拿原料、衣服、甚至椅子砸向工人。他们说，这是按韩国劳动法来管理的，而不是按菲律宾的劳动法；不管怎样，有一个趋势，就是把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送到韩国和日本学习管理技巧。来自日本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代表证实了日本的做法，并对日本所谓的“质量控制”技巧表示忧虑。

加工区的其他公司

工资最低的是一家生产蛇皮凉鞋的企业，产品出口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Fils Zapato 公司的工人每天的总收入是 15 比索，该公司为一名美籍菲律宾人所有。许多工人在厂里工作了八个月以上，仍然得不到正式工的身份。他们被当作临时工或学徒工，公司没有义务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公

司的理由是：公司还没有完全开始运作。政府也认可这种说法。这些工资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每天 32 比索的基本工资和 17 比索的最低生活保障。

当 Caffco 公司发现工人开始接受组织工会的思想，TI 公司知道要是工业区成立了工会将有损于他们的利益，于是协助 Caffco 公司破坏工会活动。TI 采取质量控制圈的方法来对抗组建工会的可能性，把工人分成小组，让他们彼此“竞争”。

Capitol 人造花公司解雇了三名员工和一名工会组织者，因为他们试图组建工会。

健康和安

除了低工资、反工会和糟糕的工作条件，工业区的工人还有很多因为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贫血，其原因特别要归咎于恶劣的饮食和轮班工作制。工作时间分别是 7 点到 3 点，3 点到 11 点和 11 点到 7 点。订单多的时候，工人被迫加班。他们被锁在工厂里。

防护器具也是健康问题来源之一。在 TI 公司，面罩、眼罩和手套是用来保护产品的，而不是保护员工的。这些所谓的防护器具更多地加重了工人的问题。温度调节是为了适应机器，不是为了工人的需要。

劳工协会（ALU）和民主劳工组织协会（ADLO）

1983 年，附属于菲工大（TUCP）的劳工协会（Association of Labour Union, ALU），建议工业区内的某厂工人罢工，并在厂外组织纠察线。跑到厂外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不去阻断生产。这好像成了一种挫败自己的做法。

工人们设立了纠察线，但是劳工协会不管他们了，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资方把机器转移到当地某市长的房子里组装起来。按菲律宾的法律，你不能把纠察线转设到其他工厂门口。

附属于五一工联的民主劳工组织协会（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bor

第 8 章 公共雇员

Organizations, ADLO) 到纠察线上去帮助工人。民主劳工组织协会现在正帮他们在四个方面做动员和组织工作, 而这些事情原来的劳工协会是不关心的: 劳动标准和工资, 员工正规化 (取消临时工的用工方式), 加班费, 和“把工作带回家做”的政策。民主劳工组织协会同工人一道组织向资方请愿, 要求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

像民主劳工组织协会这样的真正的工会要打一仗依靠自己的硬仗。

背井离乡者

有很多背井离乡者原先就住在构成现在这个出口加工区的土地上。我们找到其中一个“拆迁户”组织。

目前住在离工业区 300 米远的 Apugan 的人们, 就是 1979 年工业区动工兴建时被政府抛弃在那里的。政府承诺他们, 可以做工业区建筑的工作, 完工后也可以在工业区里工作。承诺一个都没有兑现。之前, 这些人在附近的石场工作, 他们轮班工作, 挣的钱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现在他们失业了。之前, 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供水服务; 现在, 他们的水来自碧瑶市供水局。头 10 方水的费用是 36.4 比索, 然后是 2.6 比索每立方。很多人付不起水费。孩子们不得不到 500 米外的地方取水。

108 户人家被遗弃在了路边。他们仅有的木制棚户全部是政府提供的, 这是利益驱动下的罪证。我们拜访的那些人感到一切都没有指望了。一个男人说, 他的一家人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工作 (包括他的儿子和儿媳, 都住在一个屋子里)。他捡些柴火在附近卖, 有一点收入。根据政府的失业数据, 他要被归类为有收入的受雇者。他的老婆, 跟许多妇女一样, 在家里织一些简单的围巾, 拿到碧瑶的市场上售卖。

这些被剥夺了人的尊严的拆迁户, 他们所遭受的贫困让人震撼。他们甚至连工业区里那可悲的 15 比索的最低日工资都挣不到。这些人时刻面临着再次被迫搬迁的威胁。搬到哪里, 他们不知道。有人自称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棚户区的地主, 想把地收回来, 或者把他们赶走。1979 年他们搬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被告知可以住下来, 但是政府知道, 这块地另有主人。

菲律宾劳动法限制公共雇员的权利。第 244 条规定, 只有“商业、工业和农业企业中的雇员, 以及宗教、慈善机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的雇员, 不论这些企业或机构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其雇员有组织、参加、或支持以集体谈判为目的的劳工组织的权利。”

劳动法实施条例汇编第 4 卷第 1 部分第 2 条做了补充和限制: “前述条款中以下除外: (a) 安保人员, (b) 包括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内的政府雇员, (c) 管理人员, 和 (d) 宗教、慈善机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等非盈利机构的雇员, 如果在该法案有效期内, 上述各种机构没有现成的集体协议, 或没有被认可的工会, 或者没有自愿放弃免于成立工会的权利的。”

这意味着, 大多数公共卫生部门和公共教育部门的雇员, 都没有成为工会会员的权利或与雇主谈判的权利。打个比方, 在英国, 像 NUPE、COHSE、NALGO、CPSA、NUR、UCW 等工会所包含的那些雇员, 在菲律宾, 根据法律, 都没有成立工会的权利。

第 277 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包括政府所有的企业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内的一切政府雇员, 其雇佣协议和条件由公务员法, 相关法规和条例来决定。公务人员的薪金标准由国会制定”, 等。

矛盾的是, 少数公共部门中的工会得到了承认, 并由劳动就业部 (MOLE) 登记在册, 尽管并不清楚它们是哪种意义上的工会。其中有些工会似乎是以前的一些工会的遗留物, 像 PGEA 在军管法之前就有了。这样的工会包括:

自由电话工人工会——4365 名会员。(Free Telephone Workers Union)

政府工人联盟 (其会员包括 6 家政府企业的工人)。(Alliance of Government Workers)

菲律宾飞行员协会——386 名会员。(Airline Pilots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航空公司雇员协会——5213 名会员。(Philippine Airlines Employees Association)

1983 年,在政府工人联盟(AGW)领导下,几个政府部门(包括社会保障部门)中的雇员威胁将于 3 月份采取行动,之后,劳动关系局宣布政府工人联盟不是工会,没有权利搞集体谈判。该局命令“政府工人不能建立工会,不能罢工,也不能参与任何的联合行动”。

对罢工权的限制

尤其与公共部门雇员相关的就是对罢工权利的限制。劳动法第 264 条第(g)款,破坏了各种雇员有效组织的权利。“如果在劳动就业部部长看来,发生了一件正在引起或可能会引起对国家利益产生有害影响的罢工或关闭企业的劳动争议,例如公共部门(但不限于公共部门),与生产和分配能源有关的企业,银行,医院,或出口导向工业部门,包括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那么,部长应当负责对争议进行审理和判决,或者要求强制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

在劳动法第 368 条中,这个名单扩大到仓储;电话,广播和电视,媒体和邮政服务;冷冻厂;从饲料生产到纺织业生产的一系列制造业企业;三星级至五星级的宾馆;采矿业和金属冶炼行业;等等。

1982 年,总统宣布,在 Jai-Alai(国家运动会)中的罢工是危害公众利益。

同样,“鉴于该法令的目的,‘罢工’这个词的意思不应仅仅包括停止工作,还应该包括怠工,集体请假,静坐,企图损坏、破坏或阴谋破坏工厂、设备和设施,以及其他类似行为。”(PD 823)

1985 年 3 月 7 日,国际自由工联根据第 87 号协定,涉及到政府雇员和当地政府服务部门的员工,以及政府所有的企业和政府控制的企业中的工人被取消加入工会的权利的相关内容,正式向国际劳工组织(ILO)申诉其工会权利受到了侵犯。

在论述菲工大、劳动就业部、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章节里,还要提到

这些问题。

教师的工会组织

劳动就业部名单中有 44 个工会的会员中包括教育机构的雇员。许多与私立教育机构有关。全国教职工联盟声称有一万名会员。全国教师与办公室职员联盟声称有 7618 名工人。

教师是组织得较好的职业群体之一。1983 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教师大会。这一地区联系和组织起来的教师数量快速增长。例如,比科尔区教职工联盟(the Bicol Concerned Teachers' Alliance)从 1983 年 4 月的 200 人增加到一年后的 3000 人;KAMMI 从 1982 年 5 月的 40 人增加到 4000 人;等等。然而总体来说只有 10%的教师被动员起来。工会领袖认为原因是“恐惧,没有安全感,和相对保守”。

菲律宾大学的校报能够说明教师组织到了什么程度。二月那期内容广泛,其中有社论说:“我们应该将我们亲爱的菲大称为‘抗议的大学’……目前在菲大,在学生、教师、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积极参与下,我们有整个国家最成功、最活跃的多阶层联合运动……菲大很有可能成为街头议会的中心。我们早就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抗议方式了。游行、纠察线和噪音火力依然有各自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问:这些够吗?”

教职工联盟(ACT)

教职工联盟成立于 1982 年 6 月。创办团体包括马尼拉公立学校教师联盟和菲律宾大学研究院雇员联盟。

我们去了菲律宾教师中心(Teacher Centre of Philippines),该中心在菲大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建筑是美洲—亚洲自由劳工研究所(America-Asia Free Labor Institute, AAFLI)捐赠的。我们听了 R.O.的一堂讲座,题目是“国家政策对菲律宾教育和教师工作条件的影响”。讲座留下的印象是,对学术环境迟迟不予尊重,或许帮了教职工联盟的忙。

“教师总共有 426,000 名，他们构成了整个专业阶层的 60%。共有 39,396 所学校，在校生共 13,492,000 名。85%的初级教育是国家办的，中等教育有 55%是国家办的，高等教育只有 15%是国家办的。

“教育预算只有 63 亿比索，而军事预算高达 78 亿。军管法之前，预算的 30%投入教育领域，而现在只有 9%。花在马尼拉国际电影中心上的 2.12 亿比索本可以支持 17 所国立大学。一个教师的基本工资是每月 1200 比索（60 英镑），一个六口之家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是 2500 比索。而且，如果学费上涨，更多的学生将会辍学，更多的教师将会失业。

“虽然学得很慢，但是教师们正在意识到：学生说得对——帝国主义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投资教育，造成供给过剩；劳动力政策有计划地造就了会说英语和训练有素的廉价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但是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少得多。教育系统每年贡献 50 万失业人口。你会发现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有很多大学生，还有许多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出国干体力活。

“当前的教育制度本身是反菲律宾人民的。美国人强迫我们说英语，我们主人的语言——而即使是在印度的英国人都用当地语言来教学。学校的历史课是一套谎言：西班牙对菲律宾如何开化啦，美国人对菲律宾又如何慷慨啦。

“国家教师没有权利组织工会。教职工联盟有 62 个工会，包括所有等级的教育机构，也包括非教职的员工。至少有 10 个地方联盟和附属机构。尽管如此，我们也仅仅组织了 50 万教职工中的 15%。

“首先，政府的政策是反教师和反民族的。我们的回应是：教师必须组织起来。而且，我们同社会的其他阶层受到同样的政策的影响，我们与其他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获得力量。

“在大马尼拉，400 名教师因为组织工会被解雇，De La Salle 大学解雇了 103 名教师。试图保护投票箱的教师遭到无理

迫害。达沃市（Davao）一名教师被警察强奸了七次。我们的一个成员被关进监狱，菲大教授 Valerio Nofuente 被谋杀。”

菲律宾教师中心发表了菲律宾教师遭迫害的有关记录。教职工联盟也出版《论坛》报，还有一些专门的论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卷入菲律宾教育改革的影响》等。

教职工联盟还告诉我们的代表团，学校开始采取外包和转包的主意，打的旗号是帮助那些直接受雇的非教职的员工——门卫和水管工等——“独立地与大学做生意”。这种在公办和国立大专院校中的解雇行为违反了菲律宾宪法、劳动法和公立学校教师基本法（Magna Carta of Public School Teachers）等相关的法律保障。（引用 1973 年菲律宾宪法第九部分第二条）

英国和全世界的教师工会都应该通过团结行动，支持像教职工联盟和菲律宾教师中心这样的组织，交换信息（例如工资和工作条件），还应该抗议对公立和私立教育部门教职员工的骚扰迫害。

菲律宾教师中心（TCP）

菲律宾教师中心成立于 1981 年，1983 年获得正式承认。其全国理事会包括：2 名教授，4 名律师，2 名系主任和一个研究所主任。在达沃市和比科尔岛都有它的分支机构。

菲律宾教师中心的作用是：

- (a) 为教师组织问题的研究和出版提供服务。
- (b) 实施针对教师和其他的学校雇员的教育计划。
- (c) “为受到不公正处罚的教师和非教职的员工提供法律援助。”菲律宾教师中心与一些服务型律师机构有联系，例如 FLAG 和 CLS。

菲律宾教师中心在 1983 年 6 月 10 日得到官方认可，目前在达沃市、伊利甘市（Iligan）、伊洛伊洛市 [Lapaz (Iloilo)]、卡拉班市 [Calapan Oriental (Mindoro)]、碧瑶市和马尼拉都有分支机构。一年内，菲律宾教师中心有了 3282 名教师。他们认为需要克服过去的工会模式，例如，领袖主导（通常是自封的），常常站在学校所有者和管理者一边，对律师的依赖，以及官

僚文牍主义 (Bureaucratic Legalism)。

教师很容易受到军方的骚扰。有书面证据证明，在 CHDF 持枪驱赶下，教师们成群的被赶到投票站充当工作人员。1980 年 1 月 30 日，在邦板牙省 (Pampanga) 汕佛南坨市 (San Fernando) 的市政厅，CHDF 包围了 500 名教师，命令他们更改选举结果以支持现任市长 Armando Biliwang。教师们拒绝，在混乱中，一名教师不幸流产。

全国公立学校中的 35 万名教师无偿地承担了 96 种非教学任务。

政府正在重新搞全国自由选举运动。这个运动是麦格赛赛任总统期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搞起来的。这是个右翼的运动，给教师带来了很多问题。运动受到天主教会和宗教人士中的保守派的鼓励，这些人开办了许多私人学校。教师的良心和他们的雇主的利益之间将有直接冲突。

10%的教师来自政府资助的师范院校，其他教师来自私人教师学校。学费昂贵，每学期 1500~4000 比索，而在政府的师范校里，只需 600~900 比索。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是：提高学生对教师的比例；增加每名教师的教学科目；减少科目数量。最后一点意味着，在小学，科目从九个减到三个。到 1990 年，46000 名教师将被解雇 (五六年级的教师)。“这能给世界银行省钱，将它通过初等教育权利下放计划在菲律宾的一亿美元的教育投资赚回来。”教职工联盟的发言人，理事会成员之一的 Raul Segovia 教授，引用世行一份名为“初等教育部门计划”的机密文件这样评论道。

教师的工资低于贫困线，教师费用的负担被加在了学生费用中。在 1984 年到 1985 年，学生负担的教育费用提高了 169%，各种杂费提高了 300%，当时马科斯政府把公立和私营教育部门雇员的工资冻结在 1981 年的水平上。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83 年 2 月提供 5.5 亿美元贷款所强加的第六个条件。

菲律宾教师中心出版了一本长达 100 页的小册子，名为《教师和教职员合法权利手册》，可谓专业汇编。例如，该书区分了公立学校教师自我组织的权利和私立学校教师的优先权 (比如，私立学校教师的工会注册后，他们就有权加入集体谈判协议。协议应包括相关条款，其中的规定不

得低于法定标准。)

手册似乎不愿意将产业关系行动划归为非法的行动。以维权方法为例，比如“向当地学校的校长或国立大学的主席上诉”，接着是“向 MECS 上诉” (公立学校) 和“通过学校内部的申诉机制采取适当措施” (私立学校)，等等，都是“依法维权的措施，且多数情况会需要律师提供服务”，尽管可以“咨询”教师协会的“负责干事”。教师的其他行动被称作“超出法律的”。所谓“超出法律的”维权方法就是教师们的联合行动，不是诉诸于法庭或其他政府机构，而是设法让公众意识到对教师权利的侵犯，唤醒学校当局良心……，等等。

4 月，菲律宾教师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公民服务和劳动法的研讨会。当地一个联盟的主席 Adriano Valencia，发表了一篇带有坦率的菲律宾人特色的演讲，题目是“教师如何与学校和国家官员谈判？”当官的“会跟你说，(1) 没有可以使用的资金，(2) 我们需要时间研究你们的要求，(3) 长官或主席是唯一有权答复你们要求的人，(4) 税还没有收上来，(5) 你们的工资已经比其他一些员工高不少了，(6) 如果我们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就要给其他员工同样的待遇。”“当发言人陷入困境或者不知如何应答的时候”，谈判小组的成员应该对发言人给予“支援”。最后，“你应该请求神的指导，并且完全信任他。对我来说，这样可以让我在谈判和集体行动时镇静下来。”

卫生部门工人联盟 (AHW)

劳动就业部列出了四家医院工会，还有一个菲律宾工人联盟 (以前是全国医院雇员协会——Alliance of Filipino Workers)，该联盟包括 14 个直属机构。卫生部门工人联盟没有被列入，因为该组织似乎要组织公立卫生部门的工人，而法律禁止把这些工人组织进工会。

卫生部门工人联盟成立于 1984 年 4 月。前一年，某护士因散发“颠覆性”传单被警察拘留。随后，一群激进的关心政治的护士离开了菲律宾护士协会 (该协会在全部 10 万名护士中有 1.6 万名会员)。我们在卫生部门工人联盟的办公室见到了主席 Minda Luz Quesada，副主席和其他工作人员。

根据劳动法，公共部门的工会是不会被承认的，所以卫生部门工人联盟不能签署集体协议。又如，它不能从会员工资扣收工会经费，申请开会的地方也总被拒绝。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卫生部部长认可了该组织，最后还邀请他们参与有关工资及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当部长宣布说公共部门的工资不应高于私营部门的时候，卫生部门工人联盟要求对私营部门的工资状况进行调查，部长同意了。我们建议卫生部门工人联盟通过五一工联正式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申诉：他们根据宪法第 78 条进行组织的权利遭到否决。

卫生部门工人联盟在一些医院有分支机构，例如，华人总医院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综合医护中心，和 Senyan 医疗中心，还有宿雾，除此还有个人会员。会费每月 5 比索。

1980 年，Quesada 女士参与了一个由政府召集的三方工资会议，发现其中菲工大 (TUCP) 代表卫生部门的职员，虽然菲工大之下并没有任何卫生部门的工会成员。最后，在五一工联的总方针和社会关注的基础上，卫生部门工人联盟成为五一工联的附属机构。

工会在私人部门允许存在。菲律宾工人联盟与卫生部门工人联盟有联系，该联盟通过罢工和向高院上诉，帮助卫生部门工人联盟获得了圣卢克医院的承认。

卫生部门工人联盟报道了各种无故受罚的事件。例如，达沃市诊所的工会组织得很好，但是其中一名干部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调到马尼拉去工作。

劳务输出也被官方用来打压卫生部门的加薪。1985 年初，卫生部长采纳了一项建议，同意给 61000 名医院护工和非医疗的健康检查人员加薪 45%。3 月，负责预算的官员甚至拒绝加薪 10%，说：“最好他们都离开。必须鼓励这种做法，以帮助国家恢复经济。”

卫生部门工人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用于健康卫生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 5%。例如，预算有限和贪污腐败，令许多菲律宾人得不到医疗护理而死去。在努力组织医院工人的过

程中，卫生部门工人联盟的目标不是推动医院护理而排斥社区医疗，毋宁说是把前者当成后者得以开展的基础。最近，卫生部门工人联盟在召开心脏病研讨会的马尼拉酒店门口组织纠察线，抨击酒店就此花费了 2000 万比索，而不顾人民的基本健康需要。

除了卫生部门工人联盟，还有一些卫生职业人员参与的机构，包括 HEAL (健康联盟)，卫生联盟。卫生部门工人联盟的主席解释说，同时有几个机构比较保险，如果一个遇到了问题，其他的可以继续做事情。

奎松研究所医院

1982 年 12 月，马科斯总统签署命令，拆除马尼拉这家有 1300 个病床的医院。地皮将用于奢华的形象工程。菲律宾护士协会中的几个部门发起了长达一年的抗议运动，吸引到包括日本、美国和荷兰在内的 47 个机构的支持。医院暂不关闭。少量长期病人可以留院，数目降到 500 人。

我们参观了免费病房。这里有 100 名病人，护士总共 5 名，一名护士长，4 名助理，3 名护工 (助手) 和 4 名医生。只有一名护士当班。病人必须自己提供和清洗床单物品；之前是免费提供的。在付费病房，50 个病人有一名护士。病人每天交费 40 比索，还要自己买药。儿童病房有 33 名患者，一名护士。来这家政府医院治病的都是穷人，以前是国家负担，现在则要收费。

公共卫生部门一个最低等级的护士每月总收入是 1278 比索 (63.9 英镑)，还要减去 3~5% 的税。护工 (助手) 每月只有 948 比索 (每周 11.8 英镑)。

医疗行动小组 (MAG)

在这个遭受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国家里，该组织为许多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组织由医生等职业医护人员组成，免费给最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他们很关心建立一种公平的医疗服务，救治的标准是病人的需要，而不是病人的付款能力。

医疗行动小组是 Bobby De La Paz 医生的妻子创建的。De La Paz 医生在萨马 (Samar) 岛上与乡下穷人们生活在一起, 组织社区医疗项目。期间, 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 AFP (菲律宾国家武装力量) 的骚扰。出于安全考虑, 他听从了劝告, 搬到了萨马岛上的卡布洛干市 (Catbalogan), 在城市的工人当中继续他的工作。1982 年 4 月, 他在自己的诊所中被军方暗害。他是如此深受到人们的爱戴, 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后, 数以百计的人纷纷跑到医院看望他, 排队献血。可惜他受的是致命伤。紧接着的 7 月份, 一名女医生 Aurora Parong 被军方逮捕。因应这两起事件, 医疗行动小组成立了, 以抗议对医疗专业人员、政治犯、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无休止的骚扰。

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给政治犯及其家庭、酷刑的受害者, 农村和城市贫民提供医疗服务。他们还向军事行动的受害者提供记录和支持的服务, 除此之外, 还与卫生机构的工人和职员联合行动。他们提出与健康相关的各种问题, 例如, 国际制药公司的政策和影响, 还有巴坦市在建的核电站。当美国制药公司花费上百万比索庆祝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在马尼拉的白象心脏中心周年庆典时, 医疗行动小组在外面拉起纠察线, 抗议在这么多菲律宾人还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挥霍如此巨额的财富。他们还给每一个应邀参加庆典的嘉宾写信, 请他们不要接受邀请。

医疗行动小组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农村和城市贫民之中进行的。他们组织社区医疗计划, 为输送医护人员前往建立这些项目提供方便; 免费提供服务。当一个医护工作者进入某个社区后, 他们就采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以示承诺。他们离开时, 留给当地社区一个建好的医疗小组。在我去过的很多贫民区 (村庄) 都看到过这种小组。

在城镇, 医疗行动小组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免费的医疗和药品。工人象征性地缴纳 1~5 比索的费用, 让医疗行动小组能买更多的药品。如果没有合适的药品, 病人就要从药剂师那里购买了, 通常非常昂贵。

在马尼拉的时候, 我偶然成为了医疗行动小组的病人 (我付钱了), 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做法。非常体贴; 每个人都受到有尊严的对待; 耐心地向病人解释病情和治疗的情况。诊所从早 9 点半开到中午 1 点, 然后下午 3

点开到晚上 6 点。很多人排队, 每个医生每天可以为 30~40 名病人诊治。诊所所有七名医生。如果有人拉起纠察线, 医生就会加入纠察线, 支持他们, 以便随时救治军方干涉中的受害者。

医疗行动小组和真正的工会之间有良好的关系。尽管医疗行动小组主要基于马尼拉 (共有 120 名医生), 但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组织, 例如在内格罗斯岛的 HAND (民族民主健康联盟), 在棉兰老岛的 HEAL (健康联盟), 在宿雾的宿雾医护工作者联盟。

其他公共雇员

我们本来计划联系其他公共部门的雇员, 尤其是街道清洁工和邮政工人, 但因时间和其他限制, 未能如愿。

马尼拉的街道清扫工, 穿着印有 “Metro Aides” 的制服。他们的工作包括打扫旅游区。据说有一万名 “Metro Aides”。有人告诉我们, 政府有时会要求清洁工汇报街上出现的可疑活动, 也就是说, 他们被当作监视网来利用。在示威游行中, 清洁工和其他职工被用来控制人群。

根据合同, 清扫垃圾显然是主要工作。清洁工收集垃圾, 然后装进篮子里, 最后放进大卡车。



第 9 章 罢 工

你不必走上多远，就能遇见罢工纠察线。下面是一些我们在马尼拉和南他加禄省特意去走访的和遇到的八次罢工的第一手记录。

阿特克斯（Artex）纺织厂罢工

阿特克斯是大马尼拉地区马拉翁市（Malabon）旁胡罗区（Panghulo）的一家纺织品企业，老板是一个叫 Jesus Typoca 的菲律宾华人，与马科斯总统过从甚密。阿特克斯有 2000 多名工人，他们的日工资只有 23 比索（1.15 英镑），仅稍高于当时 42 比索法定最低工资的一半。阿特克斯的工人在 1984 年 4 月 24 日发起了一场罢工。

当年 7 月 9 日，军方在罢工现场开火，26 名工人被捕，21 名工人遭到拘禁，5 名工人受了重伤，还有 39 名工人轻伤。一位孕妇流产，女婴胎死腹中。

次年的 4 月 24 日，人们以集会来纪念罢工一周年，国际团结联盟的代表也参加了。当时洪水退潮，工厂周围的很多房子和棚屋泡在水里。一些罢工者被赶了出来，住在工厂大门外边。我们见到了一个年轻工人，腿上带着枪伤。在这片挤满了赤贫者、孩子们在烂泥中玩耍的棚户区内，最耀眼的就数五一工联红黄两色的大条幅和进步妇女组织 GABRIELA 的旗帜了。我们的代表向工人们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虽然说的是英语，但还是激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还合唱了“团结到永远”。

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旗帜和人群都已散去。纠察线仍守在原地。

荷兰奶品公司罢工

我们在圣巴德罗（San Pedro）的拉古那（Laguna）见到了 200 个荷兰奶品公司的罢工者，还和他们同行前往厂门口的一小段路。他们在黑板

上为我们讲解这家企业及劳资纠纷情况，随后是一个开放的会议。

罢工的主要起因是企业没能落实工资法案。此外工人也罗列了成打的其他不满事项。这家企业的年利润高达 4000 万比索（200 万英镑），工会要求的经济福利的总额其实只有 50 万比索。他们估算，资方每投入 1 比索，回报就有 4 比索。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持有荷兰奶品公司 13% 的股权。

他们的工会在 1977 年之前一直隶属于菲工大（TUCP），后来独立出来，在今年加入了五一工联，据统计有 471 名成员。全体工会成员都参加了这次罢工，工厂也停业了。最近他们的一家在棉兰老岛的兄弟公司也罢工了，一名罢工者被杀，很多人仍在狱中。一位罢工者告诉我们：“你要是说真话，他们就给你贴上共产党的标签。”

后来，资方发布消息，称劳动部在 4 月 29 日，也就是我们到访的 4 天之后，签发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工人即刻复工”，“否则将视为自动离职”，厂方有权招新工人代替。（时代杂志 5 月 11 日报道）

费尔斯尼（PILSYN）化纤厂罢工

我们驱车前往位于郊区的费尔斯尼公司工人罢工现场。这是一家马科斯的党羽开办的化纤厂。

工人们在纠察线上喊着口号，核心的口号是，“工人追求自由解放”。他们用他加禄语（当地语言）唱《国际歌》，但是唱得没有什么把握，不时地要瞄一眼写在黑板上的歌词，就像我们用英语唱的时候一样。

他们问道：“英国矿工罢工是怎么回事？既然英国的工会力量那么强大，为什么它们不全体前去援助矿工？”他们也看到了英国警察殴打工人的照片，于是问我们，英国的法律是否也是压迫性的；我们认同皇室家族吗？

工人问：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我们答：我们是伦敦的支持菲律宾工人的团体，目的是帮助这里的工人反抗法西斯主义。

工人问：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是怎么与反工会的政府抗争的？

我们答：也许你们五一工联也可以派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去帮助我们。

我们问：为什么这里的工人都这么年轻？

工人答：我们的父辈都是农民。

我们问：你们觉得这里的工作和从事农业劳动相比怎么样？

工人答：在这里，拿到工资的头三天过得像个富翁，到了第四天就要挨饿了。在乡下就没有这个危险，干活就有足够的粮食收。从前的日子好过一些，主要是因为物价没有这么高。现在我们都生活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了。

我们问：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工人答：落实工资法案，废除强制加班。

劳资双方的协商条件都写在集体协议中，但我们都看不到。

废除 PAGIBAG 基金¹⁹。

推翻独裁。

推翻美国统治。

自由和民主。

工人要做国家的主人。

我们问：新人民军在农村的活动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工人答：没有影响，他们觉得光靠他们就能成事。

反对政府的人都被当成颠覆分子，所以菲律宾工人都是颠覆分子。

我们问：你们把新人民军当做盟友吗？

工人答：某种意义上是的。

最后，我们得知，这个工会是附属于菲律宾自由工联（FFW），而不是五一工联的。

¹⁹ 菲政府提供的住房贷款补助项目，实际运行中多虚假腐败，工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和房屋补贴——译者注。

我们还路过了附近一家有 2000 名工人的糖厂。他们的工会主席被枪杀了，工会也因此垮掉。他们正在试图重新组织起来。

富兰克林·贝克（Franklin Baker）厂罢工

晚上八点，我们到了圣巴德罗（San Pedro），一个乡镇。我们挤在一间棚屋里，仅有的一盏油灯照见了泥土地面，靠墙的桌子上摆着晚餐，有大米、蔬菜、菠萝和青蛙腿。孩子们用乌黑的大眼睛盯着我们。我向女主人感谢她的盛情，她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这真是少见的一个回礼。

我们来到屋外，和一群工人及家属交谈。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有关这家干椰子加工厂罢工的情况。工人们每天拿到 50 比索（2.5 英镑），而澳大利亚经理一周拿 500 美元。

他们要求执行工资法案的 1~6 条，涉及的总金额是 1700 万比索（85 万英镑）。工人们分化了，一部分加入了自由工联，据说该联合会把集体协议藏起来不让工人看到。2000 名工人中只有 100 多人接受了“真正的工会运动”（GTU）的课程，此外还有 100 人是支持五一工联的。工人们说，资方开出条件，只要不参加罢工和抗议的工人都能拿到 50 比索，自由工联想接受这个条件。

工人告诉我们，在工会选举的时候，谁投票支持黄色工会领导人，资方就会给 30 比索。我们对雇主花钱收买工会的做法也表示气愤。他们回答说：“在这个国家，人权不受尊重，这个政府一直掌权，我们还能怎么办？”

运输业工人罢工

当地的公交司机来向我们介绍最近的一次成功的罢工经历。他们属于菲工大（TUCP）下属的 PT&GWU 工会。1984 年，他们转投向五一工联下属的全国工会联盟（NAFLU）。因为不满于随后资方的非法行为（illegal practice）和骚扰，司机工会的 1600 名司机和售票员罢工三天，这给公司造成了数百万比索的损失。工人的直接要求得到满足，不过其他很多项要求

仍在劳动部的强制仲裁过程中。

在昏暗的光线里，我看到工人们 T 恤上印着“希望的时代”。

后来一个大块头的人出来了，说了些话，工人们散去，剩下妇女和孩子，原来这个人是 CHDF 的（一个民兵组织）。

蓝带（BULE BAR）厂罢工

蓝带是位于奎松市（Quezon）提阿诺格（Tianog）区附近卢那坎（Lunacan）的一家干椰子加工厂。我们当晚住在椰子林中的一幢小木屋里，这是他们工会的办公室。

这个厂的工人从去年的 12 月 20 号就开始罢工了，原因也是厂方拒不执行工资法案。在全部 2000 名工人中，有 500 多人是工资很低的临时工，五个月到期之后就被解聘，也可能重新受雇。他们负责给椰子去壳，每天要剥 1000 个，但是工钱只有 31 比索（1.6）英镑。

几周前，资方在圣巴德罗（San Pedro）举行了一次会议，劳动部长 Blas Ople 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还用车载了 400 多名黄色工会成员到会去，给他们提供餐食。而另一边，军方在试图驱散纠察线上的人们。工会领袖之一 Carl Lopez Natividad 遇害。在一面写着口号的墙上有很多弹痕，被人们用粉笔圈了起来。行凶的公司保安被捕。资方把一些工贼带进工厂里，一架直升机一连好些天给他们空投食物。黄色工会的领导人 and 大约 200 多名会员复工了。

我们见到了干椰子加工行业工人联合会（DCWA）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说：“为什么政府只听资本家的，而不听被剥削者的呼声呢？只要我们的斗争推进了其他地方的工人的斗争，那就值得。”

我们的向导解释说：“他们能言善道，我们称之为‘沉默的对立面’。他们之前沉默得太久了。”

我们见到了 Carl Lopez 的妹妹和妈妈。Carl 生前对“真正的工会”课程非常热心。他的父亲已去世，母亲的状况也不太好。Carl 生前负担着妹妹 Suzanne 的学业，每年的学费要 300 比索（15 英镑）。人们说，资本家杀了

Carl，等于断了他们全家的活路。他的家人只能到处借粮和要饭。我们捐给他们家 300 比索：“同志的牺牲让我们也深感悲痛。”

波雷·哈斯提亚（BERLET HESTIA）服装厂罢工

这家服装厂坐落在马尼拉地区的达斯马瑞那斯（Dasmarinas），有 500 多名工人。罢工缘于工作条件太差。在工作场所，资方禁止工人相互微笑和交谈，因为据说这些加强人际交往的活动会影响生产。工人每天只允许有十分钟用来上厕所，进出厕所的时候都要计时。他们还禁止工人梳头，说这会浪费时间。如果损坏了公司的物料，工人将面临最高可达 150 比索（7.5 英镑）的罚款。

在 4 月 1 日，100 多个暴徒袭击了纠察线，而警察置若罔闻，倒是教区的牧师介入进来，力图制止流血事件。受五一工联领导的当地工会成立于去年一月，据说有 300 多名成员，黄色工会只有 100 多名。工会的代表权选举将在 5 月 13 号举行。

菲律宾波雷·哈斯提亚股份有限公司和格柔斯拜-KP（Grosby-KP）鞋业公司都是邓洛普·奥林匹克（Dunlop Olympic）公司²⁰的子公司，英国的邓洛普控股公司在 1983 年前一直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权。

玛丽娅·特蕾莎眼镜厂（MARIA TERESA）罢工

这家马尼拉公司生产塑料眼镜片。MTC 眼镜业工会隶属于五一工联下属的民主劳工组织协会（ADLO）。我们见到了工会主席和 74 名罢工工人中的一部分。罢工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公司的一些白领职员出于同情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这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人们所说的非法行为，包括强制加班长达 16 个小时。劳动法在很多情况下为企业强迫工人加班提供了便利，比如在“出于预防对企业或雇主经营的严重妨碍和损害之必要”的情况下（第 89

²⁰ 英国邓禄普公司（DUNLOP）是英国著名品牌。

条)。他们还抗议工会不被承认，尽管他们的成员已经占了工人总数的 30%。

他们送给了我们一些黄色头带，上面印着五一工联的口号：“真正的、战斗的、人民的”。我们则同他们分享午餐食物。我送给了他们一张海格特公园的马克思墓地的明信片，他们问我为什么要送这个。我解释说，世界各国的工人要联合。他们说：“我们需要本地的工会联合起来。”

全球-麦凯通讯公司（GLOBE-MACKAY）罢工

罢工始于 4 月 15 日，有 147 人参加。他们在联合国大街上这家加拿大有线与无线通讯公司的办公室拉起了纠察线。这个工会隶属于菲律宾自由工联（FFW）。纠察人员在门前的草坪上搭起了帐篷，边上立着工人用纸糊的美国资本家弗莱德·怀特（Fred White）的像，满手的美钞，表示公司赚得大把的利润。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工会发出了三次罢工通知，反对裁员及资方破坏工会的行为。工会主席 Eda F.Oonoepolon 介绍说，在 1976 年，工会曾有 200 多的成员，但是资方正在把全体员工重新分类，列为“机密员工”或“管理雇员”的达 178 人，按照劳动法，这些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她恐怕工会成员数将会减少到 50 人。目前他们在劳动部备案的成员数是 158 人。让他们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旦有工人离开，接替他的新员工就会被归为“机密员工”。

工会的传单上说：“我们要求在公司赚取的利润中分享合理的一份……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获得这部分利润，因为如果没有雇员——我们的工会会员为公司如此辛勤地工作以赚取巨额利润——公司就得不到目前这样的利润。

“我们请求您们，在这场罢工期间，抵制全球-麦凯（Globe Mackay）公司的服务，不通过该公司发电报，直到这场为了公平正义的斗争获得胜利为止。”

工会主席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25 年，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工会脱离自由工联，改而加入五一工联。他们每人每个月向自由工联支付 5 比索的费

用，后者则为他们提供法律方面和谈判方面的援助。当地的五一工联和全国劳工联盟曾经伸出过援手，但是她觉得“他们大多有很强的政治性，可能会被资方赶走。我们避开五一工联，因为他们在和政府对着干。但也有跟他们说，我们迟早可能会需要他们的帮助。”

不久之后，自由工联的副主席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位女工会主席负责那次罢工的。”

菲人银行（BANCO FILIPINO）罢工

罢工始于一月份，到了 5 月 16 日仍在进行中。这家银行声称已经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显然不这么认为。它的 89 家分支网点关门停业，2000 多名员工面临裁员。储户多达 260 万。大约 1700 名员工加入了菲人银行员工协会（BFSA），隶属于全国银行业工会（NUBE），后者隶属于菲工大（TUCP）。

我们在高楼林立的马卡蒂（Makati）区阿雅拉（Ayala）大街上一家停业的支行网点外遇到了罢工的纠察队员们。罢工主要源于他们认为这家银行并无证据破产。其次，他们在争取拿到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遣散安置费。他们在告示上写着：“阻止银行违法关停，阻止央行舞弊！”

员工们声称和银行方面签有集体合同，到期日为 1985 年 6 月 3 日。然而劳动部不承认，大概是因为按照劳动法，银行职员不能加入工会，也不能和雇主签订集体合同。菲工大正就此事和劳动部协商。目前，银行已经同意员工对遣散费的要求，但是银行仍将指日关门。

罢工纠察队大概有 300 多人，轮流在关闭的支行网点巡逻。他们偶尔从管理人员协会处得到经济援助。他们也和五一工联发起的银行雇员联盟（BELA）建立了联系。通过后者，他们和联合银行的员工一起组织了一次集会，下一次集会也在筹划中。一个员工表示，他们中有些人曾想参加五一工联在 Liwasang Banifacio 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菲人银行员工协会的主席则劝说他们参加菲工大在奎松市举行的集会，理由是工会主席们在集会后来去总统府（Malacanang）向马科斯总统请愿。那个女员工估计，在工会

大会的集会现场最初有 1000 人，后来达到了 2000 人。令她气愤的是，那次五一活动的唯一结果，就是政府新颁了一条劳动法 1458 号，允许资方在工人不遵守复工命令时，可以找人代替他们。因此她认为，菲工大没有战斗性。

同时在进行的还有联合银行员工的罢工，这是全国银行业工会(NUBE)领导的第一场罢工，起因是劳动部所规定的工资标准过低。卢西那市(Lucina)的美国银行和奎松发展银行也有过罢工。

其他罢工

据城市教会劳工信息中心 1985 年 3 月的统计数据，当年各类组织发起的罢工总数如下：

全国性组织	分支	罢工次数
五一工联 (18)	ADLO	9
	NAFLU	3
	ANGLO	2
	NFL	2
	DFA	1
	KAMAO	1
菲律宾及相关服务工会 (6)		
菲律宾工会大会 (4)	NATU	1
	NUBE	1
	POITAF	1
	KAIMA	1
菲律宾自由工联 (1)		
独立联盟 (7)	PSSLU	2
	FELUP	2
	AFL	1
	NUWM	1
	KATIPUNAN	1
独立工会		8
总数		44

1985 年 1 月到 4 月的罢工数量比 1984 年增加了 51%。其中 42% 的罢工发生在 100 人以下的公司(劳动部劳工统计处)。27% 持续了 3~7 天, 38% 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127 起罢工中有 60 起是源于停职、解雇、终止合同、招新人取代老员工, 以及辞职等问题。而在 1984 年, 不当劳动行为和劳动标准 (labor standard) 是主要问题。

5 月 2 号下午 4 点半, 穿制服的警察 (制服上的名字被遮盖起来) 和保安, 冲破了马卡蒂的美国医院供应工会的纠察线。六名公司律师到场。工人们是从 1984 年 9 月开始罢工的, 当时资方终止了所有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合同, 拒绝承认他们, 也不与他们协商。3 个月前, 劳动就业局宣布该罢工非法。

去年的集体谈判失败后, 有 80 名工人在三家 Kamay Kainan 餐厅前拉起了纠察线。

5 月 7 号, 帕斯哥 (Pasig, 马尼拉机场附近) 的硅科技公司的罢工中, 保罗 (Jenoschik Paul) 颈部中枪而亡。一名目击者看到公司股东的一个贴身保镖逃离现场。送保罗去医院的出租车被警察拦住, 他死在了路上。



第 10 章 棉兰老岛日记

5 月 7 日星期二

凌晨两点半，我乘飞机向南抵达棉兰老岛的达沃市。五一工联的秘书长奥拉利亚，穆斯林 Nick Elman, E.S.和 A.J.与我同机，赴棉兰老岛峰会。人民运动（Welgang Bayan）成功之后，政府和军方的代表受邀来讨论人民的不满，主要是（军队的）骚扰。E.S.说我可以作为游客参加。有个外国人在身边或许可以保护他们。

达沃市干净而开阔，棕榈树立在清晰的晨光中，阿波山的轮廓凸现在天际。达沃市又是最血腥的城市。三月间有 93 人被射杀（包括《达沃之星》报的一名特约记者），20 人受伤。

Rolando 用英语讲解道，马科斯总统指示司法部长，五一工联是一个颠覆性组织，必须镇压。司法部长建议先找五一工联商谈。Rolando 预定于 9 日参加会谈。但至今为止，会议函都没有发出。Rolando 问，“这是个陷阱呢，还是镇压？”他准备提出如下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工会人员，结束军事管制，废除 BP 130 和 BP 227 两项法律，废除劳工优惠房贷基金会（PAGIBIG fund）。

我们在 M.C.家里吃早餐。院子里有两只好斗的老公鸡，一只山羊和一头猪。“你知道我们发起了人民运动。这在棉兰老岛是第一次。”这里已经停水三天，因为管道被炸毁了。

在去市区的路上，我们谈及腐败和马尼拉的两万名童妓，并开玩笑说五一工联应该在达沃市买下一处房



产，因为资本家正纷纷抛售。我与 T 商讨了我的计划，因为部落地区被军方轰炸，不能前去拜访了。

人民运动

在棉兰老岛，每 100 个居民就有 1 个军人。1981 年起，有 5000 人以上被捕和关押。其中达沃市在 1984 年的头 6 个月就有 684 人被捕和关押。1981 年以来，上千人被谋杀，300 人失踪。1983~1984 年发生了 60 起机枪扫射和大屠杀事件，300 人遇害。

反对派领袖被清除。Renato Bucag 是欣俄奥格市（Ginoog）的反对派领袖，他和他的妻儿于 1984 年 5 月被害。9 月 23 日，律师 Zorro Aguilar 和出版商 Jacob Amatong 在第波罗市（Dipolog）被害；10 月 19 日，经济学家 Alexander Orcullo 被害；11 月 14 日，三宝颜市（Zamboanga）的市长 Cesar Climaco 被害；1985 年 4 月 9 日，米萨米斯省（Misamis）的学生领袖 Rico Salona 被害；4 月 11 日，北哥达巴托省（North Cotabato）的 Fr Tullio Favali 被害。所有事件都没有解决。处处是报复行动和报复性谋杀。一名加拿大的代表说，这里就像北爱尔兰。事实上这里情况要糟得多。

“极端分子”（Fanatics）是一群退役军人。他们认为，任何反对政府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反对上帝的，对共产主义者最终要判死刑，所以，所有反对政府的人都应该立即处死。他们的财产也应被夺走。所谓的人民解放组织与军方进行合作。他们的作用就是软化异见者的意志，劝说他们与军方对话，否则要被干掉。比如某团体有六个人，其中一个人进行了对话，其他都被杀害了。军方和政府的优势就是可以对杀戮不承担任何责任。

1985 年 4 月，OMI 组织的 Bishop Antonio F. Nepomuceno 给菲律宾武装部参谋长 Fidel Ramos 将军发送了一份报告副本。该报告是工会委员会和人权现状调查组织 2 月间在达沃市完成的。报告记录了在 Franklin Baker 工厂、Ladeco 香蕉种植园等地违反工会权利和人权的现象。报告总结说：“谋杀猖獗，以及警察和军方在应对当地平民不满情绪上的无能，引起了全体居民

的恐惧。”代表团总结说，“在有记录或未记录的案件中，军方侵犯了平民的人权，甚至侵犯了所谓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可疑分子的人权；军方无法抓捕 Kapitan Inggo 及其成员，只能说明军方支持他们，并且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合谋杀害两名 Franklin Baker 工厂工人的事件，既涉及跨国公司，也有军方命令的因素在内。”委员会还提出 13 项具体的改进建议。但是看来没有一条被接受。

军事管制使群众的抗议增长起来。1984 年，棉兰老岛发生了 278 起罢工。1984 年 10 月爆发的首次人民运动使六座城市陷入瘫痪。1985 年初发生了交通部门罢工。2 月 7 日爆发了遍及整个棉兰老岛的群众罢工抗议。

根据 NAJFD（追求公正、自由和民主的民族主义联盟）和 CORD（实现民主组织联合会）的信息，人民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有工人、农民、城市贫民、青年和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信教群众、公共和私营部门雇员，甚至还有商人。其目标是使独裁统治陷入瘫痪。摧毁美国—马科斯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民运动的最终目的。该行动的口号是“为了食物和自由的人民运动”。

该组织提出了 20 项总要求和 10 项局部要求。他们号召结束军事管制和政治压迫；放弃 PDA，恢复人身保护权；最低工资增加 25%，下调基本商品价格；废除高税率和劳工优惠房贷基金会；结束跨国公司的掠夺；结束穆斯林地方政府。

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出席了棉兰老岛多个城市的集会。在人民运动中，停工从 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持续到 5 月 2 日和 3 日。除了东北部之外的整个棉兰老岛，主干道都设了路障。我问，为什么军方不把路障移除。他们说军方害怕新人民军的伏击。游击队的存在加强了人民的行动。农民拒绝出售产品。一名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在纠察线被捕，而后被释放。另一名代表说：“新人民军一直庇护着我们。人们打出白旗教我们提防军队。”有一群人选择走海路，以避开军队。

“人民运动使多数的人意识到，在美国—马科斯独裁统治下，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是虚假的，并且注定要失败。我们发动的人民运动是一场胜利！我们必须具体地提出要求。这个政

权不会傻到向于人民的要求屈膝，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利益。”（5 月 7 日峰会的报告）

在人民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运动的发言人被问及，该组织是否与共产主义者或者 NDF 有联系，发言人回答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问题在于是否为人民谋福利。”

棉兰老岛的峰会

在 Ateneo de Davao 大学，为政府和军方预留的座位不出所料是空的。峰会变成了一场审判。

“我亲自邀请了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 Ponce Enrile 先生和劳动就业部长 Blas Ople 先生出席……”发言人说。然而在 5 月 16 日，国防部长 Ponce Enrile 否认他被邀请出席棉兰老岛峰会，他说峰会是由共产党和 NDF 组织的（5 月 17 日的《马尼拉时报》）。“即使有这样的邀请，我们也不把它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棉兰老岛峰会是共产主义者设计的一个大圈套。”

人们充满了恐惧和愤怒。一位妇女说，一天晚上，她的父亲和其他六名男子在屋内被武装人员脱光衣服后射杀，房子被纵火。“你们从来对我们充耳不闻。我们现在要去参加人民运动。现在他们害怕面对我们。这场峰会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下午，新闻发布会现场。“我们从未想到政府会拒绝出席。”“棉兰老岛的大多数城市都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运动。甚至码头也瘫痪了。在达沃市，政府损失了 7000 万比索的营业额。”“我知道，如果马科斯不正视人民的需求，人民除了罢工，还会采取其他斗争。我们处在和平革命的边缘。甘地用这种方法打败了大英帝国。政府正在这场政治战争中落败，因为它在用军事力量来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或许能赢得瑞士银行的青睐，但是却将失去所有菲律宾人。”“我们准备为了人民的福利甘冒一切必要的危险。父亲倒下了，儿子跟上去。儿子倒下了，兄弟跟上去。在这个讲台上，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比我们安全。马科斯随时都会把你牺牲掉。”

达沃市的电视新闻为此播放了 20 分钟。会场中的议员说，“这个政府撑不了三、五年了。” 奥拉利亚提到最近的 1485 号议案，该议案规定，违抗复工命令被视为非法行为。在颠覆问题上，奥拉利亚说，“我们并不介意被称作‘颠覆分子’，我们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抗议的。”

CENTRUM 组织

我们拜访了 CENTRUM 组织的办公室。

这一组织的成员遍布整个棉兰老岛（有七万人是五一工联的会员），有 7 个地区性的联合会，1 个次级联合会，3 个全国性的工会联盟（全国劳工联合会，木材和全体工人联合工会，和 SPFL，即菲律宾南部劳工联合会）。该组织有 3 名全职组织者。秘书长的薪水是每月 2000 比索（100 英镑）。他以前是达沃市电力公司的一名收费员（每月工资 250 比索）。CENTRUM 组织的委员会每四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他们组织“真正的工会”课程。在宿务市，菲工大试图阻止当地一个工会参加 CENTRUM 组织。在 Franklin Baker 工厂、Butuan 木材厂和其他地方，主要问题之一是资方对罢工工人采取饥饿策略。接着开除工会领袖。CENTRUM 组织很需要资金。

我们把五一工联的秘书长护送到机场。E.S.和 M.C.两人都建议采取通过拖延来争取时间的策略。“我们需要三个月来发起新的人民运动。”我认为如果镇压发生的话，会来得很快，尽管可能不会早于六月份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回来的路上，车胎爆了。我住进了 Men Seng 宾馆。同行的人警告说：“7 点之后不要出门。” 明天我就要去东北部，“他们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杀害了。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他们会很高兴的。” 3 月 19 日，Surigao-Agusan 工人团结组织（SAWS）的高级干事 Allan Parroco 被便衣带走，至今失踪。

5 月 8 日星期三

我与一个加拿大教会团体结伴而行。我们沿着 Agusan 河坐了 5 个小时

的冷气旅游巴士。两名军人检查了我们的车子。我们通过了检查点。我买了一片西瓜，卖西瓜的妇女找给我 5 毛钱。

我们借宿在教会的一处房子里。“主教就住在我们边上。他是为数不多的好主教之一。”

UMAN（农民协会）

UMAN（Union MAGUAMA Agusan del Norte）不是工会，而是一个独立的小农协会，会员 300 人。在武端市（Butuan）附近，我们参加了一个为 30 名农民举办的领导者讲习班。一开始，他们唱起了一首带有讽刺意味的歌，“他喝可口可乐，他开丰田汽车，他用日立风扇，穿阿迪达斯鞋……”他们受的培训是，如何不用进口肥料种粮食。协会希望他们能召开当地农民会议，并成立当地的分支机构。

SAWS 组织

来自 NAJFD 组织的 P.汇报了情况。下午 4 点半停电了，所以我们点上了蜡烛，而电扇用不了了。办公室里贴着一幅大赦国际组织关于反对酷刑的海报。

“棉兰老岛的北部四省有丰富的资源，但是这里的人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从这笔自然财富中受益。棉兰老岛 52%的土地由 Dole、Del Monte 和 Guthrie 等跨国公司所有。土地属于美国人、日本人或是英国人。至少有 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 500~600 万人口中，只有 18~30 万人有工作。在这些就业人口中，只有 15 万人组成了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

“这里现在有 8000 人的军队，特别集中在马科斯亲信的不动产或是跨国公司所有的土地上。并且，这里还有野战军



(Lost Command), 极端分子和 Tad-Tad 组织从事迫害活动。”

“在所有工会会员中, 60%加入了五一工联, 其他 40%加入了菲工大 (TUCP)。联合工人机构 (the United Workers Institute) 与教会经营的亚洲劳工机构 (Asian Labor Institute) 给工人提供“真正的工会”培训。SAWS 组织在工业部门有 24 个分会, 在服务业部门有 6 个分会, 会员总计 21726 人。其中一个工会, 菲律宾联合木材和全体工人工会, 比四个‘黄色’联合会 (MATU, WATU, 劳工协会和自由工联) 集中了更多的基层工会。SAWS 支持下的全部 21 场罢工都发生了军队和准军事化团体破坏纠察线的暴行、逮捕和扫射事件。SAWS 组织的要求包括: “第二, 停止裁员、大规模解雇、轮岗、不遵守劳动法规、不断增加生产定额而不相应增加工资以及其他剥削手段; 第三, 政府要对因关厂而失业的工人进行补贴, 并给予工人每年工龄一至两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 第六, 按照对工人有利的方式解决 Butuan 木材公司、标准板材公司和 Surigao 开发公司的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

“2 月 14 日, 我们 18 家工会举行了反对军事管制的联合罢工, 以及一场抗议游行和集会。我们没有参加人民运动,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与这里的 8000 人的军队发生什么冲突。”

在棉兰老岛, 新人民军有 19 支游击队, 遍布 2700 个村庄和城镇 (菲律宾媒体 Malaya, 1985 年 4 月 13 日报道)。“从去年 1 月份开始, 棉兰老岛东北部共发生了 11 起涉及新人民军的重大军事冲突。3 个市政当局被突袭。价值 200 万比索的炸药被偷。一年之前, 你刚刚路过的 Ampayon 路口, 曾被新人民军占领数小时。”

B.J. 讲述了妇女问题。“女仆的薪水少到每天 3.35 比索 (33 便士) 外加食宿。在跨国公司和军营附近有许多妓女, 有些只有 5 岁大。”

P. 说我们应该在 6 点之前离开 NAJFD 的办公室, “这里奸细太多了”。我本来有一封介绍信, 要交给 SAWS 组织的 K.R., 但是他们说, K.R. 在一场意料中的对 Butuan 木材公司罢工的袭击中被逮捕了。

我与一名人权律师聊了一会。

“马科斯总统想让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反共产主义的斗争。我们国家的唯一希望是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人, 能够认识到全体菲律宾人民希望自由, 认识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他说了大赦国际组织的很多好话, 并批评某些代表在菲律宾只停留了几天。

晚上, 几位农民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认为, 农民是最受剥削的群体。1984 年在武端市附近, 9 位农民被第 23 步兵营的士兵杀害。政府在农民中宣传, UMAN 农民协会是颠覆组织。从事淘金者每克金沙卖 130 比索 (6.5 英镑), 付 10% 的使用费给土地所有者。这些人担心, 军事管制会导致选举结果出现偏差, 特别是考虑到军队也可以投票。“执政党 KBL 把军队派到有可能输掉选举的地方。在上次选举中, 有些士兵投了五次票。”

“佃农会开始罢工——而政府需要佃农生产的稻米——, 或是对其他工人表示支持。”

他们问我们是否每个月都能来一次! “从英国来这里太贵了。会有其他人来的”, 我们这样说。

5 月 9 日星期四

早餐时间我们讨论了买卖新娘的事, 全世界估计有 10 万这样的妇女。她们被当成男人的家仆, 特别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

Hank 遇到了一个叫 S. 的人, 他在规划按照社会主义重建菲律宾经济。

我们去了一家修道院并拜访了几位人权律师。他们说, “每个人都很害怕。谁不害怕呢? 如果我们去了你们国家, 我们就愿意讲话了。”

标准板材公司的罢工

罢工纠察队员在公路上支起了一架凉棚, 设立了厨房区和公共区。昨天, 国家劳动关系法庭发布了清除障碍的强制令。罢工工人说, 这道强制令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就发布了。一名罢工领袖在黑板上解释了该法令意

味着什么。想到军队随时会强行闯入纠察线，大家都激动不安。这是团结的好时机。工人们说他们会组成人墙。几个人戴上了黑丝带。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答：“这意味着我们视死如归。”

“你们真的愿意为罢工牺牲吗？”

“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我说，我敬佩他们的勇气，但希望他们不必献出生命。

棉兰老岛的一名工人告诉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何地将被杀害，但一定很快的。”另一个工人，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说到：“当我开始从事工会运动的时候，我就有了勇气。其他的都已习惯了。”

标准板材公司没有遵守列入集体谈判协议的第 5、第 6 号工资令。NAFTU 工会（附属于菲工大）没有提供帮助。工人们在本地联盟 SAWS 组织的协助下转向了五一工联。每个工会会员在过去三年白给了 NAFTU 工会每月 15.5 比索的会费。公司被工业木材公司收购，新公司不接收原来的 567 名工人。遣散费应该是每年工龄给予 26 天的工资，这也是集体谈判协议的规定。全部要求总计 1,614,513 比索。3 月 2 日，工人开始罢工。他们每天吃饭要花 1500 比索（75 英镑）。工人们认为工业木材公司的确想要经营这个工厂。工人问到，从菲律宾运往英国的木材产品能否被列入黑名单予以抵制，这些产品中有些就印有“标准板材公司”或者“工业木材公司”的字样。

Butuan 木材公司的罢工

去年 7 月，军方宣布森林采伐区为无人区，工人们被撤离。两周后，他们被叫回来。工人们不满于采伐区的安全状况。公司警卫为了找乐，把工人或当地人当作靶子练习射击。采伐区有两人被击中，军营附近则有三人被击中。工人还抱怨公司不执行集体谈判协议中每年增加 1 比索日工资的规定。

全部工人都被解雇了。过去八个月，工人们在锯木厂建立了纠察线。家人们住在路边的棚屋里。10 月，罢工领导者 Teodoro Malque 在锯木厂门前被杀害。“当 Teodoro 被枪杀后，我们很悲痛，因为他是罢工积极的领导

者，是罢工的一部分。”

约有 150 人还在坚持罢工。他们每天需要 7 袋大米（价值 300 比索，即 15 英镑）维持生存。有些人夜里从庄稼地里弄来稻子，铺在路旁晒干。三个孩子正在棚屋里吃午饭。每人一碟米饭、一条沙丁鱼和一个西红柿。

5 月 15 日要召开一次会议，劳动就业部将派人出席。一位罢工者向我询问起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贸易秘书处（IFBW）。

我们同行的其他人下午去了标准板材公司。那里有 12 名士兵，还有推土机。

根据棉兰老岛全体工会论坛提供的信息，1984 年 7 月至 12 月共发生 25 起罢工，30 个工厂发生了抗议行动。有 16 起罢工宣布成功。“外国垄断资本家绝对有能力满足我们合理的经济和工会要求。”

我们乘坐吉普尼前去 Aracano，拜访三名比利时牧师。大熊星座倒挂在天上。我们寄住在一位调查员的家里。

5 月 10 日星期五

我们和调查员的家人一起吃早餐。调查员从稻田里回来，清早他在那里劳动。他的姐姐是个医生，但是政府想把她赶走，而她又不想去巴结那些政客。一名政府的医生（在支付了培训费用之后）每月最少的仅能挣到 2311 比索（115.55 英镑）。菲律宾大学的医科毕业生有一半都去了国外。

教堂中贴着一幅海报，写着“阶级意识就是知道你站在哪一边。阶级分析就是知道谁和你站在一起。”

高中教师

我们遇到了一位有 18 年教学经验的高中老师。教职工联盟（ACT）的地方分会已经和当地 300 名教师中的 30 至 40 人建立了联系。他们打算开始收取会费。“教职工联盟的目标之一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父母们很看重教育，因为他们把教育看作找到好工作的途径。这里的识字率是 75%。

五一劳动节时发生了罢课，学生们也搭起了路障。结果，有些老师在政府面前暴露了。”

我问，如果教师被开除，能怎么办。他说，开除是教育部长说了算，至少要到教职工联盟变得更强大，才有办法。

PANCORP 公司的圈地运动

我们采访了一位 42 岁的农民，种植可可和椰子的 PANCORP 公司（普罗佩里达德农业公司，Prosperidad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把他从他的 4 公顷土地上赶走。大地主和总统有某种协议；虽然农民有法定所有权，当地的律师却说他们无能为力，因为诉诸法律成本太高。他们得到每公顷最多 4500 比索的补偿。

最初，他离开薄荷岛（Bohol），前往棉兰老岛这块安顿他的未来之地。现在他靠着捡拾柴禾每天挣 30 比索。

PANCORP 公司的一些机器在农民的报复行动中被焚毁。C.S.的兄弟被军方殴打，逼迫他说出新人民军在哪。C.S.估计，在四个村镇有 4000 个家庭（20000 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农民本来要在 5 月 8 日召开会议，但是遭到军方的扫射。七人被杀害，其中两人是作为举行会议地点的家庭中的父母亲。这件事发生在 Aspatia。受害者的亲属不敢去找律师，甚至不敢收尸。

我们问 C.S.，是否有人去参加了新人民军。他表情紧张，摇了摇头。

GUTHRIE 种植园

英联邦开发公司为全国开发公司-古斯利（NDC-Guthrie）种植园提供了 640 万英镑的贷款。据说英联邦开发公司撤资了，但是据马尼拉的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说，这个项目只是位于 Loreto 的一个工程，菲律宾政府筹不到全部资金。

NDC-Guthrie 种植园分为两个部分，NCD-Guthrie 种植园工人工会存在

于其中一个部分。在 1500 名雇员中有 1200 名加入了工会。每月会费 12 比索。其中 3 个比索交给 PAFLU（菲律宾农场劳工工会联合会）。马尼拉的全国劳工工会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据工会主席 A.W.说，他们在考虑加入五一工联。“我们现在正研究哪个联合会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他们确实参加了五一工联领导的人民运动。

工会有 14 名干部，包括 4 名车间代表（每个部门 1 名），每个部门还有 8 名协调员。车间代表每月薪水 200 比索（10 英镑）。工会理事会成员每月拿 125 比索（6.25 英镑）。A.W.作为主席，拿 500 比索（25 英镑）；此外，他自己的工资是 1000 比索（50 英镑）。1981 年他被解雇，他的案子在劳动就业部至今仍悬而未决。A.W.有政治抱负——在上一次选举中他成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候选人。

这里的工资平均每天 44 比索（2.2 英镑）。工会的主要问题是确保执行集体谈判协议，比如交通费 and 医疗设施问题。最近他们在上午 8 点到 10 点举行了一次停工和抗议。“我们想要举行正式罢工，但是我们的工会刚刚成立，需要资金。我们的打字机还是借来的。”一名教會的义工向他们提供“真正的工会”课程的培训。

关于英联邦开发公司，A.W.说，“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会说，我们请求英联邦开发公司撤资。并且，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土地。人民已经失去了生计。”

这时，有个妇女问我们是谁，是否要去 Guthrie 种植园。有人看见野战军的上校送她到外面的路上下了车。据推测，那人是 Lademora 上校。后来，我们的向导说，有人看到他又把那个妇女接走了。向导建议我们不要去种植园了。

英联邦开发公司继续参加 Guthrie 项目的条件之一是，野战军和 Lademora 上校不要参与。他驻扎在圣弗朗西斯科酒店附近。英联邦开发公司在 1985 年初从阿古桑地区（Agusan）撤回了工作人员。后来，在 7 月 5 日至 8 日，NDC-Guthrie 种植园的两名雇员 Rogelio Noble 和 Ruben Ulas 被政府的准军事小组 ICHDF 所谋杀。

我离开其他人，搭大巴回到达沃市。

大巴车站聚集了很多孩子，他们售卖香烟、瓶装的橙汁饮料等等，每天干很长时间。

棉兰老岛的阔叶林大多数都消失了，只剩山腰上稀稀拉拉的树木。这里的土壤呈红色，草木繁茂，雨水充足。对人民来说这本该是多好的土地啊！棉兰老岛曾是“希望之地、富饶之地”。如今它成了“流血之岛”。

5月11日星期六

《时代》杂志报道说，在新人民军周二袭击了电力设施之后，Misamis Oriental 的 9 个镇至今停电。报道还说，某宗教团体的领导者遇害，新人民军宣称因为此人拒绝参加人民运动。在棉兰老岛峰会上，这一消息被指责为污蔑。

逮捕劳工律师

12 点，我赴约来到 CENTRUM 组织的办公室。四名女士在那里。E.S. 已经走了。昨天，两名劳工律师，即棉兰老岛 Bayan 组织的主席伊拉甘 (Laurente Ilagan) 和秘书长阿雷利亚诺 (Antonio Arellano)，被捕了。周二，我还刚在峰会上见过他们。根据 Malaya 报道，伊拉甘在他的办公室被大城市警察部队 (Metrocom)²¹ 逮捕，关押在达沃市附近的 Catitipan 监狱。地区总长 Tan Gatue 说，伊拉甘是“由于领导人民运动”被捕的，并且已经发布了 PDA。阿雷利亚诺是在 18 名代表之一去交涉释放伊拉甘的事情时被逮捕的。阿布拉省 (Abra) 的另外两名劳工律师 Alberto Benesa 和 Romeo Artudillo 在 13 天前被捕，罪名是所谓从事颠覆活动。4 月 3 日，人权律师

²¹ Metrocom: 全称 Philippine Constabulary Metropolitan Command (菲律宾大城市警察部队)，是菲律宾警察部队 (Philippine Constabulary, PC) 的主要下属单位，根据 1967 年 7 月 14 日的总统行政令 (EO) 创建的，说是作为大马尼拉地区警察机关的配合和补充，开展反对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

Romaflo Taojo 在 Tagum 的家中被射杀；NAJFD 组织在棉兰老岛南部的主席 Marcos Risonar 也被逮捕。

阿雷利亚诺的逮捕令是 3 月 1 日签署的。据其他律师说，这个地区还有 5 名斗争领袖将会被逮捕 (另一个消息来源说是 9 名)。E.S. 可能在这个名单上，这也是他转入地下的原因。他的妻子总是抱怨他离家不归。妻子还能见他多少回呢？

反贫困联盟的两名妇女成员在 10 日早上被捕。《棉兰老岛每日镜报》报道，有人说早该把伊拉甘逮起来了，因为在人民运动中有 9 人被杀，10 人受伤。“从什么时候起，这些起挡路作用的人竟然有权在街道上搭起路障呢？”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交通部门和工人罢工的成功表明，群众不再对这个国家抱有幻想。如果我们想要政府注意到并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就应当采取罢工、集会和游行的手段。”

有传言说另一场人民运动将在 5 月 13 日举行，以惩罚政府和军方没有出席峰会的行为。那一天刚好是我预计离开的前一天。M.C. 至今看上去没事。女士们还告诉我，5 月 9 日在 Buhangin (距此地 3 公里) 发现了两具穆斯林的尸体，5 月 10 日在 Agdao 区发现了两具尸体，在 Paracen 区也发现了两具尸体。

我与她们讨论了形势，并承诺：第一，尽力使英国尽早向马科斯总统发出抗议电；第二，回到马尼拉，我将与五一工联商量并考虑向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申诉；第三，如果可能，我将向努里埃尔提出这一点；第四，回到伦敦，我们希望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一篇报告。

我留下了礼物和一些捐款。与达沃市医院工人的见面没有进行。由于我的出现，那位妇女可能身处危险之中。她们来见我我是勇敢之举。我草拟了一封电报，但是长途电报服务关闭了。电报周一再发。

我想起四天前的话，“我们准备采取任何必要措施……”

后来，审判前的反对这些律师的宣传启动了。“他们作为人权和公民权的拥护者而去游行，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暗地里捞好处和获取政治权力。”据说，美国支持的亚洲基金会给达沃市的人权律师捐献 260 万比索。

第 11 章 镇压工会

“律师们还建立了一个任务组，调查暗杀和军方的虐待事件。为此，他们拨出了 73600 比索……外国干涉势力通过本国的仆从渗入专业人士、宗教团体和激进团体，即那些想要进行和平或暴力演变的人们当中……群众不知道，一旦达沃市变成了越南或尼加拉瓜，这些阴险人物有足够的钱飞往海外。”

最高法院命令释放伊拉甘，阿雷利亚诺和 Risonar 三人，但军方不执行。

码头工人

我去了临海的码头，并与 Filport 的码头工人交谈。PTGWU 工会（附属菲工大）和全国劳工联合会（NFL）（附属五一工联）正在工会注册选举中竞争。PTGWU 工会的标语说，“我们是英国伦敦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分支”。

全国劳工联合会工会贴出了一份集体谈判协议对比的分析：

	PTGWU	NFL
装卸工	36 比索（日工资）	36.3 比索（日工资）
叉车司机	36.5	37.6
工长	37	39
领班	37.5	39
起重机司机	36.5	36.7
办公室人员	968 比索（月薪）	1100 比索（月薪）

一个保安人员示意要我过去，我赶紧跳上了一辆出租车。

5 月 12 日星期日

在候机时间，我写完了笔记。出租车司机说下一场罢工将会在月底举行。在路上，我遇见了一场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某宾馆外举行的罢工。

在豪华而气派的候机室里，置身于衣着入时的旅客中间，死亡之城已恍如隔世。

肆意逮捕、刑讯、拘押、谋杀以及失踪都有记录可查。1984 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代表团报告说，“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肆意逮捕的事情普遍存在……拘押、对刑讯的恐惧以及真实发生的刑讯事件，是用于压制异见者的有力手段。”1975 和 1981 年大赦国际组织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名为“拘押者工作组（Task Force Detainees）”的组织说，“1984 年至今，对战斗性工会主义采取军事镇压的趋势日益增强。”（拘押者工作组，《对菲律宾工人的镇压：档案》，1985 年春）这种趋势包括：1、对房屋和办公楼的突击查抄以及非法逮捕（没有“逮捕、搜查和扣押令”）；2、把刑讯当作标准；3、没有正式指控或不经法庭程序的拘押；4、在纠察线上的暴力镇压导致工人伤亡；5、对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制造失踪或非法暗杀。

“政府根据压迫性的劳动法 BP 130 和 BP 227 在工人纠察线上的军事镇压，目的是保护资本利益。”

大赦国际组织证实，在某些种植园里，一些公司保安是从政府的准军事小组（CHDF）或准军事团体招募来的。

政治迫害（如由于信仰而被逮捕）与在法律范围内因违反工会法而进行的逮捕是有区别的。而当法律本身违反人权的时候，这种区别就变得模糊了。一般来说，政治犯有时是长期拘押的，而许多短期拘押则与工会活动有关。从工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更令人担心的不是对那些确实拥有或被怀疑拥有政府所敌视的政治联系的人的迫害，而是常规化地运用暴力作为镇压工会活动的手段。

五一工联认为 1982 年发生的逮捕事件只会激发团结精神。如果政府想要完全阻止五一工联的活动，就必须实施大规模镇压，而政府将难以承受镇压所引发的反弹，所以五一工联现在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五一工联的紧迫问题是由于失踪、暗杀和拘押而丧失了许多最好的活动分子。

监狱中的工人

拘押者工作组列出了在吕宋监狱中关押着的人，以及其他与菲律宾相关的详情。除了我们所访问过的六人之外，拘押者工作组还提供了以下几人的情况：

Romeo S. Castillo，五一工联工人组织者、菲律宾 Blooming Mills 工会副主席以及五一工联全国理事会理事；

Herminie A. Ibarra，FPW 工会秘书长；

Danilo C. Garcia，五一工联工会领导人；

Cesar Bristol，CMC 工会秘书长（该工会附属于五一工联）；

Fernando S. Reyes，驻马尼拉的五一工联组织者。

以上五人在 1984 年 7 月被捕。

Danilo M. de la Fuente，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者（该联合会附属于五一工联），被捕于 1982 年 2 月。

拘留者工作组还列出了其他 19 位工人和积极分子的情况。

失踪工人

拘留者工作组列出了 15 人的名字。比如，NUHWRAIN 工会（附属于五一工联）创始人之一 Ceferino Flores 就在 1983 年 1 月 23 日失踪。

大赦国际组织公布了关于“菲律宾失踪案件”的备忘录，其中列出了 1985 年 1 月至 4 月发生的失踪案件。关注强制和非自愿失踪事件的联合国工作组（该工作组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向菲律宾政府递交了总计 261 起失踪案报告的资料。其中只有一起后来得到了澄清。1985 年 1 月，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建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以调查失踪案件，然而事情毫无改变。例如，全国糖业工人联盟（NFSW，附属于五一工联）的两名全职组织者 John Sera 和 Emilio Togonon 在 1985 年 3 月 29 日的一场集会后被抓。有人认出抓人的吉普车来自警察局。警察局的长官则归咎于军队部门。据说这辆吉普车后来重新粉刷过，换了车牌。另一个例子是，在 3 月 18 日，

SAWS 组织的工作人员 Alan Parroco 被四名武装人员挟持到了一辆牌照为 KAK747 的丰田车上。这辆车服务于武端市的军方情报组织。军队和警察都否认自己知情。

暗杀工人

工作组名单上列出 44 名遭暗杀的工人。例如，“Butuan 木材工人联合会的副主席 Teodoro Malque 在被捕后遭到暗杀。1983 年 12 月，两个便衣闯入他家并叫他出来商量工人问题，遭到拒绝后就把他拖出房子，其中一人将他射杀。”

据 Bobby Ortalis 所说，全国糖业工人联盟的六位领导人惨遭杀害。其中一人被斩首，尸体顺着河水漂到马尼拉后被人发现。

纠察线上遇害的工人

有 8 位工人在纠察线上被杀害。例如：

Lope Natividad

年龄：20 岁

婚姻状况：单身

职业：工人，Blue Bar Coconut Phils 工会积极分子

被害日期：1985 年 2 月 27 日

被害地点：纠察线

2 月 27 日清晨，五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载着工贼，在公司保安人员和地区安全部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强行进入公司场地。当日下午 3 时，400 名罢工工人和支持者聚集在公司大门外抗议运入工贼的行径。罢工工人和躲藏在公司建筑物中的保安人员互掷石头。随后，20 多个保安面向公司外的罢工者，并朝他们开火。罢工工人 Lope Natividad 头部和身体中了四枪，倒地身亡。正对公司的墙壁上留下的弹孔距离地面的高度从 1 英尺到 7 英尺不等，证实了保安杀害罢工者的企图。Lope 是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的唯一生活来源。

从 1985 年 1 月到 5 月，有 13 名工人被杀害，包括：

Franklin Baker 公司(位于 Davao del Sur)的工人 Willy Agustin 和 Nentor Macalino 在 1 月 10 日被杀害；

Surigao 发展公司 (位于 Surigao) 的工人 Epifani Silada 在 2 月 6 日被杀害；

Era Industries 公司(位于 Bulacan)的工人 Arnel C. Dy 和 Rodrigo Garcia 在 2 月 25 日被杀害；

Filipin Plastica 公司 (位于大马尼拉地区的马拉邦市 (Malabon)) 的工人支持者 Ernesto del Pilar 在 4 月 10 日被杀害；

Asian Carbon 公司 (位于达沃市) 的工人 Danny Salcedo、Joseph Rerbolingo 和 Ronato Tumali 在 4 月 15 日被杀害。

逮捕工人

988 名工人被逮捕，其中大多数后来获释。

马尼拉的政治犯

拘押者工作组列出了截至 1985 年 4 月 24 日的 69 名政治犯名单。其中 6 人被单独关押，包括从 1976 年关押至今的 Bernabe Buscayno。

棉兰老岛的镇压

棉兰老岛的拘押者工作组在 1984 年的报告中说：

政治犯有 529 人，工作组给出了 252 人的名单；

2725 人被捕，1983 年这一数字增长了 65.6%，多数人遭到刑讯。

例如，军方搜查了南方劳工联合会领袖 Cesar Maquiro 的家，找到一台油印机和一份工会联盟的简讯。棉兰老岛北部保护工人权利联盟的组织者 Ben-Art Valmoria 在家中被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和颠覆政权。

去年在达沃市，在纠察线上为工人家属做饭的几名妇女被逮捕。罪名



是“非法做饭”。其中有些妇女甚至被刑讯。三天后才得以释放。

暗杀：1984 年有 361 人被暗杀，1983 年有 265 人。

屠杀：有 10 场屠杀被列了出来。每场屠杀中的遇害者 3 到 15 个人不等，通常死于扫射。

划定区域进行搜查和清场，用炸药和化学武器袭击的事件也有记录。

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主要是五一工联的成员，在上述受害者中占了很大比例。

趋势

拘押者工作组给出了关于整体形势的统计数据：

	逮捕人数	失踪人数	暗杀人数
1977	1351	17	51
1978	1620	10	86
1979	1961	48	196
1980	962	19	218
1981	1377	53	321
1982	1911	41	210
1983	2088	145	368

Crame 关押营

为了访问被拘押者，我们申请了许可证，但是最后关头申请被拒，而那时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申诉。所以我们决定从其他途径寻找机会。

前往比库坦 (Bicutan) 的代表未能获准入内，但是去 Olivas 关押营的代表成功进入，与拘押者单独谈话，还拍了照片。

我和其他人一组去了 Crame 关押营，这里是关押营的中心。当时是周日早上 9 点 40 分。3 名律师陪同我们 8 名代表。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被

允许进入有点兵营式的关押营，值班的守卫让我们办理签字手续之后允许我们进入犯人的牢房。菲律宾的许多事情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我们后来的看法是，菲律宾当局并不想表现出拒绝外国访问者的样子，然而又不想全面让步，一概批准，所以他们仍然会毫无根据地拒绝发放许可证。犯人知道我们要来，所以当局很可能也知道。

我们在 Crame 关押营见到 5 名因工会活动入狱的犯人，具体情况如下。

Milleth Soriano

年龄：27 岁

婚姻状况：单身

职业：五一工联组织者

在没有出示任何逮捕、搜查和扣押令的情况下，情报安全机构（Metrocom Intelligence Security Group）在 1982 年 9 月 11 日将她逮捕。审讯期间，她被迫签下有罪声明。折磨她的人用木棍打她的颈背，并羞辱她。

Lauro Pabit

年龄：23 岁

婚姻状况：单身

职业：Redson 纺织公司的厂房看管员

Lauro 于 1982 年 9 月 11 日被 Bailen 警长所带领的武装人员逮捕，当时他正在去大马尼拉帕西格（Pasig）地区 M. Diaz Pineda 一个工友家的路上。逮捕者没有出示任何搜查或逮捕许可，也没有出示总统令。他被人推到墙角，强行搜身并被戴上手铐和眼罩。开始他被带到军事保卫部（Military Security Unit）接受审讯，那里是菲律宾军方在 Bonifacio 边站的关押中心。在被枪杀的威胁下，他被迫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签字。他指认了两个对他进行刑讯的人（来自情报安全机构的 Bailen 警长和来自军事保卫部的 Tongol 巡长）。

Lauro 在帕西格省法院被正式指控非法持有炸药和颠覆政权的材料，并在奎松（Quezon）市地区法院被指控阴谋暴乱。

被捕前，Lauro 是他们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他被长期关押导致他的弟弟妹妹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同时，他也遭受了肾脏问题和视力衰退的痛苦。

Jose Britanico

年龄：30 岁

婚姻状况：单身

职业：Redson 纺织公司的样衣制作工

被捕前，Jose 是 Redson 工人联合会的一名积极的工会会员。1982 年 9 月 11 日他与 Milleth Soriano 和 Simplicio Anino Jr 在他的住处一起被捕。军方没有出示任何逮捕令。他被要求蹲下，钱包和其他个人物品被搜走。他被迫做出声明，承认在他的家中发现了手榴弹和颠覆政权的材料。在军事情报部的小牢房，他的周身都被殴打。经过此番磨难之后，他被转移到 Crame 关押营，并一直关押至今。

Jose 在法庭上被指控非法持有炸药和颠覆政权的文件以及阴谋暴乱。他们是他们家的生活来源。他患病的母亲渴望他能尽快被释放。

Simplicio Anino

年龄：30 岁

婚姻状态：单身

职业：Redson 纺织公司的工人

Simplicio 被捕时是 Redson 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1982 年 9 月 11 日，他在大马尼拉帕西格回家的路上被捕。他的手表、钱包和其他个人物品都被没收。逮捕者没有出示任何逮捕令。

有人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戴上了眼罩和手铐。在审讯中他被殴打并受到死亡威胁。他在情报安全机构被扣押了四个小时，后来被转移到军事情报部继续扣押了两天，最后送到 Crame 关押营关押至今。

他被指控非法持有爆炸物和颠覆政权的文件并阴谋暴乱。

被捕前，他是 Feati 大学的一名工读生。由于工厂不规律的倒班，他中止了学业。他的父母已经年迈（父亲 80 岁，母亲 78 岁），需要他供养。他还承受着关押所导致的胃溃疡和膝盖伤的痛苦。

Alberto Madrigal

年龄：26 岁

婚姻状况：单身

职业：荷兰乳制品公司的工厂工人

Alberto 被捕时是荷兰乳制品公司的一名积极的工会会员。1984 年 5 月 2 日他在发生罢工的工厂附近被警察(Constabulary Highway Security Group)逮捕。

在 12 天中他被隔绝了外界联系，遭到刑讯及死亡威胁。他被迫签下了认罪声明。他被关押在 Crame 关押营至今。他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械。

他的亲属住得离马尼拉很远，所以无法与他见面或跟进他的案件。

Jaime Verdan

年龄：31 岁

婚姻状况：已婚

职业：荷兰乳制品公司工人

1984 年 5 月 2 日，Jaime 与 Alberto Madrigal 一同被警察逮捕。他周身被殴打，并被威胁如果不合作就得死。有人用瓶子打他的腿，扇他的耳光，在他由于剧痛而大叫的时候，他的嘴里被塞进了一只拖鞋。他被强迫签署了一份他一无所知的声明。他被单独监禁了 12 天。后来他被关进一间小牢房，犯人们称之为“barko”，在这个没有水、没有厕所的牢房中他呆了一个月零七天。

Jaime 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械并密谋暴乱。

他是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他的妻小在此期间与岳父母一起住。由于交通费昂贵，家人很少来探视他。

Redson 的工人们很高兴见到我们，尽管我们不会他加禄语，无法与他们自由交流。

Milleth Soriano 为他们收到从英国寄来的大量信函和明信片表示了感激之意。她看起来勇敢而又听天由命，“我估计我不会获释。可能明年吧。”

据随我们一起去的律师说，对这些人的指控无疑是构陷，比如制造手榴弹之类。不存在任何确凿的证据。目前他们正在等待保释，虽然保释也可能无法获得自由。

Isagani Serrano 是全国糖业工人联盟（NFSW 附属于五一工联）的一名研究者，但他还被认定是共产党群众运动部的负责人。他的两个孩子分别是 6 岁和 8 岁，这两个孩子写了无数的信请求释放他们的父亲，他们很难理解自己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有何不同。他请求看书以及各种游记，“这样我就能在脑海中旅游了”。像其他人一样，他埋头于手工艺和针灸，“你在这里找不到一个神经病”。

Isagani 已经被关押了六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他最后一次被捕于 1982 年 8 月，在同一个月，其他 39 名五一工联领袖都被逮捕。当他们听说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五一工联的抗议并批评对他们的关押时，“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

当我跟他打趣，拿攻占巴士底狱来做比方时，他说，“你们的关心和团结精神将会使我们获得自由。”他同意说这些犯人对政府来说也不难堪。我说“你们的所作所为和山区的游击队一样英勇。”他解释了目前暗杀这一趋势。

他曾与去年逃脱的 Crispin Beltran 同一间牢房。“Crispin 那时 51 岁。他被关押在这里时非常愤怒，那时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关押他。他不想永远呆在牢里。他趁着回家探亲时逃走了。”

（我们从五一工联前秘书长那里得悉：“Beltran 同志身体很好。我们在这种黑暗时刻更需要国际朋友的支持。”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见到了 Beltran 的妻子。）

我们见到的另一个政治犯是 Judy Taguiwalo。她告诉我们在 1984 年 1 月 28 日，她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她喊叫呼救的情况下从大街上被强行带走的。她说她没有被动刑，虽然我们得知她最初被逮捕并关押在另一个地方时，她受了刑讯——尽管那时她已怀有身孕。她的女儿 June 在监狱医院出生，从那以后就一直和她一起生活在牢里。1985 年 6 月 15 日将是 June 的第一个生日。Judy 担心婴儿在往后几年会日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她的家人正在以人道主义理由提出申诉。她询问了矿工的罢工情况，并且说，在狱中得知罢工进行得很好，他们都很高兴。

我们在监狱呆了将近三个小时。虽然有告示牌写着“不得将任何物品

递过栅栏（给犯人），否则探视权利将被取消”，但是我们仍然能传递一些小东西。我们带着午餐盒饭，和犯人交换了午餐（也给了狱警一些）。他们的午餐有一小份米饭，以及某种煮熟的血和几块蔬菜。午餐非常恶心。我的胃几天都不舒服。

虽然有人警告不得拍照，我还是趁没人时拍了张照片。一个狱警把我的相机和胶卷没收了。我们被监视了。我想要回剩余的胶片。后来狱警要我们支付了冲洗的费用。我再也没有把胶卷要回来。

交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在 Isagani 的吉他伴奏下一起唱歌：“国际歌”，“乔·希尔之歌（The Ballad of Joe Hill）”，以及“团结到永远”。

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虽然犯人的妻子可以探监，但是狱警每次会索要 20 比索。狱警还会有偿代购大麻和介绍妓女。

犯人的家属：KAPATID 组织

第二天早上在卡梅尔山中心（Mount Carmel centre），通过 KAPATID 组织的帮助我们见到了犯人的家人和子女。我们见到了 STRIKE 组织的主席 Atty Potenciano Flores，KAPATID 组织的主席 Dean Armando Malay。我们谈了见闻，并讨论下一步做什么。

我们交换了礼物。我们给 Milleth Soriano 一条全英公务员联合会（NUPE）的围巾，给其他人 Tolpuddle Martyrs 的纪念品或是扑克以及工会徽章。给孩子们的是锡制徽章，印有“我喜欢学校的食物”等等。

孩子们唱歌给我们听。最后，我们手挽手唱起了菲律宾国歌，孩子们（象征性地）挣脱硬纸板做的锁链。

帮助

我们都被敦促写信：写给犯人，写给马科斯总统，写给政府部长，写给各自国家的政府。

代表们愿意集资 64000 比索（3200 英镑）来保释这些犯人，但是律师们看来并不热心，可能是因为这会开一个坏头：必须靠赎金来救人。

1982 年，澳大利亚的港口工人抵制一艘菲律宾船入港，以迫使菲律宾政府释放 Crispin Beltran（想不到两天后他就获释了）。从 1945 到 1949 年，他们也为了反对印度尼西亚政权而抵制过印尼的船只。能否把菲律宾航空公司列入黑名单呢？我们讨论了具体行动以支持政治犯，以及反对马科斯可能在五一劳动节之前逮捕工会会员的威胁。

虽然我们在菲律宾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久久不会忘记监狱食物的味道：刺鼻、肮脏、血淋淋。我会记住小婴儿 June，她在子宫中就经历了刑讯，出生在 Crame 关押营，成为那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

我们得到了一盘政治犯录的他加禄语和宿务语歌曲磁带。其中一首唱到：

“看那些工人们，
重重压迫下谋生活，
他们努力组织起来时，
却遭到胁迫和侮辱。

只要有工人仍在承受压迫，
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就绝不步。”

颠覆政权

我们向律师询问颠覆的定义。他们答道：简单说，颠覆就是试图推翻或动摇政府。

菲律宾的《刑法》规定颠覆罪包括各种行为。例如“非法集会”，《刑法第 146 条》规定，“任何出于动摇政府或削弱政府权威、反对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门的宣传目的而召开的会议”，会议组织者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同样的惩罚还适用于“任何拥有或经营印刷、广播或电视设备或任何形式的大规模通信手段的个人，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通信手段以不断攻击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门以动摇政府或削弱、破坏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忠诚。”《刑法》第 1735 条规定任何犯有颠覆罪的个人将失去公民权，国家将没收其财产。

菲律宾《劳动法》第 242 条规定，“任何属于颠覆组织或直接、间接参

与任何颠覆活动的个人”都没有工会会员资格。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认为，“显然，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规定反对政府的示威是煽动叛乱，并将示威者判处终身监禁的。”

我们还问到，共产党在菲律宾是否合法。我们被告知，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政府修订了以前的法律，但同时也禁止菲律宾共产党和其他组织扩大规模。

1981年颁布的菲律宾现行《刑法》的第1835条——“反颠覆法令”。该法令说，“菲律宾共产党是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阴谋组织。”菲共以及“任何与菲共持相关目标的组织和协会”都被宣布为颠覆性的。

1982年，大赦国际的报告揭露了菲律宾的人权状况，菲政府把该组织称作“共产主义者”。

上述事实与工会的关系，体现在1983年在审判“颠覆性组织”五一工联的领导人奥拉利亚（Ka Bert Olalia）等人时的起诉书中。“颠覆”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任何联合行动都可以被当成是颠覆行为；可列为非法的事情太多了，例如拒绝接受复工命令，这在一定场合下就可以变成是反对政府的，因此将被法庭判为颠覆行为。

实际上，这一立法给一种比现状更恶劣的、严厉的极权主义以大展身手之机。1982年的逮捕事件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劳工部的部长 Blas Ople 向国际自由工联辩称，政府并未侵犯工会权利，因为逮捕行为是针对所谓的颠覆和犯罪行为的。（见1984年2月7日时代杂志报道）对此国际自由工联表示无法接受，他们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工会会员。”

新闻自由

团结集会发生的时候，正值菲律宾的全国新闻周。菲律宾记者所面临的困难可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在全国新闻周的第一天，电台主持人 Charlie Aberilla 在直播室被枪杀。过去18个月有15名记者被无名枪手杀害，上个月就有3名。（见1985年7月15日英国卫报报道）Aberilla 被杀之前，记者们曾与国防部长 Juan Ponce Enrile 会面，以获取政府对记者安全的保证，

并要求调查关于全国性日报《Tiempo》的记者 Tim Oliveres 的绑架和失踪案，此人从2月4日至今下落不明。

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记者告诉我们，菲律宾的情况自从1972年戒严法颁布以来就很困难。虽然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政府想要媒体自我审查。编辑们接到电话要求撤下某个报道，这类事情也并不罕见。除此之外，还有一道总统法令禁止“反对政府的持续宣传”。

1984年4月，美国一家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说，在一次对菲律宾的访问之后，他们发现菲律宾的记者“处在一种由政府的高压势力和近十年戒严法期间记者自己的自我审查习惯所划下的灰色领域中，”新闻活动“与边缘政策无关，与自由更加无缘。一些有勇气的记者冒险挑战过去的禁忌并试探制度的底线。他们能走多远仍不确定。”

1982年，一份名叫《我们论坛》的周刊在发表了一篇质疑总统在二战时期所建军功的真实性的文章之后被关闭，工作人员也被逮捕。

当记者试图报道罢工和示威时，他们经常被警察殴打、逮捕，他们的笔记和设备也被损毁或没收。一种常见的骚扰方式是死亡威胁。如果记者报道了反政府的抗议或军方的肆意妄为，他们常常收到匿名恐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恐吓被付诸执行。

到今年为止，菲律宾仍然在世的、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是 Satur Ocampo，《马尼拉时报》的前助理编辑。国际上的支援运动无法让他获释，而且他从来没有被审判。在今年五月全国新闻周期间，Ocampo 越狱了，并且没有再被抓住。

由于新闻界存在的问题，并且由于媒体集中掌握在支持马科斯及其亲戚的富有精英的手中，所以“替代性”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多，特别是报道劳工问题和事件的工人报纸。其中最有名的是 Bagwis，用他加禄语报道工会事务。然而，由于经费困难，这份报纸只能不定期出版。还有大量的斗争有待本地的劳工通讯来报导。

目前菲律宾不存在有效的全国记者工会。然而，一些记者组成了 Amado Hernandez 资源中心。该中心对违反新闻自由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培训工人和工会做新闻工作。

第 12 章 工会历史和结构

历史

有关菲律宾工会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历史来解释。

工会至少可以追溯到 1872 年，当时在甲美地市（Cavite）的兵工厂工人发起了一场罢工。西班牙殖民者的刑法禁止工人采取集体行动。在美国人统治菲律宾之后，1902 年菲律宾民主工人工会（the Union Obrera Democratica Filipina）成立。

第二年，工会的领导者 De Los Reyes 等人被逮捕。后来，来自美国劳联的一名代表来到菲律宾，就经济工联主义提出了建议。

1913 年，更多的战斗性组织再度形成，比如菲律宾工人大会（the Congreso Obrero Filipino）和血汗童工社团（Society of the Children of Sweat）。1925 年以后，菲律宾共产党对工会激进化产生了影响。

1936 年，政府通过劳资关系法庭和劳动法实行强制仲裁（联邦法案 103 号），以达到“扼死工人运动”的目的。

日本占领期结束后，劳工组织大会（the Congress of Labor Organisations, CLO）成立了。1950 年，劳工组织大会的领导者被逮捕，这是政府镇压的一部分。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自由工联作为反共产主义的工会建立起来。

1948 年，菲律宾政府加入国际劳工组织。部分出于第 87 和 98 号国际劳工公约的影响，菲律宾出台了 1953 年共和国法案。这个法案即劳资和谐法案，它缩减了强制仲裁的范围，并允许一定程度的集体谈判。菲律宾工会大会（the Philippine Trade Union Congress, PTUC）从 1954 年开始附属于



国际自由工联（ICFTU），而菲工大从 1965 年开始也附属于国际自由工联。

从 CLO 的解体中不断分裂出来的抗争性工会包括了全国工会联盟，其领导者奥拉利亚后来成为五一工联的首任主席。

这一段历史的一些主要特征有：

第一，法律限制一直存在，从西班牙殖民者的法律、1936 年的强制仲裁，到当前随着戒严法出台的法律法规。

第二，在本地或是国际影响下，特别是在 1925 年之后共产党的影响下，战斗性工会一再出现。

第三，对工会的暴力镇压不断发生，比如 1902 年对 UODF 的镇压，1950 年对 COI 的镇压，1982 年对五一工联的镇压。

第四，菲律宾引入了美国的“经济工联主义”和反共产主义阵线。

第五，多数工会中心或工会都很短命，且四分五裂。

第六，国际劳工组织的影响有限。

尽管工会有 83 年的历史，但到了 1985 年，集体谈判协议仅覆盖菲律宾 1.8% 的劳动力。1984 年之前，官方数据说在 2052 万劳动力中有 23%（473 万）参加了工会。只有 37 万人有集体谈判协议。在加入工会但没有集体谈判协议的 436 万人中，有 200 多万加入的是一个叫 NCFO 的信用合作社。可能有些集体谈判协议并未向劳动就业部申报。有许多工会出于各种原因没有集体谈判协议。

结构

菲律宾多数工会都是本地工会，通过认证选举和注册而产生的，并与单个雇主达成集体谈判协议。在大多数集体谈判协议中，每个雇主只对应一个工会，这属于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工厂的类型。

全国性工会大多是地方工会的联合会。与此不同的是，有些全国性工会有自己的地方分部（分会），或者同时具有地方工会和地方分部。

全国性工会又附属于全国性工会中心（比如菲工大、五一工联、自由工联、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即全国性工会的联合会。

地方工会

劳动就业部出版的 1983 年《菲律宾工会目录》列出了 1349 个地方工会，分为以下几类：

农林牧渔业	40
采矿业	19
制造业	765
水电煤气业	18
建筑业	11
批发零售业	88
运输、仓储和通信业	188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	52
社区服务业	168

这个列表有如下值得怀疑之处：

第一，列表中的工会都是劳动就业部承认的工会。尽管如此，我们拜访的许多工会（比如 Century Canning 公司的工会）并未列入，虽然该工会有集体谈判协议，而且我们甚至和雇主见了面。该工会未被列入，可能是因为他们附属于五一工联。Franklin Baker 公司的工会（附属于自由工联）也没有出现在列表中。根据菲工大提供的信息，“菲律宾注册的联合会与地方工会比这个国家的 7000 座岛屿还要多。”

第二，许多工会并不被劳动就业部所接受。有些工会不想注册。五一工联本身就没有出现在列表里，因为劳动就业部并没有正式承认五一工联，五一工联自身也不想为了出现在列表上而被迫遵守劳动法令的管制。

第三，列表中有些工会只是作为全国性工会分支被列为工会，而非凭借自身条件被列为工会；其他一些则不然。比如，标准微处理系统公司的工会被列为自由工联的分支，但并没有被列为经过注册的工会。而“标准

技术人员与办公室职员协会”被列为自由工联的分支，但同时也被作为工会单独列出。

第四，许多工会很小。要是评最小工会奖的话，吕宋岛中部企业工人工会和 Chori 雇员工会要平分秋色了，两者都只有 8 名会员。

第五，为了注册，工会需向劳动就业部提供会员名单。然而许多工会或者全国性联合会没有会员人数的数字。

全国性工人联合会与全国性工会

劳动就业部列出了 114 个全国性工人联合会和全国性工会。其中包括五一工联的大多数分支。有些组织的结构复杂。工会可以附属于多个全国性工会。巴斯科（Banco）菲律宾职员协会同时附属于 NUBE 和公民劳工工会联合会。Grosby 工会在列表中同时附属于木材和全体工人联合工会和民主劳工组织协会。是否存在重复计算？我们不得而知。

“菲律宾工会中心”由 12 个分支组成。其中 6 个同时是同等级上的全国性工人联合会。8 个同时附属于菲工大。会员数量没有提供。

尽管有注册要求，“全国工人工会”仍能按“估计”把 1978 年的会员数量记录为“八万人”。尽管有定期选举的要求，但是全国矿业和联合工人工会（公平中心附属于该组织）上一次大会则是早在 1974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

有两个组织都名叫“菲律宾运输业和普通工人组织”。一个由 Andres Dinglasan 领导，另一个由 Roberto M. Oca Jr. 领导。在后一个组织中，第一副主席是 Grigorio S. Oca，而总干事包括 Johnny S. Oca 和 Jose Eduardo Oca 两人。

全国性工会中心

劳动就业部列出的 7 个这类组织，但几乎都是同一个组织即菲工大（TUCP）的变种。VIMCONTU、IMF 和 PHILCONTU 和菲工大的地址相

同，VIMCONTU 和菲工大的主席都是门多萨（Democrito Mendoza）。VIMCONTU 本身就附属于 IMF。IMF 的其他分支又同时附属于菲工大。NHLF 的四个分支中的三个附属于菲工大；PHILCONTU 的 9 个分支中的 7 个附属于菲工大；PWU 的 7 个分支中有 3 个附属于菲工大；PTUC 的 4 个分支机构（包括 NHLF）也附属于菲工大。劳工协会在奎松市的全国办公室挂着这样的牌子：PHILCONTU，米沙鄢群岛-棉兰老岛工会联盟，国际金属业工人联合会菲律宾理事会。这些单位的地址和电话都一样。

自由工联、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五一工联都没有被列为全国性的工会中心，但是自由工联和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被列为全国性的劳工联合会。

大家都知道工会夸大会员数字。有观察者根据附属工会的数据，计算了下列工会中心 1985 年初的会员的真实数字：

菲工大（TUCP）	60 万
五一工联（KMU）	45 万
自由工联（FFW）	20 万
PSSLU	10 万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	5 万

我们本想拜访更多的工会中心和工会，特别是 Katipunan, PSSLU 和 AFL，但是时间来不及。

承认问题

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承认五一工联的性质应该不成问题，特别是五一工联已经被国际劳工组织所接受。然而五一工联要被承认是菲律宾唯一真正的工会中心仍然面临重重问题。

目前只有四个工会中心承认五一工联是菲律宾唯一真正的工会中心，承认者包括爱尔兰的 ICTU、澳大利亚的工会大会、新西兰的 FOL 和意大利的 CGIL。

国际团结大会代表的联合声明表达了如下观点：“五一工联是合法的、进步的工会中心”，但不是唯一如此的工会中心。同时，据我们所知，英国工会联盟也持此观点：五一工联是工会联盟之一，而其他工会中心同样也是。有些工会联盟在国际上附属于其他组织，比如菲工大附属于国际自由工联，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附属于世界工联，自由工联附属于世界劳联（WCL）；有些全国性联合会或全国性工会附属于 ITS。



第 13 章 菲律宾工会大会 (TUCP)

菲工大 (TUCP) 成立于 1975 年, 戒严法施行之后, 靠政府和劳动法撑腰, 其初衷就是把菲律宾的 6000 多个工会重组到“一个行业, 一个工会”里去。

结果到了 1977 年, 有 5640 个工会不被承认, 只有两项菲工大框架下的工会改革通过劳动部得到了推进, 即美军基地中的工会组织及酿酒业的组织。13 个现存的工会联合会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 反对菲工大的重组, 至今这些提议还在听证的过程中。空运、烟草及采矿业的工会改革也被搁置。爱尔兰 ESB 职员协会表示, 政府把控着承认工会的权力, 是为了除掉反对它的那些工会, 并迫使其它的工会同意他们的政策。

1983 年劳动部的工会成员名录显示菲工大有 1,087,294 名会员, 而菲工大自己声称会员有 180 万, 其中隶属于国际自由工联的组织有 40 万人。

名录中列出了 35 个下属组织, 主要的有:

劳工协会 (ALU), 下属 13 个联合会, 有会员 30 万人, 主席是门多萨 (Democrito Mendoza)。

PTGWO Oca 和 Dinglasan 组织

全国汽车、机械、配件及联合服务工人工会

NUBE, 有 10350 名会员。

菲律宾技师、文员及商业职员联合会, 15893 名会员。

菲律宾 Obreros Estivadores 工会, 8501 名会员

工会工人联盟 (WATU)

组织

菲工大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 每 1000 名缴费会员中出一名代表。大会下设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职能部门有: 经济事务, 教育和研究, 国际

联络事务, 法律, 会员服务, 国内事务、组织, 出版和媒体, 农村工人, 妇女, 青年。

菲工大还参与了一些三方共同组建的机构, 有社会保障系统、全国工资委员会、劳工优惠房贷基金会 (PAGIBIG)、全国劳动力与青年委员会、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 以及 Batasang Pambansa (众议院)。菲工大制作许多出版物, 比如《车间代表手册》, 其中的建议与英国出版的简明手册很相似, 比如《五个 W》²²。

社会经济项目

菲工大与其他机构一道, 设立许多的社会经济项目。比如组建消费与生产合作社, 劳工协会跟各地分支和办事处合搞了联合多功能合作社有限公司 (Associated Multi-Purpose Cooperatives Incorporated, AMCI)。ATU 拥有的合作社 ATUIC 从 TUCP-MOLE-KKK (政府组织) 处获取贷款。对此, 菲工大在其刊物中解释道: “工会传统上通过争取更高的工资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 而合作社的功能则是通过降低工人采购商品的价格并鼓励储蓄来提升工人的购买力和提高成员的生活水平。很多工会认识到, 组织合作社能够刺激工会会员数量的增加。除了在集体谈判中发挥作用以外, 合作社还使得工会在全国性的生产过程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菲工大也通过其分支组织与合作组织发起了信用合作社、医疗诊所、就业促进计划、工会产品的营销、技能与培训计划、社区住房服务 (通过菲工大基金公司), 以及面向劳工的广播站和工会经营的电影院。

全国农民组织代表大会 (NCFO)

据称 NCFO 有 280 万会员。它通过一个名叫“团结” (Solidarity) 的组织与菲工大联系在一起。与其说 NCFO 是一个工会, 不如说它是个信用合

²² 英语中将谁 (who)、什么 (what)、何时 (when)、何地 (where) 和为什么 (why) 作为事件叙述的五要素, 列为 Five Ws。——译者注

作组织。

NCFO 的主席 Jeremias V. Montemayor 身兼国家农业改革部部长。助理秘书长是 Leonardo Q. Montemayor, 登记的是同一个家庭住址。在它的 8 个下属机构中, 只有拥有 20 万会员的自由农民联合会 (FFF) 被当作一个工会单独列出, 其主席和秘书长就是上述 NCFO 的两位。

美亚自由劳工组织 (AAFLI)

美国在越战中失去西贡²³后, 美亚自由劳工组织在马尼拉设立了办公室。资金来自美国政府, 由中央情报局 (CIA) 和美国劳联-产联 (AFL-CIO) 经手。据菲工大自己的刊物所说, 美亚自由劳工组织除了前几年捐给菲工大 2 千万比索之外, 修建菲工大总部大楼的钱有一部分也是该组织给的 (计 450 万比索)。资金的流向还有菲工大向其成员提供的医疗服务、农业技术培训。据劳动部的 Ople 先生说, 1983 年菲工大共接受海外捐资 1 256 290 比索 (《时代》杂志, 1983 年 2 月 7 号)。美亚自由劳工组织为巴戈洛市 1000 多名被迁移的糖业工人再安置工作提供了 160 万比索的资金 (Malaya, 5 月 2 号)。大部头的《集体谈判协议分析》也是在该组织的资助下得以出版的。

美亚自由劳工组织的执行主席 Morris Paladino 提到了他们还有“循环贷款”, “低息贷款”, 和为糖业工人提供的再就业培训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 1985.4.25), 他说, “这只是对工会和农村工人团体创办的活动给予的资助的一小部分……他们长期缺乏资金, 并在左派和右派的夹攻中奋力维持民主立场, 而离开了美亚自由劳工组织和其他民主劳工运动中的成员组织的物质支援, 他们的创举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保持现有水平, 如有可能, 还要加大支持度。”

眼下有传言说, 在阿基诺暗杀案件调查委员会中采取了较为独立立场的菲工大秘书长 Herrera 得到了美亚自由劳工组织给予他个人的赞助, 以反对门多萨 (Mendoza)。门多萨和 Dinglasan 之间, 以及 Herrera 和 Oca 之间

²³ 现称胡志明市——译者注。

的分道扬镳已被广为报道。

鉴于美国中情局 (CIA) 对美亚自由劳工组织的资助,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中情局的局长 William Casey 于 5 月 5 日至 7 日访问了菲律宾。他前来听取关于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汇报。位于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表示, 美国愿意帮助菲律宾“推行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经济, 并在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在加州蒙特利的一次会议上,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 William Crowe 上将表示: “菲律宾需要更全面的经济、社会改革, 重建专业化的军队, 以遏制各省游击队的叛乱。” (Malaya, 5 月 11 日)

在 198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里根在和蒙代尔辩论时声称, 不支持马科斯当权, 就是听任菲律宾走向共产主义。1985 年 6 月, 一个耗时 18 个月的美国研究团队披露了一份关于“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菲律宾社会革命形势的发展, 试图遏制菲律宾的激进化, 推动菲律宾从马科斯独裁向精英民主制过渡, 并提出要向“那些走在温和改良或变革前沿的菲律宾人提供支持”。这份报告的意图对菲工大有何具体影响, 还不清楚。

菲工大的观点

TUCP-NCFO 的立场, 可以从他们在五月头一周发布的通告中看出来: “TUCP-NCFO 认可对劳工权益和福利的积极维护与提升, 也认可为提高一切政府、私人部门工人、农民及其社区的政治、经济地位而采取的斗争。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有悖于公民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利益的暴力活动, 就像我们坚决反对不人性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样。”

1983 年五月, 在一封题为《为误入歧途的工人同胞的请愿信》、写给马科斯的公开信中, 门多萨先生谈道: “总统先生, 我们的很多工人领袖似乎已越出合法的工会主义界限, 转而拥抱暴力和颠覆之源, 这种现象令我们深感担忧……”

在 1985 年 4 月的一篇文章《菲律宾工人的斗争: 菲工大的观点》当中, 门多萨先生提供了“一份基本的局势报告”。

“工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负起重要作用的努力, 往往会受

阻于来自不同方面试图左右工会发展路线的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包括政府、雇主，还有共产主义者，因此才有了我们今日在工人组织中间所见的“不团结”的现象。”

文章批评了政府的专横，“我们承认，政府对工会的控制是存在的，但它远没有共产主义者所宣扬的那么严重，即某些工会成了政府的喉舌。”“虽然我们菲工大承认政府在工会主义领域里的结构性掌控……然而我们赞成通过不断推进——如果不是渐进主义式的方法——来达到劳资关系氛围的改善……我们不赞成革命的手段。”这位菲工大的负责人称赞 Velasco Bill（见介绍劳动部一章）“对菲工大所提出的修订和增补法律条款不带有任何偏见”。

菲工大也承认雇主对工会的支配。“菲工大一贯承认存在着政府和公司对工会的控制，无论哪里有这种威胁，菲工大就与之斗争。然而我们也认为，菲律宾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家长作风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消除的。”

文章的主体部分关注的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控制。“在菲律宾，迄今对工会最为有害的外部控制来自共产党。”文章总结了历史上所谓共产主义者的影响，称其导致了 1947 年 CLO 从属于世界工联并随后为政府所镇压之类的结果。因此，菲工大声称，此后尝试建立的工会组织都将共产主义者排除在外，非共产主义的工会也不再和共产主义者的倡议有瓜葛——“当共产主义者提出建立工会中心时，除了共产主义者自己之外，无人响应……菲工大从一开始就追随国际自由工联的反共路线……就我们的处境来说，正如经验早就告诉我们的，与共产主义者的任何合作，只会带给工人更多的压制，和来自政府的镇压。与其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宁可一寸一寸地慢慢走。我们菲工大还意识到，五一工联和 PMP 是共产主义组织，和他们的任何合作，哪怕是在最合法的问题上的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与其参加共同的群众活动，不如在合法的问题上自己行动。”

这篇文章还绘声绘色地指控五一工联是由“服从北京方面的”CPP-NPA（M-L-MTT）²⁴把持的。他们还在全国工会联盟、全国糖业工人联盟、菲

²⁴ 马列毛主义人民军——译者注。

律宾民族劳工组织联盟、民主劳工组织协会、NUHWRAIN、GATCORD 和 NSU 做出了评论。比如，GATCORD 被说成是一个“由被杀的 CPP-NPA 中央委员会成员 Edgar Jopson 在 1974 年建立的，现在受 Timoteo Aranjuez 领导的奄奄一息的联合会。Aranjuez 曾经试图脱离该组织，加入菲工大，但因为面对强大的共产主义灌输而无力自主。”

文中有一部分讲的是“被莫斯科控制的组织”，指的是：

- 1、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
- 2、 KAMPIL(Kalipunan ng Manggagawa Pilipino), 领导者是 Rey Capa
- 3、 NATU, 又分为两派，争夺着世界工联的承认地位
- 4、 NLM (Nagkakaisang Lakas ng Manggagawa) 前菲律宾印刷行业工会
- 5、 AMA (Aniba ng Manggagawa sa Agrikulture)

门多萨先生在文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自由工联。

文章谴责“极左团体和共产主义者采取的对抗性策略”。“真诚协商优于无原则的群众运动。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近来的谈判为工人带来的好处，要多于罢工斗争。这就是菲工大慎用罢工武器的原因。我们在 1980 和 1982 年做过两次研究，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菲工大下属工会的集体谈判的效果，要远远优于五一工联、PMP 参所发起的集体谈判（CBA）。”（后来，门多萨先生给了我们一份该研究报告的副本。经查阅，他所提到的优势并未得到实实在在的证明。尤其是五一工联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这就更有趣了。即使是一种横向比较，也有赖于详加说明。）

菲工大的实践

《马尼拉时报》1983 年 10 月 12 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菲工大一贯支持马科斯政府。他们总是根据政府头面人物的指令来制订有关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菲工大的领导人也在政府公司和新社会运动党（KBL）²⁵

²⁵ 新社会运动党（KBL），马科斯总统 1978 年组建的新党——译者注。

机构中担任要职。也许菲工大就跟受控于众议员 Jeremias Montemayor 和 Luis Taruc 的全国农民组织协会一样，是个傀儡。”上述两位议员协助推动了 BP 277 的出台（见劳动法）。

菲工大和马科斯政权的瓜葛，从它的章程、活动和记录就可以明白看出。比如在 1983 年，菲工大向马科斯致谢道：“总统先生，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是您在最近的信中指示立即拨款用于建设菲工大主楼，才使之得以落成。”（见菲工大五一声明）

门多萨先生攻击政权的敌人，尤其是共产党，但也包括其他的反对派，比如在《观点》一文的结尾，他攻击 Laurel 先生，下次 UNIDO 大选的反对派候选人；还有 Tanada 先生，一位资深反对派领袖。但是他从没有攻击过马科斯。他对政权的任何批评都是含糊其辞的。

1982 年五一工联的领袖被捕后菲工大的反应，就是一个证明。菲工大的声明（转载于国际自由工联的报告）称该次逮捕是“政府为保护菲律宾社会，对抗颠覆分子对劳工运动持续不断且扰乱人心的渗透所采取的合法行动……”诸如此类。这份声明还断言说，马科斯政府得到公众意志的拥护。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声明发表的时候，对五一工联的领袖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随后，五一工联的申诉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支持。所以毫无疑问，菲工大对这次逮捕所持的立场是违反国际劳工公约的。

菲工大也受到了五一工联的抨击，五一工联宣称“菲工大是由黄色工会和公司工会组成的……它们的领导者已为资方所收买和控制。他们是‘劳资合作与伙伴关系’和‘劳资和平’的主要鼓吹者。由于他们积极地支持反工人的法律，他们被政府指派在制订劳工政策的机构中担任职位。比如一些菲工大的官员目前在国会中占有席位，不是因为被选上，而是由于政府的指派……菲工大的许多官员和成员工会享有政府可观的赞助，乃至津贴，把工人引向歧途，让工人听命于政府。”

1984 年，国际自由工联的代表团建议菲工大拉开和现政权的距离。1985 年，马科斯首次未被邀请参加菲工大的劳动节集会，Herrera 先生评论道：“这是因为要工会支持这届政府是很困难的。”（《商业日报》4 月 17 日）。

最近，门多萨先生说，菲工大也许会参加街头议会（Parliament of Streets），并且据说“遭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批评”。

菲工大还声称受到迫害。1985 年 2 月，菲工大下属联盟之一劳工协会的领导者 Rodrigo Lapalapu 遭到枪杀。菲工大的杂志暗示他是被一家竞争的工会所害。FFF（菲工大）呼吁对棉兰老岛上小农遭到杀害、土地遭到掠夺的情况展开调查。（Ang Pilipino 1984 年 8 月）。Herrera 先生还提到了“二号人物，Aurelio Intertas”，此人“发表了一篇强硬的演说之后遭到谋杀。他在演讲中反对共产主义侵入工人运动，以及在他们下属地方分会的一次罢工中，滥用军队杀害主席、副主席和书记的事。这一事件于 1981 年 11 月上报给了国际自由工联和国际劳工组织。”

他还提到了“针对菲工大高层官员及其子女提起的不计其数的刑事诉讼案，诸如谋杀、凶杀、严重胁迫、敲诈，等等。菲工大的主席门多萨从 1971 年到 1976 年受到了 10 次谋杀和 227 次敲诈勒索的指控，更痛苦的是，他的儿子 Ritchie 和小 Democrito 也受控犯有谋杀、强奸、盗车，以及其他严重的罪名”（1985 年 5 月 20 日的信）

门多萨先生

门多萨从 1978 年起开始担任菲工大的主席。他还是国际劳工组织管理机构中的成员。我和他在奎松市的 PGEA 办公室见面，他刚刚从宿务回来。

我问他怎么看待国际劳工组织对菲律宾政府的批评。“我们刚刚就对此对政府予以痛斥”，他说。关于公共部门的工会主义，他提到了 1972 年的宪法公约。“那些工会连收多少会费都需要请示民政局。真令我称奇。我可不会比教皇更天主教。那时候他们没有多少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

他说现在 NUBE（全国银行业雇员工会，菲工大下属）已注册成为工会，尽管他们不能发起集体谈判。1935 年的宪法不禁止公共部门的工人以



讽刺黄色工会的漫画

及银行、铁路等行业组织工会，罢工也是合法的。但自从戒严法施行后，PGEA 就发挥不了作用了。门多萨先生说，正是在他的要求下，国际自由工联现已向国际劳工组织申诉公共部门组织工会所受的限制。有传言说议会正在修订法律，尽管议会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门多萨先生说，如果法案得不到通过，那么将有一场全国性的罢工。

我问他菲工大是否会像 1984 年国际自由工联代表建议的那样，拉开和政府的距离。门多萨先生回答说，（劳资政）三方协商制要求有人代表工人，但是“既然其他团体都在骑墙观望，我们就不得不奋力一搏。就像在英国，没有人会因为 TUC 骑在中间，就批评他们和政府勾结。那些人说我们是黄色工会，是懦夫，但是我不怕死。

“在过去，这种庞大的组织存活不了一年以上。悲观的预言家们说我们顶多活几个月，然而从 1975 起我们一直延续下来，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

我问他怎么看政府发言人在 1984 年会议委员会辩论中的发言，即强调“改组问题应该重新研究，根本不要付诸实施”，门多萨先生说，这只是某些政客“信口开河”。

我提到了菲工大成员在国会中拥有席位这一现象。门多萨回答说，菲工大确实有成员在社会保障部之类的机构中任职，“但不等于说菲工大是政府的一部分”。

我给他念了图帕兹（Bonifacio Tupaz）先生的信息。门多萨对此回应说：“谁的会员在流失？和开始相比，我们的会员更多了。图帕兹想伪装成一个民主领袖，不过他隐瞒了自己从属于世界工联的事实。他想让菲工大不再隶属于国际自由工联。当初他当选了菲工大的财务主管，前提是他得辞去在世界工联的职务，他当时给我们看了一份辞职信的电报。工会运动中很多这类骗子。他根本就没有辞去世界工联的职务。不管怎么说，他和 Oca 起了冲突，所以他走了。他现在钱财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涉及二万比索……他还想在雇主委员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但是他是一个世界工联的共产主义者，这样他就没戏了。要是想演得像，除非自己是。

“你晓得，菲律宾最大的工会是劳工协会，他们有 40 多万人和 1000 多份集体谈判协议。我跟你讲，我们的资产上百万。我反对彻底的改组，事实上正因为我们的反对下，劳动法得到了修改。推动全面改组的是奥拉利亚和图帕兹这人，没错，我孤军作战反对改组，我不希望劳工协会输掉。”

我询问他，国际劳工组织在对抗政府的侵扰方面都能做些什么，比如国际劳工组织的质询委员会能起到什么作用。门多萨回答说，“国际劳工组织是政治化的，这也是他们不和俄国对抗的原因，他们没有进攻性。质询委员会，说的是南非的事儿吧，是啊，努里埃尔²⁶在回答专家委员会的问题时直冒汗，尽管屋子里很冷。”

我发表意见说，菲律宾的局势处在变化中，国际上的压力会起到一些作用。比如，一些国际媒体还是反对菲律宾政府的。

“在宿务，是媒体最自由的地方，不像这里。去年 12 月 28 日，我们的一位电台评论员被暗杀了。”

门多萨说，我应该早点联系他，他可以给我介绍宿务和棉兰老岛的情况。“你错过了一些发现事实的机会。要是一只眼睛闭着，你怎么能够了解全部的事实呢？”我回答说，我会用两只眼睛来看。

他接着说，“有些人说我们的劳动节集会上只有 2000 人，而实际上我们有两万人，有长达四小时的录像为证。光是劳工协会，就有来自全国 52 个地方分支的 8000 名成员来参加。

“我们对集体谈判做了一些分析，我会给你一份，它能够说明我们的集体谈判合同要比五一工联的好多了。五一工联从国外拿钱。在他们五一集会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有斯卡吉尔²⁷手下的人前来出席。”（这好像是误传）

我问他，如果五一工联提出他们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没有代表，菲工大将会作何反应。

他说，“我们不承认五一工联，他们没有在政府那里注册，凭什么参加

²⁶ 努里埃尔，劳动就业部副部长。

²⁷ 斯卡吉尔（Scargill），英国工党左翼，曾于 1973 年组织矿工罢工，导致爱德华·希思政府于次年下台。1981 年竞选全国矿工工会主席。

工人的代表团？他们何德何能？”

我问他菲工大中有多少成员遭到了杀害、逮捕、暗杀（salvage），或在坐牢。

他说：“我们的很多高层领导遇害了。我们有一位执行副主席被杀。你不应该用我们有多少人在坐牢来衡量我们。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不曾被宣判为国家的敌人。他们却有数千人受到了这样的指控。”

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者。

他说：“你需要了解历史。1924年共产党成立，小时候我妈就一直这样吓唬我：‘别闹了啊，再闹共产党抓你来了’。1929年，他们发动了叛乱，成了土匪，被美国人宣布为非法。1934年，在萨马岛（Samar），莱特岛和吕宋岛爆发了一场革命。我们办公室这儿就有个共产党的头头 Luis Taruc，他一直当到1950年，一会儿你和他聊聊。1949年，共产党几乎占领了马尼拉。美国人这时介入了，军事基地保住了，所以共产党成了非法组织。需要提醒你的是，现在如果共产党宣布放弃暴力，那么他们也可能获得转为合法的机会。一些共产党人倾向于议会道路，但我听说共产党将拒绝这样，也不放弃暴力。这里的民族主义者是受共产党操纵的。当然，图帕兹是反美的……”

我表示，反对政府被等同于颠覆，这不符合民主原则。

他说，“呃，当然啦，很多人认为你参与了工会运动，那你就是个共产主义者。”

我问他，现在怎样做才能够改变菲律宾工人的绝望处境。

门多萨先生回答说：“高喊口号是没用的。五一工联的解决方案只有口号。我们则培训了一些护士从事基本的健康护理。现在西药是很贵的，所以我们用草药。菲工大建了好几个医疗团队，这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为更多的福利而奋斗。”

“要不然，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叛乱，甚至革命。除非能用其他的办法阻止腐败。我们要清除政府中的腐败分子。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同五一工联的。”

“现在的形势还不是太危急，菲律宾人是有承受力的。我们从日本人

的侵略中存活了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我们就能清除贪污和腐败，人们就会团结在政府周围。”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农业技术培训项目，比如养鸡和养牛，如果用工会组织带来的实惠来衡量，菲工大无疑是走在前列的，而五一工联可没有这些附加的服务。”

我询问了菲工大的最低工资政策。

“这是个好问题，奥拉利亚只要求上涨25%，也就是12比索。据政府数据，要维持生计，一家人仅仅食物开支就需要89比索。菲工大认为，最低工资应该定为120比索，这不算什么，上层阶级一个人一天1000比索都不够呢。当然120比索只是一个目标，工会不是光搞理论，更应该是实践者。两个月前，政府说一家六口人需要每天96比索来保障贫困线以上的生活。”

“努里埃尔先生应该给你看过一份1984年2月北马尼拉的调查报告吧。在100个血汗工厂里，67个的集体谈判合同规定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这些工厂90%的工人都附属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的工会。看看集体行动的结果吧。比较才能出真知。一年前在某工厂，五一工联要求工资上涨7比索，资方给5比索他们不干。经过六个月的罢工之后，工人们不支持工会了，回去找资方了。这下连5比索都拿不到，只能接受涨3比索。”

“你和五一工联的哪个委员会成员谈过没有？他们中有人说，他在开会前一刻才拿到计划，奥拉利亚都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都是外面操纵的。我跟你讲，要是有一天五一工联大行其道了，共产主义分子可就高兴了。”

我又问他集体谈判的程序以及跟劳动部打交道中遇到的困难。门多萨先生说，“集体谈判是好的，就是人腐化了。这是申请书堆成山的原因，他们在等着别人的贿赂。至于最高法院，那就是座坟墓。我有一个案子从1954年开始等，到现在都没有回音，律师们靠拖延时间来赚钱呢。”

我引用《商业日报》的数据说，三年中，菲工大从AAPLI拿了两千万比索。门多萨先生答道：“我只为建广播电台而从Adalbert Stiftung那接受了一些设备，没有拿过现金。”

门多萨先生接着把我介绍给了秘书长Herrera先生，Luis Taruc，还有其

他的员工。我见到一个秘书有录像机和电脑，我询问他们用这些能做什么。当时这些设备好像不管用。门多萨先生建议说，“让负责设备的人进来一下。”

然后他带我去看了在建的新办公楼。

“我见过 Feather 先生，”分开的时候他说，“请代我向 Willis 先生”。

菲律宾工会大会的抱怨

后来 Herrera 先生给国际自由工联的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抱怨来自欧洲、北欧和亚洲各国的访客，说他们“对工会组织，尤其是菲工大，造成了损害。最糟糕的是，这些工会成员都与菲工大一样隶属于国际自由工联。来自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代表团就是个例子。还有一个英国代表，现在还在这里。在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之前，就对我们有偏见，不公正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只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却和我们的敌人在一起待了三个星期。

“我们这些菲工大的成员，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提出强烈的抗议。首先，他们在来到菲律宾之前，没有事先告知我们他们也是国际自由工联的成员。当然，我们并没有权力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至少也该对我们有点礼貌吧。直到他们出现在电视上、广播里，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我们才知道他们来到了这里。

“其次，他们对菲律宾工会状况的报告是不公正的，片面的。在我国期间，他们去拜访了菲工大的对手，并和他们待在一起，把多数时间用来报导这些组织的活动，却不听一听菲工大对他们关心的问题有何说法。他们无视民主程序，在我们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们单方面进行调查。我们可没冤枉这位英国代表，他在我们这里只花了一个小时，先前在别处却花了三个星期。可以想见他们提交给他们可敬的组织的会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绝对是充满偏见的。”

对此，我们答复说，我们的访问是从 9:30 持续到 11:20，我们和菲工大的接触也不仅限于拜访总部办公室；我们之所以不公开行程，是出于非常充分的安全上的顾虑。英国代表团是来自 PSG 的，而不是国际自由工联、

BTUC 或者 NUPE。我们的报告，正如我们的赞助者所知道的那样，是对菲律宾工会的状况进行全面考察。我们欢迎菲工大和其他组织对我们的报告发表意见。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所以也许未来会有研究人员或者代表团能够专门对菲工大做些进一步的了解。

结论

我们拿到的一些材料中的事实是无法得到验证的。门多萨先生所声称的五一集会人数，与其他人给出的数字大不相同，超出十倍以上。他们对集体谈判优越性的判断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未必经得住检验。对他们自报的会员人数，我们无从查究。据一些人的估计，菲工大的规模几乎不会大过五一工联和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两个组织之和，而按照门多萨的说法，菲工大的会员人数是二者之和的两到三倍；劳动部的数字则没这么乐观。自由工联的阿兰萨门迪斯（Aranzamendez）先生后来告诉我们，菲工大下面有很多“皮包工会”，菲工大本身也是一只“纸老虎”，只是装出了门面。

菲工大是在戒严法时期成立的，而且得到了劳动法中关于工会结盟行为与注册的相关条款的支持。这些条款已经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批评。菲工大的领导者跟马科斯政权关系密切。在这种环境下，工会领导者理应有某种独立的表现。门多萨先生提到“叛乱”或“革命”作为借口，是缺乏说服力的。

菲工大从政权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包括开展合作项目的经费，修建办公楼的经费。社会经济项目使得菲工大能够给特定人群提供更多的实惠。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是需要调查的。因为有充足的证据让人相信，贪污腐败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对高层人士的贪污指控也是非常之多的，这使人不得不担心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被挥霍掉了，而不是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除了资金之外，菲工大还得到政府的其他支持，比如说相对能免于政府的迫害。

菲工大做了什么来回报马科斯政权呢？

菲工大为这个伪平民主义的马科斯政权披上受劳工拥戴的外衣，尤其

是通过与 KBL 的合作。作为一个（对政府）起支持作用的工会中心，菲工大削弱了工人的反抗。菲工大与政府和金融机构一同维系着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慷慨解囊以破坏工人运动的组织，专制政权通过中上层阶级中强调工人利益的团体来寻求认同，这一切在法西斯主义中司空见惯。

在国际上，菲工大在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面前，显得像个驯服的成员，另一方面，在马科斯政权所倚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资本集团面前，他们又摆出已把工人操纵在手的样子。

菲工大还通过美国中情局（CIA）-劳联-产联（AFL-CIO）-美亚自由劳工组织（AAFLI）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好处。为什么菲工大能够独享这些其他工会得不到的资助？

菲工大能够作为反共战线服务于美国的政治战略。历史表明，为捍卫资本主义，对抗劳工利益，如下手段曾被采用过：把工人斗争限制在法律框架之内；镇压；提倡“商业工会主义”。菲工大的任务是和共产主义有可能契合的工会纲领转变成反共的纲领。要做到这一点，特别要靠着把拒绝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当成最高原则，凌驾于在工资要求方面的联合行动之上，凌驾于工会遭到镇压时彼此团结的原则之上，凌驾于承认工会有权存在（比如对五一工联）的原则之上，也凌驾于国际劳工公约之上。对于门多萨先生个人来说，他的方式就是粗暴地指责被拘押的工会活动者（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未经审判）是“国家公敌”。他们所宣扬的“伤我一人就是伤我全体”的原则跑到哪里去了？

菲工大从未充分重视国际劳工公约，以利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申诉程序，甚至在他们自己的成员被害后也是这样。每当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委员会批评菲律宾政府的时候，菲工大就哑巴了；而当国际劳工组织谴责五一工联领袖被捕的时候，菲工大却在欢呼。

菲工大也要为菲律宾工人的处境负责。它的代表名列于全国工资委员会，却认同法定最低工资订在温饱线以下。由于与劳资关系法庭（NLRC）有关联，对于劳动法被用于反对工会，他们也负有责任。当被问道他们到底为工人做了些什么时，门多萨先生勉为其难地举出了一些小恩小惠的例

子。菲工大是否在工会的基本职责方面将工人的集体代表权出卖给了资方？他们把钱花在了研究上，可是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对工人饥饿状态的记录？在哪儿能发现按照国际劳工公约修改劳动法的提议？在哪儿能找到重新分配财富和改善经济环境的措施？在哪儿能看到关于外国资本主义对本国工人剥削的研究？在哪儿能看到有关破坏工会、压迫工人之类事件的记录？

他们借口说，菲工大是“渐进主义的”，是“一寸一寸稳步前进的”，就是说，他们是经济主义的工会。这倒是可以拿来形容菲工大中那些并不尽心尽力去改良的人，或者害怕牺牲的人。“罢工是最后的手段”，这话说得轻巧，但菲工大几时认真组织集体行动？

菲律宾的那些寄生工会，比如 NAMANU（TUCP），它们为领导者捞钱，却不为会员做任何事，它们通过绑架集体谈判，排挤真正的工会，以此为雇主服务。此外还有“黄色”工会，雇主花钱让工人投票支持它们。工会领导层任人唯亲问题也很严重。当然，这些问题并非菲工大所独有，但菲工大在这些问题上都病得不轻。

菲工大未来会怎样？领导者们的难题是，找到一种语言，既能表达工人的不满，又能间接地支持政府。菲工大不能不继续装下去，以免危及它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位置，或失去美国的支持。不过，菲工大不可能回身去咬那只喂养它的手。这种矛盾的张力会体现在之前已为人们所知的内部的不一致中。

其它工会的发展也让菲工大丢了脸。从 1975 年起，所有的反对派都在广泛重组中被排除在外，对菲工大来说并无竞争者。现在，五一工联正为工人提供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菲工大的会员在大量流失。这样对于菲工大的赞助者来说，他们的兴趣也减弱了。值得注意的是，门多萨先生对自由工联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如果存在着五一工联对菲工大的渗透，后者的迅速解体将不难预见。

也许在将来，档案记录将会证明，像菲工大这样由政府扶植起来的工会联合会是怎样辱没工会原则和背叛他们的会员的。

第 14 章 五一工联 (KMU)



五一工联(KMU)成立于1980年5月1日。KMU名字的意思是“五一运动”(May the First Movement), 这让人联想起过去菲律宾的“十·二四运动(1966年)”、“一·二六运动(1970年)”和“五·二〇运动(1972年)”, 甚至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五四运动(1919年)”和“五卅运动(1925年)”。

所有这些运动都体现了文化上、政治上、工会组织和民族问题上的结合起来的不满。不过, 五一工联主要是个工会中心。

按照菲工大的说法, 五一工联直接的前身是1974年的一个毛派组织, 叫作 Bukluran, 领导者是一位资深共产党人费利克斯韦托·老奥拉利亚(Felixberto Olalia Sr)。

附属于五一工联的工会主要有:

NAFLU (全国工会联盟)

NFL (全国劳工联合会)

NUWHRAIN (全国宾馆、餐厅及相关产业工人工会)

ULGWP (木材和全体工人联合工会)

NFSW (全国糖业工人联盟)

PANALO (菲律宾民族劳工组织联盟)

1982年8月, 39个五一工联的领导者被捕, 包括主席老奥拉利亚。后来五一工联向国际劳工组织申诉, 申诉案的编号是1192。1984年, 国际劳

工组织的自由协会委员会得出了以下结论(538-543页):

第一, 正如专家委员会所要求的那样, 菲律宾政府的法律应该与国际劳工公约第87条一致。

第二, 图帕兹(Tupaz)先生的案件(案件1157号)需要迅速而公正的判决, 而工会领导者——包括索里亚诺(Milleth Soriano)——从1982年起就被关押。

第三, 政府应回答, 它为调查有关刑讯的申诉采取了哪些措施?

第四, 关于对五一工联办公室的突袭和对其财产的没收, 委员会对工会财产受保护的权利未被尊重感到遗憾(至今没收的财产尚未归还)。

工会章程

五一工联的章程在1980年6月五一工联第一次大会时起草, 1982年经过修订, 在1985年3月为期两天的大会上再次修订。五一工联的主要原则是:

第一, 菲律宾的财富属于人民, 只有菲律宾人民有权从中受益。

第二, 自然资源的开发、资本的运用和新技术的使用应尽力满足人民的需要, 而不是用于剥削劳动者, 或仅为少数人创造财富。

第三, 由于工人是生产超额利润的人, 他们应有权决定在菲律宾人民中公平分配财富, 这样才会真正公平、自由和民主。

第四, 五一工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剥削导致了人民与人民、国家与国家彼此敌对。

第五, 人人皆应平等, 这只有菲律宾的财富在所有人之间公平分配才能实现。

第六, 五一工联为菲律宾人民的以下权利而奋斗: 有保障的就业、公正的劳动报酬和真正像人类的生活。

1985年的章程还承认了联盟者的自主权。

五一工联执委会的莱托·比拉尔（Leto Vilar）说，五一工联是真正的工会中心，“因为它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五一工联是战斗性的工会中心，“因为它为了经济利益而斗争，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

章程的第五部分是财务规定：

“五一工联的资金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来自工会的会员费。

1.对独立于任何联合会的基层工会来说，新加入的会员费是 50 比索；

2.对全国性工会或工会联合会来说，新加入的会员费是 200 比索。

第二，每个月的会费，月末支付。

1.本地独立工会每个会员 0.5 比索；

2.全国性的工会或工会联合会每个会员 0.25 比索。

第三，捐款。任何同意五一工联的原则和信仰的组织和个人都可自愿捐款。

第四，金融投资。五一工联可投资于任何合法的、与五一工联原则相符的、能为组织获得收益的项目或生意。

五一工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选举全国理事会成员。目前有 23 名理事。全国理事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如果 30%的理事提出要求可另行召开会议。全国理事会从理事中选举 8 人形成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会议。

五一工联的组织

1985 年五一工联的组织委员会记录了五年间会员数量的增长情况：1980 年是 5 万人，1981 年是 75000 人，1982 年是 15 万人，1983 年是 275000 人，1984 年是 50 万人。“从基层工会来看，五一工联拥有最有影响力的工会成员。五一工联在棉兰老岛、内格罗斯岛、首都地区（大马尼拉）和巴坦省都有主导地位。五一工联与黄色工会和温和派工会的会员总数旗鼓相

当。我们希望明年我们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五一工联的秘书长博比·奥塔利兹（Bobby Ortaliz）说会员有 50 万，此外还有工人反抗贫穷全国联合会（PKMK）的会员（包括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的 90 至 100 万会员在内）。这可能是夸张的说法。据莱托·比拉尔所说，“今年即 1985 年，我们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会中心，会员数量将超过菲工大（TUCP）。数字已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数字上相差无几。”五一工联的领导者对菲工大持鄙视态度，认为它快要解体了。

报告包括了自我批评的内容。“我们面临无法避免的缺点，因为我们的工会如此年轻，成立还不到五年，比如我们的领导者在中心工作方面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严格。”这是因为他们以前从事的是基层和区域性的工作。结果，执行委员会无法处理所有分派给它的事务，有些事务又转给了全国理事会。

目前的全国理事会是 1984 年 3 月选举出来的，奥兰多·奥拉利亚（Rolando Olalia, Ka Bert 之子）任主席。全国理事会理事、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五一工联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全职的。他们没有薪水，但有交通津贴。据一个全国理事说，他们想让妻子出去工作来供养他们生活。万一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们可以向五一工联申请帮助，金额则通过协商决定。

在我们住的地方，全国理事和五一工联的干部有时会在床铺或是沙发上过夜。他们并没有特殊待遇，他们与其他工人没什么两样。五一工联的高级干部会帮助校对讲义和装信封，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得知，许多人暗中帮助五一工联，低调是为了免受伤害，所以五一工联各部门的基地也要保持低调。从办公室窗户向街上的游行队伍扔废纸的人所干的事，那叫“废纸革命”。而维持一个 50 万人的组织，靠废纸革命可不行。暂时的小挫折是有的，就像在任何组织里一样。比如，我们得知，与运输业工人联系很困难，“他们现在处境艰难，他们没办公室了。我们找不到他们了。”办公室被突袭，文件被拿走，财产被没收，并且不得不采取防备措施，任何这样的工会都会处境艰难。

两年前来过这里的代表们认为，近两年来五一工联的组织发展深入，自信心也增强了。“在这个组织中，事情总是在变化。”有人这样说。“每天都不同。”依靠口头承诺和即兴的提议，或许会让某些发达国家的拘泥形式的工会感到不安。安全问题得不到保证。有个人对我们说，“这个组织好像是用线联系起来的，但是不这样的话组织就无法存活。”国际团结大会的组织者和五一工联的工作人员有能力制订出详细的计划安排，并留有反馈和变通的余地。要知道，他们可以支配的资源十分有限；五一工联建立起全世界的联系、发出国际性的通告，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五一工联在这一点上比其他工会中心都要出色。

五一工联强调教育。与我们交谈的几个人都认识到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知道在这方面从哪里得到帮助。与我们交谈的人，特别是天主教劳工教育与研究所（EILER），都认识到教育上的差距。比如，五一工联至今还没有一份对未来的详细经济规划。五一工联现在的力量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只有比如全国糖业工人联盟（NFSW）等组织涉及到农村。菲律宾一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农民或小农场主，而五一工联需要宣传能够吸引农村中大多数人的政策，比如土地改革。我们了解到这样的观点，迄今为止，“经济工联主义”都意味着接管旧工会，甚至自称左翼的工会的接管行为，都仅仅以成立新工会、执行集体谈判协议、工会化的工厂、从工资里扣收工会和联合会的会费收入告终，而后就去睡大觉，并把工会会员忘在一边了。如果工会的领导作用仅被当成是提供法律服务，这么干倒是很容易理解。但五一工联在生存和扩张之余，还将面对改进服务和政策、减少法律上的依赖，以及扩展内部的民主等问题。

在讨论中，大家所提出的改进问题，包括了对法律辅助问题和集体谈判的结构进行研究，还有包括工会结构在内的广泛的民主教育问题。

法律事务部

五一工联法律事务部 1985 年的报告提到，这里雇佣了 9 名律师和法律顾问。3 月底之前的一年中，五一工联向 124 个劳工联合会和工会提供了一

般性的法律辅导服务，处理了 292 个具体的案件。律师们参与到了 36 起罢工的解决过程，还有另外 30 起罢工正在解决。“在解决了的罢击中，工人 89% 的要求得到满足。4 起罢工失败了，因为工会遭到捣毁。2 起罢工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条件。”8 起罢工通告待定。28 份集体谈判协议得以签署。

“由于缺少处理申诉的足够知识，律师经常被工会领袖请来参与申诉会议，而申诉在本质上不是法律事务。律师们共参与了 750 次申诉会议。”

法律事务部有一个不足，“准备诉求的任务使律师们耗尽了心力。由于工人或是工人领袖无法向律师提供案件的足够证据，这个任务变得更困难也更耗时。”

法律事务部帮助进行教育工作。去年，他们举办了 10 个关于组织、管理、集体谈判和申诉处理的讲习班。这些讲座涉及罢工法和工资法令。他们帮助民主劳工组织协会建立了法律事务委员会。法律事务部的报告还提到了 STRIKE 组织（关于劳资关系和工人权利的劳工律师协会）的作用，该组织有 44 名劳工律师。据说劳动就业部已经承认了这一组织。

总之，“资本受到的保护胜过工人。法律是在根本不考虑工人的生存权和对劳动成果的分享权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些骇人听闻的状况最终引发了工人不满，以至于他们不顾律师所提供的深思熟虑的意见。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工人。他们真诚地相信罢工是为了生活而进行的各种斗争中的一个合法手段。”

五一工联的办公室

我们拜访了五一工联在马尼拉的老商业区伊斯科塔（Escolta）的办公室。穿过一扇不起眼的门，是一套没有装修的小房间。我们见到了五一工联的秘书长博比·奥塔利兹和审计员洛利塔·格吉姆（Lolita Gozum）；这两位我们以前就见过面。

博比·奥塔利兹以他和工人相处的爽快态度解释说，五一工联从 1980 年开始申请注册，上交了章程的副本。劳动就业部并未回复。他们正在把

章程和 1985 年 3 月的修正案翻译成英文。

当天，我们见到了五一工联国际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委员。我们谈到了五一工联向国际劳工组织的申诉，五一工联将派代表出席 1985 年 6 月的国际劳工组织大



会，在欧洲议会中提出菲律宾的工会和人权问题，如有可能，在欧洲工会大会上讨论关于菲律宾工会权利的议题，以及一本关于五一工联的相册。

关于未来，他说，“当政府更迭时——这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别还想着一切会照旧继续下去。必须有巨大的变革。为了促进大变革的发生，五一工联必须强大起来、独立起来。我们不想自缚手脚。我们将努力达到目标。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现在，政府计划通过有系统地谋杀我们的人来摧毁五一工联，而我们必须动员国际力量来反对之。”

政策

1980 年，五一工联在《工人宣言》中提出了六项要求。

第一，提高最低工资，达到合理水平。

第二，恢复罢工权利。

第三，废除各种阻碍、延缓罢工的措施。

第四，恢复公民权利。

第五，承认在公共事业公司和非营利性机构组织工会的权利。

第六，把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产业国有化。

其他主要要求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土地改革和终止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

五一工联所提倡的政策在 1985 年 4 月通过新闻报道得到阐述。一份报道批评政府计划延长 8 小时工作日，以此来减少每周工作的天数。奥拉利

亚谈到 1886 年芝加哥干草市场 8 小时工作日斗争上的最终胜利。一份报道要求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引述说每年因为不合格的劳动条件而至少发生一起广为人知的致死事件²⁸。五一工联还要求暂停解雇工人，要求解雇工人要支付两个月的遣散费，要求政府帮助小业主，而不是只顾帮助马科斯的亲信，还要求废除劳工优惠房贷基金会（PAGIBIG）。

五一工联看来并不打算与现政权妥协。奥拉利亚接到艾森豪威尔基金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邀请，及许诺五一工联将会得到合法地位。马科斯总统也给他提供国会的席位。虽然这些邀请都被拒绝，但有趣的是，劳动就业部的副部长也被邀请到五一工联的三月大会上致辞。

五一工联的根本政策是政治要求，工人问题原则上是社会体制造成的。国际团结大会向大家介绍了包蒂斯塔（J. Bautista），“上周他还在监狱里。前几天他突然获释；释放第二天宣布他通过了考试成为一名律师。事情就是这样变化的。”他告诉我们，“以后，对我国实施新殖民统治的美国军阀将直接干涉我们的事务，就像他们在格林纳达所做的那样。这里已经有美国的军队。我们想要作为一个民族而自立。到 80 年代末，如果我们能阻止美国干涉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够结束这个伪善的政权。国际团结运动中的朋友们一定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莱托·比拉尔说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帝国主义在菲律宾的血腥历史将在我们手里结束。我们筹备五一工联就是为了这一天。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己的未来，我们必胜。”

奥兰多·奥拉利亚被问及如何夺取政治权力时回答说，五一工联必须和其他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我们立志要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会看到工人将起到领导作用。”

新爱国联盟（BAYAN）大会的开幕式

五一工联的支持者包括三类反对马科斯的人：资产阶级改良派

²⁸ 此处疑有误——译者注。

(LABAN, UNIDO), 自由民主派(街头议会组织等)和革命派。他们宣称, 五一工联当前的政治主张是参加新爱国联盟(BAYAN)——这是一个寻求社会问题根源的左翼反对派的新的共同阵线, 聚集了自由民主派和革命派。五一工联的领导者在组织新爱国联盟的过程中作用突出。5月4日和5日在马尼拉召开的新爱国联盟首届大会上, 五一工联的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作为客人出席了会议, 我们可以在会议上自由发言。大会有1068名代表。

新爱国联盟以“人民政治”来定义它的策略, “其目的不是个人权力, 而是有意义的变革; 人民政治认识到, 必须结束国家处在由国外帝国主义维持的本国独裁统治之下的局面。”

86岁的前参议员洛伦索·M·塔纳达(Lorenzo M. Tanada)号召群众支持“非传统的、斗争性的行动”以推翻马科斯政权, 特别是“街头议会”。塔纳达说, 菲律宾人需要的不是营造幻觉的“政治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总是说政府换届就能带来好日子。但是每次选举中许诺的好日子从来也没出现过。”

参议员何塞·迪奥克诺(Jose Diokno)说, 新爱国联盟试图解决四个主要问题: 食物与自由, 就业与公正。维持了20年的马科斯政权必须尽快结束。

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五一工联团结大会代表向大会致辞表示支持。英国代表的致辞是: “我代表英国代表团、代表英国人民向新爱国联盟的首次大会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作为英国工党党员, 我知道在英国马科斯的名称是多么令人痛恨。我们的问候还来自于在英国工作的两万名菲律宾人! 团结大会的英国代表团见识了真正的工联主义的成长, 这是自由的基础之一。说‘不’的权利——无论是罢工, 还是对政府持异议——都是一项基本权利。全世界希望你们成功地在菲律宾恢复民主和自由。失败的代价难以承受。祝愿你们以及全体菲律宾人民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某些地下左翼力量强大的地方, 新的政治阵线会参加竞选。在大会上, 有BBC的两名记者。但是马尼拉当晚的电视新闻只字未提这次大会。第二天后, 塔纳达先生说新爱国联盟将与全国统一委员会(反对党的主要联

盟)结成联盟。大会过后, 新爱国联盟将开会敲定全国联合的战斗性抗议行动, “目的是加速推翻马科斯的独裁统治。”

五一工联多部门的工作方式

五一工联有时因多部门的工作方式使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和文化上的工作相互依赖而受到批评。五一工联则把这看作是力量源泉。“我们独特的组织结构能够把经济和工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五一工联因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认为, 这是我们组织上的战略优势。没有多层次斗争的结合, 五一工联很容易像劳工阵营里的其他组织那样丧失活力。”(1985年3月的主席报告)

根据圣约瑟机构(St. Joseph)提供的信息, “更深地理解周围的可悲状况, 能够促使工人参与到自我组织之中, 以此来促进工人自己的福利。”

联盟的向导带我们去了三个城市贫民区, Tondo, Dasmarinas 和 Albana。需要解释一下, 五一工联在社区(贫民区)分支上的想法; 社区分支即以社区为基础的工会分支。这种组织如何像工会一样运作, 还不清楚。假以时日, 工会的作用可能会更为不同。

工会与天主教会

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 大多数人信罗马天主教。教会当局像其他地方一样, 分成按照传统维持现状的一派(几个世纪来一直如此)和在过去十年根本上改变了立场而支持社会上的穷人和弱者的一派。这一分裂影响了所有相关的人。支持穷人意味着重新思索贫困的根源, 以及消除贫困的力量和手段。

我发现, 在支持人民的那部分神职人员中, 那些修女、主教和神父, 普遍对传统工联主义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即菲工大所体现的“黄色工联主义”(维护雇主、政府、外国资本的利益)。不论神职人员是直接还是间接与工人有联系, 他们都对菲工大评价甚低。

一位主教告诉我，在某个产糖的省份，参加菲工大的五一集会的工人都是种植园主和工厂主用卡车运来的，有来参加就给钱。还有人告诉我，每个参加的工人领到 50 比索，外加一件免费的 T 恤衫。这都是与菲工大合作的结果。相比之下，KMU-NFSW 的五一庆祝活动至少有 4 万人参加。工人为什么参加？我问一位主教。回答是：“因为工人们相信这个事业。”

五一工联经常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接近人民的神职人员，无论修女、主教还是神父，都明确地对我说，从他们的经验来看，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五一工联是共产主义的组织。他们很理解，指责五一工联是共产主义组织，是出于某些人的利益。他们还说，等到马科斯政府垮台时，美国会来干预，不是来保护人民，而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

许多关心人民福利特别是穷人福利的教会组织认为，那些把五一工联当作共产主义组织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五一工联根本上是在为工人控制自身命运的权利说话的。它是为正义、自由和真正的民主大胆说话的工人组织，而政府和维护政府的工会却没有承担起教育、健康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责任。这些人实际上亵渎了最低工资法，在圈地等问题上也犯了罪。他们告诉我：“必须让大家都知道这些情况，因为这是真相。”

正如一位神父在某次大会上对工人和穷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联合起来抗议吧。如果保持沉默，那么你能只做奴隶。教会受到迫害，因为我们在尽力帮助穷人。”五一工联也反对工人奴隶般的生存条件。在五一工联的会员和盟友中有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

许多神职人员认为，示威和“施压政治”（比如静坐）是人民表达自身需要的合理手段。五一工联出于同样的理由也提倡这些方式。神职人员谴责在公共和政府部门禁止组织工会的规定，五一工联亦然。

我的印象是，神职人员远为倾向于五一工联，而不倾向于菲工大。菲工大被等同于马科斯政府。神职人员说出“马科斯/美国独裁统治”这个词，让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听起来感到很奇怪。然而，神父们、修女们和许多天主教会组织都参加了五一工联组织的五一劳动节集会和其他庆祝活动。

很多证据表明，信教群众和教会组织在支持五一工联，比如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YCW）。我们得知，在戒严法实行初期，有 10 个神学院学生决定，他们要致力于创建工会反对派。或许还应提到，在 38 名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中，3 名是神父。

另一方面，宗教的形式与波兰相比就不明显了。比如，虽然国际团结大会和话剧《罢工，罢工》是五一工联和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共同主办的，但我们不曾注意到这些活动中有任何天主教的痕迹。

有人这样评论在马尼拉大教堂前绝食三天以抗议工会人员被捕的活动：“这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抗议行动形式，清楚地体现了菲律宾工人深刻的天主教信仰。”五一工联工作人员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天主教的成分，比如为群体而献身的冲动，比如共同分担迫害和苦难。类似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与工会的兴起也有联系。教会可以为备受压力的人们提供精神空间和心灵抚慰，还可以与工会一起提供实际的帮助。

文化

在我们做介绍的讲座间隙，一个民歌乐队演唱了布莱希特等人的歌、《团结的人民永不败》，以及《国际歌》。我们送给他们一本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歌曲集。政治犯可以用磁带把歌曲录下来。菲律宾人民艺术促进委员会和无产阶级艺术民族联盟在卡梅尔山社区中心（Mount Carmel Community Centre）举办了一个展览，题为“向工人致敬：菲律宾国际艺术展”。他们为我们搞了一次文艺表演。一开始，他们砸碎了一幅象征马科斯独裁统治的壁画；而后是诗歌和革命短剧；最后，绘制出一幅壁画，表现“真正的、战斗性的和民主的工联主义”。一个艺术家来找我们谈，询问英国是否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艺术，以及是否有可能在英国巡展。

我们看到了话剧《罢工，罢工》，话剧的作者是博尼法西奥·伊拉甘（Bonifacio Ilagan）。话剧完成于 1972 年，这是在戒严法实施之后的首次上演；该剧已经在圣约瑟会堂（St. Joseph's Hall）中向大量观众表演了三场，

第 15 章 五一工联的同盟者

话剧结束时观众们起立鼓掌喝彩并唱起国际歌。一位演员跟国际团结大会的代表谈了起来，并介绍了该剧是如何部分地受到中国的无产阶级话剧和布莱希特（Brecht）戏剧的影响。

话剧在一场为了经济目标而举行的罢工中开场。工会主席兼律师签署了妥协协议。工人们拒绝接受协议并坚持罢工。工人接受了“真正的工会”课程。工会主席串通资方想开除“真正的工会”的领导者。这一行径导致更严重的、要求让他们复职的罢工。资方调来了军队。在暴力冲突中，工人战胜了士兵，夺走了枪，赶走了黄色工会，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

话剧是他加禄语表演的，其中只有资本家的开除信是英文写的。

最后是尾声。一位女演员向观众叹息工人遭受的镇压。今天的结局变了。英雄上场，背着包离去，加入了新人民军，全场给予鼓掌。“这条道路就是团结。我们将向全世界的亲友讲述，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这个更加光辉的故事。”

殖民主义向菲律宾输入了粗俗的东西：没有实质的美国梦，作为帝国主义语言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用菲律宾语讲述剥削的故事令人振奋。



标语意思。左：推进运动，罢工！右：为工会权利而战！

五一工联的同盟者把同一地区的工人联系起来，是基层工会和全国性组织的中介。同盟者的作用是发展队伍和组织运动。在英国，工会中央理事会（Trades Councils）和英国职工大会（TUC）地方委员会的关系，与五一工联和同盟者的关系，有些相似。

1983 年之前，五一工联在大马尼拉地区迅速发展，于是重新划分为四个区域。此后，这种发展方式为同盟者或工会“阵线”的广泛发展所取代。同盟者同样在其他地区扩展，比如在内格罗斯岛，最初的同盟以全国糖业工人联盟、木材和全体工人联合工会（ULGWP）及全国劳工联合会（NFL）为基础，名为“五一工联—内格罗斯（KMU-Negros）”。1984 年五一工联称，他们“组织了至少 20 个地区级的、省级的、工业地带的或者城市范围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我们扩张和巩固了附属于我们的联合会和产业联盟，把他们变成五一工联的协调统一的分支。这表明了在巩固和加强组织方面我们的进展有多好。”（1985 年 3 月大会主席报告）AMBA-BALA 就是一个范例。

同盟者分为以下几种：

1. 成员同盟者（直接附属于五一工联）（有 11 个），包括 CENTRUM（棉兰老岛）、AMBA-BALA（巴坦省）、PAMANTIK（南他加禄省），DFA，五一工联—内格罗斯，AHW，和 KMK。
2. 省级同盟者（2 个）：PAMAKLAS，FTILA。
3. 市级同盟者（12 个）：比如 ALMAKAMAY。
4. 产业同盟者（5 个）：比如 BELA，EEEWA，LAHI，ALMADES，CSP，和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YCW）。比如 GATELA（服装纺织工人）在 1984 年 12 月通过了首个全国性公约，由 47 个基层工会组成，工人会员六万人。
5. 跨行业同盟者（2 个），比如 ALMAGO（因企业同属于某雇主）。
6. 全国性同盟者，比如工人反抗贫穷全国联合会（PKMK）。

菲律宾劳工监察 (the Philippine Labor Monitor) 情况报告中列出了目前同盟者的名单。同盟是一种多变的、不断扩展的组织形式,这有助于它们开枝散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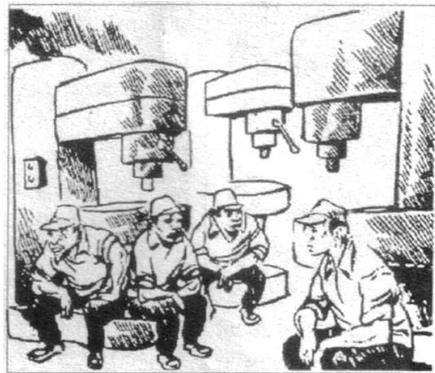
对同盟者还有进一步的分类,比如 CENTRUM 由 6 个地区性的同盟者组成。AMA-Sugbo (宿务岛) 分为 3 个区域性的同盟者,其本身又有 30 个成员工会和 3 个分别以司机 (NADSU)、碳业工人 (AMAKAR) 和竹篾藤条业工人 (PABRIKA) 为基础的成员同盟者。在班乃岛 (Panay), 同盟者是 AMIGO。

PAMANTIK 同盟

PAMANTIK 是吕宋岛南部他加禄地区的同盟者,成立于去年。有人问 PAMANTIK 资金从哪里来。“我们每个会员交 5 个比索,或者视会员能力交一定的会费。联盟的要求并不苛刻。我们依靠工人道义上的支持。”在工人发展研究所的办公室,我们了解了一些劳资纠纷,其中某些纠纷我们就去实地探访。

雀巢公司是工资最高的企业之一,日工资 147 比索。集体谈判协议签订时工人有 1200 比索的奖金。以前,雀巢产品工人工会是黄色工会,名义上独立,但与菲工大结盟。工会领导人受到挑战,但资方对新的认证选举进行抵制。这是非法的,所以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这一非法行径,并在认证选举得到同意之前拒绝撤除纠察线。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的雀巢工人伸出了援手;当地工人则发现,了解其他地方的集体谈判协议也很有用。

PAMANTIK 告诉我们,通常真正的工会不会在认证选举中受到挑战。大多数地区有工会的工



人都是少数, PAMANTIC 所倾向的策略是真正的工会把 10% 的工人从黄色工会接管过来,以此为基础,把工会发展到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中去。

在共和面粉厂发生了一起持续六个月的罢工。军方使用了催泪弹。妇女们躺在地上保护纠察线。最终的协议要求罢工中的关键人物辞职。这些人现在与联盟一起工作,在其他地方发展工会组织。

女工与男工是否同工同酬,有赖于集体谈判协议。女工有全薪产假,可达 90 天,还有 3~5 天的待产假期。

如果外国人工资更高,就形成了种族歧视。澳大利亚经理的薪金以美元计算,此外还拿津贴;从瑞士来的机械师的工资比其菲律宾上司还要高。

封建态度仍然存在。雇主通常表态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工作在一起,我们很快乐。”在某些椰子种植园,如果你病倒了,你的亲戚可以接替你的工作。

ALMADES

ALMADES 是在马尼拉东南部 Dasmarinas 新定居区的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联盟。ALMADES 的执行委员会由各种不同的工会构成。城市贫民联盟和工人组织共用活动场所;当需要动员或发生争端的时候,他们会相互帮助,比如在集体拒交房租的行动中。当地工厂中 45% 的工人住在本地的社区中。

当地 6 家工厂有 6000 名工人。Golden Needle 厂和 Sanitary Steam Laundry 厂不允许工人组成工会。Philippine interfashion, Atlas Globe 和 Dasmarinas Garments 三个工厂有工会。1984 年发生了 4 起罢工,现在 Berlei Hestia 厂正在罢工。

ALMAGO

这是 Gokongwei 公司 (马尼拉东部某区) 工人的联盟。圣约瑟研究所 (St Joseph Institute) 是该联盟的一个基地。ALMAGO 之下有 13 个工会,

会员总数 12000 人。在这个地区有 27 家企业，剩下的企业的工会大多由黄色工会把持。

我们问，工资要求能否成为整个联盟的要求。这样做很困难，因为不同的集体谈判协议的有效期不一样。另一方面，工资攀比也不无可能。

食品加工区联盟

食品加工区位于马尼拉南部，那里有约 40 家工厂，其中 20 家有工会。我们同食品加工区联盟的干部（包括主席在内）一起参观了 Grosby 工厂。当地宗教组织的修女也一同协助参观。

我们得知，劳动就业部曾提到，去年二月在食品加工区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多方谈判，从而防止了一次涵盖全区的集体行动。

ALMAKAMAY

ALMAKAMAY 是一个超级联盟，由食品加工区联盟和其他在大马尼拉地区南部的联盟组成。联盟的目的有：第一，支持罢工；第二，帮助解决工人的问题，比如他们正在举行一个关于解雇冗员和强制休假的会议，会议上还有一些雇主参加，再比如举行支持基层谈判的集会；第三，教育，特别是“真正的工会”课程，提供有关集体谈判的技巧和法律知识。

在这个依赖外国资本的地区，裁员是重要问题。通用电气公司裁员 470 人，Dianetics 裁员 2500 人，日立半导体裁员 2000 ~ 3000 人。短期工作和强制轮休很常见。

药品和食品联盟

我们见到了药品和食品联盟的主席曼尼·萨缅托（Manny Sarmiento），他去过日内瓦会见 ITS。他还与国际法学家协会的人谈了话。

全国食品和药品联盟也有各个地区性的药品工人联盟和食品工人联

盟。椰子种植工人联盟和糖业工人联盟的也在筹建中。

PAMANTIK 地区 27 家制糖工厂中有 26 家有工会。当地食品工人联盟的主席将要访问瑞士，但因他的斗争活动而被拒签。

菲律宾海员联盟

我们见到了菲律宾海员联盟的主席和研究主任。主席罗赫略·莫拉莱斯（Rogelio Morales）船长刚从欧洲回来，并想和 NUS 取得联系。他们已经与诸如英国水手会、海员俱乐部、国际基督教航运协会、费利克斯托海员中心（Felixtowe Seafarers' Centre）等组织取得了联系。

我们讨论了辞退海员的问题，以及荷兰的海员罢工。

该联盟成立于 1983 年，到 1984 年底，会员已超过 4000 人。会员名单刊登在工会的期刊《舵手》上。根据工会规章，会费每月 5 个比索。

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船海员供应国（根据《舵手》1984 年 7、8 月号提供的信息，30 个国家的 4500 艘船上有 64169 名菲律宾海员）。菲律宾的注册海员有 196 000 名，只有 54 000 名海员有工作，72% 的人失业。海员月薪从 150 美元到 200 美元不等，80% 的薪水必须汇回国内。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海员参考月薪是 275 美元。

首届全体海员大会在 1985 年 4 月 30 日召开，来自澳大利亚水上工人工会的国际团结大会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从现在开始菲律宾海员联盟成为一个工会，无论劳动就业部是否承认，我们都将履行全国性海员工会的职责，从事相关活动。”（Pinoy 海外编录，1985 年 6 月）

劳动就业部承认了 37 个海员组织，但是据菲律宾海员联盟的信息，其中没有一个达成合理的集体谈判协议。菲律宾海员联盟向劳动就业部申请承认其地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联盟没有必需的 10 个集体谈判协议（其实有 22 个）。最近，由于发生了欠薪六个月未付的事件，菲律宾海员联盟迫使两艘船抛锚。其他 37 个海员组织自戒严法实行之后从没这么干过。目前，菲律宾海员联盟正取得一个雇主的同意进行认证选举。

女工运动组织 (KMK)

女工运动组织成立只有两年。主席 D.也是五一工联全国理事会成员。女工运动组织不附属于五一工联,法律禁止这样做;只有主席在五一工联全国理事会中代表女工运动组织。五一工联在原则上同意它可在五一工联的组成工会中组织独立的分支。

女工运动组织代表了 40 家企业中的 5000 名女工。组织有全体大会、15 人的全国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地区性分支(如巴坦省、宿雾市、碧瑶市、大马尼拉地区和巴哥洛市)。大马尼拉地区有 37 个分支尚在组织。

女工运动组织遍及多个产业:服务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酒店和餐饮业。她们计划把农业部门也组织起来,并巩固在群众中的组织。哪里没有工会,女工运动组织就帮助建立相关工会。哪里有真正的工会,女工运动组织就请求工会支持 KMK 女工成员的地位,从而在工会中成立一个团体,来表达妇女和工人的需求。如果现有的工会是黄色工会,那么女工运动组织将建立一个分支,为工人权利和成立真正的工会而斗争。如果工会开始与其所属的黄色工会联合会疏远,对现状不满并寻求真正的改变,女工运动组织就会鼓励他们为工人权利而斗争。

“女工运动组织只关心妇女问题吗?关心的又是哪类妇女问题呢?”国际团结大会的妇女代表提出这样的问题。女工运动组织认为,妇女在工人中占多数,所以“工人的问题就是妇女的问题”。女工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如工作没有保障、工资过低、恶劣的工作条件等。作为女性,女工还面临找工作时的歧视问题,被看成是软弱和无能的人的问题,做轻体力活儿拿低薪的问题。女工运动组织所关心的问题中还有,妇女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问题,性骚扰问题和侮辱问题(例如厂内的选美比赛)也比较普遍。

“性别压迫”也是一个问题:男人动嘴,女人动手;管理是男性的权利。所以在以女工为主的工厂里,担任监督和管理职责的总是男性。在许多裁员事件中,比如电子产品业、服装业、纺织业等,女工占大多数,因

此也倍受裁员的影响。只有解决了工人的问题,妇女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负责处理具体的妇女问题的,是名叫 GABRIELA 的综合性跨部门的组织。女工运动组织是它的成员,但不是整个组织加入,而是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GABRIELA。

女工运动组织关注作为工人的女性,培养男女作为工人必须一起工作的意识,以改造社会。然而,女工运动组织也看到一些影响女工的具体问题,比如政府为了卖淫这个产业而对妇女进行的剥削,例如招待香港游客的性旅游项目。女工运动组织把美国军事基地看成是菲律宾性产业的头号祸首。

代表们问,女工运动组织要求企业提供照顾小孩的服务吗?是的。她们把这看作是影响女工的众多问题之一。管理层歧视已婚妇女,而已婚妇女常常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家庭和女工都受到歧视。这种歧视应予结束,企业应该提供照顾小孩的设备,生产这些设备的企业也应当受到支持。甚至菲律宾的劳动法也这么规定,“超过 50 名雇员的工厂应该有照顾小孩的设施和服务。”现实中,这只是一纸空文。通常已婚妇女或是有孩子的妇女是不许停下工作照顾孩子的。

妇女面临福利问题,比如生产期的福利。在戒严法颁布之前,妇女有 40 周的产假,并可拿到 60%的基本工资,外加生活补助。福利是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来算的。现在她们只有 6 周带薪产假,而且福利只以基本工资为基数来算(生活补助不计入基数)。如果妇女休产假,当年的病假就没有了。申请的福利不得等上很长时间才能到手,常常要等到小孩出生以后。有些妇女说,她们拿到钱的时候,小孩已经在蹒跚学步了。通常雇主只会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妇女申请之后再支付福利。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官僚主义,批准过程很费时间,而且批准以后雇主也不会立即就支付福利。女工运动组织正在争取在集体谈判协议中规定,小孩出生前支付产假的福利。

妇女受到性骚扰和侮辱,证明的办法是做医学鉴定。这些鉴定通常不会尊重女工。我们得知 Artex 公司为了评价女工是否温顺或者是否很快就会结婚,会对妇女进行处女鉴定。我们得知,这种做法在很多公司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出口加工区的出口企业中,这种故意侮辱妇女人格的行为特别普遍。

代表女工的女工运动组织也遭遇了政府对工人的压迫。法令 BP 130 和 BP 227 被用来骚扰女工。纠察线上的妇女会受到警察和军方的恐吓。

莱蒂西亚·塞莱斯蒂诺 (Leticia Celestino) 是布拉干省 (Bulacan) 巴伦苏埃拉市 (Valenguela) 维多利亚区食品厂的一位罢工的女工, 1984 年 11 月在纠察线上被杀害。工厂主的女婿, 同时也是当地一名警官的亲戚开枪将她打死。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犯罪指控还都没完成。枪杀事件之后, 工人们把管理层锁了起来以示抗议。现已有 13 名工人被控非法拘禁管理层, 并将按照司法程序接受审判。

这起罢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承认工会的地位, 被解雇的工会领导人复职, 让临时工转正, 以及增加工资。工人的日工资只有 7~14 比索, 而且没有生活补助。临时工没有诸如病假、节假日等福利, 也无工作保障。临时工不许参加工会 (资方控制下的工会)。他们的工资只有基本工资的 75%, 其中许多人被公司雇佣了三年, 每天工作 12~15 小时, 仍然是临时工。这种做法在菲律宾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很普遍, 特别是被用来对付女工。

跟女工运动组织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听说罢工结束了, 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工会被承认, 工会领导者复职了, 公司执行了新的工资标准, 莱蒂西亚·塞莱斯蒂诺的家庭得到了补偿。公司最初给这个家庭 4000 比索, 作为她被害的补偿。公司解释说, 这笔补偿不多, 是因为在这样困难的处境下公司没有钱! 我们得知, 接受补偿的问题之一是, 原告要撤诉。工人、工会和这个家庭拒绝放弃指控, 并要求公司赔偿 80000 比索。最后, 资方答应了这一赔偿要求。工人们将在 1985 年 5 月 13 日复工。但是, 女工们仍然守在纠察线上, 直到复工之日, 以防资方搬走机器, 到别处建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把管理层锁起来的 13 名工人以“严重胁迫罪”被判入狱, 直到工人施压才把他们救出来。

健康与安全, 以及公司的管理方式, 都是女工运动组织所面临的其它问题。女工常常被迫从事本应由男工从事的工作, 工资却比男工低。这些

工作对孕妇有害。女工运动组织还记录了妇女在电子厂工作致死的例子。一个来自大马尼拉地区帕拉尼亚克市 (Paranaque) 的女工埃尔弗里达·塞莱斯蒂诺 (Elfrida Castellano), 受雇于 Dynetics 公司, 由于长期接触浸在酸性液体中的产品而死亡。在过去三年她一直上夜班。在另一家 Silicon Tech 公司里, 工会称, 一名雇员由于工作条件不合格而死亡。正如某女工会会员所说, “除非你刚好被拍摄下来, 证明是死于与工作相关的原因, 否则资方不会承认的。”劳动就业部有三、四年没有进行过职业健康和安全检查了。

女工运动组织就这些问题制作了相关的传单。尽管才成立两年, 但他们的工作和服务是无价的。她们很需要信息的交流, 比如其他国家或者菲律宾公司在国外的姐妹公司的产假福利协议。资金是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目前女工运动组织寄居在另一个组织中, 共用他们的房间, 但为了更有效地满足女工的需求, 她们很需要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办公设备。

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 (YCW)

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帮助青年工人组成工会。它在大马尼拉地区有 7 个地方分支, 在维萨亚斯岛 (Visayas) 和棉兰老岛也有分支, 行业主要是种植园。该组织的 9 名工作人员当选不到四年。

青年天主教工人组织在每个周日举办感化引导讲习班, 为期三天。讲习班的安排有: 第一, 自我发现与发现他人; 第二, 呼吁加入进来; 第三, 作为青年天主教工人献身于工人阶级。

该组织的主要需要是一台复印机和一台扩音器, 以及需要一台设备来代替被偷走了的电子打字机。

工人反抗贫穷全国联合会 (PKMK)

PKMK 是与五一工联和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相关联的综合性组织。由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和五一工联各自庆祝五一,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 PKMK 的标志。

第 16 章 工会教育

按菲工大的说法，“去年末，五一工联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亲北京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试图以 PKMK 的形式建立‘左翼联合阵线’。该阵线于 1985 年 1 月解体。CPP-NPA (M-L-MTT) 的主席何塞·马里亚·塞松 (Jose Maria Sison) 被捕后，分裂的两方开始靠拢。最后，支持塞松的积极分子赢得了斗争，联合体瓦解。”

总结

其他的全国性中心与五一工联领导的联盟是敌对的，他们说五一工联不负责地追求权力。也有人怀疑五一工联的合法性；五一工联是一个“非正式”类型的组织，性质含糊不清，也可能更难以镇压。

我们还听说，菲工大在基层的一些组织被五一工联的联盟渗透并有效地组织起来，但是这些被策反的组织还没准备好与菲工大正式决裂，或者仍在等待时机。



五一工联的教育活动不是独一无二的新发明，但完全比得上菲律宾或其他地方的教育活动。

教育是一种组织工具。学习小组，系统地深入讨论，等等，都是鼓动的主要手段。

五一工联的群众教育

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工会教育是英国的文化输出品。

然而我们发现，根据 1985 年 3 月五一工联代表大会的报告，约有 65 万名会员参加过为期一天的入门课程 (PAMA)。

某独立观察家说，实际数字约为上述数字的 10%。但即使只有 65000 人，也是很大的成就，特别是跟大多数英国工会相比。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些英国工会都没有尝试对全体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实践中也只局限于对会员代表和积极分子进行教育。

五一工联报告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工会的目的就是把工人引向政治行动。成功的标志是削弱“黄色工会”对工人的束缚和分化，进而不断加强五一工联的地位。

1984 年，共约 12.8 万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五一工联的“真正的工会”课程。其他课程的情况如下：

领导能力训练：3485 人

组织者培训：1725 人

讲师培训：8000 人

演讲训练：4900 人

宣传训练：200 人

法律研修班：2488 人

报告还指出，以上数字并不包括“在纠察线上以及罢工期间所开展的工会学习”。上述统计数据多于五一工联的会员总数，原因在于，很多工人是在代表权选举之前接受的工会教育，而如果选举失败，他们就不能成为五一工联的会员。此外，其他工会的成员也可以参加五一工联的学习活动。

1985年五一工联的教育计划中，包括针对工会领导者和工人组织者的新课程。课程包括“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世界观”。为了满足新出现的需要，他们还为服务业的工人准备了专门的课程，比如为银行业、酒店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人开设专门的课程，还有专为女工开设的课程。

这些教育活动在五一工联开展的活动中占什么地位呢？在资源有限，并且受到国家镇压的情况下，一个像五一工联这样的组织，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

天主教劳工教育与研究所（EILER）



我们拜访了位于马尼拉的天主教劳工教育与研究所（Ecumenical Institute for Lab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简称 EILER）。这家机构成立于 1981 年。其前身是成立于 1976 年的教会劳工中心。当时菲律宾政府认为菲律宾面

临着“红色恐怖”。随后有两名左翼律师被谋杀。

EILER 现在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有四位研究员，四个讲师，两位行政人员。机构资金来自工人捐助和一家基金机构，还有一些钱来自荷兰政府。EILER 声称独立于五一工联。

他们为为期一天的“工会入门”课程（简称 PAMA）和为期三天的“真正的工会”课程设计了相关教材。这些教材正在被译成英文。这些课程是在没有明确的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始是在工人的住处上课。1975 年的时候，最早也仅有一些教学提纲流传。



PAMA 课程只选取了“真正的工会”课程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现在大多数 PAMA 培训都是在当地进行的。1984 年，EILER 出版了篇幅为 70 页的 PAMA 课程小册子，有一些生动的插图，画着贪婪的资本家和无畏的工人。书中还列举了不同的斗争手段：请愿、派代表谈判、抵制、离开车间的停工（walkout）、集体离岗（mass leave）、示威、纠察、和罢工。附录里给出了工会注册和认证所需的表格，还有一个如何计算剥削率的说明。

“真正的工会”课程中包括：

A

- 1、工人和资本家的定义
- 2、剥削率、剩余价值、劳动力的价值
- 3、工人的问题：低工资、失业、没保障、不人道的工作条件、通货膨胀、缺少教育、居住条件差、健康条件差、对妇女的压迫
- 4、黄色工会
- 5、垄断资本与美帝国主义

B

- 1、工会结构。在讨论中，EILER 的负责人说，工会代表和管理层事情，都应由全体会员来决定。在罢工期间，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可以召开一次特别的会员大会。我们问到了解雇的问题。在某些集体协议中，资方开除工人之前，应先通知工会。工会还应该设置申诉委员会。
- 2、法律。问题是怎样规避法律。在另一次访谈中，一位五一工联的律师告诉我们对待这类问题的三个原则：避开法律、不要相信律师、不要依赖领导者。

C

- 1、工人与菲律宾人民解放运动，以及民族民主运动。
- 2、工业化与土地改革
- 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讨论中，EILER 的负责人认为混合经济是有可能的。外资撤离以及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将会造成严重的危机。我们没有按照计划讨论工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D 菲律宾工人运动史

从 1981 年到 1984 年 7 月，在 EILER 总部办公室和四个地方机构，共有 4992 人参加了“真正的工会”课程。从 1984 年 7 月到 1985 年 3 月，参与“真正的工会”培训的有 1600 人。另一个讲师培训课程，内容是如何向工人讲授入门课程和“真正的工会”课程。EILER 共训练了 420 名讲师。该课程包括了现场实践的部分。

EILER 还专门为一些团体开设了入门课程，比如银行业职工、药品与食品联盟、通讯行业工人等等。其中一个机构还开设了介绍欧洲工会运动的课程（涉及到英国矿工的罢工）。新课程“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即将面世。

EILER 还在名叫“DATOS”的小册子上发布一些补充材料，如关于垄断资本的文章和关于罢工信息。除了马尼拉，他们在布拉干省也有机构，而且他们正在尝试在宿务和棉兰老岛建立其他的机构。在国际上他们只和瑞士工会教育中心有联系。他们对来自 TUC 教育中心、NUPE 和其他工会组织的英国教材颇感兴趣。

旁边一间屋子是“应用研究中心与图书服务（CARLS）”的办公室。他们拥有关于菲律宾工人的数据库，还提供外借图书的服务，设立了流动图书站，而且正在为工人建立图书借阅网络。“CARLS 呼吁支持菲律宾工人运动的国际友人向我们提供物质援助。给我们提供进步书籍，或资助我们购买外国书籍。”“CARLS 则负责提供选书的意见。”

圣约瑟（St. Joseph's）教育研究所

这是 EILER 在外地的办事处，坐落在 Sta Mesa 附近。圣约瑟教育中心的年度预算为 35000 比索（1750 英镑），资金来源于宗教团体和工会。教育项目包括：

(a) 培训。PAMA 课程和“真正的工会”课程。墙上一张表格记录了各工厂参与培训的人数。菲律宾电力公司 65% 的工人参加了其中的一项培训。

教育开支占去了预算的大部分。如果员工在休息日报名参加 PAMA 课程，雇主就会安排强制性加班。参加“真正的工会”课程则意味着至少会失去两天的劳动报酬。他们强调说，教育项目是工人自己决定的，而不是工会领导决定的。他们还计划在高等教育项目中加入“真正的工会”的内容。

(b) 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和一定的地区内。这一地区有 378 家工厂，大约 30 万工人，大多数被组织进工会或者处于黄色工会中。他们还记录了工人的斗争经过。研究所还制作了一盘非常好的关于菲律宾工会历史的录像带。ISA 的代表们看到过。

工人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

研究所位于南他加禄省，覆盖了吕宋岛南部的四个省。该研究所包括：教育部门，研究、记录和出版部门，以及行政部门。他们服务的地区共有 10 万名工人，其中的 3 万人还没有被组织进工会。这个研究所与五一工联下属的各联盟密切协作。研究所共有 10 名员工，他们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墙上列出了全部的课程。一个布告上写着“保持觉悟工人的纪律”。

他们确信，群众教育是首要工作。重点应该是群众教育，而不是先培训讲师，再让他们去教育普通会员。从 PAMA 课程的经验来看，有潜力的工人会被挑选出来参加“真正的工会”的课程，然后再去参加讲师培训。讲课和小组讨论两种方式他们都会使用（少于 20 人的时候）。作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方式，大量的工人都接受过 PAMA 课程的培训。他们到工人工作的地方去讲课，而不是把工人带到他们的中心。甚至在罢工纠察线

上也能给工人讲授 PAMA 的课程。他们在幕布上印制重要的图表，用于辅助教学。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在罢工纠察线上，黑板是很常见的。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我们看到有表格，按照不同的工厂，统计了各周末参加课程的人数，平均来看大概是 20~25 人。

参加学习的工人通常要放弃周日的休息。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代表说，工人们不太愿意放弃他们唯一的休息日。在菲律宾，人们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工人被剥削的处境使我们容易把他们拉来上课”。他们还有一个流动宣传队，用扩音器喊着口号四处宣传。

他们的课程还包括会计、非律师的法律培训、工会管理、工会报刊等等。他们还有一个文化小组。“工人需要的是关于他们对剥削的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跟上菲律宾社会发展的脚步。”他们还编了一份月刊，叫做《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Take Ours)。

当地的 PAMANTIK 联盟的 50% 的经费都用在了教育上。“工会的教育活动是不会停止的。经费用得多是因为我们在现阶段面向很多工人组织。”他们说，除了五一工联，其他的工会组织没有将教育放在首位，而是把钱花在法律和行政事务上了。协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由于五一工联的印刷机被查没，澳大利亚的代表建议，可以将印刷设备名义上“租”给这家机构，这样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没收了。或者也可以这样，把材料发往国外，印好后再把上百或者上千份的材料寄回来。

其他机构包括：人力资源中心，工人学习中心，工人研究与档案中心，以及工人信息中心。

工人教育、援助与研究中心

工人教育、援助与研究中心(英文缩写 CLEAR)坐落在碧瑶市(Baguio)。CLEAR 独立于政党和工会。它的任务是为工会提供服务。这就是该中心在工人教育、研究和援助中对工人所做的事情。

教育包括对工人的正式教育，还有满足不同需要的不同课程。总体来说，教育内容包括工人的基本权利和工会的基本原则。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包括工会组织，工会管理、讲师培训、集体协商谈判与准备工作、相关的法律培训等等。在政府不断地将工人及工会的活动定为非法的情况下，相关的法律培训就是必要的。这种正规教育凭借出版物进行，包括每月简报和专题评论集。

为集体谈判进行的研究，依据与企业相关的一些材料，如财务和投资情况。长期研究项目的内容包括出口加工区的影响，短期的包括监控工资与物价变化，以及劳动法规和工人权利的落实情况。

在劳资关系方面，以及在工会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心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助工人，并向工人推荐律师。中心有自己的律师储备。CLEAR 不会直接去组织工人，而是间接协助工人自己组织起来。

尽管 1979 年就开始筹备，但 CLEAR 最终成立于 1981 年。到了 1982 年，CLEAR 已经成为一家拥有 6 名理事会成员和 6 名全职工作人员的机构。他们和矿工组织、教师协会、政府雇员（法律禁止他们组织工会）还有女工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和各个工会的主席、罗马天主教牧师，还有各类人权组织也维持着良好的关系。理事会成员都是没有报酬的，目前他们每个月都会开会来制定工作方针。

从 1982 到 1983 年，CLEAR 共为 7 家工会提供了服务，1984 年上半年为 19 家工会提供服务，而到了下半年服务的工会达到了 90 家。在 1984 年全年，他们共为 400 名工人提供了工会基本原则的培训。

NUWHRAIN、全国工会联盟、民主劳工组织协会等工会联盟，以及妇女运动组织都接受过 CLEAR 的服务。CLEAR 和亚非工人联盟(Asia-Africa Workers League)也有联系。

真正的工会与黄色工会

五一工联把真正的工会和黄色工会放在一起作比较。在和 EILER 及其他机构交流的时候，英国代表问他们，除了这两种之外，有没有第三类工会，即经济主义的工会。比如一个工会是独立的，没有被公司管理层所收买（就像南他加禄的 Franklin Baker 厂中的工会），但同样也可能是非政治

性的，或者领导得很软弱，或者不是很好。他们对此的回答是，曾经有过这么一种分类，但是他们发现，在实际中这种“经济主义”的工会要么成了公司的工会，要么就发展成了真正的工会。在五一工联 1985 年报告中有关“组织”的部分，对“黄色工会或者温和的工会”做了说明——意味着这种区分。

据 EILER 介绍，黄色工会的特征是：

(a) 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是利益一致的，可以和谐相处的。

(b) 他们依靠和平、合法的手段，比如调解和仲裁，不相信罢工等集体行动。他们宁愿诉诸法律，而不愿进行对抗。

(c) 黄色工会的领导者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指派的，是“贵族领导者”（这个词儿在他加禄语中要难听多了）。新的工会成立时，工会领导可能是被指派的，但是工会注册之后，就应该举行选举，选出来的工会干部应在劳动部门备案。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操纵选举和贿赂的情况。（劳动法中的相关条款对黄色工会或公司工会有利）

EILER 承认，对于什么是“黄色工会”，也许存在多种标准，不过他们还是认为，是否有进行对抗、依靠集体行动的根本意愿，比否独立于公司或工会内部是否民主重要得多。我们承认，罢工行动是工会的一个基本原则，但组织原则也很重要，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工会来说就是如此。尽管只有一种“工会主义”——即“真正的”那种——但我们还是觉得五一工联将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工会都称为黄色工会，有点像自我标榜。

他们告诉我们，“真正的工会”（GTU）一词最初产生于 1978 年。在菲律宾工会历史上，战斗性工会受到压制，以利于商业性工会的发展。提出“真正的工会”的概念是为了划清界限，为了强调，鼓吹服从和驯顺的美国工会观念是虚伪的，是为了助长对工人的剥削。考虑到美国自由工人研究所（AAFLI）对菲工大的资助，西德机构对自由工联的支持，就能理解五一工联为何坚持工会的原则应是完全由工人控制，并且只为工人的利益服务。

在参观访问中，我们看到了“黄色工会主义”的例子。一次，我们和宿务联盟的主席 D.L 会面，他在米沙鄢玻璃厂（Visayan Glass）工作，这里

工会是劳工协会（ALU，隶属于菲工大）的成员。该厂因为续签集体合同的问题正在发生罢工。D.L 说，菲工大的主席门多萨先生在新的集体合同谈判中争取并同意了开除 D.L 本人和其他五一工联成员的条款。教会对马拉拉工人状况的一份研究报告值得在此摘录：“那些所谓黄色工会中的工人承认，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益方面是无望的。正如一些工人所说的……‘工会帮不了工人任何忙，因为工会本身就属于资方’，他们多次试图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会，但遭到资方的阻止。”

NATU（属于世界工联）的副主席 Vladmir Sampang 说，他从劳动部部长那儿获悉，政府机构渗入工人的组织。（《大都会先驱报》，4 月 30 日 ~ 5 月 6 日）。

五一工联的教育实践

我们没能亲自参加一次这样的学习，但是马来西亚代表团参与了一次星期日举办的 PAMA 培训。那次课程共有 40 人参与，从早上 8 点上到晚上 10 点，中间休息了三次。

我们注意到，ISA 代表团去参观一处罢工纠察线时，纠察线的组织者借此作为促进教育的因素。这里的人们常常用一块黑板来公示各种问题，问题的反馈和更新。在“开放论坛”（open forum）中，交流讨论以一种半教育的方式进行，即使在罢工期间也是这样。

1984 年，Ruberoide（属于阿迪达斯）工厂中 2500 名工人的“有组织的罢工准备工作”包括：a 教育、b 宣传、c 会议、d 交通、e 食品。总计 39 万 7 千比索（18650 英镑）。1984 年 1 月 8 日到 2 月 14 日，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期间的实际花费，统计如下：

(a)、教育

1、PAMA 培训——120 人（每人 20 比索）——共 2400 比索

2、“真正的工会”培训——30 人——食物（4 天每人每天 15 比索）——共 1800 比索

3、工会罢工技巧——35 人——食品（每人 20 比索）——共 700 比索

五一工联现在正在对一日讨论会的模式进行深入思索，尤其是关于怎么拓展 PAMA 培训的内容，还有怎样更好地进行后续教育。

首要的工作

五一工联通常在一些中小企业中开展组织活动。对于一个新的工会联盟来说，与挑战大企业已有的工会组织比起来，这样做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五一工联的会员相对缺乏经验，从经济上、教育上都为其他工会所忽视。他们中的一些人刚从农村出来，可能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很年轻，就像菲律宾整个工人阶级一样。

由此，有人可能会断定，工会对会员教育的重点，应当是会员参与工会活动的基础技能和培养会员的组织能力。五一工联中确实有这类课程，比如当众演讲和工会管理。在一些英国工会中，人们至少在实践中，把会员教育等同于技能培训；然而在菲律宾，技能培训是排在提升阶级意识之后的。我们见到的在建筑上喷涂标语、在布上写口号的工人，他们没有接受过宣传方面的培训，但是作为积极分子，他们差不多肯定已经在“真正的工会”课程中讨论过剥削、资本主义、集体行动、以及社会主义一类的问题。

对于五一工联的教育成果，各国代表团都认为，在大多数纠察线上，都能找到一些能够清楚表达出对工会和政治情势的看法的普通工人。从代表团对五一工联提供法律服务的部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处理工人申诉的工作还有待改进，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需要改进。

各国代表都注意到了他们的教育方式，马来西亚代表考虑引进“真正的工会”课程，他们说，“我们那儿还没听说过‘真正的’这个词”。

为了全面起见，我们需要引述菲工大对他们的批评。

“五一工联和联合阵线中的组织教育其成员的课程是一样的。他们全部的教育材料都要得到菲律宾共产党地方党委会的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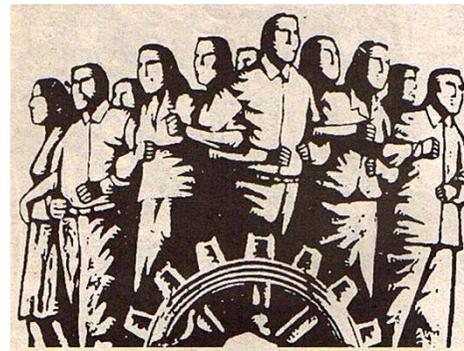
“基础教育项目叫做‘真正的群众课程’，从共产主义的

观点出发，讲述菲律宾的历史，尤其是工人的历史。他们认为菲律宾人民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美国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菲律宾处在‘美国-马科斯集团的专制统治’之下。”

“中级的课程叫做‘真正的工会主义’，教导的是对抗性的劳资关系。他们描绘了一幅劳资关系辩证发展的图景，声称这个矛盾需要通过‘文化革命’，最终以‘武装斗争’来解决。”

“终极课程留给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这些人能够成为预备党员。这被称为‘内部党建’，教工人如何在党支部的指导下，在工作场所建立自己的党小组。”

菲律宾大学的法学教授 Perfecto V. Fernandez 做出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他说，“在菲律宾，工会作为人们熟悉的一种社会机构存在了 80 年，但是工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是由于工人运动内部的软弱，也由于工会处在一种不利的甚至是敌对的环境中。尤其是后者，造成了人们对工人的要求、工作，以及工人参与工会活动过程的相当的无知。”上述这段话引自 1985 年 Rody 和 Rosario 合著的《工会！》一书的序言。在这本关于工会的入门读物中，没有提及任何现有的工会。但是这本书中的基本方法与 PAMA 小册子类似。也许这意味着，五一工联的“真正的工会”中的方法对任何工会开展教育都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第 17 章 自由工人联盟 (FFW)

自由工人联盟 (Federation of Free Workers, FFW) 组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原来的口号是“不要共产党, 不要骗子, 不要公司操纵, 不要政治和政客, 不要政府控制”。自由工联隶属于世界劳工联合会 (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r), 其前身是世界基督教劳工联合会 (World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labour)。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肆虐”, 同时也反对“一切形式的马列主义的国家主义”。他们的资金来自于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1983 年他们收到了 110 万比索的经费。他们还雇了一个德国人全职从事教育工作。

自由工联大部分的会员在吕宋地区, 尤其是大马尼拉地区。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工人在联盟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据独立的消息来源, 自由工联为其组织干事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 以便使他们不容易被贿赂。

如果菲工大垮掉了, 自由工联就会是主要的得益者之一。

自由工联的教育

自由工联通过一家叫做菲律宾社会机构 (Philippine Social Institute) 的组织实施教育计划, 并得到亚洲工会兄弟同盟 (Brotherhood of Asian Trade Unionists) 和 KAF 的协助。

(1)、劳工基础教育预备课程, 包括 6 次长 30 分钟的幻灯片演示, 以及紧接着的座谈会或讨论会。

(2)、劳工基础教育课程, 一共包括 6 节课, 每次 3.5 小时, 参与人数是 30~40 人。

(3)、基础培训课程, 有关工会基本技能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

(4)、经济学、社会学等入门课程。

(5)、定期的工会主义研讨班; 两周的领导能力培训

(6)、特别研修班: 多层次的技能培训和两周的强化课程

(7)、职员发展高级计划

以 1977 年为例, 有 6127 人参加了第 1、第 2 和第 3 项课程的学习, 283 人参加了第 5 项课程的学习, 189 人参加了第 6 项课程的学习, 另有 940 人参加了其他课程的学习。

阿兰萨门迪斯先生

我见到了自由工联的副主席阿兰萨门迪斯 (Efren Aranzamendez) 先生。他年轻、精明, 谈话很坦率, 也很主动。

他祖籍美国,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而 he 自己是第二代人。他在碧瑶市做学生时, 受到了菲律宾政府的限制, 直到 1969 年才获准离开这个国家。就个人而言, 他还是更希望这里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他说, 缴纳会费的会员有 20 万人 (劳动部的数字是 40 万)。这个组织“面向基层, 且其地方干部由大会选举产生”。自由工联的元老 John Tamm 是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的顾问, 但是这比他作为世界劳工联合会的主席还重要。

他把自由工联的立场描述为中左翼, 而且显然是不支持马科斯的。他说, 据劳动部的记录, 应由自由工联负责的罢工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多。最近在巴坦, 自由工联巩固了他们的立场, 他们是最有战斗性的。在泛亚公司, 那些离开自由工联转向五一工联的工人回来了, 因为他们受到巴坦劳工联盟 (AMBA-BALA) 的支持。他指责五一工联将自己以外的其他工会全贴上“黄色工会”的标签。自由工联的一些成员在罢工纠察线上遇害。在 ERA 纠纷中, 两个工会干部遭到卡车碾压。同时还有很多人入狱。很明显, 这些肆意逮捕和杀害都是错误的; 必需要有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

自由工联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愿意被渗透或被利用。“来自左翼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民族民主阵线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的成员就接受上级的指令。他举例说, 五一工联下属的全国农业工会联盟中 40% 的成员都是被共产主义民族民主阵线控制的。他觉得, 就连

奥拉利亚本人都未必知道是谁在控制五一工联。他说，共产主义者的策略是，通过外部联盟的介入来引起罢工，而不考虑具体条件，也不管斗争能不能成功。如果他们赢了，就会接管工会。要是失败了，一些人会变成极端分子，另一些人会上山去打游击。他认为这是一种对工会的破坏。五一工联宣称的工人反对富人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用的。他们对选举的抵制是彻底失败的。他还质疑五一工联的资金来源。他说，五一工联用的一些律师，从谈判中抽成。

自由工联从来没有加入过菲工大（TUCP）。劳动法出台的时候，自由工联组织过抗议游行。他们向最高法院提起的诉讼还在等候审理。强制仲裁是不对的。在戒严法时期，三方原则就意味着政府的意见占据主导。例如工资水平的问题上，菲工大不愿意和政府对抗，他们更愿意听任马科斯做决定。到了政府换届的时候，菲工大就死定了。只有菲工大选区之外的工会联盟才有稳定的会员。其他的菲工大组织如PGEO和PAFLU都已经四分五裂了。全国工会（National labor Union）只是个皮包工会。菲工大是只纸老虎。

至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他认为图帕兹（T Bonni upaz）是个共产主义分子，否则TUPAS是不会附属于世界工联的。TUPAS是被渗透了的。

我们谈到了工人的处境，他承认现在工人的处境是非常令人绝望的。很多企业发现很难给工人更高的工资，尽管他们经常承诺给工人加薪。他赞同主教和企业家大会的声明，我就其中的一段向他提问，“管理方和资方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他们负担的应用于工人的标准也同样应用于自身的薪酬福利。”他说，在日本，高管和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7倍；而在菲律宾，这一数字是50到100倍。在遇到困难时，公司不应该裁掉工人，而应该压缩高管的薪水。但这在菲律宾没法马上做到，因为菲律宾目前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土地贵族还在控制着一切政党。

菲律宾的很多问题都源于经济管理不善。糖业20万工人遭解雇，因而在班乃岛左翼运动势头高涨。在戒严法期间及之后，政府都是由独裁者控

制着的，媒体被操纵了，反对派受到压制，腐败和低效率四处蔓延。比如，据估计美国对菲贷款中有三分之一都没到过菲律宾本土。阿基诺事件能够唤醒民众，这是一个转折点。自由工联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产阶级也走上了街头。

在独裁时代之前，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我们有好的基础教育系统，人民是有文化的。

然而示威游行并不能使马科斯辞职。必须要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才行。下次大选中，菲律宾新社会运动党（目前的执政党）的得票也许会大幅下跌。年轻的一代人会起来。与此同时，工人们会受到教育，并且政治化。一旦马科斯倒台了，经济就能够反弹。

他还认为新人民军（NPA）的武装力量还不足以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至少在未来的3~5年内不可能。生活在群岛上的菲律宾人热爱和平，不会去搞暴力革命——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就花了300年的时间。

对于未来的经济政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菲律宾走上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道路，这样美国把机械设备出售给我们，而我们的工业一旦有所发展，他们又开始设置贸易壁垒。比如英国，就实施了对纺织品的保护主义政策。我对他说，菲律宾经济是很脆弱的，依赖外国资本，很多工业部门从事于中间加工过程，依赖原材料进口，因此不太容易能够独立；菲律宾需要发展满足本国粮食需求的农业，而不是为了出口的农业。

我提出说，美国的镇压政策正在迫使人民以暴力作为回应。阿兰萨门迪斯先生说，在美国的时候，他问过美国人，为什么要支持台湾、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受政府控制的工会。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最近访问了菲律宾——也许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吧。

可以想见，庞塞·恩里莱（菲律宾国防部长）和其他人可能会发动一次政变，紧接着是选举。当然马科斯可能会再度宣布戒严，但是人民不会再次容忍了。或者有可能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即使很多政客并不是极右翼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温和的中间派，教会会支持中间派，而自由工联将扮演这个角色。

第 18 章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 (TUPAS)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 (TUPAS) 成立于 1972 年 4 月。其创立者和现任秘书长图帕兹 (Bonifacio Tupaz) 是马尼拉南部港口的保安队长。据现任主席 Napoleon Macaluda 介绍, TUPAS 不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成立的, 而是图帕兹的保安工会被 PT&GWU 公司驱逐之后的应对措施, 目的是保证工会的生存以及获得外界支持。

作为一个工会联盟, TUPAS 建立之后便成长迅速, 曾一度每两天就有一个新工会加盟。

TUPAS 声称, 截止到 1984 年共拥有 20 万会员。联盟拥有 18 个地区办事处。其下属 12 个劳工联盟, 9 个全国性工会, 179 个地区性工会和 530 个地方分会。联盟在其出版的刊物《铁砧》的 4 月号上列举了 1985 年 1 月至 4 月 15 日之间的 29 次罢工, 其中有 21 场罢工已经得到了解决, 另外 8 场罢工则还在进行中。TUPAS 声称他们向劳资关系法庭 (NLRC) 要求立案仲裁的案件, 比其他任何一个联盟都要多。

TUPAS 所做的声明反映了他们的政策方针: “TUPAS 始终站在争取恢复罢工权的斗争的最前线……TUPAS 正陷入与跨国公司的企业、残暴的政府官僚及其在工会运动中的代理人的苦战之中……TUPAS 的答复是, 以坚定不移的行动把工人阶级团结在真正的和进步的工会运动的旗帜下。”

五一劳动节过后一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在与菲律宾全国工会联合会 (NATU) 主席 Vic Bati, 以及 Rey Capa 一同谴责企业裁员时, 图帕兹先生显示出他在这种场合发表得体言论的一贯技巧。他说: “我呼吁总统重视这一严重问题, 希望劳动部能够遵照总统五一节讲话中传达的信息, 否则工人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并继续罢工和建立纠察线。”他还说, “管理层无意解决纠纷……让这一切暴力结束吧。企业家必须恪守一定的道德, 为互惠互利的谈判气氛创造条件——否则的话, 无论管理层使出什么花招, 在

我国经济的这个悲惨时刻, 工人都将会给予回击。”(《都市先驱报》Metro Herald, 5 月 14~20 日)

TUPAS 有一个教育计划。“TUPAS 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运动。那个时候, 在存在戒严法的环境下, 教育工人作为一种手段, 对于发展、巩固 TUPAS 并实现其目标来说, 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引自 Macaluda 1984 年在国会的报告)

1972 年, TUPAS 加入了菲工大, 但是两年后就退出了。“菲工大认为工会运动中只应由一个工会领导, 最好是始终和政府唱一个腔调的工会, 而 TUPAS 认为真正的团结只能来自工人要求团结的集体意愿, 而不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威压或资本家的收买。”

门多萨先生对图帕兹进行了严厉批评, 指责他“脱离菲工大的理由完全是自私的。他想成为雇员赔偿委员会 (Employee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中的菲工大的代表, 这是一个三方机构。其次, 在菲律宾, 附属于世界工联 (WFTU) 的工会还比较少, 所以他很有可能从国外友好劳工团体得到更多的资助。”

在工人反抗贫穷全国联合会 (PKMK) 之前, PMP 是连结五一工联与 TUPAS 的中间组织。据门多萨先生说, 由于内部分歧, PMP 正摇摆于 TUPAS 和 KAMPIL 的 Rey Capa 之间。这个亲莫斯科的工会联盟最近正在根据旧的菲律宾共产党的指导反思他们的立场。Capa 和图帕兹之间的争吵 (没有被当做意识形态的斗争) 因为 Capa 的抱怨而变得更加激烈, 他认为世界工联和设在达斯马里尼亚斯 (Dasmarias) 的苏联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俄国联络人都更偏向图帕兹,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图帕兹是一个忠诚的同志。他认为图帕兹的政治觉悟提升得太慢了。

图帕兹的回应则更有说服力。他指控 Capa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 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劳工参赞 Joseph Lee 联络。

“五一工联与 PMP 之间的‘左翼联合阵线’的破裂源于 PMP 指责五一工联的冒进主义导致奥拉利亚和图帕兹被捕。出于对亲北京的共产主义者的敌意, PMP 开始考虑加入菲工大来

打击五一工联。”

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图帕兹似乎想通过我给门多萨先生传达一些信息。

图帕兹先生

60岁的图帕兹（Bonifacio Tupaz）先生是TUPAS的秘书长，他的名字恰巧与联盟的缩写发音相同。“门多萨和自由工联的Johnny Tamm都是我的朋友，我和奥兰多的父亲老奥拉利亚同岁。”图帕兹1982年9月被捕，被监禁了8个月。世界工联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申诉，马尼拉的国际劳工组织办公室邀请他作为代表参加一个国外会议，争取释放。

我在图帕兹的一所位于王城区（Intramuros）的老式建筑里见到了他，那里一看就知道是工会的地盘。墙上用粉笔记录着TUPAS开展组织工作的15个公司的名字，还有发起代表权选举的情况。他的桌子上写着“图帕兹（Bonifacio Tupaz），律师，公证人”。

他对五一工联没有询问他的意见就在工人反抗贫穷全国联合会（PKMK）内部发起团结运动感到失望。劳动节那天，他接待了来自法国（CGT）和保加利亚的访客。他想起TUPAS曾经发电报声援NUM。我提到他参加过对皮诺切特来访的游行示威，他补充说他曾经建议菲律宾大学的校长不要授予皮诺切特荣誉学位。

我问他五一工联和TUPAS之间有什么区别，以及他对进步工会团结的前景怎么看。他回答说五一工联是跨领域的联盟，包括学生组织、城市贫民组织，等等，而TUPAS只是一个工会。五一工联具有更加公开的政治倾向，尽管TUPAS实际上是隶属于世界工联的，而图帕兹本人也在世界工联中担任职务。

他说他曾给国际劳工组织的总干事Francis Blanchard写过信，抗议1458号指导意见，这个文件规定不服从总统裁决或者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判决的行为违法。（Rey Capa也在5月11日给Malaya的一封信中提出了类似的抗议）

我问他，除了这次世界工联因为他被逮捕而提出申诉，TUPAS是否有想到过利用国际劳工组织的申诉机制。他说他现在还处于软禁状态，参与国际活动是受到限制的。

图帕兹先生说：“菲律宾工人现在有所觉醒了。政府有杀人许可证。司法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马科斯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马科斯聪明、敏锐，他背着300亿美元的贷款，他怎么还得清利息呢？为了还贷款他不得不择手段。他才不会管什么国际劳工组织呢。”

“劳动人民——我只关心劳动人民——现在有1900万，但是工会现在只能组织起来200万人。为什么？因为法律。政府中的工作人员过去是不能成立工会的。戒严法禁止政府公务员的工会，现在依然如此。”

“这个国家将会有一场革命。这是很坏的事情，菲律宾人打菲律宾人。国际劳工组织在睡大觉。公众权利一直被剥夺了20年。”

“你不能指望菲工大保护我们。他们是拿政府钱的。工会怎么能一屁股坐在政府那里呢？现在我很高兴看到菲工大也组织集会了。五一节那天马科斯看到了他们的集会。你明天见到门多萨的时候，告诉他放弃自己的立场吧，告诉他要为未来而战斗。他很老了，没什么好失去的。他死的时候又不能把那些财产带走。我斗了36年还活着；他有什么好怕的？他应该意识到BP 130和BP 227号国家法律对国家是没好处的。”

我问到了TUPAS教育计划。图帕兹说他们是唯一一个有用于研讨会房屋的工会，距马尼拉45公里。其他的在宿务和达沃。有针对工厂层面的课程；有名为“塑造工人思想”的课程；每年还举办全国性的研讨会，以及工业研讨会。每年他们举办工会领袖研讨会，培养未来的工人骨干。他的儿子负责联盟的教育，目前正在与位于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沟通。

他说，五一工联有一家名为Malaya的媒体支持，还有天主教会和一些外部机构的支持。我问他，菲律宾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后 记

“菲律宾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想要获得独立。殖民主义是不受欢迎的。然而资本家们想要控制经济。除非资本家放松控制，不然发生在越南、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事也会在菲律宾发生。即使是属于马科斯势力范围的省份，前几天也发生了一个事件。人民正在一天天变得勇敢起来。”

“马科斯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所以现在人们厌恶美国人。如果中国南海不存在的话，军队就很容易过来。新人民军（NPA）也不会这么容易幸存下来。多年来越南一直在反抗外国的剥削。美国人会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进行干涉，就像他们在格兰纳达和尼加拉瓜一样。马科斯政府是腐败的。”

最后，我们握手合影。我祝愿他能够亲眼看到革命爆发的那一天。



本次采访中，许多经历过七八十年代工运高潮的老战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发自内心地憎恨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掌握了反剥削抗争的丰富经验，锤炼出了百折不挠的韧性。虽说几十年间目睹了运动的几起几落，他们仍对工人解放的前途抱有深刻的乐观主义。所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国内的罢工/维权工人普遍缺少的。

1989~1991年以来，中国建立起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二十年里，中国工人历经了国企的普遍倒闭、裁员，沿海外企、私企的持续发展，以及加入世贸以来的跃进式工业增长，目前，无产阶级的队伍空前庞大。但无论是珠三角工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工人，普遍缺少应对老板压迫的思想武器，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在菲律宾，战斗性工人虽然受尽磨难，但许多反抗传统顽强保留下来了。本次采访的部分工人，要么父辈曾是罢工积极分子，要么在斗争中受过老一代觉悟工人的熏陶。在阶级传统潜移默化的教育下，许多工人至少能认识到：劳资是根本对立的；工人无论有何差别，毕竟是一个整体；工人很难摆脱阶级出身，要真正解脱必须敢于反抗，诸如此类。

而在中国，阶级斗争的传统中断已久。九十年代国企工人对下岗的反抗，是充满幻想和犹豫不决的，整体很被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进入21世纪初，那支老的国企工人队伍，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同时在沿海，工人对老板的反抗获得了新的动力。工厂越开越多，劳资矛盾遍地都是，近十年来，珠三角地区的罢工不计其数。然而，壮大后的私企工人队伍，甚至不具备国企工人那一点点集体主义传

承，只得盲目地一边生存一边学习如何对付老板。

除了斗争传统的缺失，资本主义复辟也给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带来深刻变化。人们的内心变得灰灰的，被压迫者集体抗争的理想，受到从上到下的广泛漠视。关注自身私利、个人奋斗打拼出头的人生态度，强烈地主宰着工人在内的年轻一代。十年来制造业的持续繁荣推动了小生意的暂时泛滥，使无数工人幻想成为小业主，永远逃离工厂。以上种种精神因素，导致珠三角工人在具体斗争中无论如何机智勇敢，始终缺乏连续性，难以深化对劳资矛盾的认识，至今没有涌现出一批能从整个阶级的高度看问题的觉悟工人。

那么觉悟工人的精神演变历程是怎样的呢？不论在菲律宾还是在中国，这一历程大致分成几个阶段：

- 1、为了个人或群体的日常利益，或是出于对社会不公的愤恨，而参与到某项反剥削斗争中去。
- 2、在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热情，希望更多了解工人的社会出路何在，愿意为了推进工人的事业而付出代价。
- 3、发现所参与的维权斗争改变了工人的生活，但也有许多缺点。不愿再回到过去消极的生活状态中，开始产生使命感，期待在新的斗争中加强反抗的效果。
- 4、发现自己的才智十分有限，而阻力（包括最意想不到的阻力）是无穷无尽的。开始懂得自己只是工人事业的一分子，而最需要做的，是以本阶级利益为指南，推动所处的工人集体向前走，去争取更多工人起来反抗老板。
- 5、在持续的阶级战争中经历了蛰伏、胜利、挫折、迷茫、叛卖和突围，体验过冲上天空的喜悦和堕入深渊的绝望，但仍然决心前进，前进，直到工人阶级接管社会。

目前来说，珠三角最优秀的维权工人，也顶多走到了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二十年来，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剥削阶级对工人构成了

一边倒的力量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在工人中产生了对现存秩序的迷信，相应的，是对自身力量的轻视。迷信也好，轻视也罢，最终只能由斗争工人自己去打破。本书整理了一批异国战斗性工人的精神剪影（个人印象），作为中国工人未来前进的路标。

说几句“马克思主义青年”

这一代的中国高校学生以及年轻职员群体，带有服从资本主义现实的浓厚特征。少量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也不例外。不管挂什么激进招牌或炮制何等做作的表演，这些青年默认世界自然而然地分成两类人：“上等人”和“下等人”，“管人的”和“被管的”，“说了算的”和“跟着走的”，而这一尊卑秩序是亘古不变的。他们口头赞成改造社会，但不相信工人是社会改造的主体。他们对工人有着强烈的隔膜感，对无产者接管国家的前途充满轻蔑，甚至不是轻蔑，而是绝对的无视。本质上，他们是资本主义秩序下的驯良市民，充满了保守性。他们远不是合格的材料，不可能产生类似菲律宾工运老干部那样的战士。

但这并非是他们“天性”如此，而是我们所处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无休止膨胀，阶级矛盾必然迎来周期性的高潮，而社会思潮的大环境，也会跟着有所不同。大浪淘沙，只要以服务工人利益、促进工人斗争（而不是空话与表演）为评判标准，就一定能从新一代青年中筛选出真正的战士。

目 录

前 言	1
-----------	---

综 述 篇

菲律宾工人斗争简述	4
菲律宾天主教会简介及其与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关系	27
菲律宾工人生活、工作状况	31
菲律宾的工会	35

运 动 篇

自发罢工与有组织的罢工	49
罢工中的工人组织问题	53
外界支持	68
斗争工人面临的迫害	72

访 谈 篇

菲律宾工运史问答	76
----------------	----

· 人 物

妇女运动组织者奥菲	89
露同志	96
琳达经历的工人斗争	101
七十年代老组织者访谈	108
药品和食品联盟主席访谈	113
前酒店工会干部老杜	116

真正的民族主义工人联盟（ANGLO）毕主席	123
修 女	132
神 父	141
南他加禄省工业区简介	146
“伟大领袖”老沃	149
本田工会主席老罗	155
纸鹤老巴	159
“艺术家”老波	166
汤老伯的两次罢工	169
丰田工人访谈	175

· 工 会

吉普尼协会情况	181
N 公司工会访谈	190
IBM——工人团结之光工会	196
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座谈	199

· 事 件

矿区工人的斗争	206
---------------	-----

· 其 他

首都某年轻工会干事访谈	225
服装厂的罢工	227
烟草公司的罢工	229
台资厂女工：为反对转成派遣工而罢工	231
一次组织工会失败的经验	233

纪 行 篇

菲访谈见闻琐碎记	239
----------------	-----

菲律宾见闻.....	247
菲国游记感想及见闻	251
菲律宾行纪.....	260
菲国游	269

资 料 篇

第1章 马尼拉的五一劳动节.....	280
第2章 马尼拉工厂中的工会组织.....	287
第3章 碧瑶市的工人	294
第4章 考迪莱拉山区的矿工.....	304
第5章 内格罗斯岛的糖业工人.....	311
第6章 巴坦出口加工区.....	321
第7章 碧瑶市的出口加工区.....	331
第8章 公共雇员.....	336
第9章 罢 工.....	347
第10章 棉兰老岛日记	357
第11章 镇压工会	372
第12章 工会历史和结构.....	385
第13章 菲律宾工会大会 (TUCP)	391
第14章 五一工联 (KMU)	407
第15章 五一工联的同盟者.....	420
第16章 工会教育	430
第17章 自由工人联盟 (FFW)	441
第18章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 (TUPAS)	445
后 记	450

本书提到的各主要组织及名词列表

- ☞ 五一工联 (KMU): 全称 May the First Movement, 1980 年成立的战斗性工人的工会联合会, 接受菲共的政治领导。
- ☞ 菲律宾工会大会 (TUCP), 简称“菲工大”, 全称 Trade Union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1975 年底由菲律宾政府将一些主要工会联合而成的全国总工会, 隶属于国际自由工联。
- ☞ 自由工人联盟 (FFW), 简称“自由工联”, 全称 Federation of Free Workers, 自称独立的改良主义工会联合会, 60 年代在美国产联的帮助下成立, 隶属于世界劳联。
- ☞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 (TUPAS), 全称 Trade Un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Allied Services, 1972 年成立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 为苏联官方主导的世界工联的成员。
- ☞ 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 (KMP), 简称“菲农运”, 全称 Peasant Movement of the Philippines, 成立于 1985 年。
- ☞ 新爱国联盟 (BAYAN), 1985 年成立的左翼反对派共同阵线, 聚集了自由民主派和革命派。五一工联、菲农运是主要加盟者。
- ☞ “真正的工会” (GTU), 全名 Genuine Trade Union, 由五一工联组织的课程, 旨在培养劳工意识, 分辨战斗性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区别以及培训工会运作实务等。